

林默涵 魏巍 主编

# 我们唾弃 那种中国人

动乱“精英”在海外

不废江河万古流 一个留学生的思考



# 我们唾弃 那种中国人

动乱“精英”在海外

不废江河万古流 一个留学生的思考

■ 林默涵 魏巍 主编

责任编辑:王忠民

## 我们唾弃那种中国人

林默涵 魏巍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甘肃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1 字数 286 千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200

ISBN 7-226-02148-X/I·547 定价:23.8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 目 录

## 第一章 动乱“精英”在海外

- 大内证：王希哲状告魏京生 ..... 宋文申(3)
- 媚外软骨症
- 评魏京生晤沙特克 ..... 冷 眼(10)
- 盛世妖孽 ..... (马来西亚) 彼 岸(16)
- 民族败类吴弘达的丑恶表演 ..... 何孝先(18)
- “马前卒”的悲哀 ..... 文从周(24)
- 表错情
- 方励之、李洁明交恶记 ..... 马 鸣(27)
- 如此“斗士”
- 李洁明大曝方励之当年“避难”内情 ..... 马 鸣(32)

## 莲花落

——政治乞丐方励之的“精彩表演”……………牛 羊(37)

“国宝”王若望……………隋 卞(39)

## 昙花梦

——“民运”水晶城闹剧……………孔 见(49)

## 齿冷录

——“精英”百丑闹剧补记……………振 兴(65)

中国流亡者在西方……………(美)梅 佳(77)

严家其的新包装……………宋文申(83)

## 立此以存照

——请看海外《探索》杂志关于“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  
和平演变”的“笔谈”……………(89)

### 附录：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摘要)

……………司马璐(92)

大老爷与“小学生”……………魏 巍(97)

## 难得的教员 绝妙的教材

——逃亡“精英”启示录……………赵望 凌光(100)

## 孽海孤舟

——“民主女神”号炎凉记……………林照真(124)

## 卖身投靠的“效忠信”

——“民阵”上书克林顿……………马 鸣(131)

陈一谘从幕后来到幕前……………韦 骥(134)

## 怎一个“丑”字了得？

——叛逃“精英”在海外的表演……………郑一天(139)

叛逃“精英”劣迹钞(六则)……………章 嫻(152)

## 国格人格的廉价大拍卖

- 评祖慰、刘宾雁台湾行…………… 赵 初(157)
- 苏晓康沉浮录…………… 马午阳(162)
- 从《河殇》到《五四》…………… 殷其雷(175)
- 西方无岸
- 孔捷生其人其事…………… 于 逢(181)
- 1988: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在巴黎…………… 牛 羊(186)

## 第二章 不废江河万古流

- 爱我中华的心声,壮我中华的呼唤…………… (199)
- 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
- 读何亲先生文章有感…………… 颜元叔(202)
- 中华民族揭开了腾飞的历史
- 遥致颜元叔书…………… 潘亚暎(210)
- 真正的爱国者
- 读颜元叔诸先生文章感…………… 魏 巍(217)
- 盘古龙之再临
- 答苏晓康先生…………… 颜元叔(227)
- 一片冰心在沸腾…………… 颜元叔(235)
- 牧惠为什么大骂颜元叔?…………… 刘志洪(253)
- 不忘民族恨,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劣根性…………… 雁 湫(262)
- 牌子与骨子…………… 柳下舟(266)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 .....	
.....	马福龙 徐国梁 虞骁(273)
谁对历史开了个大“玩笑”? .....	蔺美璧(281)
意大利人奥雷利奥·佩西如是说.....	林一株(284)
也谈“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	陈漱渝(287)
毛泽东同志怎样评论“狗与华人不得入内”这块牌子? .....	柳岸牛(290)
请读陈天华的《警世钟》 .....	正 言(295)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续考 .....	绿 原(299)
都怪中国人犯了贱 .....	老 编(303)
洋奴的嘴脸 .....	郑永慧(307)

### 第三章 一个留学生的思考

#### 一个留学生的思考

——《友人书简》之一..... 丹 阳(315)

#### 令人悲哀的卑谄心态

——《友人书简》之二..... 丹 阳(324)

#### “变相难民营”

——《友人书简》之三..... 丹 阳(330)

#### 选择

——《友人书简》之四..... 丹 阳(338)

不该折断的帆

——《友人书简》之六 ..... 丹 阳(347)

“自我”与“沙粒”

——《友人书简》之七..... 丹 阳(356)

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友人书简》之十五..... 丹 阳(366)



## 第一章

# 动乱“精英”在海外



## 大内讧：王希哲状告魏京生

宋文申

在刚刚进入 20 世纪最后一年：1999 年 1 月 8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在美国媒体面前，由美国国会众院举行的一个专门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所谓“听证会”上，闹了一场中国的所谓“民运分子”或“异见分子”内部各个山头 and 派别之间的“同室操戈”。他们“相互攻击”，互指着鼻子大骂、大吵、大嚷、大闹、“大打出手”。沸沸扬扬，演出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混战和恶斗，把个“听证会”搞得不欢而散，至今余波未消，继续口诛笔伐、各不相让，还闹到了美国的“公堂”，在洋人面前打起了“官司”……。

一些中国的民族败类，在“洋”地方的“洋人”面前出尽了中国人的大“洋相”！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大开眼界、发人深思的“奇闻”，一出自我讽刺的“闹剧”和“滑稽戏”！

### 在“主子”面前大动干戈，出尽“洋相”

最近一个时期美国统治集团和反华势力，显著强化和加紧了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攻击和“惩治”的力度。最突出的就是借所谓中国的“人权”、“人权”等大做文章，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增强、施加压力。

人们知道，美国政府的官方人士，包括其总统和国务卿，都曾

“信誓旦旦”表示要同中国建立什么“21世纪战略伙伴关系”。可是他们起劲做的,却是另一回事,恰恰是利用一切机会,不择手段地压服和“惩治”这个被称为“战略伙伴”的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这种背景和气氛下,作为对中国施压的手段和步骤之一,由美国国会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出面,在华盛顿国会山庄专门召开了一个所谓“中国政府镇压民主运动”、“践踏人权”问题的“听证会”。这个“听证会”,专门挑选了几个死心塌地投靠美国、由美国豢养、彻底背叛祖国的所谓中国“异见分子”“民运人士”,充当“做证”人,专门对付自己的“战略伙伴”——中国。

这又是哪一家、谁同谁、何种“战略”的“伙伴关系”呢?

当然,这几个黄皮肤的中国人,其实也够不上美国真正“平等”的“伙伴”。充其量不过是受其豢养、庇护,任意调遣、驱使的一帮死心塌地为美国“战略”效劳的“奴才”、“走卒”而已。

可是,美国在这些奴才中,却单单看重和选中了新近来到美国并大为“走红”的魏京生和刘念春,以及更后一些来到美国的几个鲜为人知的人。而投靠美国“资格更老”,为美国对付中国立过“汗马功劳”的王希哲等人却遭到冷落。他们只够坐在“听证会”的“旁听席”后排“旁听”的份。

这就不免引得王希哲等人颇感“失宠”,醋意大发。在魏京生等“做证”,摇尾乞怜,发表一通大骂自己祖国,哀求美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对中国实行更严厉惩罚和制裁的“证词”之后,王希哲等就立即从旁听席站起来,对“听证会”仅仅邀请了魏京生等人,冷落了其他的人,表示了强烈不满和抗议,指着魏京生的鼻子怒骂。

结果引起了王希哲和魏京生等人之间一场恶言相对的互相攻击和斥责。

报道说,王希哲在“听证会”快结束时,“突然起立”,对美国主

子没有邀请他“做证”大声抗议，高喊“这一次出席听证会的几个证人，是没有资格为中国民主党说话的”。还大骂魏京生等人“欺世盗名”，说魏对中国大陆一些所谓“异见分子”非法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历来持反对态度，还曾中伤他们是“共产党特务”，因此，他根本不够资格，“不能代表海外民主运动”到这里“做证”。

而魏京生等人则反唇相讥，大骂王希哲等人“居心叵测”，“非常恶劣”，“有意抹黑海外的异见人士”，甚至把王希哲指为“共产党特务”。

这场突然爆发的争吵，使国会的会议主持人仓皇失措，最后不得不招来警察维持秩序，使得这个“听证会”中途不欢而散。

据有的报道描述说，“冲突场面一度十分火爆”，“最后‘动起手来’，升级为‘武斗’”，“令场面失控”，后来不得不“由国会警察将王希哲等人押离议会大楼才了事”。而那位主持“听证会”的美国人，更是“手足无措”，不得不悄悄退席，溜之大吉。

在“听证会”后，王希哲与王若望等人还在会场外发表“连署抗议声明”，公布揭魏京生老底的函件和录音，闹得“不亦乐乎”！

这幕热闹丑剧，还做了电视的现场实况直播。引起国际传媒的严密关注，纷纷进行了报道和评论，向我们绘形绘色地展示了那场“丢人显眼”的“丑剧”和“闹剧”。

## 丑剧“方兴未艾”

这场所谓“民运分子”的“内讧”，其实并非什么新鲜事。实际上，这帮人虽寥寥无几，历来却是以与“民主”、“民运”风马牛不相及的“内斗”为“传统”和“专业”的。几年前围绕所谓“民联”、“民阵”合并为“民联阵”的那场丢人显眼的“恶斗”，王若望头破血流，含泪兵败华盛顿，人们大概会记忆犹新的吧！王炳章、徐邦泰等人

围绕《中国之春》杂志那场同样闹到美国法庭的争夺战，至今也仍未停息。

这一次也不例外，据报道，1999年2月5日，王希哲等3人就以所谓“中国民主党”负责人的名义，向美国纽约州高等法院状告魏京生和台湾《新新闻》杂志“三项诽谤罪”，要求被告正式道歉并赔偿200万美元。据说已得到受理，并向被告发出了传票。看来，好“戏”还在后头！

如果说，当年王若望兵败华盛顿，是他妄图充当“中国的华盛顿”，担当海外“民运”总头目的野心和美梦的破灭，与什么中国的“民主”、“民运”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那么，这一次王、魏之间的华盛顿之战，也同样和中国的民主根本不搭界，纯粹是在其美国主子面前的一场肮脏的“争宠吃醋”、“争权夺利”的闹剧而已。这出最近的“表演”的近因，就在于自从魏京生来到美国后，得到其美国主子的特别青睐和器重，寄希望于他来“统合”处于四分五裂的所谓“民运组织”。为此，其中一部分人就大肆鼓噪，极力为之争取“诺贝尔和平奖金”，肉麻地捧他为中国的“民主之父”、“中国的曼德拉”。魏京生自己也洋洋自得，“欣然”接受，自认为“舍我其谁”、“当之无愧”。

这恰恰就是更早投到美国主子怀抱的王希哲辈所难以接受和容忍的。这不是明明抢了自己的位置和地盘吗？

这种“不争气”的情况，当然也引来了支持供养他们的美国有官方背景的反华势力的关切和失望。据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周刊的报道，在1月8日“听证会”闹剧的一周之后，前美国驻华大使夫人包柏漪就以“中国人权组织的创始人”的身份（这倒是透漏了这中国“人权运动”的真实起源、后台和背景！）“在曼哈顿第五大道的一家湖南餐厅”请魏京生、王丹、方励之等人吃饭，“对大厅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活动分子进行了说服工作”。可是王希哲却未见露

面。这也是意味深长的。

这篇报道中还提到“一些批评人士”认为，这帮人的内斗，“其结果是持不同政见者出现尖锐分歧，这对中国政府有利，并使这个流亡运动越来越同中国的局势发展脱节”。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这场表演的“终结”。

## 中国最腐败的一股政治势力

这帮十年前在北京制造政治动乱的分子，曾经把自己打扮成“反腐败”的英雄。经过十年来的反复表演，恰恰充分证明，他们本身就是中国的一股最为腐败的政治势力。难怪一位身居泰国的曾是“圈里的人”，把这帮人搞的所谓海外“民运”形容为“奸商宵小贻害无穷”的“丑陋的海外民运”，“差不多成了几个争地盘的流氓团伙”，“在海外中国民运的大本营美国，就又上演了一曲令人恶心的丑剧”。他们的权欲个人野心很大，可是权还没拿到手，自身就完全烂透了。

据海外一家报纸《星岛日报》在《从“一盘散沙”到“水火不容”》的“特稿”中评述说：“从八九年‘六四’事件以来，通过明或暗的渠道到达西方的中国异见人士少说也有两三百人，其中较有名气的有大概有数十人，但是在海外的各种异见人士团体竟有七十多个，有‘党’有‘派’，有‘会’有‘部’，由于各人都是主席、会长、秘书长、召集人，谁也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故两三年过去后，海外形容这些所谓的民运组织实际是一盘散沙。”

这就是对这帮子“民运分子”多年来的所作所为的很好写照。如果说，《沙家浜》剧中那个“胡司令”，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话，那么这些所谓的“民运分子”种种“党派组织”竟然连这样一个“平均数”都还达不到，互相之间的拆台，更是早就成了家常便

饭,这不是够可怜、可悲的吗?

他们目前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美国的一点不同名目(包括这样那样的以“民间”形式存在具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的施舍,有时还要跑到台湾去乞讨。当年召开的“民联阵”成立大会,则是由王若望专门跑了一次台湾讨了8万美元才得以开成的。魏京生前一个时期也曾专程去了一次台湾,受到李登辉的“接见”,其目的之一也是讨钱。据说并未捞到多少。可是这样四处乞讨的一点钱,相当一部分就已经进了个人的腰包,供少数人挥霍了。上述文章就提到,最近王希哲就曾“公开质疑魏京生所筹集的巨额资金的下落”。

一部海外“民运分子”的发展历史,就是始终贯穿着这种“四分五裂”、“争权夺利”、激烈“内斗”的历史。还没有拿到权力,自己就争得头破血流,还没有掌握经济大权,已经为“分赃”而打破头了!

这是一帮什么人?是一股什么力量?他们闹的是怎样一种“异见”?不是已经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了吗?他们自称是“民运分子”,至少该是与中国的“民”字即同中国的最大多数的人民大众的“民情”、“民生”、“民愿”、“民意”有点关系,与中国真正争取民主的民主运动有点关系吧?然而,不!他们却是当今中国与自己的人民大众最为脱离、最为格格不入,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他们连“众”也谈不到,有时甚至连三个人都合不拢。结果就形成了一伙不成气候的“乌合之众”。

民主,首先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表达人民的意志。和自己的祖国作对,和生养了自己的人民的共同意志作对,背道而驰;和美国国会的反华势力相结合,与中国的农奴主的最后代表赖相结合,与违背最大多数人民意愿推行“两个中国”的身居台湾的李登辉甚至一直从事“台独”的势力“民进党”相结合;干的是遵从反华势力的旨意,危害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勾当,这算什么



“民主派”？难道不是对民主的最大背离和亵渎吗？这哪里是“民主”！分明是“‘美’主”（以美国为主子，由美国做主）、“‘钱’主”（当外国金钱的奴仆），归根到底是“‘我’主”（一批谋取私利的个人中心主义者、唯我主义者），岂有他哉！

（《中流》1999年第4期，标题略作改动）

## 媚外软骨症

——评魏京生晤沙特克

冷 眼

编者按：这里刊登的《媚外软骨症》一文，转载自澳洲的华文《汉声》杂志。它揭露的是“动乱精英”魏京生，投靠、勾结其外国主子，摇尾乞怜地恳求其对中国实行制裁、禁运，大力干涉中国的内政，以对付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丑恶行径和卑鄙灵魂。这种对魏京生这个小丑的旗帜鲜明、一针见血的揭露和鞭挞，在国内众多的宣传媒体上，似尚未见到，知之甚少。把它转载于此，供大家一阅，恐怕是不无益处的吧！

值得注意也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患了典型的“媚外软骨症”，卖力地为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的“行政命令”和“世界战略”效劳的洋走狗魏京生，却正在被某些外国人吹吹打打地举荐为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候选人。

这些推举人，恰恰也就是魏京生早已投靠了的美国国会的那些反华的议员们。

据外国的通讯社报道，去年十月间，美国的58位国会议员，联合搞了一封致诺贝尔委员会的签名“提名信”。信中说：“我们坚信，魏京生得到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是当之无愧的。”“希望诺贝尔委员会能承认魏京生作出的特殊和杰出的历史贡献。魏京生代表的理想和目标，是中国和平转变的重要因素。”

主子一声令下，躲在美国的“动乱精英”方励之等，立即吠声吠声，起而响应。

这真正是“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了。

与世界和平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个卑劣的跳梁小丑，却居然被和人类最崇高的和平事业联系起来，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一种空前的历史嘲讽和咄咄怪事吗？按照美国的指挥棒，专事在中国制造动乱，竟成了“维护和平”；拜倒在美国脚下，乞求由美国在中国大地上当家作主，竟成了“争取民主”；保护一小撮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动乱精英”搞卖国、分裂祖国，推行美国“和平转变”的“理想和目标”的“权利”，竟然成了“维护人权”。所有这些居然又成了“特殊和杰出的历史贡献”，这不是对“和平”，对“民主”，对“人权”，对历史，也是对诺贝尔奖金的最大亵渎和玷污吗？

报载刚被假释出狱不久的中国“异见”分子、被西方誉为“民主斗士”的魏京生，于2月28日与刚到访中国的美国专事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沙特克共进午餐（见1994年3月2日澳洲《新报》报道）。席间魏京生竟然要求美国人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以延续中国“最惠国”经贸地位要挟，迫使中国政府在所谓的“人权”问题上向美国屈服，以期实现他所说的“如果美国有坚决的决定，便可望有大的收获，否则一切努力将属徒然”。……他还促请美国今年不可太快决定延续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如果中国拒绝改善及继续漠视国际压力，美国便应言出必行”。言下之意即要美国撤销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变相对中国人民施加经济制裁。魏京生之流跪倒于美国霸权面前，置自己国家民族振兴、发展的根本利益于不顾，甘愿堕落为美国反华的马前卒，丑态毕露，十足是一副洋奴嘴脸。

对于当今国际上自诩为“人权斗士”的山姆大叔的颐指气使，

世人几已习以为常,甚而是麻木不仁。总之对“人权”的诠释,山姆大叔说一,则他人不能说二,否则那根狼牙大棒砸将下来,那还得了。是故,折服于山姆大叔淫威之下喝“洋奶”长大的有着东方人面孔的所谓“民主精英”们,乃至那些虽喝不上“洋奶”却总想方设法仰仗山姆大叔的淫威,四处蛊惑人心,甚而狐假虎威,恃势凌压自己民族的“民主斗士”们,通通患上了“媚外软骨症”。对于他们的摇尾乞怜,百般做态,山姆大叔自是赞誉有加,万般呵护,如获至宝。前有方励之辈,后有魏京生之流,他们企图借美国人的霸气来凌压中国民族的正气,居心可恶可诅,每个有民族尊严的中华子裔都会对他们一伙的媚外求宠嗤之以鼻。

民主、人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有其自身形成的内在规律。各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因而造成了发展中的千差万别,这当可理解。然而,民族的生存、发展权是当今世界上每个国家民族步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缺乏了这个前提来高谈阔论所谓的“民主、人权”,如果不是狂妄无知就是居心不良。众所周知,西方国家今天的物质文明及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三五百年来对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民族,特别是对亚、非、拉美三大洲人民的疯狂的殖民掠夺。这段历史人们当可追溯至 1492 年哥伦布等西方殖民主义先锋抵达拉丁美洲时开始的血腥的对外豪取强夺及种族灭绝的殖民统治时期共 500 年左右的时间。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空里,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科技发展、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成形,殖民掠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臻至巅峰……一言以蔽之,西方国家积 500 年来灭绝人性的对外殖民扩张,豪取强夺,几尽榨干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膏血,以建成今天西方国家炫耀于世人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文明圣殿”。换一句话说,西方国家赖以走向现代化的生存发展权恰恰是建基于剥夺第三世界国家同样应

享有的权力基础之上,造成第三世界国家长达几个世纪陷于贫困落后、停滞不前乃至种族灭绝这样一个血淋淋的残酷困境。时至今日,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已纷纷奋起抗争,以争取和维护本民族的生存发展权的时候,西方国家以他们的血盆大口向发展中国家兜售他们那套“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价值观,就是十足的虚伪!其目的不外乎指责发展中国家的落后、野蛮以突显白种民族的“优越”和高高在上,从而贬抑、压制发展中国家步向现代化的种种努力。

鉴往知今。历史是一面最公正的镜子,往往伪装的妖魔鬼怪,在这面镜子里总要原形毕露,无所遁形。时时对照历史,人们当不能忘记西方的撒旦们犯下的深重罪孽。然而到了今天的科技时代,西方的撒旦们却乔装成了悲天悯人的救世主,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摆出了一副乐善好施的慈悲样。特别值得人们玩味的是,经过了改头换面,西方的撒旦们以教育、科技、物质享受、金钱美色等种种手段来培植一批又一批第三世界的“自由、民主、人权斗士”,以发动一场无形的现代的“十字军东征”,将他们的价值观念以“国际标准”作为包装,通过他们培植、影响的“精英”们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有形无形的渗透,内外呼应,软硬兼施,以期达到瓦解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摧毁一个民族的自信心,实现他们对第三世界“无兵以屈之”的目的。这是人们不能不严正对待的一招杀人不见血的恶毒招数。可以想象,如果西方的撒旦们的阴谋得逞,发展中国家顿成被抽掉民族脊骨再也挺不起腰干的软体动物,那么步向现代化非但免谈,而本民族的生存发展权也顿失依据,灭绝的命运也就摆在眼前了。这是不能不防的!而他们此一毒招能否得逞,端视乎他们所培植、影响的这批第三世界的“精英”们能否完成内应工作,这恐怕是发展中国家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隐患。

记得魏京生曾于70年代中期提出过一个当时颇具争议性的

“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观点，一时颇能耸动视听。由于他的言论充满激烈的感情色彩，因此很难弄清楚他此一观念的真正含意。但从他获得假释出狱后陆续读到的一些有关文字，特别是此次他本身的现身说法，那么，人们当可明了魏的所谓“政治民主化”的意涵不外是希望借助洋大人之力，在中国强行西方化制度。果如是，足证明魏京生之流是十足的史盲，盖渠竟置中华民族振兴发展的整体利益于不顾，甘愿为洋大人的马前卒，更是令人齿冷。

中华民族的子裔绝难遗忘我们民族在近代一百多年来蒙受西方列强所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深重灾难和屈辱，永远缅怀及秉承无数民族英雄、志士仁人为外抗列强以争民族的自由、独立，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统一，内惩国贼以求民族的振兴、富强，政治的稳定、民主，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地前仆后继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时至今日，一个独立自主，团结奋斗的中华民族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牢牢地掌握了自己民族的生存发展权，上下一心，正以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勤劳刻苦的传统美德建设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大业。在这个举世瞩目的历史演进中，中国人权再也不受西方列强的任意宰割，而是真正为全体中国人民所共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深入发展，中国人权将日臻完善。而这一切是完全建基于我们民族一百多年来艰苦奋斗，浴血抗争的结果，充分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勇于开拓，勇于进取的高贵品质。这同西方国家五百年来的殖民扩张，贪婪残暴，豪取压榨的强盗行径根本上是泾渭分明，完全不同的。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中华民族是以王道待人治天下，西方列强恰好反其道而行之，是以霸道欺人夺天下，这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价值取向。所以，那种崇洋媚外，企图以全盘西化来取代“中国特色”是根本违背基本国情的叛逆行径，注定是要失败

的。

“中庸”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藉此，不妨正告魏京生之流，希望你们在反民族的路上别越走越远，及早回头，善莫大焉。如果你们真的有一番为社会大众谋福利的抱负，那么就必须踏踏实实地投身于我们民族的振兴大业之中，以实际行动贡献你们的才智。但如果你们只想仰美国人的鼻息，妄图恃“洋威”以令中华，那么到头来你们将会发现，你们不但不能见容于中华民族，最终也必不能见容于其他族群。

(原载澳洲《汉声》1994年4月,《中流》1995年第1期转载)

## 盛世妖孽

[马来西亚] 彼岸

又一个人渣被撵出了中国,就像送瘟神那样,谢天谢地,阿弥陀佛!这回是魏京生,中国扔掉的垃圾美国捡回去当成宝贝,供奉膜拜,目的只有一个:反华!

“国之将亡,必出妖孽”。中国正当盛世,正在如火如荼振兴中华的关键时刻,却也冒出了一小撮像魏京生那样甘心任由摆布被用来反华的败类,为什么?卖国求荣!李志绥不是捏造了一部《一个医生的回忆录》,艾蓓不是虚构了另一部《叫父亲太沉重》,企图诬蔑当代的伟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吗?所为何事?还不是为了几个臭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断语加诸此辈倒是十分确当的。

“克林顿蔑视中国,在白宫接见魏京生”。这是新加坡《海峡时报》的大字标题。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克林顿是美国总统,理当日理万机,本不应也无需小题大作,下作到去搞这样有失体统的小动作,在丢人现眼之余,还损害了中美关系。

不单是克林顿,历届美国总统都是一样德行,喜欢小题大做,无事生非,搞小动作,搞对抗,来达到破坏世界和平的目的。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怀疑白宫的头头们的智慧和两党轮流坐庄的选举制的民主性。难怪有一个美国人曾经这么说过:只要有第三个总统候选人,即使是猴子,我也会投它一票。猴子也比克林顿有智慧。



克林顿智慧欠佳只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把中国当成假想敌,总是企图围堵中国。美国和一些西方列强这种反华心态,有时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不久前,诺贝尔和平奖不是颁发给了分裂中国的奴隶主达赖喇嘛吗?据说他们还准备提名魏京生,也把这个大奖奉送给他。为了反华,不惜践踏诺贝尔奖。和平奖的颁发不是为了促进和平,而成了搞对抗、分裂他国的手段,成了反华的一个毒招。诺贝尔假如九泉有知,肯定,肯定会椎心泣血,怒火万丈。

克林顿口口声声要和中国接触交往,要和解,不搞对抗。我看,他是口是心非。奉劝他,还是省点搞小动作的时间和精力,用点心思,苦读一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接触交往”一番,也许会开窍一些,演跳梁小丑的角色,有辱超级大国的尊严。

(《中流》1998 第 4 期)

## 民族败类吴弘达的丑恶表演

何孝先

编者按：下面所刊载的，是一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对投靠美国的民族败类、反华走卒吴弘达的丑恶表演，所作出的部分评价和反应。听一听生活在美国的具有起码爱国心的华人对这件事的种种议论，是颇能发人深思的。

被美国官方封为“人权斗士”的吴弘达，到底是何许人也？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却被美国“不断夸奖”为“真正的美国英雄”，当做“患难归来的英雄”而“热烈欢迎”，这不就一针见血地说明了一切吗？何孝先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连“反华的中外政客”都“心里雪亮”：吴弘达所作的一切，并“不是出于个人的使命感，而是职务赋予的责任”。什么“职务”？对谁的“责任”？原来，远在美国的许多人都早已十分清楚，“他（吴弘达）为英美情报宣传机构工作，用心良苦，力求表现”。不仅如此，他去年偷偷摸摸从新疆溜进中国窃取情报，不仅是直接受美国情报机构指派，而且还是“和负责宣传方面的美国人士同行”。这不是把他的身份、背景和使命交代得清清楚楚了吗？说穿了，这个吴弘达不过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背叛祖国、卖国求荣的汉奸、卖国贼，一个死心塌地地效忠美国主子，受美国情报机构豢养、派遣的卑鄙可耻的美国特务而已。正因为如此，他厚颜无耻地“一再强调自己是美国公民，感到十分光荣和骄傲”，一再“要求美国‘惩罚’中国政府”，乞求美国政府“有强硬的政

策,阻止中国成为‘政治、经济和军事巨人’”,就一点不会使人感到奇怪了。

给吴弘达这样的汉奸、卖国贼以背叛自己的祖国的“权利”,以破坏、颠覆自己的祖国而不受惩罚的“权利”,这就是美国政府所维护的“人权”!

去年10月18日晚吴弘达来敝校(威士康辛大学欧城校区)演讲,题目是《中国:奴工背后的真相》。能这么快便找来这位中国政府释放后返美不久、英文全名(Harry Wu)正被媒体炒得炙手可热的“人权斗士”,使不少同事和学生感到意外。听说有某位亲台的教授从中穿针引线。

最近一位朋友来电话闲聊,提及他曾有幸亲聆过吴某的“崇论宏议”,于是在长途电话里细细将内容相告。我发现它与吴某在敝校的演说同出一辙,由这位“斗士”演唱出来,竟是一首厚颜的三曲,慷慨激昂处不让“正气歌”:

- 一、中国政府“倒行逆施”:中国人民是毫无权利的“奴隶”。
- 二、感谢美国政府及人民,并以拥有美国公民权自傲。
- 三、大力推销他那本反华的著作,乘机狠捞一笔。

像这种名利双收之举,他自然勇于为之,他又“有何忧哉”!

连不断夸奖吴弘达为“真正的美国英雄”的听众,对他多次处心积虑地潜回中国,进行他所谓的“神圣任务”,也会有“何不殚烦”的疑问。但反华的中外政客心里雪亮——这不是出于个人的使命感,而是职务赋予的责任。他为英美情报宣传机构工作,用心良苦,力求表现;否则,最近一次去中国应从上海或深圳等地入境,不必从新疆偷渡,更不必和负责宣传方面的美国人士同行。可笑他们万没料到一个遥远而冷僻的入境小站居然也有电脑稽查。吴某一入境即被捕,没有机会获取更多用来控诉中国政府违反人权的

资料。所以这次演讲缺乏新内容，放映的还是两盒有关劳改及器官移植的录影带。这固然由于在某些美国人心目中，吴某像位患难归来的英雄；但有一事实我们不能忽视——他诽谤中国的那些话美国人听来正中下怀。基于本身的利益，美国绝不愿见中国强大，时时刻刻想抓一条小辫子为难；中共对此应该有所警惕，不再轻易给外人以藉口。

至于负面的影响，其严重性连吴某本人也始料未及，但他对自己的能耐无疑十分自满，处处宣扬一贯的论调，反对北京，要求美国“惩罚”中国政府。姑不论美国是否有此权利及能力，单谈惩罚的对象是否合理。尤其是大陆留美学生，常被误认为来自统治阶层或由政府派遣出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政府，也就代表中国。他们会不情愿地被卷入政治论争中。听见自己的国家被误解、被批评，总不能不挺身说几句话。

最恼人的情况是有些对亚洲一知半解的美国人，因受吴弘达的影响，以为自己也非常了解中国，见了东方人便大谈中国如何落后、中国人仍过着奴隶的生活，以及中国留美学生都是共产党员等等。以偏概全，自以为是。

吴弘达放弃中国人的立场，一再强调自己是美国公民，感到十分光荣和骄傲。他告诉听众说，这次乘机返美时，机务人员要其他乘客慢一步，而请他一人先行下机。看到黄缎带及欢迎的人群，他充分感到做美国人的幸福及骄傲。言外之意是中国人可悲，若比起美国人来，最多只能算二等公民。美国的报章杂志也一直强调他拥有美国护照，竟然在中国被捕，非常不合理。似乎美国护照可以使他高人一等，即使按照中国法律，他确有窃取国家机密的罪嫌，但因是美国公民，所以也应当逍遥法外。这还是 19 世纪帝国主义侵华时的论调。

演说时吴某一再提出，美国应有强硬的政府，阻止中国成为

“政治、经济和军事巨人”。今天虽然禁止部分中国产品进口，克林顿总统对中国政府仍然过于迁就，把生意经看得太重。美国从未给过苏共最惠国待遇，为什么对中共如此厚爱？他这种偏激的态度我想连反华的香港总督及民运分子都不会赞同，因为最大的受害者会是中国和香港的老百姓。他更强调囚犯不该被迫劳动。其实罚令犯人劳动是四海皆准的原则，美国也不例外。人权组织应反对的不是劳改，而是任何冤狱。吴弘达摄制的录影带内容模棱两可，并未说明劳改的对象是政治犯还是刑事犯。如果是后者，则被罚劳动不为过分。工资低微也非不人道，而是限于国情，不该用美元为单位来计算，也不必和美国比。何况美国监狱中犯人的工资比一般人的工资也低很多。

吴某承认他在法庭上认罪是说谎，多年来前后二十多次，理由是对骗子说谎乃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中共政权本身就是一个大骗局。奇怪的是他在法庭上说是俯首认罪，从不像一个有胆量、有骨气的“斗士”，可是一离境却立刻头角峥嵘了起来，变成英雄，侃侃而谈，似乎道理和正义全在他一边。虽然如此，他却避免解释官方文书所载是否属实——他以盗窃罪被判刑三年，刑满之后自愿留在农场劳动，并非十九年期间他一直是囚犯。

讲词也有轻松的一面。他说去年夏天他被禁在武汉一所别墅中，囚室面积不大，却有两个沉默寡言、面目可憎的警卫。由于不耐小房间里的沉寂，他便主动和警卫攀谈，话题不少，如辛普森案，苏珊·史密斯，以及美国运动明星等，神态非常得意。听众不禁哈哈大笑。后来有个美国学生问他：法庭上的照片显示吴某神情沮丧，像一个极其可怜的囚徒。在狱中他是否真能如此轻松自在？真能的话，中国的监狱似乎便不如他描写的那么可怕……。

谈起中国违反人权的详情，吴弘达乘势推销他前年出版的那本书——《昨夜风疏雨骤》（用李清照“如梦令”一词首句略改两字

作为 Bitter Wind 一书的中文译名,看似典雅,其实不伦不类。李词的意境与吴著的气氛大不相同,最惨不过“绿肥红瘦”而已,何况还有“海棠依旧”)。精装本二十二元九角五分,平装本十四元九角五分。讲演前销路便不差,也有人只是翻看一下,讲完后即刻有二三十人购买,并且排队请他亲笔签名。回答听众问题时有人曾问说这次坐牢对他有什么影响?他笑答一大影响是他的书更畅销,中共帮了他一个大忙。接着他说他虽以做美国人为荣,如有机会还想回中国:中国是故国,没有人有权阻止他再回去,继续人权方面的工作。这一点颇令人费解:他回中国的目的不是积极地参与国内的政治改革,而是窃取情报,向外邀功,提供英国广播公司(BBC)及美国机构所要的照片、录音带和录影带。这种用心比起海内外民运分子的行为来,显然又逊一筹了。

绝大多数的美国听众没有到过中国,吴某的演讲就像“天方夜谭”,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中国听众却不大以为然。连台湾来的学生都有人批评吴某是“哈巴狗”、“挟洋自重”;香港的政论家如罗孚及岑逸飞等人也认为他老奸巨猾,目的全在利己,根本不值一听。但我认为外国势力仇视和贬损中国的心机值得海内外爱国的华人时时警惕。英美政府及其情报宣传机构习惯于将一切反华的言论都当成真话,将中国政府及人民的辩解却看成谎言。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华大阴谋,在现阶段表面上是以维护人权为藉口。这一所谓的“人权”机构会利用层出不穷的中国败类,例如刚捧过反华“英雄”,又抬出反华“英雄”——君不见“人权斗士”吴弘达的老调尚未弹完,在美国又出现了一个振振有词的张淑云,有计划地编造上海儿童福利院的病童照片?她被西方政府及传媒利用,将个人私怨及经济利益置于国家的荣誉之上。这一点连实地观察的美国记者也有些看出来了,但她的控诉被别有用心的政客及机构所接受,向世界各地传送,就像笔者在起草本文时,美国哥伦比亚

公司每周一期的“六十分钟”节目正在播放中国“虐杀”幼童的消息。

(原载澳大利亚《汉声》杂志 1996 年第 4 期,《中流》1996 年第 6 期转载)

## “马前卒”的悲哀

文从周

在 1989 年政治风波中,柴玲小姐曾被捏塑为“志士仁人”的形象。正是靠着这样的光晕,在天安门广场中,在“自由女神像”下,她坐“总指挥”宝座达几十天之久。

然今年 4 月 25 日在台湾出版的《联合报》,却以《让别人流血,而自己求生》的题目,把她的这副假面撕破。这家报纸的记者自香港报道说:美国最近搞了一部影片。影片将披露美国记者康宁汉(Phil Cunningham)在天安门广场对柴玲的采访。大概是柴玲小姐自以为遇到了自家人,又没有别的学生在场,于是和盘托出自己的老底。她对记者说,她作为“总指挥”,根本就不是要领导学生们去争取什么“胜利”,“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用鲜血和生命唤起民众”。记者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坚持吗?”柴玲厚颜道:“我想不会的”,“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什么的”。

将别人往死里推,而后自己逃之夭夭,这算得什么志士仁人呢?所谓志士仁人,必须是“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倘若 有求生以害仁,无杀身以成仁,那就翻到了志士仁人的反面,就成了懦夫小人。然而,柴玲小姐们又岂止有求生、无杀身而已,而且是杀众人以成一己私利。倘若不是长着一颗狼子野心,能干出如此残忍、如此卑鄙的勾当么?一位摩登的卑鄙诗人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回头去看,他的这句诗简直就是谶语。这谶语就



应在他自己及其同类头上。柴玲之流的卑鄙者不正是用卑鄙拿到了“通行证”吗？踩着被愚弄者的躯体筑成的阶梯，她们爬上西去的飞机，到“极乐世界”悠悠哉哉地享受那“极乐”去了。不知当年虔诚地追随柴玲的学生们读了这则消息，心里会是怎样的滋味？

善良的人们或许要问，填塞私欲可以有很多手段，何必用这么毒辣的一招呢？这是因了恶魔的诱惑。当是时也，东欧崩溃，苏联解体在即，美国老爷们的“颠覆”魔爪对准了独立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要颠覆自然需要内应，于是便网罗利欲熏心的小人作汉奸，于是就有方励之、严家其、苏绍智、吾尔开希、王丹、柴玲……如雨后蘑菇般现世。“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精于商道的美国老爷深知，只要许以一张绿卡与些许美钞，就足以使这般丑类出卖父母、祸害家国、残杀同胞。“流血”是柴玲们的“期待”，更是美国老爷们的“期待”，而且首先是美国老爷们有了这样的“期待”，柴玲们才有这样的“期待”。

这样说冤枉了美国老爷吗？大量的铁的事实不论，仅从这件事也可以证明。设若美国老爷们当真对中国怀有善心，及时公布柴玲的谈话，即可成为促进受蒙蔽者觉悟、促进中国大局安定的助力。为什么不公布呢？一向以抢“新闻”著称的“新闻”掮客们何以变得迟笨延宕了呢？就是因为这个计划原本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的。自己怎么能够公开自己不可告人的阴谋呢？待到阴谋实施以后又来公布，自己也觉得这是个漏隙，于是修补说：柴玲的“一部分谈话在美国的电视媒体上也被用过”，但是因为翻译、剪接等技术问题“而失去了柴玲说话的逻辑性”。美国老爷们在中国问题上造了那么多的谣，他们的技术不失误，怎么偏偏在这里失误了呢？失误还可以改正，怎么一拖就是四五年呢？实则包藏祸心，岂是失误者舆？

美国老爷们于1989年在中国干下的坏事，愈来愈被更多的中

国人看透,愈来愈招致中国人的愤怒,他们的伪善假面已是破碎不堪。为了挽回颓势,便来了个丢卒保车,抛出从犯。这就是时下又公布这则新闻的全部秘密。说到底,所谓“新闻”,不过是美国老爷们实施政治阴谋的工具而已。

对于柴玲们来说,这实在是一个需要格外当心的信号。这信号说:君莫得意君莫抖,尔等不过一条狗。可使吠人与咬人,也可装入替罪篓。今天抛出了柴玲,明天、后天……呢?呜呼!蜜月已尽,恩爱将绝。想一想这以后的日子,难道不心寒么?有道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主子要抖落你们以自保,尔等如欲自保,唯一的办法就是抖落主子的老底——向世人公布他们是怎么收买、利用你们的。不过,这需要胆气,就看尔等有没有?

1995年7月18日于北京

(《中流》1995年第9期)

## 表错情

——方励之、李洁明交恶记

马 鸣

1990年美国的一位学者，针对东欧剧变后的前东欧国家“持不同政见者”在新政权下的境遇，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抱怨和感叹：“如果一个人曾经是持不同政见者，那一辈子都是不同政见者了。”当时，笔者曾在一篇短文中介绍和评论过这个耐人寻味的论断。

这显然是一个悖论。当时我曾试图回答：“‘持不同政见者’推翻的要推翻的对象，与现政权不就成了‘相同政见者’了吗？何以又注定‘一辈子是持不同政见者’呢？”我只能这样来解释：他们的“政见”，本来就不是独立“政见”，只不过是把西方“政见”全盘“套”来，用西方社会模式和价值标准“全盘”改造自己的国家而已。由于他们看外国眼色行事，唯外国意旨是从，为外国利益服务，他们头上就有了十分显眼的外国“徽记”。对有点民族尊严的国家而言，这“徽记”总是犯忌的，很难吃“香”的。一个哪怕是表面上标榜独立形象的国家，也很难公开容纳他们或明目张胆地奉他们为“英雄”，这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的。这不能不说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一种“事与愿违”的悲剧。

这只是“持不同政见者”作为外国代理人，在自己国家所注定的并不美妙的命运。可是那些逃离自己的祖国，直接投进外国怀抱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变成外国的直接工具正式获得被庇护、豢

养的奴才地位之后，其命运是不是就会美妙一些呢？

其实并不，也不可能如此。

道理很简单。“持不同政见者”从国内转到外国，当然是其地位、身份、价值、作用的重大变化。可是，在任何意义上却都不意味着其身价、地位的提高，相反却是这种身份、地位的一种明显的贬值。正如一个待价而沽的妓女，在嫖客未完全把她买到手之前，她是嫖客争取弄到手的对象，自身还有着讨价还价的余地，掌握一定限度的主动权。嫖客为了把她弄到手有时还不惜出高价，海誓山盟，苦苦追求。可是，一旦交易完成，嫖客就拥有了对这妓女的绝对玩弄权和支配权。既已卖身，吃着人家，靠着人家，也就剩下看人家眼色，受人支配、使用、玩弄、发落的份了。

不幸的是，“持不同政见者”从国内转到国外，同时也是自身实际作用的大大削弱，一落千丈。像方励之、刘宾雁这样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能够被一些外国势力看中，不仅在于他们甘于为外国势力效劳，还在于他们是中国的“著名作家”、“著名学者”，有些人曾是××领导人的“智囊”，××要害部门的知情人、主持人或掌握宣传媒体的负责人，有的人还曾拥有“政协委员”、“作协副主席”、“科协副主席”等等的社会头衔。他们不正是因为原来有着这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广泛的社会联系和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而被选中倚重的吗？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也就失掉了这种社会地位，失去了国内的讲坛，割断了原有的社会联系，其实际的“使用价值”，也就不免打了极大的折扣，而转变为单纯寄人篱下的门客以至奴才了。

事物的辩证法本来就是如此。可是这却是那些把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接纳到自己国内的外国势力所始料未及的。现在他们已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失策。其结果不仅导致这些人实际价值的下降，而且还常常惹出种种麻烦，演出种种笑柄、闹剧，甚

至转化为碍手碍脚的包袱和累赘。现在美国又打发“持不同政见者”返回中国大陆,就是一个不能不引起注意的新动向。然而这些人即使“打回大陆”,也不可能发挥原来那样的作用了。于是他们更多地着力于在中国大陆内部打主意,也就毫不奇怪了。

对这一点更缺少自知之明的,是“持不同政见者”们自己。他们能得以受到外国人倚重、赏识,又得以登上梦寐以求的外国“乐土”,于是就往往有一种“宾”至如“归”,落“叶”归“根”,乐不思蜀,受宠若惊,身价百倍的“良好”感觉。人家大搞反华,偶而要他们出来装装门面,造点声势,打打小旗,骂骂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在媒体上时而露露面,便自己以为已“平起平坐”、“登堂入室”,至少也跻身于“智囊”、“高参”、“谋士”的行列。于是就飘飘然起来。也就难免“得意忘形”,产生错觉,忘记了自己寄人篱下的门客、甚至奴才的真实身份,闹出摆错“位置”,看错“眼色”,表错了“情”的“不合体统”、“不识时务”的蠢事来。

从最近一些日子美国媒体传出来的方励之和李洁明之间的那场“争论”中,就不难闻出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有点“失宠”,遭到厌烦的气味来。

正当美国在关于给中国以最惠国待遇这个敏感、微妙问题上进退失措、举棋未定、争论不休的当口,被称为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的方励之,也耐不得寂寞,急不可待地要插上一嘴了。9月6日,他和另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前全美“学自联”主席赵海清,在美国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纽约时报》上公开发表文章,敦促美国政府对“取消国营企业产品享受的低关税待遇”。文章还忘乎所以、出言不逊,以咄咄逼人的口吻告诫、指责美国政府:“如果克林顿总统屈服于中国政府和美国商界的压力,那么就等于向中国的强硬派践踏人权的行为了开了绿灯。在今后几年里,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会更加糟糕。如果不是过去几年来每年都重新考虑中国的

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那么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表现肯定会更加恶劣。”

显然,方励之并非在对美国总统和政府发表“不同政见”。他不想,也不敢这样做。尽管言辞激烈、尖锐,不无“上纲上线”,指责“施压”之嫌,可是他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为美国说话的“立场”,是毋庸置疑的。何况,如果文章不是明明白白地署着方励之的赫赫之名,有谁相信它不是出自洋人而是出自一个中国人的笔下呢?

可是这调门很高、气势汹汹的“瞎起劲”,却似乎并未得到美国决策圈内人的嘉许和赏识。相反却被认为是“足以使美国最终失去在中国的影响”的“馊点子”。

明确站出来反驳、教训方励之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美国外交圈内的重要人物,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人们不会忘记,正是他,在1989年初,先是把方励之列为布什访华宴会的“贵宾”,后又把方藏到美国使馆保护起来,最后又把方装入美国军用飞机运入美国。李洁明又是北京风波中代表美国官方的现场指挥者之一。既是美国外交圈内重要人物,又是有“恩”于方励之的李洁明,出面用尖刻的语言针锋相对地反驳、教训方励之,其份量,其含义,恐怕都是非同小可的吧!

李洁明在《华盛顿时报》发表的反驳文章除了明确地表示了反对方励之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观点之外,更突出地是表达了对呆在美国的某些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强烈反感和不满。他明确地把呆在国内和呆在美国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表现加以对比。他说,根据他们的调查,大多数呆在中国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已经不再强烈要求美国取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很多人认为方励之和其他一些在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出国以后,就不顾国内的人民的生活了。他们对此很反感”。

这也就是主子对奴才的“不满”和“反感”。说这是因为奴才们

“不顾国内人民的生活”，那是虚伪。从李洁明的反驳中，并不难看出这不满和反感的真实原因。

其一曰：“方励之不应该试图使美国的政策符合他的目的。”意思不是很清楚吗？几个“持不同政见者”值多少钱？你们不是优先考虑符合“美国的政策”，而是试图借“美国的政策”来改善自身的处境，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其二曰：“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应该更多地直接和中国政府打交道。美国政府应该在后面支持他们。但是不应该给他们打先锋。”这意思就更清楚了。养活着你们，是要你们“直接和中国打交道”，也就是要你们自己上阵和中国政府对着干的。你们不这样做，却呆在美国国土上坐而论道，喋喋不休，说三道四，指手划脚，力图把美国推到第一线为你们“打先锋”，而且不体谅决策者的困境和苦衷，多方指责和“施压”，这更是主仆不分、摆错了位置了。

其三曰：“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压力，不应只来自美国，这种压力是多边的。美国应该特别支持香港和台湾的民主力量。这种来自中国方面的力量，比任何外来的所谓最后通牒和威胁都更有效。”这段话那就更是“话中有话”，令人回味无穷的了。它不仅表明了对这些躲在美国养尊处优、“光说不练”的奴才的失望和不满，而且还明确暗示，美国统治集团已下定决心把重点转移到更多直接依赖“来自中国方面的力量”，这是不是意味着方励之这些呆在美国的“不同政见者”因“不识相”而受到某种“冷遇”呢？使“不同政见者”，继续呆在国内站住脚，保持其原有地位和联系，利用合法讲坛发言，不是更有效、更划算吗？

唉！说来说去，这“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并不易扮演，即使想当个“够格的”奴才，又谈何容易！方励之兴冲冲地交了一份“试卷”，实际上却被判了一个“不及格”，落了一个使人家厌烦的尴尬处境。

（《中流》1994年第5期，标题略作改动）

## 如此“斗士”

——李洁明大曝方励之当年“避难”内情

马 鸣

4月间,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和“中国的异议人士”方励之,在美国的两家大报上展开了一场颇为精彩有趣、令人回味无穷的争吵。笔者在《中流》5月号,曾以《摆错了“位置”,表错了“情”》为题(本书收录时改为《表错情——方励之、李洁明交恶记》)就这件事做过简略评述,指出了透过这场争吵而能够意会的某些重要动向和含义,提醒人们注意,美国对这些呆在美国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上的微妙变化,以及那些寄人篱下的奴才们的尴尬处境。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打不成交”。可是李洁明和方励之的争吵,却是在保护人和被保护者之间、主子和奴才之间早已“成交”,即早已确立了各自的地位、名分并大大热乎一阵子之后的对“打”。这本来就不属于平等对手之间的平等“对话”或“讨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会向什么方面发展?到头来会吵出个什么名堂?这却是人们所不能不关注的。

从最近来自西方,特别是来自香港传媒的信息表明,这场争论不仅并未停息下来,反而呈现了“升级”的明显趋势。

这一方面突出反映在争吵范围的明显扩展上。原来这场争吵是围绕美国是否应该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而展开的,现在却



发展到“翻”业已过了五载的“陈年老账”，把当年方励之躲进美国使馆的事实真相和是是非非也扯出来的地步。从美国本土的媒体，扩展到了香港的媒体，也标志着这种争吵范围的发展。

另一方面则突出表现在争吵双方的“攻”、“守”地位的“转移”。如果说，4月间就表面化了的争吵，是由方励之首发其难，主动挑起争论，急不可待地试图影响克林顿政府利用“人权”和“最惠国待遇”来“惩治”他自己的祖国，而李洁明则只是站在克林顿的立场“被动”起而“应战”的话，那么，其最新发展却是李洁明转而采取了不留面子，毫不客气，穷追不舍，追根究底，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而一向以“敢于直言”自诩的方励之却显得底气不足，欲言又止，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大有被逼到墙脚之势。最后竟挂起了“免战牌”，连一点“民主斗士”的气派和影子都找不到了。

据香港一家报纸披露，在6月间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李洁明除了对方励之“成功来美后的言行有比较严厉的批评”之外，还大曝其“内幕”，力图证明，1989年方励之躲进美驻华使馆要求庇护，并非美国请去的，而是方励之不请自来，赖着不走的。

李洁明在接受香港一家杂志的“独家访问”中说：方励之“六四”后第一次跑到美国使馆要求庇护时，他（李洁明）即劝告方励之离去，并告诉他大使馆帮不上忙，这种做法对自己和民运也没有好处。方励之无奈离开。但过了六小时又折回，并带了美国学者林培瑞和《时代》杂志的记者同来。李洁明认为，方励之这样做的目的，是迫使大使馆答应他的庇护要求。否则此事会在美国广泛报道。

于是“大使馆最后在不太愿意的情况下把他留了下来”。一待就是一年又20天。

这是不是真实的情况？在同一个时间香港的另一家杂志披露了另一种说法：“方励之及其太太李淑娴躲进美国使馆的真正经过

是,美国大使馆奉上级命令派车到北京大学,乘当时一片混乱之际,将两人藏进车内,飞车开回使馆。”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两种说法大相径庭的情况下,新闻媒体去采访当事者的方励之,想从他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材料,这是合情合理的。可是方励之采取的态度却是避而不答,他说:“对于事实‘内幕’,哪篇文章真,哪篇文章假,或者皆真,或者皆假,我也不予置评了。好在我现在尚未竞选公职,也未在押受审,所以不谈‘内幕’也算一项权利吧!说句笑话,这也给喜欢推理、喜欢传奇的朋友,留下一个发挥想象力的空间。”

用的是戏谑、轻松的口吻,包含的却是难以言表的苦衷,挂出的则是不置可否的“免战牌”。这位“民主斗士”,在反对自己的祖国时曾经何等“神气”,而在涉及到其美国主子时,却连说出一点事实真相的勇气都没有了。把不敢“犯上”说出“内幕”,说成是维护“一项权利”,则纯粹是无可奈何情况下的自我解嘲而已。

到底是谁利用了谁?方励之及其同伙们该是心知肚明的,也最有资格做出自己的回答的。李洁明说:“美国为了方励之,实在做过不少事情。”而对于方励之为了美国“做过不少事情”竟只字不提,这就有点不“公道”了。方励之充当美国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马前卒,“冲锋陷阵”,不遗余力,在面目彻底暴露,无法在中国存身的情况下,投奔自己的外国主子,反而落了个“利用美国”的罪名。这实在是一颗太大太大的“苦果”,真乃是“推完磨杀驴吃”,“过了河拆桥”,几近“走狗烹”的一种悲哀了。而对这一点方励之竟然连答辩的勇气和余地都没有了。当然,方励之此时此地公开摆出为美国“做过不少事情”的“功劳”,对自己、对其主子都不是那么有利的事。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两难”的苦衷吧!

说穿了,李洁明翻1989年那笔老账,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了美国当局对方励之等躲在美国国内“吃老本”的“精英”,兴趣已大大

降低。李洁明不是说过吗，方励之自从“走进美国大使馆匿藏后，对民运的价值已没有了，对大陆当局也不再构成任何威胁”，“方励之已不能对大陆民运起领导作用”。

对美国所策动的“大陆民运”价值的丧失，也就是方励之对美国对付中国战略价值的丧失。对中国大陆当局不再构成“任何威胁”，养活你们这帮子人还有什么意义！方励之如果不是呆在美国，而是呆在中国，哪怕呆在中国的监狱里，对美国的价值不是要大得无比吗？当年的汪精卫，如果一直呆在日本，而不回到南京组织伪政权为日本服务，对日本帝国主义有什么价值？方励之不识相，不但不乖乖呆在那里，反而时而出以“功臣”自居，说三道四。难怪李洁明要说出“我们对此感到十分不满”的话来了。

标志着这场争吵进一步升级的最明显发展是，李洁明在对香港媒体的谈话中，实际上已经显示出极其不耐烦，在给不识相的方励之等呆在美国的“精英”们下“逐客令”了：

“如果要推动中国民运，他们必须回到大陆，在本土扎根，美国帮不上忙。”

不是商量，而是“必须回到大陆”，在“本土扎根”，跟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着干。而“美国帮不上忙”的话，更是耐人琢磨。它不是带有“不再帮忙”即不再供养他们的某种威胁吗？方励之不再敢于“应战”，挂起“免战牌”，正是对这种威胁及其后果有所“领悟”的结果。

其实继续赖在美国也罢，“回到大陆”也罢，像方励之、刘宾雁、阮铭、王若望这些人，都早已成了“过了气”的“乏走狗”。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来说，他们都永远不可能再拥有曾经有过的那种价值了。就是“回到大陆”，方励之能继续捞个科技大学校长当当吗？而没有了原有的社会地位、社会头衔、社会联系、社会讲坛、社会影响，这个“根”又“扎”在哪里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确，从他们

躲进美国使馆、登上新大陆的那一刻起,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其对美国价值的降低,甚至丧失。可惜的是不仅那些“精英”自己对此缺乏自知之明,而且连美国统治集团意识到这一点也晚了一些。现在他们才开始知道,把这些“价值已经没有了”的人收罗到美国来只是增加了包袱和累赘。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李洁明前一段时间所做出的明确暗示。美国统治集团已经把对付中国的重点,从支持海外“民运分子”和“民运组织”转移到更多直接依赖“来自中国方面的力量”,即主要在中国国内,利用非法以至合法的力量,来为美国“改变中国”的战略目标服务了。从美国在中国国内“有影响”的人物中,重点寻找和培植“扎根于中国”的新的对象,把某些在海外的“精英”派回中国,重点扶持,组织国内的什么“人权保障协会”、中国式“团结工会”等等,不是都反映了这一新的动向吗?李洁明说“西方应与大陆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而不是进行对抗”,也成了国内一些“民运”分子的新的“指导方针”,被他们所心领神会。这倒是我们不能不深入思考、高度注意的一个新的信号,这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显然,扮演这种“新”的角色,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方励之辈已经不够格了。

谁能负担起这一新的“重任”?谁在成为这种新的角色,正在被选中并大加培植和扶持?人们当密切注视,瞪大双眼,拭目以待……。

(《中流》1994年第8期,标题略作改动)

# 莲花落

——政治乞丐方励之的“精彩表演”

牛 羊

最近(1993年),台湾一些报纸斥方励之为汉奸。有篇文章记述了方励之在美国的一场“精彩表演”。现叙述如下:

前不久,美国奥运会选手在纽约华道夫大饭店举行庆功宴的时候,方励之溜了进去,对着扩音器大声喊道:“伟大的美国选手万岁!伟大的美国万岁!我们伟大的美国在这次巴塞罗那奥运会所得的金牌比中国多21面,银牌多20面。我们伟大的祖国彻底打败了万恶的中国。为此,我要向各位发表一篇人权学术演讲,讲中国的……”

这时,一位定向飞靶射手忍不住了,大步走上台,一把拿开扩音器,问道:“你是谁?”

“我是方励之。”

“你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

“我是美国人,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忠贞公民。”

飞靶选手回头问大家:“有人知道个叫什么方励之的美国人吗?”

一位棒球选手举手站起来大声说:“我想起来了,他就是被我们驻北京大使李洁明藏在裤裆里从北京带出来的家伙。”

飞靶选手重新打量了方励之。方励之脸红了一下,说:“我是

堂堂正正坐飞机离开那万恶的中国的。”

“坐飞机离开中国之前你在那里?”

“住在我们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里。”

“你在大使馆工作?”

“不是工作,我是逃到大使馆避难,免得万恶的中国政府抓我。”

“中国政府为什么抓你?”

“因为我热爱美国,我要用我们美国的人权标准改造中国。”

这位飞靶选手忍不住了,掏出一张 50 美元的钞票塞进方励之的口袋,说:“原来你是个政治乞丐,以唱人权小曲到美国专讨饭吃。我们这里不需要你这马屁人渣,你滚吧!”

## “国宝”王若望

隋 卞

今年一月底，流亡在海外的两个所谓的“民运”组织——“民阵”和“民联”，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上演了一出连刘宾雁之辈都目瞪口呆、叫苦不迭、丑态百出的“合并”大闹剧。生活在国内的人，是有理由知其详，并且一定会感兴趣的。因为，它使人们大开眼界，知道这帮打着“民主”旗号的人，是如何在糟塌这个崇高的字眼。连他们当中也有人用一个“黑”字来概括这场丑剧，实在再贴切不过了。它确实确实为我们上了“民主”的生动一课。关于这场丑剧的全面情况，将有专文详加披露。本文只就这场闹剧（丑剧？喜剧？悲剧？荒诞剧？滑稽剧？）重要角色之一的王若望的“精采”表演，略作勾画，曝一曝光，以使读者先睹为快。欲窥全豹，则只得见另文了。

### “回到美国”

1992年9月，王若望带着他的老婆羊子，登上了美国国土。“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是他的“通行证”。登上美国，他们便夫唱妇随，大唱对美国的赞歌，辱骂自己的祖国。他去美国，是冲着“领导”、“整合”所谓的“海外民运”，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使命”去的。在这之前，所谓“海外民运”，早已日薄西山、分崩离析、

七零八落。其内部则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腐烂透顶，群丑无首，难以为断，混不下去了。这个垂垂暮年，年高 74 岁，长期混入共产党内的老资格反共老手王若望的到来，似乎给他们中的一些人打了一剂“强心针”，带来一线新的“希望”。寄望于借他的“老资格”的号召力和比较超脱的地位，出来挽救走投无路的颓势。一时间，他颇有点“众望所归”之势，不少人打算拥戴王氏“出山”，借以收拾残局，重整旗鼓。

## 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人的国宝”

拥戴王若望，最为卖力的，首推刘宾雁。据 1992 年 9 月 9 日“美国之音”记者报道，王若望夫妇 9 月 7 日抵纽约，9 月 8 日就举行了一个欢迎他的记者招待会。刘宾雁，这个王若望的“老战友”，即席发表了“热情”的欢迎词，对王若望做了肉麻兼有趣的吹捧。他说：

“我今天在路上想，我是应当用什么字来表达王若望在中国的地位？我想可以用‘国宝’两个字。从中国人民争自由，争解放，改变和改善自己的命运的说上，王若望先生的一生，他所做的贡献，恐怕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人。”

亲爱的读者！这不是“天方夜谭”。这是刘宾雁当着众多的中外人士亲口讲的，并印在报章上。它的录音，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听到。这短短几句“高论”和历史“判断”，难道不足以使历史学家们（不管什么国籍、持什么观点）都“无地自容”吗？你们出了那么卷帙浩繁的关于中国的历史著作，竟然有眼不识金镶玉，把中国最伟大的“国宝”王若望给漏掉了。这不是证明你们的“才疏学浅”吗？



凭着这个足以“振聋发聩”的伟大发现，刘宾雁就具有充分资格去拿历史学的诺贝尔奖金了吧！

## 自觉的共产主义叛徒

那么，这位“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人”的“国宝”，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到底留下了什么“政绩”呢？他为中国人做了些什么呢？刘宾雁没有做出回答。查遍中国的史料，也找不到一条证据。查来查去，只看到王若望与“美国之音”的记者的一段对话。

记者问：你是一个很忠贞的共产党员了。请问你来到美国，你还是心爱这个共产党，还是很恨这个共产党？……

王若望答：我年轻的时候，几乎到40岁以前，我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但自那以后，我开始反省，开始认识，睁开眼睛，认为这个党是没有将来的。这个党要脱离人民，最后被人民唾弃的。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怀疑毛泽东，怀疑共产党的政策，走上了背叛共产主义，背叛这个党的道路。这个背叛，我认为是光荣的，是自觉的。而不是被迫。

原来如此。王若望不过是一个自觉不是被迫地背弃了共产主义、背叛了中国共产党的可耻的叛徒。如果说他是“国宝”，那就只是同社会主义中国为敌的国家和势力的“国宝”。他不是已经被美国当做“国宝”供养起来，并不惜花费巨款拿到世界“展览”了吗？王若望的自白，倒使我们想通了许多道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确有扩大化，确有冤假错案，我们总结加以纠正，是并不错的。可是把他划为右派、清除出党倒是并不错的。相反，后来恢复了他的党籍，却的的确确错了。共产党不留自觉背叛自己的人做党员，

是天经地义的。可是,说王若望这种人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恐怕就夸大其辞了。刘宾雁难道算不上第二个吗?在这里他未免过于“谦逊”了。然而比之于张国焘那些老牌的共产党叛徒,王若望却望尘莫及,“余生也晚”,摆不了老资格。在这里刘宾雁又过分抬举了王若望。可是,在卖身投靠直接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上,王若望又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 鼓吹反共反华,谆谆教导“下属”

经刘宾雁等这么一吹捧,王若望的的确确受宠若惊,头脑膨胀起来,自以为确已在那一帮人中“众望所归”,重整“民运”做美国反华的马前卒,担当重任,已“非我莫属”了。还没有当上“主席”,他就倚老卖老,拉开架势,发号施令了。在对记者的多次谈话中,他以发言人自居,大谈他的“施政纲领”。他针对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必须主动地解决六四事件,为六四平反,释放政治犯,结束‘一党专政’”,否则他就要号召“人民起义”,用暴力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他又大声鼓吹“共产党内部分裂”,呼唤共产党内出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人物”,“对这个国家实行彻底改造”。

多么大的口气!真是“蚂蚁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另一方面,面对着所谓“民运”组织的内部倾轧、内哄、争吵,他摆出一副“老资格”的面孔,居高临下,耳提面命,发出了“谆谆教诲”。他在一次会上说:

“应当承认,大陆来的朋友,头脑中都有个小的毛泽东的阴魂在作怪。我是共产党的资深党员,我身上的小毛泽东,一定更顽固。因此,我们都面临着一个驱鬼附体的任务。”

他对那些争夺权力红了眼的年青人,甚至提出了“时时提醒自己”,进行“长期的自我修养”的“教导”,为此,他还规定了“四项行为准则”,即:

1. 以平等精神,尊重他人;
2. 不拉山头主义;
3. 排除小团体习气;
4. 不患得患失,服从整体利益,顾全大局。

可是,谁听他这一套呢?老谋深算、不甘寂寞的老太婆戈扬,对此倒有点自知之明,她对王若望起劲争当“主席”大不以为然,多有微词。不是要年青化吗?你那么一把年纪了,凑什么热闹,何苦来呢?这些被新闻媒介传出来的“闲言碎语”,正在兴头上、忘乎所以的王若望哪里听得进去?

## 风尘仆仆四处招摇、游说

实际上王若望倒是更来劲了。他不顾老命,风尘仆仆,四处奔波起来。又是巴黎,又是伦敦,又是澳大利亚,又是香港和台湾,到处接见记者,发表谈话,“考察民运情况”,可谓做了淋漓尽致的表演。其用意,当然是借以扩大影响,确立自己的牢固地位,为当“主席”进行铺垫。“美国之音”、“BBC”、“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许多西方报刊,也连篇累牍为之宣传。吹吹打打,可谓“盛况空前”。

限于篇幅,这里仅将他在港台的表演略加介绍。

刚抵香港,王若望就宣称,“愿意以孙中山精神为榜样,以余生投身民运”。并明确表示他“答允下月在美国竞选民阵和民联合并

组织的主席”。这样看来,王若望曾有以“中国的华盛顿”、“今日的孙中山”自比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当记者问及于此,他回答说:“自己无此雄心壮志,但以孙中山当年在海外领导民运的经验和精神,则无处不开花结果”。这岂不是把他们的捣乱,同辛亥革命相提并论了吗?当然,王若望也未忘记表示一点“谦逊”,一再表白,并不是他想担当这个历史角色,而是被“推上马背”的。他还明白地说:“海外流亡人士、留学生和华侨人士,会是一股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如果团结起来,可以跟北京当局抗衡,成为取而代之的政治力量的一部分。”

有的记者问,你这样做“会否担心会被大陆视为从事反革命”?王若望回答说,“打从反对毛泽东开始”他已是反革命,邓小平也曾把他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老祖宗”,因此,他不害怕被视为“反革命”。

王若望还说,他对大陆反“左”并不寄以厚望。他认为,反“左”只可能是表面功夫,反不到要害。王若望对反“左”如此热心,矛头之所向,也是颇能引人深长思之的吧!

## 在台湾的“不期而遇”

更富戏剧性的,是他随后来到台湾的那场精彩表演。台湾记者郭启宏写的两篇报道,读来更是回味无穷。先看他的第一篇报道。

“中国大陆异论作家王若望夫妇,元旦清晨到总统府前参观升旗仪式。清晨5点50分来到总统府。6点多钟行政院长郝柏村来到现场,走过王若望夫妇面前时,郝柏村停下来与王若望握手,但双方并未交谈。6点半钟,李登辉总统来到会场,在升旗完毕后,

王若望由团结自强协会秘书长吴水云陪同上前与李登辉总统见面。李登辉总统向王若望说：‘王先生，欢迎你们来台湾。’王若望说：‘我从小时候就是在青天白日旗下长大的。’李登辉又关心地问王若望：‘听说你夫人身体不太好。’王若望还向李总统表示，民权主义在台湾实行得很好，他要向中国大陆民众介绍这个状况。会面之后，王若望表示，李登辉总统是个很热情的人。王若望夫人则说：‘李总统那么忙，居然还知道我身体不好。’离开总统府广场之后，王若望夫妇在团结自强协会副秘书长的陪同下，前往行政院，由副院长施启扬接见。双方谈了约半个钟头。王若望不愿透露会谈内容。”

如果说这一篇报道，“客观”地交代了“不期而遇”的经过和一些表面的应酬的话，那么这同一位记者的第二篇报道，却向我们透露了这次“不期而遇”的部分背景，更富戏剧性，也留下了更多可供品味的东西。请看：

“为安排王若望夫妇与李登辉总统不期而遇，费了不少心机。据团结自强协会理事长陈宝用表示，当他向李登辉总统提到能否安排和王若望见面，李总统立刻说好。为降低官方色彩，就安排在团结自强协会主办的升旗仪式中‘不期而遇’。但为顾及王若望非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不便以参加升旗仪式的方式出现在会场，便以参观者的身份赴会场。在现场，为使两人的‘不期而遇’显得很自然，王若望夫妇站在哪里何时趋前见李总统都费了番斟酌。王若望也事前准备好一套能表现他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却又不失其立场的话来答复记者。当现场有民众拿一面国民党党旗要和王若望合照，王若望毫不迟疑地和民众换上一面国旗，才和民众合影。至于王若望赴行政院拜会，也在相当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王若望和

团结自强协会都不愿透露会谈内容。”

我比较详细地转录了这两篇报道，因为它们实在是两篇难得的妙文。两者相比，后者更坦率一些，告诉我们这场“不期而遇”原来是精心策划的、安排表演的、意味深长的一个政治戏法。

显然，王若望的赴台，与到别的地方的考察、游说，是具有不同的目的和内涵的。也是经过了特别精心设计筹措的。但是，他们幕后进行了什么政治上的交易，包括该记者在内，都是讳莫如深，不作任何透露。

发表这两篇报道的台湾报纸对这个“不期而遇”倒是点破了一点：“李总统和王若望这段谈话实在意义深远。在此时，青天白日不只是国民党的党徽，也不只是中华民国国旗，而是象征着中国人所寄望的理性精神，代表着自由、民主的光明与希望。”这也就是说，所谓的中国“民运”已经是在“青天白日旗”下的一项政治性活动。

## 八万美金的政治交易

可是王若望做上述对“青天白日旗”的“认同”，背后隐藏的更多东西是什么？王若望得到了什么“回报”，达成了些什么实质性的幕后交易？人们就不得而知了。

直到一月底，“民阵”和“民联”合并大会召开后，在唇枪舌战，继之以笔墨官司，吵了个底朝天之后，才使我们陆续知道了一点真实的底细。据香港《开放》杂志的一篇文章透露，这个合并会原定1992年10月召开，“因苦于没有经费而延期”。文章告诉我们，原来“去年王若望访台”所负有的特殊使命，是“以其政治声望筹款，并且同意投身民运主持大局”。也就是说，访台、筹款、主持大局，

是互为条件的。王若望果不负“众望”，“终于获得八万美元的经费，使联合代表大会得以举行”。

原来如此，我们总算找到了“谜底”所在。原来王若望访台的“不期而遇”和“不愿透露”的密谈，他公开表示对“青天白日”的“认同”，都是与乞讨“民运”的活动经费有关的。而拿到一笔可观的经费，又是王若望得以主持民运“大局”的一项不可缺少的资本或砝码。于是，所谓的“民运”，也就带上了“青天白日”印记，变成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一支别动队。这也就露出了“民运”的支柱和后台在台湾的尾巴。有了这项施舍，这次大会才开得成。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 更主要是“传播美国的理想和原则”

可是“民运”的真正后台仍然还是美国，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行动的。在这方面有大量事实为证。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美国众议院的议员佩洛西女士在联合大会上所做的发言。与其说这是“来宾”的祝词，倒不如说是后台老板的“指示”。请看：

“我非常高兴，大家在克林顿总统就职后不久，能在此开会，讨论两大组织的合并问题。国会保证和克林顿领导的政府合作。现在我们可以一致地向中国政府表示，美国有决心在全世界传播美国的理想和原则。大家要加倍努力，让美国人民、国会和总统都知道你们在全力以赴地推进中国的民主……。”

这不是一语道破了所谓“民运”的性质和目标吗？原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向美国的国会和总统负责的，他们的使命无论贴上什么标签，都是为“传播美国的理想和原则”而服务的。

## 竹篮打水一场空

钱拿到了,会开过了。王若望通过幕后交易,拿到了八万美元,交给了大会筹备会。可是,王若望“主持大局”稳拿“主席”头衔的美梦,却落空了。曾经表示拥戴他当主席的徐邦泰,一转脸,巧使机关把这个位子拿过去了。王若望气急败坏,他哭,他咒骂,他以退出会场相要挟,都没能改变既成的事实。连当个挂名的名誉主席保持一点面子的提议,也被他的“战友”严家其一句话给否决了:“王若望从他的历史看出,从来不是真正的民主派。他的脚踏出大厅门槛(指王若望的退席)那一刻,他的政治生命就完了。”

然而,报道这幕精彩的亵渎民主、糟塌民主的热闹丑剧的任务,已经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只好让另外的专门文章去详细描述了。读者们,且听下回分解吧!

王若望到底是中国的“国宝”,还是过了气又不齿于中国人民的“政治垃圾”和可怜虫?这就让亲爱的读者,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让无情的历史去做最后的裁判和回答吧!

(《中流》1993年第4期,标题略作改动)



# 昙花梦

——“民运”水晶城闹剧

孔 见

1993年1月29日-31日。

美国。华盛顿近郊的水晶城。

春寒料峭。虽是大地回春之时，但大西洋的彼岸仍是北风呼啸，寒气袭人。灯红酒绿的大街上人影稀少。位于城中的四星级豪华饭店——凯悦饭店，突然一下子冒出了许多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熙熙攘攘，煞是热闹，仿佛在举行什么重要的活动。

是的，一些参与“八九政治风波”的所谓“精英”和“民运”分子正在这里举行海外两大反动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民联”，下同）和“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简称“民阵”）的合并大会。围绕这次大会，这些一贯标榜“民主、自由、人权”的“精英”为了争权夺利，在会场内外使尽了种种卑鄙手段，拉帮结派，搞小动作和阴谋诡计，致使会议乱成一团，几乎“流产”，上演了一场亵渎民主的闹剧。

综观这次大会的整个过程，风波迭起，群丑亮相，令人拍案称奇，是一个绝好的反面教材，它有助于人们认清这些“精英”的真实面目。现将其中一些内幕整理出来，让大家看看这次大会是怎样为民主论证的吧。

## “咱们都有点良心好不好？”

2月28日,来自美、英、法、德、日、澳、加、比、荷、西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名代表到达凯悦饭店报到。晚上,“民阵”和“民联”分别在万润南和于大海的主持下召开了两组织的最后一次会议。接着,两组织联合工作委员会召开了筹备会,通过大会议事规则,并选举大会主席团。

29日上午,大会正式开幕。除与会代表外,受邀出席会议的还有美国参议员戈登及流亡的“精英”分子刘宾雁、陈一谔、刘青、柴玲、王若望、李录、沈彤、项小吉、苏晓康和刚到美国的郭罗基、郑义,以及香港《百姓》杂志社社长陆铿等。会场前的演讲台上,左右分别挂着“民阵”、“民联”四字,正中却悬挂着美国白宫的图像,表现出这些人对权力的野心和梦想。

首先发言的刘宾雁本想给会议打打气,出口却是一个“难”字。“中国人能够聚在一个地方集会、说话、结社,很难得。也许我们不能面对的,是我们在有了自由之后仍然很难说话”。三年来的“民运”历史已证明了,“说真话很难,说公道话更难”。在谈到海外“民运”组织内部的种种丑陋现象时,刘宾雁大呼一声:“咱们都有点良心好不好?”好似一声哀鸣,状极凄凉,使得开幕的会场上罩上了一层阴影。

当刘宾雁慷慨激昂地在台上呼吁道德形象时,各派势力的争斗已经开始了。被称为“倒万(万润南)派”核心之一的朱嘉明在大厅右角与三人窃窃私语,而刘宾雁的“同路人”胡平则在与两名代表商谈。预示着各方的较量即将展开,好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

势头。

果不其然。开幕式一结束，只见大会主席团两主席于大海、朱嘉明便吵了起来。伍凡、吴仁华、陆铿站在一旁。

“你他妈的为什么让刘宾雁讲话？”朱嘉明骂道。

“你凭什么骂人？”于大海也不甘示弱。

“我们商量好的，尽量少让来宾讲话，你为什么让刘宾雁讲话？”

“支持民主人权的总得有个人讲话，方励之没有来，我当然请刘宾雁。这没什么不对，即使你认为有什么不对，也不应该骂人。”

伍凡也许觉得陆铿在场听到不方便，说：“有话我们那边去讲。”便和吴仁华一起推着朱、于二人到一个角落去了。

这时，一位欧洲来的代表笑嘻嘻地问陆铿：“你为什么不在大会上讲几句话？”

陆：“刚才苏炜和晓康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朱嘉明不让讲，你难道没听到？”

徐邦泰马上接话：“陆大哥，不是不让你讲，他指的是刘宾雁。”

陆说：“那更不对。即使刘宾雁某些话讲得过火，于大海已补了几句，肯定了民运是在前进；朱嘉明凭什么骂人。”

刘宾雁是作为“贵宾”和“民运”组织的支持者讲话的。可是他的讲话却又戳着了一些人的痛处，这便有了朱、于对骂的风波。

## 代表资格屡生风波

此次大会中，围绕代表的资格问题，风波不断。已被“民联”开除盟员资格的华夏子竟然也跑去参加会议，并在大会的第一日便将她的千言申诉信贴在宾馆大厅，旁边还有她撰写的长达万言的有关中国将来成为联邦制的草案，只是标题的邦字写成了“帮”，让

人啼笑皆非。更为可笑的是，并非正式代表的华夏子最后还参加了新组织主席的竞选。

不久，在其申诉信周围又陆续出现别人的批注及其他材料，汇聚成一片条幅和小字报，将整洁、漂亮的宾馆大厅贴出一块“民主墙”。凯悦饭店自1981年建成使用以来，还是头一次见识如此举动，不知如何处理是好。

大会开幕当天便传来了澳大利亚的十几位代表因美方拒发签证不得来美的消息。原来，有人冒用方励之、刘宾雁的名义，向美国驻澳大使馆发出封传真信，谓部分澳洲代表有移民倾向。方励之和刘宾雁两人过去曾经为澳洲代表来美签证之事，致函美国国务院请求给予方便。而这封冒名信却表示不能保证这些代表是否滞留美国不归。徐邦泰、朱嘉明亲自跑到澳洲说，澳洲代表不与会也不会影响大会进行。结果大部分澳洲代表的护照被美国拒签，只有少数人报到。而炮制这个骗局的人另外拉了十几人填补这些空缺。为了握有更多选票，“荷兰的张英（又名伍作人）冒充民联成员，由徐邦泰出具假证，证明他是民联成员，在会场上递补为正式代表。经民联组织干事杨巍出面指证，民联在荷兰没有分部，伍不是民联成员之后，伍作人的代表资格在大会上宣布取消。”“民联”如此，“民阵”也不清白，“韦祖良的假代表身份被前民阵监事钱达当场揭发。”丑闻曝光，会场像炸了锅似的，乱成一团，愤怒、咒骂声不绝于耳。在30日晚的大会上，澳洲代表为资格问题差点发生肢体冲突。

对此，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海外“民运”资金赞助者之一）的一位先生感到很失望，对一“民运”分子说：“我们对你们中国人自己内斗花样百出，真是服了。不过比起越南人还是技高一着，越南人是用刀子杀，中国人是用计谋来整对方。”

原来，澳洲的一些代表属于“拥万派”，是万润南的铁票。因

此，“倒万派”就使出小动作，暗中破坏，使澳洲的万系代表无法到会。在会场上有人提出了要在澳洲设立分会场的要求，又被大会主席团否决。很显然，在代表资格问题的较量上，“倒万派”占了上风。

## “民运”低潮与王若望其人

谈这次“民运”组织的联合风波，就不能不先了解海外“民运”的总体情况和背景。

海外“民运”曾在1989年热闹了一阵，但随着内部丑闻不断曝光，如“民阵”组织内部派系横生，财务混乱，吾尔开希拿着捐款大吃大喝、玩女人等，很快就“丧失了公信力，变成由几个人把持的小集团，以维护他们个人的利益”，而每况愈下。罩在“精英”们头上的光环和桂冠很快褪色，暴露出他们的真面目，再也无法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在此我们不妨引用“民运”骨干分子马大维在大会前所写的一篇题为《放弃内斗，重整民运》的文章中的一段话：“三年中，我看到不少人把投身民运作为今后回中国去做官的政治投资，因此权欲薰心，导致走火入魔，从而开始对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产生猜忌；在权欲薰心之下，开始用文革那一套人整人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战友。头上戴着一项民运‘高官’的帽子，四处顶着为民主运动宣传的帽子，其实到处拉帮结派，封官许愿，结成私党，为的是打击别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番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这种乱成一锅粥、斗得七零八落的情况下，“民运”急需一个有感召力的领袖人物来重新整合海外“民运”组织，而大家一致看好的方励之在到达美国之后则坚拒出山的游说，表示不愿搅这滩浑水。加上经费不足，酝酿已久的两大组织的联合也一再延期。

1992年8月,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祖师爷”的王若望到达美国,给处于焦头烂额状态中的海外“民运”注入一支兴奋剂,许多人视王为“民运”的“救星”。鉴于王若望没有派别色彩,“道德形象”较“佳”,很多人希望他出山来挽回颓势,重整旗鼓。

这时,徐邦泰曾多次登门拜访王若望,请他出山竞选“民阵”、“民联”合并后的主席。最初提出三种选择:一是像方励之、刘宾雁那样致力于人权,二是担任名誉主席,三是竞选主席。当时王若望表示选择第二种,徐劝王要多看看,不要草率决定。第二次在黄雨川家,大家促王出来整合“民运”,黄提议由王任主席,万和徐分任副主席,徐表示全力协助王工作,并和万搞好关系。徐除力主王竞选主席外,还向其他人作了推荐。在“民阵”、“民联”联合工作委员会上,于大海也提议支持王出面竞选主席,并得到了万润南、朱嘉明等人的赞同。正是在徐邦泰的推动和游说下,自我感觉良好、踌躇满志的王若望“不孚众望”,最终决定参加竞选。

王若望在表示了竞选的意愿后,就风尘仆仆地前往世界各地游说,作“环球民运之旅”。王先后去了欧洲、澳大利亚、香港和台湾,自诩为“东南西北巡”。

这位王先生所到之处,对海外“民运”多有指责,得罪了不少人,再加上随着曝光率和演讲次数日多,人们逐渐发现他“名声大但肚里无货,炒来炒去一碗粉条,无创造力”。而王若望在台湾“为了拍国民党的大腿而不惜放弃任何道义原则”,去打“方励之的屁股”,更是遭人非议。方励之说国民党应该向大陆老百姓检讨,意思是承认国民党的正统,可惜把江山丢给了共产党。王若望却以为方励之是在批评国民党,因而指责方励之,拍马屁拍错了位置,反而损坏了“光辉”形象。真可谓聪明反被聪明误。

一直到大会开始时,王若望还是信心十足,成竹在胸,自以为台湾之行不仅见到了李登辉,还为大会拉来了八万美元的经费,所

以没有进行竞选活动，连和代表拉拉手、说句拜托的话也没有。在大会第一天的晚宴上，艾端午说，王应趁此机会表个态。这句话不知什么人传给了王，王若望得意洋洋地向大家宣布：“我已经报名参加主席竞选，请大家投给我神圣的一票！”

王若望仍然一心想圆主席梦。殊不知等待他的竟然是屈辱！

### 徐邦泰自食其言

就在王若望满怀期待地等着当主席时，会场内外已开始有人展开活动。有人说，王年纪大了。有的人还指出王的太太羊子很可能插手干政。徐邦泰一改支持王若望的初衷，想自己竞选主席。总之，有一股势力不想让王担任联合后的主席。王若望也很快知道了其中的变化，顿觉骑虎难下，遂将此情况转告好友陆铿。

而陆铿刚到达饭店的大厅，伍凡就拉着他说，现在的形势是王若望不一定能赢胡平（原来报上公布的竞选主席的名单是王、胡二人），因此要由徐邦泰来对付胡平，希望王能同意出任名誉主席，希望陆利用其同王的私交去说服王。陆当即表示拒绝，发觉情况不对劲，遂在 29 日下午找徐邦泰和朱嘉明约谈。

陆一开口就冲着徐邦泰说：“邦泰，你们把若望拉上去了，现在又想拉下来，果如此，你会变成千古罪人。”徐表示，他还是支持王出来，但是，如果主席、副主席分开选，即使支持他的票都支持王，也不一定能打败胡平，因为万润南掌握的票很可能改投胡平，再加上胡平自己掌握的票，那王就可能输。因此，准备搞混合直选，主席、副主席一起选，得票多者为主席，其次为副主席。

朱嘉明则直截了当地提出万润南的问题，不希望王若望跟万润南搞在一起。原来，他把王划入万派势力里去了。而王若望也确实考虑以万润南和马大维为副主席的搭档参加竞选。徐邦泰重

申：如果大会决定搭档竞选，一正一副，王和他搭档，一定能取胜，但如果大会决定进行分开选举，他就要竞选主席。就在朱离去的霎那，徐跟陆说：“其实我对万，并非绝对排斥，主要是他（指朱），你当然知道。”

30日，朱嘉明与朱培坤前去王若望的房间进行沟通。两朱谈话的重点是坚决排除万润南进领导层。朱嘉明在谈话过程中还算客气，而朱培坤则充当炮手，用威胁的口气说，如果王若望的搭档中有万润南，那王若望也别想当选，“我们有90张铁票，你不听我们的话就完蛋了。”妙的是，朱培坤既非代表，又非贵宾。

万润南与朱嘉明的矛盾由来已久。当两大组织决定合并时，“民运”分子中就传出了万的一切活动主要是为自己拉票，有的甚至喊出“誓死保卫万润南”的口号，而“反万派”的目标就是要粉碎万的计划。双方剑拔弩张，几达白热化的地步。再加上胡平、徐邦泰、严家其等各自的派系、人马，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31日，大会讨论选举办法。最后，否决了混合直选和搭档竞选，采用主席、副主席分开选举的办法。徐邦泰告知王若望说：“我不得不报名参选了！”王答：“这是你的自由。但是，你自己的许诺，你自己违反。当时，你对我是如何推崇，结果你来个180度大转弯，后果要由你负责。而且，你这样背信，今后你要承担责任的。”

于是，徐邦泰正式报名参加主席的竞选。他在竞选演说中表示，他和王若望之间只有协商，没有契约。在谦让和责任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对此，很多“民运”分子认为，徐违反自己的诺言，是“背信弃义”、“道德的堕落”，“为民运中尔虞我诈的行为开了绿灯”，应对这次会议的结果负责。

差不多同时，万润南也接受了陆铿要他退出竞选的劝告。因为反万已“形成一股势力”，“为什么还要死乞白赖地参选呢”？与



其受辱,不如主动退下。万接受了建议,但表示对方对他造谣很多,因此要在竞选发言时把话讲清楚,然后宣布退选。

出人意料的是,万迎面碰到朱培坤,朱以咄咄逼人之势说:“两年之前我们输给你(指‘民阵’二大选举),我们认了。这次你输定了,希望你好好认输。”旁边一位年轻的代表听了一面摇头一面说:“太过分了!”

### “退出! 退出! ……”

在这次会议中,最精彩的部分当推 31 日夜进行的选举。

选举开始前,先选举工作人员。有人提议,不要男士,只要女士。于是,6 名花枝招展的美女站在台前,拍照者蜂涌而上。接着,大会主席宣布,选举完毕后要大肆庆祝,按圣诞节的风俗,到时男士可以随意拥抱女士。台下有人补充,女士也可以拥抱男士。会场顿时活跃起来,打情骂俏声,不绝于耳。

接着,王若望带领 5 名候选人进入前台,开始演讲。

华夏子以朝鲜语“晚安”开始了她的演说,谈女人参政,认为女人应该跟男人比试比试。

徐邦泰对其十大竞选纲领侃侃而谈,呼吁大家投他一票。

王若望表示自己之所以在垂老之年来支持“民运”,是“民运”的声誉不太好,他决心在道德上、财务上改善“民运”组织的形象。但是,一些人向他泼污水,发动进攻,欺人太甚,不得不作出无可奈何的决定,宣布退出竞选。

岳武历数个人在大陆为“民主”所作的贡献,以及在海外所受的冤屈。

胡平作最后演讲。他表示,虽然王若望退出竞选对他的当选带来了相当大的机会,但是他对王退出竞选的理由深有同感,所以

也宣布退出竞选。

胡平说完后，王若望带头走出会场，就在这一霎那间，40多人蜂拥而出，整个会场像炸了锅似的。继胡平、岳武宣布退出竞选主席后，原来宣布竞选副主席的马大维、钱达、万润南也退出了会场。只听扩音喇叭里吼叫着：“民阵洛杉矶支部退出！”“民阵纽省支部退出大会！”“瑞士分会退出！”“日本民联分……”“原民阵理事会欧洲地区召集人和德国代表退出本次会议。”一位挂着贵宾条子的人特别热心地向周围的人介绍：“这是廖天琪的声音，德国汉学家马汉茂的太太，她完全没有利害冲突嘛！主要是看不下去了。”有人叹息“完了”、“分裂了”。此时场内气氛已经难以控制，秩序一片混乱，叫喊声、辱骂声、哭声……响成一片，“有人抱头痛哭，有人跪地求情，一位叫许英朗的代表突然用头撞墙，作自尽成仁状”。

更妙的是大会执行主席姚勇战在麦克风里把维持会场秩序说成“维持市场秩序”，令人忍俊不禁。他发觉说错了，自我解嘲地说：“我也糊涂了。”从另一角度来看，姚某并没有糊涂，当时的会场可不就是乱糟糟的市场吗？他们的争权夺利与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又有什么不同呢？只是比市场肮脏而已！

会议在几十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了选举。经过如此复杂曲折的厮杀，徐邦泰如愿以偿，当选为主席，杨建议和张伯笠当选为副主席，合并后的组织名称为“中国民主阵线”。

## 严家其一鸣惊人

这时，主席团宣布向大会提议请王若望担任合并后新组织的名誉主席，全场鼓掌。

“我反对！”突然，一声大喊响彻整个会场。

众人为之一震，掉头一看，原来是严家其，不禁目瞪口呆。

只见严家其抖地一下站起来，冲上前台，声色俱厉地说：“王若望从他的历史看出来，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民主派。他的脚跨出大厅门槛的那一刻，他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民主运动不需要救世主！”

会场又是一阵掌声。两次掌声，一次拥护，一次反对，反映了代表们的情绪已经完全失控，而执行主席如同前一位的自嘲“我也糊涂了”一样，没有将提议付诸表决，也没有宣布通过。平日一再强调的“民主程序”，也随风而去了。

郑义坐在后排，听见柴玲气愤地表示：严家其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太不像话了！开会的12万美元都是老人去要来的呀！

一声沉重的声音，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何必相残如此！原来是看到了于大海在主席台上揩眼泪。

## 谣言满天飞

为了打击对手，各方不惜造谣中伤。在王若望等退出竞选之后，大会即传出王若望、胡平、万润南开秘密会议商量退选之事。据胡平说，事实是整个会议三人从未坐在一起过。

旁听大会的曹长青说：“我住在会场所在的饭店三天，会场上和天安门广场一样时时谣言横飞。一位美国记者曾对我说，他在天安门广场上一天听到的谣言比他一生听到的要多，而我在三天会场上听到的谣言比我一年中听到的还多。”

看来，这些“精英”分子的伎俩并不高明，他们在策划动、暴乱反对共产党时故意制造谣言来煽风点火，蛊惑人心，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从他们的立场来看，似乎还可以理解。但对于自己的同伙，他们何至于如此呢？故而有人痛心疾首，发出了“相煎何太急”的悲鸣。这里有马大维的一段话，道出了“精英”们的心底

之言：“在将来的民主运动中，会扮演什么角色。他们觉得这是一次很重要的定位，现在不占据这个位子，将来回到中国就没有位子了。”“有些人是不肯做事情，光夺位子。”原来他们所谓的“自由”与“民主”，就是个人的“位子”！为了这个“位子”，可以下毒手，使绊子，争得个你死我活，哪管什么国格与人格。

对于会议的结果，大多数“民运”分子表示意外。会前，有人表示乐观，认为经过几年的风风雨雨，“民运”较以往成熟，预测合并会上将“不致出现往年为主席之争而剑拔弩张的情况”，结果跌破了眼镜，贻笑大方。有人本来对联合也不怎么看好，可断没有想到会出现如此多的丑闻，致使大会“难产”。

王若望在退出选举后这样写道：“在民阵民联合代表大会上，我决定退出主席的竞选，作出这一决定，是不得已的，对我是极为痛苦的。”徐邦泰、朱嘉明、严家其“他们一手导演了这次分裂，封杀一切反对的人”。这位王先生这回算是真正领教了“民主”的滋味。

曹长青在谈到对会议的观感时说：“原来我对大会抱很大希望，但我在会场上看到有一半人哭了，三分之二退场了，我很痛心。……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计后果，不计名声长久。如不反省，海外民运将很难深入开展。”

刘宾雁说：“对大会结果我并不感到意外。这几年我虽未参加民运，但在某种程度上常发生接触。民主基金会问题至今未解决，我曾写过有关文章，在写作过程中，我遭到不是基金会成员或某些基金会成员的阻挠谴责，使我从中看到和经受了一些极端不民主的嘴脸。……在海外这几年，有的人已经完全变成了披着学者外衣的政客或政客学者，……他们想的是有一天能成为权力的核心，尽管他们的权力是如此微不足道，离大陆政权那么远，但这么小的权力却让这些人利欲薰心！”

当然,感到失望的不仅仅是“民运”分子,还包括“民运”幕后的那些“黑手”。美国之音和 BBC 派去专门采访大会的记者在熬了三天三夜后,看到如此结果,不禁在一旁干着急:“怎么会这么糟?”长期以来,台湾方面一直积极插手海外“民运”。对这次合并台湾作了大量准备工作,“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秘书长陈惠青到会致辞,甚至大会的工作人员都是由“大同盟”美东分会担任的,以便达到控制“民运”组织,为其反共服务的目的。在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之后,台湾面对“民运”的分裂局面,又能得到什么呢?除了埋怨“民运”分子不争气以外,大概只能是打掉牙齿连牙带血合口吞,自认倒霉吧!

## 余波未尽,内斗继续

合并大会结束了,但是“民运”内部的矛盾更加激化了,裂痕加深了,形式上“合并”,实质上却更加分裂了。

2月2日下午,对徐邦泰背信弃义做法不满的原“民联”主席于大海在纽约表示不与徐合作时说:“徐邦泰自食其言,要与王若望一争高低,一些帮徐邦泰竞选的人更是从多方面攻击王若望及其夫人羊子,所表示出来的政治道德极为低下。”并宣布:“只要徐邦泰还在台上,我不会接受《中国之春》社长之职。”

2月4日,退出副主席竞选的马大维在洛杉矶召开记者会,表示合并大会不合法,南加州“民阵”、“民联”支部不承认新组织。

2月13日晚,“民联”纽约分部召开盟员大会,表示不能接受在盟员之间的关系上因没有“契约”不受法律的约束就可以不顾良知信誉等道德约束的辩解,认为民主应该建立在公开、合理、公正的基础上,而不应在尔虞我诈的密谋中进行。决定在澄清是非和事实之前,对联合大会的选举结果表示质疑,保留进一步发表观点

的权利；其组织名称、工作和活动仍按原状继续进行。

2月20日至21日，“民联”、“民阵”在澳大利亚的各分部在悉尼召开联席会议。会上，承认新组织的腾正平、郑郁等与反对者展开了一场混战，大打出手，致使一人血如泉涌，待警方赶到，方才制止这场群殴事件。事件发生后，会场所在的酒店老板、一位老华侨愤慨地表示：“你们丢尽了中国人的脸！我经营酒店30多年，从来没有听闻这么丢脸的事。”

与此同时，退选派同当选派在纽约进行了两场大辩论。万润南说，你活，我也活，大家协商解决问题，重新再整合，对当选派赶尽杀绝的作法表示不满。呼延民反驳说，联合大会不是分赃会，是民主选举，如协商就不需要代表出席，指出退选派总是将道德放在嘴上，不谈合法程序问题，为了几个人的乌纱帽没摆平，大打世界大战，这才是道德的彻底堕落。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彼此攻讦，最终也没有辩出个结果来。在大会上退出主席团的原“民阵”德国分部主席齐墨回德传达了大会经过后，“民阵”德国分部“决定不承认大会产生的新组织和新领导，德国分部将与欧洲的法国、丹麦、挪威、瑞典、瑞士、英国、比利时等联合，独立开展活动。为了使欧洲民运人士了解真相，他们将出特刊”。

## 用一个“黑”字概括

王若望此次出山，意在坐头把交椅，因而从一开始就表示不当名誉主席。谁知尽管周游世界，“东西南北巡”了一大圈，并厚着脸皮化来几万美元送给大会，到了也没当上主席，气得当场退出大会，继而求其次，接受名誉主席一职，谁知也让严家其给搅黄了。不仅如此，就连他到洛杉矶的食宿开销，大会也要他自理。气得王若望大骂：“操纵这次大会的人作得太不漂亮了，也太过分了。”他

认为整个大会既没有严肃性,也无有效性,离开民主十万八千里。据“民联阵”法国分部成员透露,王若望已跑到巴黎,准备自立一个山头,另拉一杆人马,成立“中国民主党”。刘宾雁的评价更是简单明了,“两边都一样,都很黑”。

得了便宜的徐邦泰面对一片反对与不承认之声,急忙抛出合并后的“民联阵”计划,为同伙打气。“‘民联阵’今后的首要目标是做好大陆工作,争取1994年底返回大陆。促使共产党解除报禁、党禁,并为六四翻案”。“到1994年底,同欧洲、美洲、亚洲各主要国家的朝野政党建立密切联系,以促进各国对北京施加压力,加速中国的和平演变”。

这一派胡言,除了又一次暴露他们与祖国和人民为敌的人的丑恶嘴脸之外,又有谁会相信它呢?就连万润南也不得不承认,“要使这样的组织在未来的中国大陆民主化中起作用并和中国大陆内力量集合是相当困难的。”

我们的祖国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上下一心,致力于经济建设。人心思定。通过八九风波,人们越来越看清动乱“精英”们的真面目了。他们再也无法兴风作浪了。海外“民运”的走向没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这次联合大会上出现的乱象,正是这种必然的表现。其命运注定是多舛的!

“民阵”、“民联”合并的闹剧结束了。

借民主之名,行争权之实,便是这次联合大会的主要特点。原来,所谓“精英”们一贯标榜的“民主”只不过是欺世盗名罢了。在此,我们不妨引用一个“民运”分子在会后所说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滥用名气者,必为名气所累;滥用民主者,必为民主所苦。”我们要说:滥用民主者,必为民主所弃!

在这次合并的前夕，严家其似乎早就预感到会出现上述情况。他当时说，“今天海外民主运动出现的现象”，在他们回到中国后，“将上百倍、上千倍的规模在中国重演”。唉呀！你们就那么几百人，已经闹成这个样子，如果在更大范围内，“上百倍”、“上千倍”地闹下去，会闹成什么样子，中国人民受得了吗？

就凭这一点，中国人民就已大开眼界。还是请你们把这种“民主”，留给自己“享用”吧！

（《中流》1993年第5期，标题略作改动）



# 齿冷录

——“精英”百丑闹剧补记

振 兴

1月底,美国首都华盛顿。以“整合”为名目、为号召的中国“民阵”和“民联”的“合并”大会,变成了“吵翻了天”、“斗红了眼”、“闹炸了锅”的一场恶斗的丑表演。一帮子“中国人”在“洋”地方出尽“洋相”,落了个不欢而散。

谁能说中国人只是喜欢搞“窝里斗”呢?这帮子专造自己祖国的反、又善打“派仗”的“英雄”们,不是跑到“窝”外的美国首都的洋饭店里“斗、斗、斗”,斗了个昏天黑地吗?何止在美国,他们还在巴黎、伦敦、澳大利亚、香港,“四面开花”一路斗下去,斗得花样翻新,有声有色,历久而不衰……。

果然,好“戏”真的是在后头!

1 + 1 = 3?

那场恶斗的暂时结局,是宣布了以徐邦泰为“主席”的一个名为“民联阵”的组织出笼。

“民联阵”者,“民主联合阵线”之简称也。可是在这场恶斗中,人们却没有看到一丝一毫的“民主”,也没有看到有形的“联合”,更没有看到稍为有点气候、像点样子的“阵线”。见到的只有势不两

立、无穷无尽的争吵，望不到尽头的深刻分裂和吵吵嚷嚷、乱糟糟的“一锅粥”！

端出了“民联阵”这锅“稀粥”，并未给这场恶斗划上一个“句号”。随着大会帷幕降下，却标志着这场恶斗“登”上“新台阶”，升了一大级，预示着在更大范围内，更激烈的纵横捭阖、明争暗斗、拼搏厮杀的新开端。

说是“民阵”、“民联”合成了统一的“民联阵”，可是原来的“民阵”、“民联”及许多头面人物，却并不理会什么“合并”或“整合”的事实，依然各打各的算盘，各拉各的队伍，各唱各的调子。

在那场“火并”中被逐出局外，未分到“一杯羹”，未捞上一官半职而耿耿于怀的万润南，不久前就从巴黎跑到美国，频频在传播媒介露面。他毫不掩饰，他的使命就是同“民联阵”搞“多元化”、唱“对台戏”的。在他看来，“民联阵”的出现，不是出现了“联合”，而是“形成‘一加一等于三’的局势。也就是‘民联阵’、‘民阵’、‘民联’，事实上同时存在的三分天下”。万润南此刻来到美国，可谓“来者不善”。

同样在“火并”中败下阵来，一无所获，受尽羞辱的王若望，更是气急败坏，哪里肯忍下这口气，买“民联阵”的账！5月4日，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他做了如下判断：“‘民阵’、‘民联’今年初合并为‘民联阵’，它的合法性以及公信力，都受到质疑。”在他看来“合并”后导致的恰恰是一种“分裂状态和各自为政的局面”。他摆出的是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对“民联阵”的合法性公开提出“质疑”和挑战。

美国的一家有影响的传播媒介，在评论“民联阵”成立后的状况时，也无可奈何地说，他们更加“山头林立”，“而所谓‘整合’，则是‘整而不合’”。

这是对“整合”“成果”的很贴切的表述。的确，“民联阵”成立

了,至今却仍然没有把原来的“民阵”和“民联”都“整合”进去。从澳洲到法国、伦敦、柏林,许多地区的“民阵”和“民联”的基层组织,或者仍打着原来的旗号活动,或者一分为二,各行其是,更加捏不到一块去了,从上到下,争斗更表面化、更激烈也更不择手段了。

这何止是“一加一等于三”!简直是等于无限多了。徐邦泰占了“山”,离“为王”则远去了。

### 《中国之春》争夺战仍酣

在新一轮的“争夺战”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所谓“民运”刊物《中国之春》的一场红了眼的“争夺战”。这场从1月开始持续了三四个月的“争夺战”,最后竟闹到对簿美国之公堂,求助于美国之司法来解决。

《中国之春》是原由薛伟、胡平、于大海在美国主持的由“侨界和台湾等方面支持的十年有余的”一份“民运”刊物。“民联阵”成立后,徐邦泰等人,当然要顺理成章地把这个舆论工具“整合”到自己的名下。可是,薛伟、胡平、于大海等人都拒绝交出《中国之春》的“主权”。于是先由香港的《前哨》,在今年的4月号刊出了有关这场“争夺战”的“专文”。《纽约新闻报》于4月19日全文转载此文并发表了追述报道。该报的标题是《妄改〈中国之春〉为私人刊物,胡平、于大海、薛伟被民联阵撤职》。

该报道称,4月12日,“民联阵”理事会责成徐邦泰发出一份亲笔公函。公函上说,“中国民联阵”理事会决议,正式免去薛伟《中国之春》经理一职,任命“民联阵”副主席张伯笠为《中国之春》代理社长,“民联阵”加拿大分部主席汪小风任《中国之春》代经理,胡平、于大海应向张伯笠、汪小风办理移交《中国之春》的事宜。

该报道说,4月13日,当张伯笠、汪小风以及美国律师等人去

《中国之春》接管时，薛伟以要“报警”相威胁，拒绝交出《中国之春》的大权。他还对《前哨》、《纽约新闻报》的报道“相当不满”，扬言“要打官司”。

闹到后来，果然打起了美国官司。据香港《前哨》杂志报道，4月27日上午，“民联阵”理事会新任命的《中国之春》代经理汪小凤和美国律师把美国法官签署的三份出庭应讯的传票送达《中国之春》编辑部。这场官司原定4月28日开庭。到那一天，胡平、于大海未到场，只有薛伟露脸。薛向法院递上给予时间请律师的书面请求。于是这第一回合只得暂延。但法官宣布“薛伟、于大海、胡平等，不得动用《中国之春》的任何款项，不得出刊《中国之春》的禁令，已即生效”。

这场关于《中国之春》的“争夺战仍酣”。徐邦泰信誓旦旦地说，“《中国之春》一定会由民联阵主办”，“发生争夺战非得通过美国司法来解决是我们不愿做的，但我们耐心等待了三个多月”。而于大海也不示弱，他咬定“任命不当”，他“决心不离开《中国之春》”，决“不与民联阵对话”。以“三不政策”与之对抗。

在纷纷扬扬的“争夺战”中，特别有趣的是，徐邦泰等人竟然矛盾百出地给《中国之春》历数种种罪名。竟给这份刊物戴上“红帽子”。徐邦泰说：“多年中，我在民联联盟委员会上做过多次表态，我认为海外以社会主义原则为经营方式的唯有《中国之春》杂志。”

到美国作短期讲学的刘晓波说：

“你们《中国之春》发表十周年回顾的文章，如果把民主、自由的字眼去掉，跟共产党纪念几十周年的内容没有区别，完全一样，真可怕。《中国之春》发表的那些对于形势的什么看法也跟共产党的形势报告一样……。我搞大众文化，就强调大众文化新的语言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颠覆作用。”

可是,另一方面,《纽约新闻报》的主笔、被称为“民运三朝元老”的呼延民等,却又攻击《中国之春》当了台湾的“附庸”、“巴儿狗”、“特务”和“线民”甚至“第五纵队”。他指责“有的方面实际上把海外以及大陆民运当成自己的‘第五纵队’,因而才会在今日为了支持一个声名狼藉、名不见经传的线民,宁可舍弃海外最大的民运联合组织”。“怪不得这些人昨天会丢掉大陆江山,今日会偏安一隅,一心想借手中共来保住小朝廷的统治”!这里所指的是谁,不是很清楚吗?这狗咬狗背后的恩恩怨怨和潜台词,不更耐人寻味吗?当台湾的“第五纵队”,当然就赶不上当美国的“第五纵队”神气风光了。

这除了证明这场“争夺战”白热化到何等程度,以至不择手段外,还能证明什么呢?

## 报一箭之仇王若望另立“山头”

王若望能够善罢甘休,承认既成的格局吗?

人们曾记得,王若望热衷于“民联阵”主席的头衔,凌驾于“矛盾”之上那阵子,曾谆谆告诫“下属”的年轻人,“不搞山头主义”,“排除小团体习气”。言犹在耳,现在他却不顾老命,以百倍的劲头,要披挂出马另立“山头”,给徐邦泰辈“一点颜色”了。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经过几个月的紧张酝酿、策划,王若望在5月5日正式宣布:从5月8日起,在洛杉矶召开“全球中国人权和民运团体联席会议”,会期预定为三天。

王若望称,这个非同寻常的行动,是由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这三个“头面人物”倡议和发起的。他还预告,这三个人“都将在8日上午致辞”。可是徐邦泰在一篇文章中却说,王若望在此前,还

写了一个“联席会议和组党”的“一号通告”。该“通告”中“未经别人同意,把郭罗基、戈扬、王若水、朱杏清等人名字列入他的联席会议和组党阵营”,因而犯了“对名人的‘强奸’”罪。他未说把方励之、刘宾雁列入发起人名单,是否犯了“强奸”罪。可是这两人在整个大会过程中却似乎也无重大作为。王若望看来唱的更像一出“独角”戏。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开会的前两天(5月6日)公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方励之和刘宾雁作为“发起人”都未露面,而是由王若望、万润南和马大维三人出面主持。

王若望宣布,这个包容、涵盖“全球”的“人权和民运组织”的“联席会议”,要“讨论、分析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规划民运的总体工作及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另外组成一个“欧共体式”的“全球海外华人对中共政权进行抗衡的政治组织”,即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松散的、但是道德形象高的、有纪律的这样一种民运、人权联合组织”。

王若望的追随者马大维说得更明白,就是要“组建有更高政治诉求的政党,同时以合适的途径和方式,建立一个总的协调机构”。

这个“政党”叫什么?王若望、马大维都未点明。据“民联阵”主席徐邦泰说,王、马在华盛顿时对他讲过,这个党叫“中国民主党”。实际上王若望要组这个党早在好几个月前就从巴黎放出了风。

这个“政党”和“协调机构”,同“民联阵”是什么关系,置“民联阵”于何等地位?明眼人一看便知,徐邦泰更是心知肚明。这个重大举措很大程度正是冲着“民联阵”来的。

严家其在华盛顿的“合并大会”上,不是曾指着王若望的鼻子轻蔑地宣布王若望“从来不是民主派”,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完了”吗?那位著名的“精英”刘晓波不是也曾把王若望形容为四处

乞讨的“政治乞丐”吗？当时，王若望的老婆羊子，还曾亲自出马对所谓王若望贪污了四万美元的传言，在报刊上“辟谣”，喊冤叫屈。王若望哪里能忘掉华盛顿的胯下之辱！如今，他要报这“一箭之仇”了！

说穿了，王若望的“组党”、“成立协调机构”，正是取“民联阵”而代之，与其争夺所谓“民运”主导权的摊牌和生死较量。是与“民联阵”唱对台戏、分庭抗礼、取而代之的重大步骤。

当然，王若望采取如此歹毒的步骤时，并未忘记表示一点“大度”。他不仅表示了“不想(不齿？不屑?)议论‘民联阵’”的“高姿态”，还当面“邀请‘民联阵’主席徐邦泰参加联席会议”。这一手不就足以把徐邦泰置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地位吗？你不来，就是不与“我”“团结”；你来了，就成了“联席会”属下和“民阵”、“民联”同等地位的成员之一。这一手，可谓老谋深算，够狠毒的了。不是说，“姜还是老的辣”吗？

## 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5月4日王若望刚刚宣布要召开“联席会议”成立新党和“协调机构”，5月5日曾经担任过“全美中国学自联”头目的赵海清，急急忙忙在华盛顿新闻俱乐部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一个“全美中国事务委员会”的组织正式成立。

赵海清声称，“这个委员会的宗旨有三个方面：那就是促进中国的人权和政治改革；促进中国的市场经济；保护中国人在美国的权益。”委员会的成员则囊括了“民运领袖、学运领袖”，还加上“美国的知名人士”。

在王若望踌躇满志宣布组党的“前夕”，抢先宣布这个“新委员

会”的成立,很难说是一种偶然巧合吧!人们有理由认为,它既是针对“民联阵”另拉起来的独立“山头”,又是针对王若望“组党”,独擅“民运”领导权作出的反应。耐人寻味的是,被王若望拉为搭档的方励之,未在洛杉矶露面,却和赵海清联袂出席了宣布另一个组织成立的记者招待会。他在讲话中,又针对认为在山头林立、整而不合的情况下不宜建立那么多组织的议论,作了辩解:“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目标,一个组织不可能包括所有的组织……”

那么这个“委员会”“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呢?原来就是它有着比别的组织更多的、强有力的美国“后台”和“靠山”,有“通”美国的“天”的“王牌”,还笼络了“美国知名人士”,因此,也就有了和美国官方更密切接近的色彩。赵海清不是得意洋洋地声称,这个组织“游说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善走美国“上层路线”,并且可以与美国官方建立“上层联系”吗?他简直对此有点忘形而夸耀不已了:“实际上在克林顿总统竞选过程中,我就和他们有过很多的联系”,同克林顿本人“见过好几次,向他提供有关中国方面的资讯和建议”。他还宣称,在宣布这个“委员会”成立的这一天,就安排了跟白宫、国务院、国会资深参众议员和其他官方人士的“频繁接触”的多种活动项目。这些活动的主题,就是向美国官方献策,乞求美国“在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时附加条件”,“如果不满足这些条件,就取消对中国国营企业的最惠国待遇”。这些活动的另一目标,则是争取、乞讨“美国基金会”的“资助”。

5月底,克林顿公开宣布对中国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时,没有邀请“民联阵”的头头与会,而这位赵海清却榜上有名得以聆听克林顿的致辞。对此赵海清受宠若惊,还以受到邀请和克林顿谈了话,照了像,大事炫耀。真是奴像十足!这不是活生生地勾划出这帮卖身投靠的汉奸、洋奴的嘴脸吗?可悲的是,当他们大讲向美国



官方提供“资讯”，亦即出卖情报乞求洋人“资助”即施舍，钻营于洋人门下摇尾乞怜、献计献策对付自己的祖国的人民的丑行时，竟不以为耻，反而引为荣耀，并以此作为“争宠”和占据有利阵地的一笔资本。

### “乐”观其成，还是“苦”观其成？

在王若望咄咄逼人的挑战面前，轮到尴尬和难堪的，恐怕莫过于踞于“民联阵”主席宝座的徐邦泰了。面对着群“雄”竞起、山头林立，谁都不把他放在眼里的窘境，他徒唤奈何！下面这段话，活脱脱地反映了他的窘态：

“我看到王若望、马大维、于大海三人（注意：王若望的倡议搭档，又换了另外二人）的《组党倡议书》，除了敬佩于大海从半年前反对组党到倡议组党的飞跃式进步外，还相当佩服王老一个圆画不成再画一个更高级的圆圈的勇气和志气。我不敢到会捧场，实在是有二怕，一是怕弄不好又下海同王老竞选主席，再结新怨；二是怕弄不好对抗起来又发生‘退场’风波。不过王老执意推出中国民主党，我乐观其成，并一定会致电祝贺。只是希望届时王老先生不要再发表声明宣布中国民主联合阵线是非法组织。你活，亦让我们活，好吗？”

这不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生动写照吗？其实，与其说他是“乐观其成”，倒不如说，是“苦”观其成，更符合实际吧！他吞下的，是一颗很难下咽的“苦果”。克林顿着意邀赵海清与会，冷落了“民联阵”，徐邦泰又品尝了“酸葡萄”。

他果然没有亲自参加王若望的会，而是以“民联阵”总部的名

义,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事先他申明,参加的是“研讨活动”的前半部分,“对后一段组党活动,我们采取观望态度”。

当然,徐邦泰也并未善罢干休。在发表了“言不由衷”的“乐观其成”的声明的同时,他不是又用“严厉的措施”,要求原“民阵”和“民联”的“少数负责人”,“停止搞分裂活动”吗?为此,他甚至以“法律解决”相威胁了。他说,在“民联阵”成立后,“少数人”依旧打着“民阵”或“民联”的旗号活动,他“不敢苟同”。要就是“辩论解决”,要就是“法律解决”。《中国之春》案被诉诸美国公堂,就是“法律解决”的一例。

### “民主”? “我主”? “美主”?

王若望果然一个圆圈没画成,又东山再起画成了一个“更高级的圆圈”。他并未遵守不批评“民联阵”的诺言。在大会的第二天,还是在“检讨‘民运’过去,展望‘民运’未来”的名目下,针对“海外‘民运’内斗的现象,发出了坦率的批评和反思”。其矛头恰恰是集中于1月间“合并大会”和“民联阵”。来自肯塔基的吴方成历数那次大会的“违法现象”就达“六点”之多。有人更把那次合并的“选举”称之为“黑箱作业”。另外有的代表则在会上“建议采取行动,促使‘民联阵’停止对《中国之春》的法律诉讼”。王若望画自己的“圆圈”,当然就是要勾销“民联阵”那个“圆圈”。于是会上公开鼓励原来的“民阵”、“民联”,照常活动,照常召开代表大会。

经过三天的大会,在闭幕时宣布了两个新的“民运组织”的成立。一个是宣布以“反对党”姿态出现的“中国民主党”的筹建会的成立;另外一个体现“海外民运多元化”的“中国民运团体协调会”的成立。

会议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王若望唱的是“独角戏”的判断。

王若望宣布的三个会议倡议人中,刘宾雁、方励之都未列名为筹建人。在一百多个与会人中,参加“中国民主党筹建会”的只有30人。“他们推举王若望、马大维和钱达三人为筹委会召集人”。而叫做“中国民运团体协调会”的组织,召集人也是王若望,秘书长是项小吉。名称不小,却并没有亮出像样的阵势,不过是“七、八个人,十来条枪”而已。除了王若望,还是王若望,真是有点势单力薄不成气候了。

值得注意的倒是,王若望在解释这个“政党”的“纲领”时,充分暴露了他做为共产党叛徒的丑恶嘴脸。在“中国民主党”的“筹建宣言”中,开宗明义指出:他们就是“要以‘和平演变’方式,结束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实行三权分立,建立一个多元政治的民主国家”。

在阐明这个宗旨时,王若望的下列一段话更是意味深长的:

“在这个时候,国内的形势,瞬息万变。在某种情况下,中共的一党专制,不管是‘和平演变’引起或动乱引起的被民主政治代替的结局,已成为大家思想里共同认可的一种预测。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需要为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结束,做种种准备。这种准备工作做得越好,越充分,就可以使得新的时代不至于重复以暴易暴那样的历史循环中去。而且,我们从海外可以带回一些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民主精神,怎样运作……”

在他们发表的筹备“宣言”中,还大讲“目前大陆存在着从事合法民运的可能性”。他们已经把返回大陆,“在中共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推进民主化和政治改革”,打进“各种官方机构、群众团体、民主党派等”来瓦解、颠覆、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提上“日程”了。

亲爱的读者,王若望不是在向我们上“和平演变”的生动一课吗?它再一次证实所谓“和平演变”绝不是任何人凭空想象、编造的“假想敌”,而是一个早已不加隐讳的现实,不仅已写入他们的纲领宣言中,而且一直在实实在在地卖力实施。王若望的“中国民主党”和“协调委员会”也罢,徐邦泰的“民联阵”也罢,赵海清、方励之的“中国事务委员会”也罢,充其量不过是美国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不同“番号”的别动队而已。他们共同的奋斗目标,不过是争相进入美国规定的“圆圈”而已。对于他们的祖国,他们都是听命美国专造社会主义中国的反的“造反派”;在他们之间,他们又是争宠于美国主子的一伙伙专打“派仗”的能手。而所谓“民运”、“民主”则不过是一种漂亮的幌子,他们与“民运”、“民主”连边都搭不上。离开“民”,何来“民运”?没有“民”,何来“民主”?作为现代中国与12亿人民游离得最远,最格格不入的这一些,是既无“民运”,也无“民主”可言的。作为一个人就是“一元”的极端自我中心和利己主义者,即使在这一些游离于人民之外的人当中,也只能有“以我为主”,而绝不可能有什么“民主”。如果有什么“主”的话,那就只能是“美主”,也就是用听命于美国的驱使、争宠于美国主子来换取“论功行赏”和施舍、豢养而已。

正是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他们在中国人民创造伟大历史的斗争中,注定扮演一种可怜无望的悲剧角色,成不了气候,最终被12亿人民所不齿和唾弃,落一个千古骂名。

(原载《中流》1993年第7期)

# 中国流亡者在西方

【美】梅 佳

1989年“六四”之后，一些人亡命天涯。  
对于他们目前的生活情况，相信读者是有兴趣了解的。

## 台北资助由热渐转冷

怎样活下去？既是流亡者个人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一些海外“民运组织”的难题。1989年“六四”之前，海外“民运组织”甚少，较有影响的只有“民联”。但“六四”之后，“民运组织”仅美国就冒出了800多家。不过，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大多数“民运组织”停止了运作。

本来，“六四”之后一段时间，由于不明其相，各界捐款异常踊跃，“民运”经费毫无问题。“民阵”仅1989年即获捐款180余万美元。

然而，以“民阵”为代表的一些“民运组织”，花起捐款毫无顾忌，大手大脚。“民阵”要员坐飞机东奔西跑，为了讨论所谓“民阵”“民联”合并问题跑到东柏林开“现场会”，结果会未开出成果，钱却花了20来万美元。去年9月在旧金山开“民阵”“二大”，也花了17万美元。有的人一个月电话费即达数千美元之巨，亦要“民运组

织”报销。加上有吾尔开希等人挥霍的传闻,令民间捐款人不满。另外,“六四”热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冷,导致来自华侨等民间团体捐款愈来愈少,现在基本上已断源。

“民运人士”曾把希望放在台北国民党政府身上。据说,台北也确实曾寄望于“民运人士”可以帮助自己制约中共,经与“民运人士”多次接触之后,发现对方难成大器,搞得不好反而成为与中共谈判的包袱,故对海外“民运组织”的资助大幅削减。

### 处境“死不了也活不好”

万润南自去年9月接替严家其出任“民阵主席”以来,时常为经费短缺所困,尽管压缩开支,裁减总部工作人员,但为时已晚,设在巴黎的总部的租金和支出债项即达10万美元。万润南先是在英国提出搞一个集资1000多万美元的筹款计划,即向各界人士借款1000多万元,利用其利息养活“民运”,等“民主中国”建立以后再还债务。此计划被人讥为“黄粱美梦”,自然只是说说而已。今年2月,万润南专程从巴黎前往美国,企望能调动各大城市的地区“民运组织”的款项,一路却饱受奚落与批评,无功而返;三四月,万润南与理事长朱嘉明相继去台湾,也未达到预期目的,只拿到10多万美元。据说台湾今后不会定期提供资助。

在美国还有一个叫“中国民主与人权基金会”的组织,成立该组织的目的是集合力量向美国各大基金会申请资金,然后再分配到各海外“民运”团体。去年3月,20多名“民运”头面人物聚首佛罗里达,对“民运”项目和资金分配方案进行了商讨确定。该组织至今已获40多万美元,但由于申请资助的组织甚多,并不能完全维持一个组织的经费周转。获得款项的包括“民阵”、“六四”之声电台、《民主中国》杂志、波士顿中国信息中心、洛杉矶《新闻自由导

报》等。

“民阵”不仅经费拮据，而且在海外名声正呈负数增长。它是一个流亡组织，但相当多的知名流亡人士如刘宾雁、方励之、项小吉、柴玲、戈扬、刘再复、何频、徐刚、祖慰、吴国光、苏绍智等人并未加入“民阵”。“民阵”号称有 2000 名成员，但绝大多数只是一时出于激愤填一纸登记表而已，平时压根儿就不参加“民阵”组织的活动。有的人参加“民阵”甚至只是为了方便申请移民。留学生参加“民阵”人数更少。那么“民阵”会不会解散呢？估计在近期不大可能，台北和美国会适当给一些“活命钱”。一位“民阵”要员说：“死不了，也活不好。”

### “山穷水尽”可上西来寺

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在“民阵”内部吃“民主饭”的并不多，总部拿薪水的只有 5 人，其中除万润南外，领全薪的只有两人，半职薪水的两人。

现在各“民运组织”的专职人员不仅人数不多，而且薪水普遍很低。如果将他们算入“吃人血馒头”之列，的确不公平。

有的人私吞捐款，有的人以“民运人士”身份去台湾游山玩水，却又不干具体事务，当然属于“吃人血馒头”之列。在巴黎，有一个流亡学生不愿打工度日，请人用法文写了一块招牌，声称自己是“民运领袖”，在公园里举牌为自己募款。

现在这类人已慢慢没有了市场，只得去打工。像吾尔开希，据说就在旧金山一个加油站工作。

台湾联合报系在美国所办的《世界日报》，每年有 20 个名额资助“民运人士”1000 多美元。去年一些人为了获得此笔资助，耍了不少手腕，一时闹得很不愉快。一些不是“六四”后逃出来的人，有

的甚至未曾参加过“民运”的人也争得了一年资助。

更多的人为挤进普林斯顿大学而费尽心机,也使普大负责援助“民运人士”项目的余英时和林培瑞两位教授头痛不已。原来在1989年8月,普大一位从事文物生意的校董感于“六四”事件,捐助100万美元,希望能援助“民运人士”。消息传出后,申请者即有百余人,现已获得批准的有陈一谔、方励之、刘宾雁、张郎郎、苏晓康、柴玲、远志明、白梦、张钢、阮铭、陈奎德、苏炜等等20多人。每人每月可获得1000多美元,一般为期一年。有的已获两年援助,如苏晓康、张郎郎等人。

一年之后怎么办?有“民运人士”说,他们预备到了山穷水尽时,便前往洛杉矶西来寺挂单,投靠星云大师。西来寺虽然不发“供养费”,但免费提供住宿和餐费。原《海南日报》总编辑程凯逃亡之后一直住在西来寺。

如此靠人“供养”下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且因此备受外界非议,使他们的形象大为受挫。有人在报刊上公开责问他们为何不能去学洗碗扫地养活自己?事实上,那些靠人供养的流亡者心情亦不好受,他们在大陆时即较一般老百姓有更多的自由权,大多能随意地、不受约束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又有固定的薪水保障,可以过独来独往的“散仙”般生活。他们没想到在海外很难靠在中国的名气和地位长期活下去。

## 方励之等人声望下降

在流亡的“学生领袖”中,吾尔开希几已成为历史,大小“民运”活动很少见到他的踪影,不是他没有参加的积极性,而是活动主持老担心请他来会影响其他人的情绪,因为在许多留学生和华侨心目中,吾尔开希只是个“花花大少”。



柴玲的名声亦不佳,接近她的人指责她太傲慢。她刚出来时曾到美国各地巡回演讲募捐,结果几乎连路费也未捞回来,可见她的影响力。与封从德离婚之后,她花了几百元买了一只狗,甚至抱着狗参加会议,自然引人反感。

几位“学生领袖”关系闹得很僵,相互不买帐。吾尔开希当“民阵”副主席时,李禄、沈彤各自树了一牌子,撰写出版了自传。李、沈英文较好,与美国上流社会来往密切,还不断获人权奖之类。

严家其在大陆时“名震四海”,曾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过不少大胆设想。1989年他出任“民阵”主席之后,影响力渐弱。一是他缺乏行政管理能力,“民阵”总部权力大小都落在万润南之手,他甚至连总部财政进出的数字都不清楚,有“弱君”之称;二是他的理论受到不少人的非议,认为把中国问题看得太简单。

“方励之要出来就好了!”方励之尚陷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里时,海外从事民运的人都这样说。一年之后,人们似乎已忘了这句话。方励之不愿出任“民运领袖”,喜欢跟美国的名流来往。作家徐刚曾写过一篇文章:《方励之:迷信的解脱》。文章引用一些留学生的话说:“方励之是可以笑了,一家4口全在西方,背后有布什撑着,整个一个‘民主之家’,他为什么不笑?我只能把方励之淡忘,而为另外一些人祈祷!”还有人说:“去你妈的方励之!”“方老师,你太圆滑了!”

## 流亡到底有没有尽头?

苏晓康最近发表文章说,“流亡已经开始,大概没有尽头,对专制的不同,对西方的不适应,都是一种不愉快,虽然有霄壤之别。流亡是心灵的流亡,一种中国大陆人在本世纪末无法回避的境遇和感受,在国内或在海外都一样”。

苏晓康在流亡者中是比较坦率的一位。他公开承认自己是天安门广场上最软弱的人,在戒严之前便逃离了北京。他还承认他在《河殇》中严厉指责中国传统文化,并呼吁中国增加西方观念,但他的这些理想,与西方的生活现实迎头相撞之后,他“觉醒”了,过去对中国文化的一些批评,他都收回或修正了。苏晓康说,尽管目前的中国有缺点,但中国仍给予他力量与艺术灵感。

已恢复主编《今天》刊物的北岛,发现在西方有办刊物的“自由”,但刊物要生存下去并不容易。已出版了两期的《今天》只在极小的范围内发行。北岛说,推动他们事业的最好方法,是尽可能早日回去。当他们确定回去完全有保障时,就会带着一种修正了的使命感,以及对文学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所起的较清晰作用的观点回到中国大陆。

(《中流》1992年第6期)

## 严家其的新包装

宋文申

1979年在“西单墙”开始“崭露头角”，又在1989年北京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大显身手”的“理论精英”严家其先生，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著名“理论家”，这大概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他又发表了什么“高见”，扮演了什么新的角色？许多人却未必是清楚的了。

不久前，一位热心朋友向我推荐了一份刊登严氏在台湾鼓吹“和平演变”言论简要的剪报。读后使人茅塞顿开，大开眼界。原来严家其又跑到台湾，祭起“和平演变”的大旗，充当起“和平演变”的“理论家”、“预言家”和“高级谋士”的“新”角色了。

据严家其说，他“本来也就想写一本书”，“就叫《和平演变》”。此书写成了没有，写了些什么？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是，1991年7月间，他去了一趟台湾，在那里进行了一次推销“和平演变”战略的游说，却白纸黑字，千真万确。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唱了主角。念的就是“和平演变”这本“经”。他用十分清楚的语言，全面、系统地提供了他的“和平演变”的“理论纲要”。说这是他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提供的“献策”、“进言”，一份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宣言书”，也不为过。

既然它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鼻子有眼，鼓噪得颇为热闹，借《中流》一角，使读者们得知其一、二，似乎不是多余的吧。

台湾的有关报道告知我们，严家其风尘仆仆搞的这次游说，成绩未必很佳。他实际上在座谈会上唱了一出“独角戏”。而应邀参加座谈的大部分台湾学者或其他身份的人，对他鼓吹的“和平演变”战略，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冷淡、保留，甚至明显的反对态度。真正认同者寥寥无几。这是颇能发人深思的。例如，在严家其开宗明义打出“和平演变”的旗号后，一位正直的台湾学者，就老实不客气地表示，“老实说我拒绝用”这个概念，因为“和平演变”是“30年前就用过的名词”，“是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构下对抗共产主义国家的一个概念”。他一针见血点出，所谓“和平演变”，也“就是‘和平颠覆’的意思”，因而是一个应予“扬弃”的概念。他进一步指出，严家其的“和平演变”概念，是“偏向资本主义的概念”，不过是推销一种使“大陆能够和平地变成美国的方式”。这也可谓一言中的。

这位学者明确地反对、拒绝“和平演变”的战略，一针见血点破其服务于西方战略的实质，有胆有识，令人肃然起敬。在这次座谈会后不久，台湾的《海峡评论》在一篇社论中也语重心长地指出，“‘和平演变’不可不防，以免步上苏联覆灭崩溃的后尘”。可见，在台湾的真正爱国者中，对这个问题有较为清醒看法的，不乏其人。

还有些到会者，则用比较委婉的语言对严家其的言论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保留和批评。例如，一位与会者，用诙谐、含蓄的口气指出，严家其能成为台湾的“座上客”，甚至成为在电视上出尽风头的“电影明星”，是因为他“支持国民党或反共或国统会的和平演变意见”，否则，他的表演在台湾电视上“是播不出来的”。的确，在这次会上，唯一对台湾的“民主化建设”给予高度肯定评价、大力推荐所谓“台湾经验”的，是严家其先生。而生活在台湾的许多学者却无不谈到了其中“负面的”现象。而所谓的“台湾经验”，则早已被一些爱国的台湾人士嗤之以鼻（“什么‘台湾经验’，笑话！”）。更有的人，对严家其“很笃定资本主义那一套”，“主张私有制就是同

志”，表示了疑义。有人甚至列举事实指出，如果中国照抄美国和台湾的模式，会导致严重后果。

严家其跑到台湾为台湾的“社会进步”大唱赞歌，大力推销许多台湾人士都嗤之以鼻的“台湾经验”，其实是并不奇怪的。既然被请到台湾并成为“新闻人物”，严家其当然应当有适合需要的“表现”。他的“良苦”用心，读者是不难体会的。

当然，会上也有一位台湾教授，对严家其的“和平演变”做了某种认同，即同意把“达成大陆和平演变”规定为“总的目标”。可是，他却不同意“高举”这面旗帜，“把这一个目标清楚地展示出来”。因为，如果“明白地、直接地”把“和平演变”作为“对大陆政策的凸显的目标，又会导致中共的抗拒和反弹”，“促使中共透过所有的一切方法去防止、避免被国际社会或台湾和平演变”。这样一来，“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反而不可能实现”。他主张，不要使“目的太过于凸显”，以免引起“中国的反弹”和“内部的紧张的情绪”，而“应当高举和平交流的概念的方式去促成大陆和平演变的目的”。

这不失为一种“要这样办，却并不这样说”的献策性意见。无非是说，把“和平演变”说得太露骨、太刺激、太直白，并不利于这个战略的有效贯彻。

这种观点，在座谈会上似乎也应者寥寥。

而严家其的答复却是斩钉截铁：“不行！”不能掩掩盖盖、羞羞答答！

严家其到底说了些什么？其含义是什么？为免断章取义之嫌，还是请大家读一读他发言的详细摘要并给以判断和评析吧！但以下几点，却是十分清楚的，可谓“旗帜鲜明”：

1.“中国大陆的和平演变是无疑的”。“我们的目标是为促进和平演变”，不能遮遮掩掩。不仅要实际这样做，而且“公开的也是这样提”。这是“正大光明的事，管你共产党高兴与否”。

2.“和平演变”的目标是什么？他毫不含糊地回答：“和平演变的含义是很简单的，就是非共产主义化和民主化，就是要消除公有财产制度”，就是在中国“走非共产主义的道路”，就是打破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变社会主义的中国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连五星红旗“也要修改”。

3.他以“高级谋士”的身份，向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献计：“台湾要提大陆政策的话，主要政策就是和平演变的政策”。“台湾、香港、澳门这些地方应成为中国大陆和平演变的基地”。

4.他提出了在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的步骤。这就是先“做各式各样的准备：组织上的、思想上的、理论上、人才上的准备”。他们这些“精英”，“最终目的就是回中国大陆”，争取“推荐和平演变”的“新闻自由”。接下来就是“成立反对党”，“举出保证私有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旗帜”。最后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5.为了实现“和平演变”的目标，首要的是要掀起一个针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揭露高潮”。他从苏共 20 大开始的“非斯大林化”高潮导致苏联解体中得到了启示，预言中国“在下一代会有这么一天”，会出现一个“非毛化或非邓化时期”。

6.这个“非毛化或非邓化时期”，何时到来？他回答是“将在‘六四’新评价时候到来”。“中国现在的的关键问题是‘六四’问题”。“在未来几年中促使‘89’年民运的重新评价，这将是大陆演变的开端”。

7.他鼓吹国内外强化对大陆推行“和平演变”的联合攻势。认为，“促进大陆变化的动力”，是“来自大陆内部的抗议，西方国家及台湾的压力”。

8.他连中国大陆“和平演变”的时间也做了“预测”，把演变的实现，定在“未来的八九年”。

请看,严家其先生,不是把“和平演变”的性质、目标、方法、步骤、时间表,都和盘托出了吗?以至于在这种直言不讳的言论面前,还来讨论有没有一个“和平演变”的战略存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当然不是中国的几个“精英”们的孤立行动,而确实确实是一个国际范围的巨大联合战略行动。就在严家其跑到台湾的前后,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也跑到台湾,大念“和平演变”的“经”。他说,“和平演变”是一个“好”概念。美国接受中国留学生,与中国经济来往,都是服务于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这一唱一和,不是很发人深思吗?

4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中说过,“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原因之一是“艾奇逊公开的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5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的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美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

看到严家其这篇“和平演变”的“宣言书”,中国人难道没有理由对他的精彩表演表示自己的感谢吗?40多年前美国人想干而一直没干成的事,正在由严家其式的人更起劲地鼓吹和贯彻。严家其以教师爷的口气真的是给我们上了一堂“和平演变”的课。这真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

这个“如意算盘”真的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吗?其实严家其也无可奈何地透露了自己的“悲观”和隐忧。这就是中国人有多少人愿意跟着他们走?一位台湾与会者提出了这个问题: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会成为“促成大陆非共产主义的主力”吗?他担心,现在“经济改革造成农民是既得利益者”,如果他们对现政权“很满意”,“又该如何促使他们成为主力”?他进一步问,中共的现阶段政策“的确对农民有很大吸引力”,可是你们搞“和平演变”,

“有没有能够吸引农民的口号”？

这一点恰恰击中了严家其的要害。他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极重要的问题。在促成大陆民主化非共产主义化乐观的一面是时代潮流不可违逆”（?），“但悲观的一面即是农民”（何止是农民，我们的工人、解放军、知识分子会接受他的“和平演变”吗？）。据他说，目前还找不到从这方面“落实”“和平演变”的办法。他甚至说，中国人民“不愿见中国踏上东欧、苏联的后路，所以竭力替共产政权说话，这是很可怕的”！

请看吧！中国人民，不愿像苏联东欧那样解体、崩溃、破产，中国经济上的发展，生活的改善，社会的稳定，中国人民拥护自己的人民政权，居然被看成是“悲观的一面”、“落实”其“和平演变”战略的阻力，使他们感到“很可怕”。这就暴露了他们与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的实质。

这一点难道不正是这些“和平演变”专家们的致命弱点吗？中国的命运，归根结底还是决定于人民最大多数的向背。违背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人民看成是愚昧无知的群氓，脱离、背弃人民，正是他们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从这里我们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只要我们党保持清醒的头脑，永不腐化变质，永不脱离人民，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原则，使大多数人民的实际利益得到保证，得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大多数的广泛拥护和支持，所谓“和平演变”的阴谋是永远不能得逞的。



## 立此以存照

——请看海外《探索》杂志

关于“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的“笔谈”

**编者的话：**这里披露的，是海外出版的一份反动刊物《探索》杂志的主编司马璐写的《和平演变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文的详细摘要。

1992年，《探索》杂志为纪念该刊在海外“复刊”9周年和发行满100期，专门组织了一次“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为主题的“笔谈”。包括千家驹、戈扬、严家其、刘宾雁、苏绍智、阮铭、苏晓康在内的老、少“精英”式头面人物，均纷纷亮相，围绕这个“主题”竞相发表了各自的“高论”。“笔谈”结束时，该刊主编司马璐写了一篇关于此次笔谈的综述和总结性的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笔谈”和这篇文章，竟引起了台湾官方宣传媒体的浓厚兴趣和特别青睐。他们如获至宝，在1992年下半年对中国大陆的广播中，一而再、再而三，反复多次播送了它的全文，并一再用了画龙点睛的三句点题式的导语：

“和平演变——中共的唯一选择”；

“和平演变——中国的唯一出路”；

“唯和平演变可以救中国”。

其实，这并无可奇怪之处。人们大概不会忘记，今年年初在华盛顿上演的那场出尽洋相的“民联阵”成立大会闹剧，不就是由王若望专程赴台，进行了一番着意安排的上层幕后交易吗？施舍在

后,这篇“和平演变经”的出笼在先。人们并不难从中找到某种内在的联系吧? 8 万美元,当然不是白白拿出来的。鼓噪“和平演变”的小喽罗们交上了“试卷”,“考官”们才拿出 8 万美元表示认同、首肯和嘉奖。这也是把“和平演变”付诸行动的一种物质上的保障和支持。而他们不厌其烦地对中国大陆进行传播,则无非是想以这种方式在大陆找知音和“内应”,从而“加速”、“促进”社会主义中国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进程而已。

这个事实再一次证明,“和平演变”确实并不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凭空臆想出来的“假想敌”、唐吉珂德的“风车”或“稻草人”,而确实实是美国帝国主义者一贯卖力推行的一项险恶的战略。台湾的亲美反动势力,在美国的旨意下,正在不遗余力地强化针对中国大陆的“和平演变”的攻势。由一小撮“动乱精英”拼凑起来、名目不一的所谓“民运”组织,则不过是美国及其台湾同谋培植、豢养的不同牌号的“和平演变”的“别动队”罢了。

司马璐的文章,实际上是一篇全面阐明的“和平演变”战略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它受到台湾反动传播媒体的特别青睐,反复向大陆传播、推荐,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可是,事情还包含着它的另一面。它也成了——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珍惜社会主义成果的人们,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份十分难得的反面教材。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共产党人,有理由了解这些人在怎样用“和平演变”的险恶手段来对付自己的祖国,也有理由了解在新的情况下他们推行“和平演变”的某些新特点和表现形式。不久前,国内的某些报刊上有人不是又在公开宣称“和平演变”和改革是“同义语”吗? 曾经死不承认存在一种“和平演变”阴谋的某些人,现又改变了腔调,把“和平演变”说成是“治国兴邦”的圣丹灵药当作宝贝向人们大力推销了。这倒是很能发人深思的。读一读司马璐的这篇文章,把两者加以对照,将有助于澄清某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所制造的混乱,看

清许多问题。归根结底,把改革和“和平演变”等同起来,给对“和平演变”有所揭露和防止的努力,扣上“反改革”的帽子,是徒劳的。我们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和“和平演变”不仅不是一回事,而且是根本对立的。

## 附录：

### 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摘要)

司马璐

《探索》复刊9周年,又适逢100期,本刊特举办“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为主题的笔谈会。

这次笔谈会,原意是在“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这个主题下,分别以《如何加速促进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私有化》、《如何加速促进中国军队的国家化》、《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社会与教育文化的多元化》为重点的笔谈。参加这次笔谈的来稿,多先从当前中国的政治进行分析。中国当前的现实也的确如此。“演变”也好,“演进”也好,改革也好,一切都与中国政治情况的变化分不开。

以下,我分别介绍各位朋友的笔谈要点。

参与“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主题笔谈的有千家驹先生和戈扬女士。

千家驹先生,以自己献身于中国革命70年的经历,作为历史见证:“唯有‘和平演变’才能救中国。”千家驹先生引用了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进步。可是中国建国后的“三反”、“五反”后对资本家的利用、限制、改造等等,使中国生产力大倒退,灾难频仍,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千家

驹先生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和平演变中进步的。“和平演变”能把坏事变好事。中共的“反和平演变”是违反历史潮流的。

戈扬女士一向以生动活泼的散文、中国民族文学特色表达她对中国“和平演变”的看法。戈扬女士分析，中国好比一个蛋，内里已经变成鸡，只是一层壳死死地包住。现在这层壳开始破了，小鸡快出来了。

以“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为重点发言的有严家其先生、苏绍智先生、阮铭先生、陈安先生。

严家其先生详细分析了中共中央和人大权力机构操作程序，认为中共政权正逐渐走向没有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专政。

他提出，从五个方面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第一，推进中国的私人企业和市场经济；第二，推进中国新闻出版自由；第三，推进中国选举制度的变革；第四，推进中国的结社自由；第五，推进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经济文化的交流。

苏绍智先生认为，民主的要义在于多元、参与、选择、法制和制衡。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民主精神格格不入。但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看，中国的民主化已有基础。他认为，民主需要权威，不是突出个人专制的权威，而是建立在理性和宪法上的权威。权威主义较权能主义更能够转向民主化。所以中国民主化的前途是光明的，民主的障碍是可以克服的。

阮铭先生指出，中国的“太子党”正在中国形成以父荫为背景、代表既得利益者的封建力量。目前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自由派与极左派两头大中间小。中间力量逐渐成为中国的主导力量。中国自由民主力量有可能联合中间力量，取代中国的极权主义者。

陈安先生的意见：社会主义的试验已经失败。中共老一辈死后，中国的民主不可避免。中共新一代领导人面对民主潮流，会有较理性的反应。他认为：假如在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下推行民主，开

放党禁,任何党派赢得多数取得政权,即使民主派不能获胜,也可以先争取掌握地方政权。他寄希望于中共从上而下的民主改革、自由选举。

以“如何促进中国的经济私有化”为重点笔谈的有陈一咨先生、赵发生先生、吴国光先生。

陈一咨先生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在89年民运后,由疲软而复苏,是由于计划经济为主,公有经济为主路线失败的结果。现在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在养活着一个社会主义的躯壳。这条路线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中国农村改革、经济改革,已经使中国经济制度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陈先生劝告中国领导人,早日顺应潮流,积极促进中国根本制度的变革。

赵发生先生提出十六个字:“自下而上,从小到大。以民压官,自然渐进。”他说,中国大陆很有可能通过“和平演变”,以较小的代价,在不引起剧烈社会动荡的条件下,完成经济私有化。

吴国光先生认为,一党专制与公有制是共生的。要结束一党专制,就不能不瓦解公有制。中国近期的私有化发展,将有助于打破中共政治权益上的垄断。在中国现实条件下,私有化正在为民主化准备基础和条件。私有化不等于民主化,可是我们可以顺应私有化的发展而推进民主化。

以“如何加速促进中国军队的国家化”为重点笔谈的有杨秉章先生、林常胜先生、艾端午先生。

杨秉章先生指出军队必须摆脱政治,需要职业化、专业化,以代替革命化,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不可分。

林常胜先生认为,由于解放军的现代化、军队思想意识的变化、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及中共强人时代的终结,解放军具备了由党军变为国军的基本条件。民主派应作的基本工作:第一,支持军队非党论;第二,针对军人的利益提出具体的政策;第三,争取

解放军政治上的中立,根据 89 年民运的经验这是可能的。

艾端午先生的看法:“和平演变”的主力是军队。“六四”事件打乱了中共军队的战略部署。解放军高级将领被撤换,军队素质降低。但海湾战争使中共领导人大大为震惊;全军上下要求军队现代化、专业化,军队中改革派力量影响正在扩大,目前中共的下级军官是关系中共未来走向的最关键的一代人。

以“当前中国农村与中国农民变化”为重点笔谈的有陈铁军先生。他从人民解放的重要根源来自农民,谈到中共统治中国大陆的 40 年,中国农村和农民所发生的变化,认为:目前中国农村正在社会转型。以开放为转折点,正冲击着中国的国家统治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运动最有希望。

以“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社会及教育文化多元化”为重点笔谈的有苏晓康先生、高新先生、何钟瑞先生。

苏晓康先生指出,“六四”之后文化观念的破产,打破了权能主义的统治,造成中国社会大幅度倒退,打破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垄断。他分析了当前中国“文化热”思潮的几个主要分裂:一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裂;二是激进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分裂;三是传统与反传统的分裂。虽然引进了不少精神文化的新资源,还是缺乏普遍的认同。在创造一个文化中国的宏伟构思中,中国知识分子应当从形形色色的决定论和反传统中摆脱出来。

高新先生认为,提高全民族的教育文化水平,是促进中国“和平演变”的首要任务。

刘宾雁先生指出,苏联和东欧变化的一些负面影响,中国民运中的一些弱点,很值得大家反省深思。他又指出,我们反对的不仅是一个政权和制度,同时应正视在中共统治下人民素质所受到的伤害。作家的活动不仅限于写作、演讲,应该投身于社会公益,改变人们的精神状态。

我认为刘宾雁先生这段反省深思的建议非常重要。所以借刘先生的这项意见,作为笔谈要点介绍的总结。

(原载《中流》1993年第9期)



## 大老爷与“小学生”

魏 巍

刘宾雁跑到台湾去了。

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许多共产党的叛徒早就是刘宾雁的先驱。那个鼎鼎大名的张国焘，不就是一个吗！现在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残余分子，既然还占据着一个小地盘，残茶剩饭总是有的，尽管未必很理想，只要肯出卖灵魂，还是可以找到一個归宿的。至于最后的下场如何，那就很难说了。

据外电说，刘宾雁是于去年12月11日自美国抵达台北“访问”的。令人感到有趣的是，这个在大陆一向以“青天大老爷”自居的刘宾雁，却一下子变得媚态可掬，毕恭毕敬地称自己为“小学生”。据法新社自台北报道，刘宾雁说，他“要像一个小学生那样来观察台湾过去40年所取得的成就”。

既是宣称要当“小学生”，自然就要当得够格。在台湾的半个月中，他对共产党进行了百般辱骂，对国民党进行了肉麻的吹捧。这都是在意料中的。然而不曾料到的是如下一则消息：“大陆作家刘宾雁昨日指出，他的作品第一次在台湾刊出，是民国七十一年一月底，中央日报晨钟版连载了他的《人妖之间》，他幽默地说：‘中央日报当年没付我稿费，当心这次是来要债的！’”（见国民党《中央日报》12月12日）当然国民党官员对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于12月24日派《中央日报》总编辑许志鼎前往来口饭店见刘宾雁，“将七年前的这笔稿费致赠刘宾雁，替七年前的文字缘划下美丽的句点”

(见12月25日该报)。这笔钱究竟多少,报上没有透露,既然当“小学生”当得那么够格,自然是稿费从优了。其实刘宾雁也还是有愚蠢之处,即使不说“要债”的话,就凭那半个月无尽无休的吹捧,主人也还是会给一笔厚厚的赏赐的。不过我觉得最精彩的还是发表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的照片。你看那一向道貌岸然的刘宾雁手托金票时那种含情脉脉的样子是多么地动人呀!如果有哪位画家要叛徒的形象,那真是绝好的资料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凡是有一点良心的中国人都是承认的,就是敌人也无法否认。而刘宾雁对于党和人民取得的这些伟大成就,却没有任何热情,换不来他一声赞美。在他眼睛里,总是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人民的事业简直是一片黑暗,一团漆黑。而对真正的黑暗势力——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却没有看见他有过什么指责。这是很叫人纳闷儿的。如果说特点,这恐怕就是他作为记者和作家(其实他是没有多少作品的作家,这一点他自己也清楚)的特点了。可是他巧辩说,这是“第二种忠诚”。他特意写过一篇作品,题目就叫《第二种忠诚》。意思是像雷锋那样的人,可谓第一种忠诚,而这种忠诚不过是愚忠愚孝,一种工具罢了。而像他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忠诚——“第二种忠诚”。他还专门找了一个模特儿作为作品的主人公。可惜这个模特儿不长脸,为时不久就叛逃了。这个耳光真是打得脆响。不过,这还不算最有趣的。我觉得最有趣的是,通过刘宾雁对台湾的“访问”,我们发现他身上不仅有“第二种忠诚”,也有“第一种忠诚”,不过“第一种忠诚”是专门献给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第二种才甩给共产党和人民。事情就是这样奇妙的组合,正如大老爷和“小学生”也可以统一在一个人身上。

刘宾雁是1987年被开除出共产党的。一个人既然天天骂共产党,反共产党,老是想把它推翻打倒,那就不如把他请出去。如

果还有人对此不理解,那么看一看他对台湾记者的谈话,也许就了然了。记者叙述说:刘宾雁跌入回忆中,他说自己在1984年开始怀疑,开始绝望,热情被浇熄,理智在良心上萌芽,此时写了《第二种忠诚》,呼吁不要盲目服从党的领导,正是他当时心态的反映。“1986年,我清醒了……”这句话刘宾雁尘埃不惊的淡淡说出,却令人有从无声处听惊雷的震动……这不是给《第二种忠诚》作了一个最准确的注脚吗?一个“清醒了”的要同共产党最后决裂作对到底的人,共产党为什么要把他硬留在自己的队伍中呢?

刘宾雁像其他叛徒一样,在主子面前表示要反共到底。“他决定写成各种小册子,用各种伪装,寄给大陆民众。”可是我倒觉得他应该更多地想一想叛徒的下场,实在说还没见过哪个叛徒有好的结局。就说前面提到的张国焘吧,刘宾雁决不会比张国焘对国民党更有价值。张国焘“红”了一阵之后,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连个车都要不出来,后来又回到香港摆香烟摊子,最后像狗一样地冻死在加拿大。这种景象不是也可以让刘宾雁之流警醒一些吗?

1990年2月6日

(《中流》1990年第3期)

# 难得的教员 绝妙的教材

——逃亡“精英”启示录

赵望 凌光

难忘的 1989 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过去已经一年多了。逃亡海外的动乱“精英”们,在匆匆搭就的反华舞台上,群丑毕至,众怪咸集,使出浑身解数,拳打脚踢更兼力竭声嘶地闹腾,上演一幕幕喜剧、闹剧、悲剧,也颇有些日子了。替他们画画像,号号脉,并从他们麇集作怪、跳梁撼树到日暮途穷的三部曲中,思忖一番,琢磨一番,以求在这些难得的反面教员身上悟出点什么,从这些绝妙的反面教材里面获取点什么,正其时也。

## (一)

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多,世界很不平静。且不说美苏和解、“冷战”趋缓在世界格局中引起的风云变幻,也不说打得够可以的海湾战争,单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新动荡,特别是东欧土地上的急剧变化,就够人们细细地想一阵子了,而我们国家则经历了西方世界的所谓政治经济制裁,以及终于制裁不下去的戏剧性变化的历程。

但是,不管国际形势千变万化,不管政治风云阴晴晦明,经过正正反反、反反复复的实践,我们越来越明白了一个真理:国际范

围内的阶级斗争没有终结,国际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会止息,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就是这种斗争的最主要的形式——正如《阵地》发刊词所说。放在这个大背景下,回顾1989年春夏之交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决策,评估其在捍卫人民的政权、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作用,看得就更清楚了。也许,时间间隔得更长些,从历史前进的长河看,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程看,这不寻常的一页,将会展示出更为深远的意义。

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考查逃亡域外的动乱“精英”们的所作所为,所行所思,便洞若观火了。

## (二)

《香港时报》1989年7月19日刊登了中央社18日发自巴黎的一条电讯:

逃亡至国外的中国大陆民主运动领袖们,在巴黎秘密地举行了三天会议,于今天达成决议,创组“民主中国阵线”,团结全世界反中共政权暴政的人士,拯救在中国大陆上遭受迫害、镇压,为民主奋斗的人们。

这些民主运动领袖们,有大陆旅美知识分子名作家刘宾雁、前合肥科技大学校长管惟炎、中国民联主席胡平、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阮铭……大陆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李春光、四通集团领袖万润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苏炜、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毛思想研究所所长苏绍智、北大生物系学生沈彤等20余人,先后分别于7月13

日从美国飞抵巴黎，与逃亡在巴黎的中共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北师大教育系学生吾尔开希、南京大学学生李录等 10 多人汇集，举行会议。

他们在巴黎共和广场的“假期旅馆”内，隐秘地集会三天，达成初步协议，创组这个反共、反暴力的“民主中国阵线”。

《东方日报》1989 年 7 月 21 日刊登了由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苏绍智、刘宾雁等五人签署的《成立“民主中国阵线”倡议书》，正式打出了旗帜，召唤各路逃亡“精英”，麇集于麾下。

接下来，《明报》转发了中央社 8 月 22 日的电讯，“民阵”总部已设在巴黎，正式开始工作，开展对外联系。这个总部办事处的负责人之一，就是万润南在四通公司的副手、受命插手动乱暴乱的代理人曹务奇。9 月 22 日，这个拼凑的反动机构正式成立。严家其成为总头领——“主席”，吾尔开希论功行赏坐上第二把交椅，成了“副主席”，万润南则充任了“秘书长”。动乱“精英”们逃亡海外之后演出的反华闹剧的第一幕，在吵吵嚷嚷中收场了。于是，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反动组织“民联”（“中国民主联盟”），在跳了十多年光杆舞之后，又添了一个“志同道合”（应该读作臭味相投）的新伙伴——反动组织“民阵”（“民主中国阵线”）。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看看这份发起者、组织者、当政者的名单，人们不难发现，那里边有三多：长胡子的居多，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手居多，前年那场政治风浪中充当学潮背后黑手者居多。撇开“民联”头子胡平不计，原科技大学校长管惟炎就是 1989 年那场学潮亦即自由化高潮的煽动者、支持者；刘宾雁、阮铭等搞自由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来年前；严家其、苏绍智、万润南、苏炜等更是 1989 年那场动乱暴乱的灵魂和高参。过去，“三多”人物和青年之间这层微妙的关系总还是遮遮掩掩的，许多好心人也误以为学

生闹事纯属自发,并无上当、被操纵等情由;如今,他们撕下了掩饰物,公开勾连在一起了,长胡子的跑到前台亮相了,这就给人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帮助人们擦亮眼睛的一课。

顺便提一句,苏绍智 1989 年 6 月逃到美国以后,8 月初曾经在芝加哥接受《新闻周刊》访问,有一段妙语。

问:中共当局说你们知识分子在民运期间跟学生勾结?

答:这是毫无根据的谣言。学运完全是自动自发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纯粹是因具有共同信念才结合在一起。并无勾结情事。

苏先生说,是“结合”,而不是“勾结”。仿佛当年孔乙己向咸亨酒店老板辩诬:他的断腿源于“跌”,而不是窃书被“打”。

在这个问题上,万润南倒毫不躲闪。也许是急于邀功,他公开承认插手学潮、支持动乱。香港《明报》1989 年 7 月 30 日刊登该报记者发自芝加哥的专稿。试摘引若干,以飨读者:

[本报记者芝加哥 28 日专电]著名的民营企业家万润南认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民主社会的建成,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中国能否形成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

万润南为四通公司总经理,今日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第一届代表大会。他在大会所作的发言中着重从经济角度分析了八九中国学运的发生、形成和发展。他说:“如果中国经济不发展,中国中产阶级不形成,那么民主社会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他说,这次民运是十年经济改革的必然结果。……各种矛盾集中,表现出来就是产生民运的一个经济原因,像“四通”这样的民办企业和个体户,是最积极支持这个运动的一分子。

他又指出,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这次运动也不会有这样的规模和持续这么长时间。争取民主是开销很大的,在广场上每天开支起码要四万元人民币,当然海外筹集了许多资金,但大部分未能进入大陆。

……如果说,广场阶段主要的经济支持来自国内的民营经济,那么第三阶段——民运在海外的继续发展,要靠海外的企业界。

这是一番极为难得的自供状。妙处有三:第一,公开承认插手学潮;第二,说明了支持的原因:学潮的目标——建立一个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代表着他们——民营经济和个体户的利益;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公开呼唤中产阶级亦即资产阶级的形成、发展,并最终以西方式民主制度亦即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推动民主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的复辟。可以说,万润南为“民阵”、也为他们的“哥们儿”组织(诸如胡平的“民联”、王秉璋的“中国民主党”等等),提出了明确的经济纲领。把他们的向往说得如此坦率、直露,堪称宝贵的反面教材,难得,难得!

### (三)

如果要问“民阵”是个嘛玩意儿,组织起来干什么的?可能会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比如,刘宾雁在巴黎第一次筹备会之后接见记者时就说:“‘民主中国阵线’并非政党,他们亦未有打算以暴力手段推翻共产党,只希望能以温和派人士代替专政。”(《香港时报》1989年7月19日)苏绍智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一方面断言“中共政府会垮台”,“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已经破灭了”;另一方面,在回答“你想推翻共产党吗”的提问时,又说:“不想。我仍然认为我们只能在体制内想办法。但我们必须仰赖党内



的一股健全力量来推动改革,以便使它成为一个受人民信任的党,使党变得更加理性,更有人性,也更加民主。”(《中央日报》1989年8月10日)如此等等。似乎他们只是关心国内的改革和民主建设的进程。

且不要急于相信他们。再看看另外几位首领的想法:

万润南 1989年8月10日在旧金山说:“‘民阵’是紧密政治党与松散联合体二者中间型态的政治组织,并不是流亡政府。该组织正致力于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接掌政权。”(洛杉矶《国际日报》1989年8月15日)瞧,秘书长先生的目标是接掌政权,是要共产党和人民交出政权。手段和途径呢?据香港《争鸣》月刊报道,秘书长先生在美国与西东大学某教授的长谈中,“否认‘民阵’是以‘体制内改革派’为主”,“也驳斥所谓加入‘民阵’是小招安,是‘海外共产党’的说法”。他强调“‘六四’获致的重要教训,就是体制内改革解决不了大陆问题,只有进行体制外改革,中国才能进步,这就是‘民阵’的工作”(见《中央日报》1989年12月14日)。

主席先生严家其持何态度?台湾《中央日报》1990年5月13日登了一则报道,题目就是“从温和的体制内改革,到坚决推翻中共”。报道称,严说:“我的思想在近一年起了很大的变化,六四之后开始看清了体制内改革是条死路。”“六四让我发现必须推翻中共的一党专政。”报道赞许地称“严家其从温和和理性的体制内改革者,一跃而成果敢坚定的推翻中共体制者”,这是“将自己过去的思想和信念彻底地粉碎,再拾缀碎片重新排列组合一个崭新的自我”的一种“心灵浴火”的过程。其实,无论“体制内改革”还是“体制外”打倒,目的都是一个:让中国走向西方资产阶级怀抱。手段不同,旗帜不同罢了。——当然,这旗号的改换还是大有用场,那就是他们自己撕毁了党内“改革派”的外衣,露出了“坚决推翻中共”的真实而狰狞的面目。这岂不又是一件绝好的促人深省的活教

材？

如果说，长了胡子的“精英”还讲究含蓄和策略的话，那么，动乱中出尽风头却又头脑简单的吾尔开希，就爽快得多了。据台湾《中央日报》1989年7月30日报道，这位“大明星”在芝加哥“锋芒毕露”。他踌躇满志地说：“有一次，我在天安门广场讲话的时候，一位西方记者问我，对天安门前所悬挂的毛泽东像有何评价。我回答说：‘总有一天，我会把它拆下来。’”对方问及“中共认为这次中国的民主运动，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吾尔开希供认不讳：“从某些方面来讲，他们并没有说错。”在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共产党做了一番诬蔑之后，他大言不惭地说：“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当然要推翻！”中国共产党“必定会被推翻”。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人们能够听到那牙缝中迸出的恨恨之声。这不禁使我们联想起1989年4月27日非法组织北京“高自联”发动的大游行。当时，针对《人民日报》“4·26”社论，发布了所谓“新学联一号令”，要求各高校“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并且规定了游行口号，包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坚持改革”、“人民万岁”等。并且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的口号，改为“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吾尔开希正是参与决策者之一（当时身任“高自联”的前身“北京高校临时学联”的常委）。这个斗争策略的转变，也曾蒙骗过一些人。现在，两相比较，终于让人们看透他们的真实用心和本来面目。

其实，吾尔开希在本质上并非前后矛盾。动乱中的5月16日，他在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中，早就喊出了“政府是一个由坏蛋和腐败分子组成的帮。党和政府是一回事，要反对政府就必定要反党”。立场不可谓不坚定，态度不可谓不鲜明。

写到这里，想起了前年读到的一则短文，讲到苏晓康逃亡海外

的一番忏悔、一番谄媚，很有点“心灵浴火”的模样。原文不长，抄录如下，以供鉴赏：

### 苏晓康的遗憾

华多

叛逃海外的动乱“精英”苏晓康最近在香港报刊上大谈起其得意之作《河殇》的“偏颇”、失误来了，一副诚惶诚恐、遗憾万分的模样。

不过，千万不要以为苏先生是出门思过，认识了（哪怕一点点）自己否定民族文化遗产，欺祖灭宗的罪过，认识了自己宣扬资产阶级文明，鼓吹全盘西化的罪过，认识了自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动乱的罪过，不满不是那么回事！

他在香港一家半月刊上撰文说，过去，他曾由羡慕西方人的自由精神而羡慕西方文化，总认为是因为中国文化未能导致自由精神而不能原谅它，因而，《河殇》的反传统思想有偏颇之处。今后呢？今后思考中国的问题，不能再绕过共产制度而只去清算传统文化，即：“不要再奢谈文化而不敢直接面对这个制度了。”

原来，苏先生的遗憾在于《河殇》错拿了民族传统文化做靶子，透过这个靶子再批判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直截了当地以共产制度做靶子。

这二者之间有区别吗？有的，苏晓康在文章中就不无后悔地说过：《河殇》出现以后，台、港两地不少学者曾经指出这种偏颇，认为当前大陆的问题，主要在制度而不在文化，但他却因觉得这些学者过于偏爱传统文化，而未能接受——可不是么，原本是同一战线的“友军”，是共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战友”，他却和他们闹开了误会，有了龃龉，这便如何是好？

有了这番后悔，便有了这次行动：公开承认《河殇》的偏颇和失误，公开表示从今以后将不加任何遮饰地反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政治制度。这是什么？这是反祖国、反人民的宣言书，是反华大合唱的叫骂曲，自然，也是向新主子——国际反华势力的献媚书。

至此，我们已经完全明白了：曾经以呼唤改革的先锋而名噪一时的苏晓康先生，原来是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洋奴才、卖国者！

然而，苏先生注定要遗憾终生——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吓不倒、更骂不倒的！

#### (四)

这些逃亡海外的“精英”们，除了麇集起来拼凑“民阵”，信誓旦旦地发宣言，流窜四方搞煽动，恶言恶语地咒骂自己的国家、民族之外，还干了些什么样的勾当呢？

总的说来，就是一件事：投靠国际反动势力，使用各种手段，阴谋颠覆人民的政权。正如杨尚昆主席 1990 年 5 月出访拉美五国前就“民主女神”号船问题所说：“所谓‘民主女神’号船是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的活动工具之一，活动的目的是颠覆中国政府。”这里讲到的“民主女神”号船的活动目的，揭示了“民阵”全部活动的总出发点和总归宿。这些“反华专业户”每天吃饱了，喝足了，睡够了，不必去做工，不必去种地，也不必去搞科研，被豢养来反对祖国，反对人民的政府。他们干下的件件桩桩恶行，几乎无法统计，也没有谁有兴趣去统计。但，也可以举其要者。

比如，呼唤西方国家施行制裁，并梦想通过制裁使中国要么俯首听命，要么经济崩溃、政府倒台。

早在 1989 年 4 月下旬，即那场政治动乱正要劲的时候，方励

之就通过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记者，向美国总统出谋划策了。他献计要外国通过经济手段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抽出在中国的投资。而为了这一手有巨大效力，短期内则要鼓励外国投资。何以如此？为的是“迫中国对外国投资有巨大的依赖性”，“在国际社会和中国的关系上经济因素越来越重要的时候”，迫使中国就范“那就很容易”了。1990年出国之后，经过短暂沉默，又旧调重弹，要美国保持对中国的压力，加紧对中国的干涉。7月15日英国《观察家报》刊出的访问记中，登载着方励之的话：“所有外国给予中共的援助均应附加条件，以迫使北平当局尊重人权”，“任何外援都应附加条件，特别是有关人权的条件”。

平息暴乱之后，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了政治、经济制裁，亡命“精英”们从这些霸道行径中受到鼓舞，额手相庆，又不断四方游说，呼喊加温。

严家其逃到法国不久，就秘密接受三名记者采访，口出狂言道：“……政府已完全丧失合法性，再没有将来，它不会维持多过两年。”然后说：“我赞成制裁这个政权！”（《明报》1989年7月11日）7月13日，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苏炜、李录等8人在巴黎举行首次记者招待会的时候，被通缉犯、天安门广场动乱副总指挥李录，在会上宣读了一份《告各国首脑书》，恳请“尊敬的各国首脑们”，“采取各种方式，继续对中国现政府进行谴责，和必要的经济制裁”。（《明报》1989年7月14日）

其后，在意大利举行的1989年国际青年大会上，李录又大放厥辞，再次呼吁“各国政府继续对中共实施经济制裁”。据台湾中央社记者报道：“意国记者询问他有关西方国家政府正逐渐恢复与中共经济关系的看法时，李录说，西方国家对中共唯一的压力是来自经济制裁，这项措施千万不能妥协。”（《中央日报》1989年8月25日）

制裁的目的何在？用万润南的话说就是：“当大陆发生经济困难，无法解决的时候，不得不在政治上有所让步。”（据香港《百姓》杂志报道）而当前，由于“外国对中共政权的经济制裁”等原因，“中共的经济已经开始崩溃了”。香港《明报》1989年8月11日报道了万润南在记者招待会上讲的这番话。万润南明确地说：“我认为他们已经经过崩溃的起点。他们要支持到年底，将会非常困难。”《明报》报道这则新闻时，大标题醒目地写着“万润南愁看中国经济，预测年底前将会崩溃”。事实已经粉碎了这番梦呓，但他们的那点祸心，却暴露得明明白白。关于制裁目的，陈一谔1989年9月7日在巴黎的一次谈话中说得更直露：“我个人认为对中国政权实行经济制裁是必要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不断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和实行经济制裁”，使“中国基本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造成政治瘫痪……这样，我们就可以早一天回到中国”。瞧，设计得多么美妙的一幅远景图！然而，它只不过是一枕黄粱！

那个曾经担任过天安门广场动乱总指挥的柴玲，逃离大陆以后，在制裁的问题上，表演了一出颠颠倒倒的滑稽戏。逃往法国之初，在接受《中国时报》独家访问时，说什么“我们不同意经济制裁，因为我们人民的生活已够艰苦了”。香港《新报》1990年4月6日登载了这则消息。也是这家《新报》4月15日又以“柴玲誓不放弃战斗，呼吁制裁李鹏政府”为题，发表来自巴黎的综合消息。称“柴玲周末与丈夫封从德一起在巴黎露面，她呼吁西方各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制裁中共政府”。消息援引柴玲的话说：“无论是经济、政治或其他性质的制裁行动，对中国政府均非过分。”只不过“这些制裁行动必须与知会中国民众的运动同时进行”。同年7月到了美国之后，据香港《明报》报道，7月9日在休斯顿会见记者时，柴玲又一次恳求七个西方主要工业国不要取消对华制裁。

欧洲经济共同体10月22日决定撤销制裁，与中国恢复正常

关系,10月26日新接任“民阵”主席职务的万润南立即跳出来加以指责。且看香港《新报》10月29日刊登的美联社27日巴黎电讯:

万润南周五正式接任民主中国阵线主席,他并立即指责西方政府撤销对中共的制裁。

万润南周五向支持者及记者表示,他对于由12个国家组成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决定解除对中共的制裁表示遗憾。……

万润南于巴黎西部举行的记者会上,指责欧洲共同体“未有就中国人权状况发表任何声明……改变中共极权主义行为之前”,便于周一决定撤销制裁。

无可奈何花落去!动乱“精英”们企盼对中国的永久制裁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崩溃的幻梦,一点点破灭,那泪眼婆娑的祈求、哀告,色厉内荏的批评、指责,通通无济于事。

而且,他们这种种卖国行径,不仅自己撕破了“独立”、“爱国”之类的外在假面,出卖了“人格”、“尊严”之类的内在价值,也遭到了世界上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们的蔑视和唾弃。法国《欧洲日报》1989年9月15日的一篇社论就曾指出:“在国外靠着某种势力的豢养,干着反对中国现政府的勾当,虽嚣张一时,其实可鄙又可悲!”“因为不爱自己国家的人,最为人们所不齿!”他们的前景如何?社论说:“靠谩骂自己国家捞私人资本的人下场一定不会好。当他们的价值利用光了的时候,他们的戏也就演完了。”说得好!这些匍伏在洋主子膝前,媚态十足,对祖国则狺狺狂吠的吧儿们,早就折断了脊梁骨,能有好下场吗?走着瞧吧!

## (五)

说他们是奴才气十足的吧儿狗,是不是冤枉了这些可爱的先生们了呢?我看没有。有事实为证。

西洋镜之一:

[本报记者芝加哥 28 日专电]吾尔开希与郑心雄,双方均否认曾会晤。

吾尔开希指出,他曾经拒绝与台湾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郑心雄正式会晤。据指出,芝加哥一位亲台方面的华人教授希望见吾尔开希,经安排后,他用车将吾尔开希接到某处,结果发现台湾国民党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郑心雄正在等待,而吾尔开希感到坐立不安,极不自在,随即便告辞。(香港《明报》1989 年 7 月 30 日)

台湾《中央日报》驻美特派员报道:

吾尔开希否认和郑心雄接触过。他说:“我要澄清一个传言。有消息说,台湾海工会主任郑心雄和我有过一次会晤。事实是,有人想安排我和郑先生有一次正式的晤谈,被我拒绝了。……我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传言,这对中国民主运动没有什么好处。”(《中央日报》1989 年 7 月 30 日)

万润南答美加新闻中心记者问。

问:民阵对台湾采取什么态度?



答：在民阵开始筹备期间，为了避免问题趋于复杂，暂时不会与台湾官方接触，但是可以和台湾民间联系。（纽约《世界日报》1989年7月30日）

此时为羞羞答答、想吃羊肉又怕臊的阶段。吾尔开希甚至明白说出与台湾勾搭对他们的所谓“民主运动没有什么好处”的话来。

然而，且看——

西洋镜之二：

吾尔开希、万润南等8月10日在旧金山与柏克莱加州大学留学生对话时表示，“‘民阵’一直把台湾作为争取民主的整个力量的主要部分。”万润南说，“现在建设中国民主政治的基地只能在台湾。”“台湾的存在，对中国的明天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洛杉矶《国际日报》1989年8月6日）

[本报特约记者芝加哥专电]严家其称：台湾民主将成为统一基础。（《东方日报》1989年7月31日）

此时可谓舆论铺垫、频送秋波阶段。要实现颠覆大陆上人民政权的目標，自然要找一块基地，找一个样板。这块反共基地，这个“民主”样板，他们终于耐不住地大声呼喊，找到了！那就是他们心中的圣地——台湾。

那就让我们再往下看吧！——

西洋镜之三：

（台北讯）畅游故宫、摩耶精舍，刘宾雁：宝岛生活真美好。

大陆作家刘宾雁夫妇昨天全天畅游故宫和摩耶精舍。……刘宾雁说第一天的活动就让自己对台湾之行的信心更增强,会有更多的收获和认识,自己以前对台湾太无知,太不了解了。(台湾《中央日报》1989年12月14日)

[本报专讯]台北消息:中国民联主席胡平和《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曹长青,明日主动约见台湾海工会主任章孝严,要求台湾方面对海外大陆民运人士提供帮助……另外,“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万润南,今日将与章氏会面,预料将会谈及支援的问题。(香港《明报》1990年1月9日)

[本报专讯]台北消息:民阵秘书长万润南多日来在台湾到处奔波,与此间各种团体及各界人士接触,在前日社会大会的企划研讨会上,万润南谈到台湾之行的目的,除了“广结善缘”之外,特别又加了一项“等米下锅”,言辞恳切,溢于言表。万润南特别表示,民阵募款自然是抱着多多益善的宗旨,如果募得多,可以多做事,募得少,摊子就只好铺得小一点,就算一毛钱募不到,民阵也会缩紧肚皮撑下去。……民阵将于今年三、六、九月内发动各式活动,名之曰“三六九大闹”。民阵秘书长万润南指出,这些活动约需经费二百万美元,但目前仅募了四百万台币,距离目标甚远。(《明报》1990年1月9日)

这回到了登门参拜、伸手乞讨的阶段了,又是“广结善缘”,又是“等米下锅”,讨钱要“多多益善”,讨来后准备“大闹”。如此等等。那一派效忠辞,那一副奴才相,不是很有点令人捧腹么?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如意算盘是打不成的,只好眼不闭心一横,卖身投靠去了。

然而,戏并未演完,还有恶心的在后头。请看——  
西洋镜之四:

[台北法新社 10 日电]民阵主席严家其称台北政府为中华民国,他表示个人首次公开承认中华民国合法性。他说:“我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华民国政府同时存在。”他提请外国同时承认这两个政府。(《东方日报》1990 年 5 月 11 日)

[台北讯]“民阵”主席严家其昨日下午二时在福华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表示来台几天最深的印象是,台湾的新闻界与传播界,在推动中华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上起了很大作用。他指出,台湾的新闻自由和走向民主化是最令人激赏的,因此希望藉着“台湾经验”带来示范作用,来影响“中国民主化”。……长期目标则在于“推翻中共独裁的一党专政”。……他强调,这个长期目标一定会达成……。(台湾《中央日报》1991 年 5 月 13 日)

[台北讯]执政党中央海工委会主任章孝严昨天在执政党中央委员会,与来访的“民主中国阵线”主席严家其,就中国统一的未来及方向坦诚沟通。……严家其说,中共的“四个坚持”已快坚持不下去了,海峡两岸如果一边放弃“四个坚持”,一边放弃“三不”就可以统一了。不过,他也强调,在“四个坚持”未放弃之前,还不要放弃“三不”。(台湾《中央日报》1990 年 5 月 13 日)

瞧,这位“主席”先生一到台北,赶快叩头礼拜,尊称“中华民国”并呼吁外国承认其合法性。然后就是“拥抱台湾经验”(《中央日报》语),尊为“示范作用”。再以后就是媚态十足地出谋划策,要台湾当局以“三不”作为筹码换取大陆“四个坚持”的放弃,最终以

台湾统一中国。有趣的是：这位“主席”先生是到台湾“执政党中央委员会”去进谒“执政党中央”要员的。这不能不是一个小小的讽刺。

## (六)

以“闹”的名义乞讨，讨来钱自然要“大闹”，再用“大闹”的功劳邀赏——这就是逃亡“精英”们的“三部曲”，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发展模式。他们当然不满足于流窜游说，事事假手他人；他们还要粉墨登场，自编自导，自唱主角。自然，也想借以改变“民阵”内部一味纷争和无所事事的局面，在内外交困、财源匮乏的困境中，闯出一条生路。

“民阵”成立前后，他们确实“闹”了好一阵子。比如，1989年7月12日这一天，他们就“闹”了三出：一是又在巴黎弄了个“民主女神像”，搞了个热热闹闹的竖立仪式；二是弄了封《致各国首脑书》在记者招待会散发，企图利用30多个国家首脑聚集巴黎参加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的机会，乞求他们加紧制裁中国；三是找了间售货铺子，凑了个“中国民主之家”，演了一出成立典礼的小把戏。至于流窜、煽动、蛊惑、乞讨……于欧洲某些国家、美国和台湾等等之间，就难以计数了。

在这种种闹腾之中，真正大闹的，又莫过于他们全力拼凑并寄予莫大希望的“民主女神号”广播船事件了；而失败得最惨痛、以至于严家其主席先生为之临风涕泪、泣不成声的，也莫过于这个“民主女神号”广播船事件了。兹略说一二。

这艘海盗广播船，酝酿于1989年秋，筹建于1989年底，命名于1990年3月9日，始航于1990年3月17日，寿终于1990年5月25日，前后折腾了十来个月。花了几十万美元成本乔装打扮的

“女神”，满载着“精英”们一举惊世的美梦和豁出去大闹一番的孔武精神，在凄风苦雨中行驶了59天，行程8万海里，绕了多半个地球；原本气势汹汹，到头来灰飞烟灭；未能广播出一个字，就呜呼哀哉了。

颠覆广播的计划彻底告吹，这艘扮演过“女神”的宝贝船呢？请看几则报道：

[综合东京24日电]不获捐助，“弹尽粮绝”，续航乏力。民主船将在台湾拍卖，今天宣布中止广播计划。

“民主女神号”广播船的筹办者周四说，由于日本不欢迎“民主女神号”到访，因此有关计划决定取消。发言人说：“我们会在台湾拍卖该船，之后尽快将船员遣返法国。”

[本报台北航讯]“民主女神号”广播船，真如外传是一艘“买空卖空”的船只！在得不到原先计划的捐助后，顿陷“弹尽粮绝”的困境，续航乏力。

……女神“美梦落空”！……计划募捐的金额遭“滑铁卢”……致使“女神”陷入坎坷的路途了！（《东方日报》1990年5月25日）

[本报专讯]女神号50万卖出，台南市商人购得。保存设备，供人参观。（香港《明报》1990年5月31日）

[特稿]民主女神遭逼迁，船主拟让它去大陆。

现停泊于台南安平港的“民主女神号”，被高雄港务局限期于3月28日迁离，不知何去何从。该船船主，台湾商人吴孟武表示，盼有民主国家收容，他甚至气愤得说假如无路可走，就让“她”到大陆去。吴孟武说，“我是商人，并非搞政治的，我希望全中国改革开放，但也不希望有动乱。”（香港《明报》1991年1月29日）

香港《新报》1991年2月13日报道,台商吴孟武决定于3月20日将“民主女神号”广播船改名为“和平”号广播船,以“减轻该船的政治敏感度”。(《参考消息》1991年2月19日)

这就是说,到了“民主女神号”的名称也从那艘“船龄超过20年,依规定只能以废船名义”(台湾高雄港务局语,见《明报》1990年8月24日)从宝贝船上抹去的时候,叛逃“精英”们系在它身上的最后一缕“念心儿”,也将没了着落。历史就是这般无情,它让那些逆流而动的可怜虫们,丑态出尽,希望成灰!

“女神”号事件明白无误地展示了“民阵”好汉们处处碰壁、走投无路的困境,世人有目共睹。其实,早在1990年初,有关“民运人士热衷于开次会议,搞个募捐,弄个位子,忘了事实的指责”(见1990年3月1日出版《百姓》杂志)就已经纷纷扬扬,以至于在旧金山召开的“民阵”美国分部成立会上,《河殇》作者苏晓康为“民阵”“被人误解没做多少事而抱屈”,不过,他列举的“民阵”正在进行的大“项目”,却是那个注定短命的“‘中国之船’的广播宣传”(出处同上文)。也是在这个会上,美国分部筹委会发言人、“民阵”监事会主席钱×致贺辞时,就“直率承认民阵正在走下坡路的现状,行情看跌”。不过,还得鼓鼓劲,“相信只要大家发扬爱心,就能重振声威,促进民运的大发展”。(出处同上文,见《十字路口遇红灯,民主道路本崎岖——“民阵”美国分部成立大会侧记》一文)

走下坡路,行情看跌。——这就是逃亡“精英”、“民阵”好汉们的自我鉴定,他们一向是靠谎言和幻觉过日子的,这里却说了一句实话。实属难得。

其实——又一个其实,更早些,在“民阵”1989年9月22日挂牌成立第三天,台湾《中央日报》9月24日刊登的一篇专论中,就

曾哀叹：“历史只是给了‘民阵’一个机会而已，不等于已给了他们智慧。”“八九学运实质只是一场失败，甚至是如何失败的还来不及反思。”作者出谋划策说：“为此‘民阵’应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思考，在未来的实践中加强学习，不要只沉于哀叹，不要只迷于呼声，不要自以为是。而是虚心听取各方的意见，群策群力，付出应有的诚意，努力去扩大民主阵线。”这副药方效果如何？从“走下坡路，行情看跌”的既成事实看，似乎也不是什么灵丹妙药。退一步说，就是仙方神授，药么，按老百姓的说法，治得了病，只怕治不了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已“命”中注定“民阵”好汉及一切逃亡“精英”们的“行情”和“命运”，多么老谋深算的狗头军师，也回天乏力。话到这里，索性再全文引述一则报道，让事实来大声诉说。

[本报纽约专电]柴玲结束访美返法，对民运筹款表示失望。

北京著名学运领袖柴玲周六结束美国之行飞返巴黎，行前公布了此行为中国大陆筹款的情况。她说，这次获各界人士捐款合计一万九千七百六十元。扣除工作费用一万八千五百八十一元，几乎所剩无几，这还不包括膳食、住宿和医药费在内，否则将入不敷出。

造成捐款未尽如人意的原因，估计与民运处于低潮，前段时间传闻民运人士贪污滥用捐款和柴玲以“平常心”对待捐款活动等有关。柴玲对这次捐款成绩表示有点失望。（《东方日报》1990年8月13日）

乞讨了半天，没落下几文铜钱，这位原本想着捞一大笔的丐者，当然会“有点失望”，甚至不止有“点”，可能有好几“点”呢。报道把乞讨落空的原因归结为三点：一是他们的折腾处在低潮。二是斗士们不争气，贪污滥用捐款被曝光。这两条倒触到了问题的

某些本质方面,但冠之以“传闻”,未免客气了些。贪污滥用云云,许多是他们相互攻讦、知情者们闹内讧揭示于众的,就像1989年麇集天安门广场闹事的时候,因分肥不均而演出了“外高联”绑架北京“高自联”头头、广场总指挥柴玲的闹剧一样。第三条原因说是柴玲不卖力气、以“平常心”对待捐款活动,这就有点委屈这位刚从芝加哥捞了块“民主女神,龙的传人”奖牌的“英雄”人物了。为了弄钱,她是颇费了一些心机的,比如,到了旧金山,举办的那个名为“与柴玲聊天”(或译作“与柴玲的一个晚上”)的演讲会,是要掏钱买票的。惹得一位香港记者发开了牢骚:“我没有买门票去看她,去年带着严肃激奋的心情捐了钱支持民运,如果今日要循着购票形式去争捧一位无法接近而又失去自主权的人物,倒不如去看梅艳芳或麦当娜。”(《明报》1990年7月3日)如何?可即使这样,财源仍不旺盛,怨得着柴玲小姐吗?

当然,钱并不说明全部问题。此处不给彼处给,娘家不爱婆家爱。只要她们对着中国大陆猎猎,便自会有慷慨解囊的豢养者;而且,依据卖力的程度,还会有相应的犒赏。她们还不会丧家,至少在使用价值丢光之前。举出这样的实例,无非是说明她们并不美妙的境况,一斑窥豹罢了。

## (七)

流水落花春去也。

这些叛逃祖国的动乱“精英”们,从麇集作怪,到鼓噪跳梁,到日暮途穷,不过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一出大部头的包容了反华三部曲的活剧(喜剧?闹剧?悲剧?)竟然拿下来了,本事不能说不大,劲头不可谓不足。善良的人们从这场活龙活现的丑陋表演中,不也可以悟出许多?



1989年9月呱呱堕地的怪胎——“民主中国阵线”，刚过一岁生日，1990年9月便不得不换血了。过了一年主席瘾的严家其辞职了，出够风头丢尽丑的副主席吾尔开希也丢官了。万润南受命于危难之秋，充当了坛主。

然而，眼前的处境呢？——且看海外议论！

这是刊于1990年7月19日香港《明报》上的一篇专论，下面是文章的第一节：

### “民阵”问题重重与前路模糊

在海外支持中国民主化的人士中，“六四”后一年多来掀起了关于所谓“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的争论，但其实都是有所偏的，因为这二者之间并无必然排斥……及至“六四”后逃亡国外在巴黎组织“民阵”，严家其、万润南、陈一谘等都像1986年学运被压后的方励之那样，转向了“体制外改革”的思想。

但首先，他们都丧失了在国内本土活动的条件，而孙中山式的海外华人革命之路又显然在今天不通，于是，即使在外国将口号喊得更激烈，于中国国内也没有什么实在的影响，找不到切实可行的做法，成了当前“民阵”的一个严重问题；第二，所谓“体制外改革”对“民阵”来说不仅缺乏实践的条件，而且缺乏有说服力的理论指导，“民阵”主席严家其曾表示他认同社会民主主义，但其实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取向与他过往思想不协调之处甚多。严家其或“民阵”其他领导人至今仍没有在这方面做出最起码的理论功夫，理论贫乏，思想混乱，可说是当前“民阵”的另一个严重问题；第三，由过往的迷信“体制内改革”急跳为“八九民运”后、逃亡外国后的激进主义，明显出现了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现象，以至将所理解到的“体制外改革”观念又完全对立于“体制内改革”，不理解

二者之间在中国具体情况下是亦有矛盾亦有统一的……这则是当前“民阵”的再一个严重问题。

此外，“民阵”仍然有很多实际存在的严重问题，尤其是部分成员及代表性人物的作风惹人非议，组织混乱，以至“钱银”不清楚，对民主缺乏足够认识……等等问题；但纵使暂且不谈这些，前面提出的三个关于“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之间关系的思想认识混乱、理论贫乏的问题，亦足以使“民阵”的发展前景出现迷失方向的根本危机了。

请注意，专论作者在这里用了“根本危机”这样的词语。对于万润南新任主席来说，无论思想混乱，理论贫乏还是组织混乱，钱银不清，哪一个不是致命的问题？何处不潜伏着根本性的危机？

至于“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改革”的议论和谋划，倒需要认真对待。特别是重又拾起“体制内改革”的谋略，表明，有些人是寄希望于我们“体制内”力量的！寄希望于那些依然存而且活、与他们打联手的力量的！他们幻想着他们或者他们的联手们，像前些年那样，披着“改革”的外衣，想方设法钻到我们“体制”的内部，甚至爬到核心部位，充当智囊和高参，用“非暴力”的手段，实现国家“和平”地向着资本主义的“演变”。这样的高招、狠招，我们能等闲视之吗？

据说，严家其又在做这样的梦了。这位原本奉行并实践着“体制内改革”，即从“体制内”改变政权性质的高参，叛逃后赌咒发誓要放弃“体制内改革”，实行“体制外改革”，即从“体制外”打倒和颠覆人民的政权。如今，在碰得头破血流之后，经过一番总结、思付，又要重新拾起“体制内改革”的法宝了。——当然，这个新阶段的“体制内改革”是与“体制外”颠覆相配套的两手策略中的一手。在斗争策略问题上，这位“民主”斗士也有个三部曲呢。

香港《明报》1990年9月28日刊出了该报驻加拿大记者的特稿,标题就是“严家其盼回国推动民主”。报道说:“这位刚卸去中国民主阵线第一任主席职务的政治学者表示,他自己的事业已经与中国连在一起,而在国内推动民主自由必定较海外有效。”“他说,数日前三藩市(即旧金山——引者)举行的第二届民阵全体大会,一致通过在适当时候民阵将与中国民联合并,是作为在中国成立反对党的第一步。”而严先生渴望着以“反对党领袖”身份,出现在大陆。

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中国人民不会容忍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重操旧业,再搞政治动乱,再掀反革命暴乱。人民群众把他们看透了!

然而,我们这里还是要引用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在法西斯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时候,发出的呼唤,企盼它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人们,我爱你们。

你们要警惕!

——(捷)尤利斯·伏契克

(《中流》1991年第6期)

# 孽海孤舟

——“民主女神”号炎凉记

林照真

编者按：1989年后，作为那场政治暴乱破产的“余波”，一批“动乱精英”受其外国主子的授意和鼓动，曾在台湾吹吹打打上演过一场所谓“民主女神号”广播船“开航”的“闹剧”。当年，严家其、万润南、柴玲之流不是就纷纷出动，风尘仆仆地专程“云集”台湾，参与主持过这艘广播船的“开航仪式”，煞有介事的“风光”过一阵子吗？五年多的时光过去，这出“闹剧”的“演出成绩”如何？不久前台湾《中国时报周刊》刊出的这篇短文，向我们透露了一点信息。现特摘要转载，供人品味。

“笑死人，听起来真是肉麻！”一位当年曾为之“出资”的台湾商人，在“伤心与气愤”大叫上当之余，不是对这出“胎死腹中”，未成气候的“滑稽剧”和“讽刺剧”，作出了相当酸楚的评判吗？

几年前，台南吴姓商人，半夜宿醉回家，接到一通电话，“官员兄弟”打来的，说是要商人买民主女神号。

吴姓商人，名孟武，年41。说话间听得出台湾国语，回忆旧事时习惯向上翻白眼，眼球都快看不到了。他说，吴家在台湾几百年，没有亲人在大陆，也不知道多少“六四”天安门事件。但是，电话中那个人告诉他，中共扬言轰炸民主女神号、血洗台湾，潜水艇

已经开到鹅銮鼻，股票狂跌、人心惶惶，这时反共很有意义，买下这条船台湾局势就不会乱。吴姓商人全身酒意，“兄弟嘛！”又可以为国家解决一件事，为什么不作？

自此，吴姓商人，爱国商人也！

吴孟武是台湾华泰关系企业董事长，经营房地产、保龄球馆、进出口贸易，是 30 余家公司的负责人。他个人拥有 2000 余名员工，出入乘坐宾士 600，还可提供座车给地方官员使用，是个标准的富商。但他自称无党无派。

## 买下“民主女神”成为爱国商人

在吴孟武为这艘船付出 10 万美元订金后，他的名字开始与大陆民运发生关联，毕竟，在那个热头上，当一个台湾商人买下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民主女神”号后，对民主的热爱已经毋庸置疑。后来吴孟武付了 50 万美金买船，5 万美金买船上的广播器材。生意人吴孟武自此也以民主人士自许，在“民主女神”号于 1990 年 6 月 4 日进入安平港时，他也曾经激动，说了许多激动的话，像是：

“希望买了这条船后，所有的台湾人、大陆人，能为民主自由而生存，他也谨代表青年企业家，表达支持民运人士的一点心意。”

船进港的画面透过录影带的重播，可让人回忆当初那个国旗飘扬的热烈场面，当时台南市长施治明曾公开赞扬：“让中国人感到骄傲，台湾人、府城乡亲更骄傲，我以“民主女神”号为荣，以台南市民为荣，以吴孟武为荣……。”

大陆民运人士严家其也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公开说：“吴孟武的精神，使我感动。”

吴孟武自己又说：“民主女神号将使安平港成为国际知名港口，这艘船不仅是本人所拥有，也为全世界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所共

有。”

“那时大家都说我有爱国！”

5年后，吴孟武在巴士车上的电视小萤幕再度看到上述谈话，他一旁抽着烟，直摇头地对记者说：“笑死人，听起来真是肉麻！”

1989年，大陆天安门广场前发生六四学运，俗称“天安门事件”的大陆民主运动，像龙卷风袭般卷紧了每一个人的心。当时，欧洲、亚洲、美洲的19个著名新闻单位，与民主中国阵线联合成立“中国之船”协会，《欧洲日报》社长杜怡之被推选为协会主席。经过中国之船协会四外奔走，跑遍大小码头，终于购得1艘有27岁船龄、圣文森船籍的探测船。名义上虽然是世界各新闻单位出面买船，但是台湾却出了大部分的钱。支持民运的人相信，下令镇压1989民运的中共领导人看到或听到民主女神号，一定会颤抖的。

## 不复当年风光 只觉心痛窝囊

民主女神号广播船从1990年3月17日起航，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当时中共一再对外宣称，反对任何国家、机构或个人对民主女神号广播船的活动提供任何支持。4月底中共新华社还曾经强烈抨击台湾当局积极策划与大力支持，是公开进行挑衅；同年5月李登辉总统在接见八名无党籍立委时，表示基于2000万人的安全考虑，政府对“民主女神号”不宜出面，但不反对民间的积极反应。民主女神号航行期间，先后在香港、日本停留被拒后，最后终于疲惫地在台湾靠岸。

当时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万润南曾说：“民主女神号带着世界各国人民的良知，起航了。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关心与支持，只说了一句话：不要忘掉天安门，不要忘掉六四屠杀，不要忘掉八九民运。”

到今天,民主女神号广播船却从来没有如愿向渴望自由民主的12亿中国人广播过,如今广播电视、电台设备已先行搬走,而没有搬走的5个播音器、卫星导航系统、无线电通讯机、卫星侦测雷达都已经失窃,船上仅乘空旷与尘埃。

虽然吴孟武认为,民主女神号广播船为全世界爱好自由民主的人所共有,但是,很多事情却又像是吴孟武一个人的事。就以开幕当天来说,从舞龙、舞狮、乐队、气球等开销,还安排十几个人的升旗典礼,场面隆重、盛大,但最后都来向他收钱,然后,所有来参加开幕典礼的贵宾与民运人士,一切在台南吃的、住的,也全部由吴孟武负担。“什么钱都花我的,连市党部送来一个300元的花篮,都来向我收钱。”现在民主女神号船只停泊发生问题,却没有人来问一声,过去一些大力支持的媒体不见了,“如果早知道如此窝囊,我就不会这样做,现在的我欲哭无泪,想起来真叫人痛心。”吴孟武说他的“一个心很痛”,自认重义气的他不禁要问:“我的兄弟在哪里?”

吴孟武在船进港的2个月后,便向经济部申请成立民主女神号有限公司,登记的资本额是新台币500万元。而公司经营项目则是经营有关民主女神号展览、宣传、娱乐之相关业务,以及有关民主女神号纪念品(钥匙圈)、装饰品(项链、耳环)、女神号玩具模型及其材料之制造、加工买卖及进出口贸易业务。另外,还包括前述各项有关业务之经营及转投资。不过,照他说,这些都还没有真的执行。

## 船主精于营商 船体面临拆解

吴孟武因为身为民主女神号广播船的船主,这让他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商人。吴孟武是一个聪明的生意人,在保龄球界他赫

赫有名,最主要是因为他投资的保龄球馆,开启了全自动化彩色电脑计分设备的先河,改革旧有的人工计分,并率先采取 24 小时营业方式,建立 28 家球馆的连锁经营模式。而保龄球馆内拥有 64 条标准球道,也是为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而来。

名片上的头衔虽然多得数不完,但是吴孟武却在最前端,并且是以放大字样介绍自己:“‘民主女神’号广播船船主”,可见这个身份对他是多么重要。但多年来他只赢得“爱国情操为国人楷模”的称诵,以及一整箱的“民主之光”、“爱国志士”的小旗子。

买船后,吴孟武原本希望当台南开设海洋公园,可以做为“女神”号栖身之处,又或者可以藉着政府的支持,将船只装设成“六四”事件纪念馆。市长施治明在“民主女神”号广播船进港时,也曾经对新闻界提此构想,但是后来一直没有下文。“官员说的话,我们当然相信。”但是,吴孟武又深深觉得,以现在的结果看来,做市长的好像只会“发誓让别人去死”。

吴孟武最近却接到高雄港务局建议解体的公文。高雄港务局在今年 1 月 10 日,行文给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本给吴孟武,文中指出基于安平商港建港开发工程需要,该船须尽速就地解体或迁移,同时希望陆委会能召集有关单位研议相关细节及费用分担。

吴孟武说,他曾经为这件事付出太多心力,很不愿整件事在自己的手上结束。于是,吴孟武已经多次以“草民”身份,向总统府、陆委会等相关单位表示有意捐船的初衷。吴孟武在给李总统的信上表示:“草民愿无条件将‘民主女神’号广播船赠送给国家政府,做为观光及宣传的工具,让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共当局统治大陆四十多年残暴本质的历史见证。”

吴孟武同时也在信后委屈地提到:“草民 4 年来为了保存‘民主女神’号广播船,已耗费不知多少财力,对国家社会尽心尽力,却得不到应有的善待,亦使草民至今非常感伤。”吴孟武在去年 4 月



29日的信函,总统府第一局则在5月13日回复信件收到。

不过,陆委会也在去年10月11日给吴孟武一封信,提到:“有关台端愿无条件将‘民主女神’号捐赠予政府,以暴露中共于1989年民运期间的残暴本质,并作为历史见证一节,本会甚表敬佩。但是由于该船吨位较大,一时难觅得适当场所,以长久保存该船,所提捐赠一事,尚请缓议。”

## 两岸期待和解 女神封籍沉睡

台湾方面的解体之议让吴孟武感觉不到温暖,伤心与气愤情绪夹杂,但聪明的他很快就想到大陆彼岸去找另一个可能性,好像是在打大陆牌,以对台湾当局施予压力。三趟下来,吴孟武的感觉良好。他说,他见到了几个大陆的高官,“你就写说大陆国务院很支持”就对了,而且大陆还同意在厦门或上海两个港口停泊。

大陆方面据称非常希望“民主女神”号回归祖国,并且还告诉吴孟武:“只要你船上不搞‘六四’资料,不支持民运人士,大陆方面非常同意让‘民主女神’号回归祖国,不过,名称也要改成‘和平号’。”

吴孟武说,他知道大陆当然会有政治统战的目的,但这是台湾方面赶他走的。

没有惊动太多人,停泊在安平港的‘民主女神’号广播船,后来悄悄改名字为“和平号”,但是,在千岛湖事件发生后,吴孟武又激动地将“和平号”三个字涂去:“台湾人死了那么多个,一定要把名称改回来。”他说。

第二年的“六四”纪念日来到时,香港方面来向吴孟武借“民主女神”号的女神神像。吴孟武同意了,但是,却被外国记者报导成是出借整艘船,引起香港政府的紧张。于是,当时在香港近海的所

有船只都被暂时扣留,为此,吴孟武还曾经专程到香港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等到问题解决后,回来又怕出事,便悄悄地把“女神”号的神像运回台湾。

女神像落到今天这般田地,吴孟武认为他是台湾反共教育的受害者。当他答应买船时,说了许多以他为荣的话,船进港时国旗飘扬,他又是一个多么可敬的爱国商人。当海峡两岸关系恶劣时,“我就受到很多的重视”;然而在两方关系获得改善时,“我就被打入冷宫”。

“政府自己喊反共,等到我也要反共,并且邀他一起反共时,怎么每一个都吓跑了?”

夹杂在两岸期待和解的政治气氛以及台湾社会迅速发展的局势中,无言的“民主女神”号等于被弃置,吴孟武的心血付出也成为两岸政治讽刺剧的最佳剧本。

如今,有两尊出自法国人手中的自由女神像曾经轰动全世界,一个自由女神像目前高耸在纽约的天空,提醒美国移民的辛酸血泪。另一个自由女神在哪里?不瞒各位,目前则是放在吴孟武家的走廊中,说明台湾支持大陆民运的反共故事。

女神像被牛皮纸包着,露出上半身,还有厚厚的一层灰。

(原载台湾《中国时报周刊》1995.3.18,《中流》1995年第6期转载)

## 卖身投靠的“效忠信”

——“民阵”上书克林顿

马 鸣

1992年11月13日,中国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主阵线”,向美国总统当选人克林顿递交了一封信,提出了三点建议。“美国之音”记者魏珂就此采访了“民阵”组织的外交事务政策委员会主任马大维。

记者请马大维谈了向克林顿递交这封信的考虑和经过。马大维说:“在克林顿竞选中,我们很注意他对于中国方面的政策的言论。我们分析的结果,他对于中国的政策跟我们是符合的。所以在民主运动的中间,特别是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是支持克林顿竞选的政纲,特别是他在10月15日在纽瓦比的外交政策演讲。他演讲之前,我们已经跟克林顿的总部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徐美捷小姐。她是亚洲事务的政治事务的主任。这之前,她曾要求我们在纽瓦比演讲之前,给她一个对华政策的提议。我们写了一个东西给她,我也是主要起草人。这之间,我们提出了一个有实际性、具体性的建议,让她能够建立一个对华政策的智囊小组。在他的纽瓦比的演讲里,他又提到非常具体的东西,就是当克林顿组织政府以后,他要利用新的移民,特别是各国来的新移民,组成智囊团,对华也好,对苏也好,对波兰也好,就对这些国家的政策,由这些人提供一些相当具体的看法建议。在他的演讲中

有很多实际上是我们建议中提出的东西。所以我们感觉到他很能够接受我们提出的一些东西。”

马大维接着谈了“民阵”向克林顿提出的三项建议的具体内容。

“第一个，就是他讲的：能够利用少数民族，特别是对于母国情况非常了解的人士，很有深度的人士，有智慧的人，帮助他建立他的智囊小组。从我们的立场来看，我们大陆民运人士也好，或者对中国的问题非常了解的人士也好，希望能纳入他的行政部门里面，作为他的一个智囊小组的一员。我们这些人就能够有声音，对他有帮助。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就是希望能够建立自由中国电台、自由民主电台，在亚州，在其他地方。他在纽瓦比演讲也提到这一点。我们也向他们申述了我们的诉求：希望他很快把这个电台建立起来。我们在信里提出，建立这个电台主要是受了波兰共产政府倒台的启发。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波兰政府在倒台前的三、五年中间，在自由工会走入地下活动之后，主要以信息为主。他们的信息量，比波兰共产政府的信息量还要大得多。因为信息的快速传递，而令波兰共产政府受到很大伤害。所以他们能够很快把波兰政府推倒。所以我们觉得把信息传回中国，让中国人民有第二种选择、有第二个声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是比较创新的东西，就是我们在南加州民主运动联席会议上我提出过的一个提案：希望克林顿政府能够帮助中国的民主运动人士，即那些有志气的，也愿意将来能够回到中国去实行民主政治帮助建立各方面上层建筑，各方面的团体、机构，在各方面推行民主程序的人士。我把他叫做‘民主技师’。希望他们能够进入美国的政府，美国的两党，特别是民主党里面去学习民主的过

程：怎么去建设，怎么去组织，怎么去推行。投票是怎么一回事情，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各方面筹集一些资本，像奖学金一类的东西，招聘一些将来能回中国努力工作的人士，把他们推荐进克林顿的政府跟他的党。从基本上学习他们建设、建立组织，怎么做。我相信我们需要很多这种人士将来回到中国建立中国的民主程序。”

马大维说：“民阵的这封信，亲自交到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转克林顿政府过渡班子。”他表示相信民阵同克林顿班子，已经建立了联系，所以他们期待，不久将收到克林顿政府过渡班子的答复。

记者问马大维：民阵在不久的将来，是否会同克林顿政府过渡班子进一步联系。马大维说：“关于将来我们是不是需要去活动，去游说？我想我们是会的。我们有一批人跟民主党也有相当的联系，跟美国政府有相当联系，跟民主党国会议员我们也有相当联系。我们会通过这些渠道，继续推行我们这三个比较重要的建议。”（据《美国之音》1992年11月18日报道）

目前，民阵正在筹备与另一个主要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合并。这两个组织将于明年1月28日开会，讨论合并事宜。

（《中流》1993年第2期）

## 陈一谘从幕后来到幕前

韦 骥

天安门广场乱哄哄的时候，陈一谘被视若钦差，然而藏头露尾，恐怕吾尔开希之流草头司令，也难窥真身的。暴乱平息，消失三个月，突然出现于巴黎，终于让人看见了头脸。海外、国外通讯社、报纸、刊物开列的头衔，除并非夸大的“原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还有“逃往国外官阶最高的中共干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主要领导人之一”，“十年来均从事并主持中国的经改、政改设计，被认为是赵紫阳的主要顾问之一”，“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高级幕僚”，“赵紫阳的首席智囊”，等等等等。第一个公布这露面的，是公元1989年，台湾国民党9月5日《中央日报》。只是主题太陈旧，不过学了方励之的老调：“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停止对中共实行的有限制裁”。好在人遇危难，哭爹喊娘，先供出师尊和大老板，算是验明了正身。接着有台湾《联合报》9月7日，发表“第一次接受中文报纸记者的访问”的报道，又讲一遍“对中国现在政权实行经济制裁是必要的”；倒也多了一手新招儿，是颇以为台湾报刊的反共宣传不够味儿，于是出题目，开定单，说社会主义中国“蔑视人权”，是“没有最基本自由，实行如此残暴政策的国家”，“希望你们也能宣传这个看法”云云。

据《联合报》10月17日报道，陈一谘“逃出大陆后第一次公开演讲”，是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演讲记录载于《中国之春》第

12期。办这“之春”的，是原先“西单墙”的难兄难弟。前“高级幕僚”、“首席智囊”和“西单墙”的落魄将士，亲亲热热拥抱，一道吃美国饭，成了反对祖国的专业户，实在够滑稽，够悲哀的。

“第一次公开演讲”，题目是《在“八九”民运的背后》。“八九”自然指1989年。“民运”应为动乱暴乱。最有趣的，是那“背后”。

演讲开头，以为“‘八九’民运有五个原因”：

第一原因悼念胡耀邦，胡是耿直正派，为民请命的好人，1987年受不公正对待抑郁而死，大家觉得应该替他说话。第二原因对改革进程不满，通货膨胀，社会不公，官倒、特权越来越厉害，人民始终没有必要的民主权力。第三原因对一系列社会现象不满，道德沦落，分配不公，特权腐败。第四是对工作失误不满。李鹏作总理后，在人大、政协反复地说，问题是工作失误，他的目的是攻击赵紫阳的市场经济的政策，当然赢得老头们赞赏，可是老百姓觉得，怎么政府、党中央都是笨蛋，老是失误呢？因此，失误的宣传也鼓动群众。第五原因，学生运动发展，各阶层参加，是被政府态度所激怒。

怎么会闹出一场动乱暴乱，把个好端端北京城闹得乌烟瘴气，“精英”、“智囊”们曾经随了“美国之音”，信口雌黄出种种谣言。一言即出，传单贴满街巷，喇叭响彻广场。不过几个小时，真相大白，谣言消散；于是重新雌黄，贴满，响彻，消散。如今请出原先藏身后的顾问、首席、主要领导人，专论“背后”，一开口，竟有五条之多。

“第一原因”，便令胡耀邦死期提早两年，把1989年改成1987年。第二和第五，唠叨重叠，其实当并为一条。陈一谔的小计谋，是排出一堆丑事，却隐去主词。主词本来现成的。比如通货膨胀

如何无害、如何高妙、如何救国，白纸黑字，就在前些年的报刊上，作者不正是陈一谔们么？要问官倒，状元即万润南，动乱暴乱时的财东，巴黎“民阵”里的要角，不妨就近立个样板，侃一套经验宣示世人。至于分配不公，——何不下一手谕，令横行于长安街的“飞虎队员”传授一二呢？

说到特权腐败，请出陈某人，已经足够。以大陆颇为紧张的住房论，自1987年到1989年，即得三处之多，先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三间。接着是平房小院，盖车库和司机住房，正房里铺地板，贴壁纸，装吊灯，安浴盆和淋浴器，一场翻修，共房11间，费公款15万余元，该是陈某75年的工资。然而首席仍旧发火，说质量差，再得三室一厅及二室一厅两套。照例是地板，壁纸，吊灯，浴室，所费已经节俭，为陈25年工资。三处电话，合计五部。只头一处的三间，即有彩色电视机三台，雅马哈电子琴二架，及录相机、组合音响之类，另有名酒百瓶列于柜中，补品百盒排于几下。

就派头，一级教授无人可以望其项背。据说他那个所长，在工资表上列入局级，即便部长，倘有其后两处住宅中的一处，也会因为超标准，定个违法乱纪，递交监察部门处理的。

我颇疑心，陈一谔早存了出逃的念头。那深层的恐惧，恐怕正在共产党的不许腐败。

第四条尤其古怪。列了“对工作失误不满”的大题目，文章却落在指责“失误的宣传”：“李鹏作总理后，在人大、政协反复地说，问题是工作的失误，他的目的是攻击赵紫阳的市场经济的政策。”这就让读者纳闷，究竟这“鼓动群众”的，是“失误”呢还是“失误的宣传”呢？李鹏“作总理后”，自然该对“失误的宣传”负责。然而倘说百姓只不满这宣传，却赞成那失误，这是无论怎样的观念更新，也让人糊涂的。

至于第五，把任什么罪责一概加诸政府，倒是集了“智囊”、“精



英”们高见的大成。“学生运动”，当为“运动学生”。“各阶层参加”——也有别样的高见。万润南已经宣布，唯中产阶级与他们的政治“天然的联系”，却又偏偏尚未形成，因此，“民运的失败是必然的”。另有名不见经传的“民主流亡者”某人，在香港《潮流》去年12月号撰文，说那时虽然人潮如涌，“北京市民和工人是在旁观”，承认百姓与陈一谔、万润南们并无“天然的联系”。还有更坦率的话，说学生们的“背后”，“有一批在理论界活跃的主张民主政治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在整个民主运动中只是少数”。如此这般，背后运动者的眉目，便愈难掩饰了。

陈一谔却不愿自认“黑手”。他说：4月28日，李锡铭在北京市对处级以上干部说，这次学生运动有三个黑手，一是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一是体改所，一是农发所。我很奇怪，我人在医院，怎么变成黑手呢？

这里所说的体改所，即陈一谔任所长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我不知道李锡铭可曾有过这讲话。何况据陈一谔所引，其中并无他的名姓，回答却变成“我人在医院，怎么变成黑手呢”？体改所即我即陈一谔所长。——“民主斗士”口里的民主，正是说的独裁。这恐怕也是全盘西化的洋货，令黄面孔中国人高深莫测的。

然而还有两条照旧出自台湾的材料。

《联合报》1989年12月30日有《张钢小档案》，说张系体改所“联络部长”，已经投靠台湾，去作“反共义士”。文中写道：“张钢透露，当时‘体改所’所长陈一谔因腿疾不便出面，因而由他走到第一线指挥，他说：‘中共要抓人。就让他们抓我好了！’”“义士”在青天白日旗下的宣誓，自然极豪壮的。只是读者会问，“第一线指挥”的幕后呢？

《中国时报》1989年9月13日，刊出该报在伦敦专访陈一谔的

报道,倒已经提前揭出了谜底。赫然大字的标题,便指陈一谔为“‘民运’幕后总指挥”。报道还顺便转达陈一谔“送给台湾新生代的箴言”：“人要热,嘴要紧,脑子要复杂。”

“幕后总指挥”,即是《中国时报》专访之后的结论,足见无论怎样热、紧、复杂,还是露出一丝天机。不承认黑手,理由大约在嫌那评价的低。不过虽然有成打头衔,也确在幕后,确在指挥,“总”还要打折扣的。看那从幕后来到幕前,一番语无伦次,实在也不学无术和乏味得可以了。

(《中流》1990年第5期)

# 怎一个“丑”字了得？

——叛逃“精英”在海外的表演

郑一天

去年春夏之交，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精英”，有计划，有预谋地发动了一场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动乱以至反革命暴乱，给我国政治、经济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反革命暴乱之后，极少数动乱“精英”，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庇护下，先后叛逃海外，走上了一条背叛祖国、继续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从事反华、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至今时间已过去了一年，看一看这些叛逃“精英”们在海外的丑恶表演，进一步揭露他们的真正面目，有助于我们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更清楚地认识这场动乱的性质及其危害，从而坚定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 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早在动乱之前和动乱期间，出于某种政治目地，为了蒙蔽学生和群众，动乱“精英”们大都为他们的言行进行了种种伪装，打着“反对腐败”、“推进改革”、“促进民主”、“为民请命”等等堂皇的旗号以售其奸，也确实欺骗了不少人，然而一旦逃出国门来到他们久

已向往的“西方自由世界”，这些伪装的面具则被他们自己统统揭去，露出了背叛祖国和民族，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实现资本主义的本来面目。

据国外报刊报道，苏晓康等人叛逃以后，马上和万润南、严家其、吾尔开希以及先期出国的刘宾雁一起，积极拼凑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并由曾经当过赵紫阳“智囊”人物、前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陈一谘当“民阵”的“筹委会主席”。1989年9月22日，“民阵”在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正式成立，虽经多方联络，却只有一百多人参加，门庭实在冷落。陈一谘就是这场开幕闹剧的主持人。会上严家其、吾尔开希分别当上了正副主席，万润南任秘书长。“民主中国阵线”是个什么组织？他们在海外要干些什么？从“民阵”成员们在海外的言论和活动中，是不难看出的。

“民阵”分子把攻击的矛头，首先指向了中国共产党，陈一谘说，“大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政权”，“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祸害”。1989年10月15日，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次公开讲演，公然煽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胡说“让共产党这样地领导，国家绝无出路”，他反复鼓吹“政治多元化”，这个“多元化”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在1989年12月1日《百姓》杂志发表的一篇采访录中，陈一谘毫不掩饰地作了说明：“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要分共产党的权”，“就是要与虎谋皮”。同年11月4日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的讲演中，陈一谘联系5月下旬天安门广场的形势，说得更为露骨，“那时，如果有一个有气魄的人，站出来号召大家把报社、通讯社、电台、电视台一起占领，发布通告，召开中央全会，解决国家问题，将会是另外一种局面”。而在半年之前，就是这个陈一谘，在他所写的《向体改委党组的汇报》中，还口口声声表白，“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必须对党负责”，“我这十年来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两相对照，陈一谘的伪装，不攻自破，其丑恶嘴脸，则暴露无遗。

在“民阵”的成立大会上，万润南说，“民阵”的成立，就是“要创造一个反对中共的政治力量”。在《中国时报》1990年2月2日的一篇报道中，万润南进一步表露了他在动乱前后的心曲：“昨天，作为四通公司的总经理，我认为我所做的事情是造环境；今天，我作为流亡海外的‘民主中国阵线’的秘书长，我所做的事情是给中国的民主造势；明天，我会在中国取消党禁之后，以‘民阵’成员的身份回国，作为中共党外的一个制衡力量。”“民主制度的条件是要在社会形成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没有中产阶级，没有稳定的多数，社会不会安定，民主制度就没有一个基础。”“经济上要实现私有制，政治上要实现多党制。”“我们要在海外和国内造势”，“第一步，要使中共当局换马，平反……这是我们的短期要求。第二步是开党禁、报禁，这是中期要求。第三步，是民主政治，自由经济，这是长期诉求。”万润南的话已经讲得再明白不过了。他的上述言论，不就是一个在中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实行资本主义的完整纲领和“步骤”吗？

如果说陈一谔、万润南等人的言论多少还绕了一点弯子，而吾尔开希的言论则近乎于赤裸裸的反动口号。这个在学校里几门功课都不及格的大学生，靠着搞动乱，摇身一变当上了“民阵副主席”之后，曾在纽约《世界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目就是《我看“打倒共产党”》。吾尔开希说：“打倒共产党可以理解为：①理论上不允许共产党存在；②理论上不允许共产党执政；③结束现在执政的共产党的统治。”并特意指明：“共产党在中国海外民运讨论的特定范围内是指‘中国共产党’。”“中共执政四十年来，甚至可以追溯到执政以前它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清楚地表明了它从一个专制党演变为法西斯党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实质是由少数人支配并实行法西斯专制的法西斯党，对于这样一个党，必须坚持打倒的态度。”

这里还要提到被通缉的反动组织“工自联”的副总指挥岳武。此人原是山西一家工厂的分厂厂长，动乱期间参加“工自联”并直接参与了暴乱活动。他在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后逃到巴黎，随即发表反动声明：“我虽身在海外，但已决定做一个献身给中国民主运动的专业革命家。我正着手在法国重组工自联，与国内的工人团结一致，推翻共产党，建立民主中国。”可惜至今无人响应，就连海外人士听了“在海外重组工自联”之后，也觉得“是不可能的”。

至于“推翻了共产党”由谁来领导，万润南说：“‘民阵’不是流亡政府，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力量来讲，它随时准备执政。”吾尔开希也当仁不让：“我是具有民主精神同时又搞过民主运动的人，我曾说，希望成为中国明天的领导人，是希望在民主的机制下，发挥最大的作用。”一语道破了他们妄图取中国共产党而代之的狼子野心。

苏晓康是逃往国外较晚的一个，但他的言论却比之“先行者”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谓后来居上。据1990年12月28日《联合报》报道，苏晓康说：“这次大陆民运失败，知识分子要负极大的责任；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避开问题重心的共产制度缺失，高唱文化救国论，这是典型的清谈误国的重演。”“‘六四’之前，知识界没有直接面对最影响人民生活的共产制度，也许是根本不敢碰，……当然也把握不住，冲不出来，这根本是立足点没有搞对。”在1989年10月16日的《百姓》杂志上又说，“大陆当局并未因《河殤》反传统而饶恕它，”“这件事本身便提醒人们：不要再奢谈文化而不敢直接面对这个制度了。”应该说，这才是苏晓康的心里话，也是他们拍摄电视片《河殤》及其续篇《五四》的真实目的和最好注解。

既然“清谈误国”，文化也不能“救国”，反传统的《河殤》也推翻不了“共产制度”，苏晓康自有他的办法。在1989年12月30日台湾的《中国时报》上苏晓康说：“基本上我还是希望大陆的民主运动

能走‘和平演变’的模式,至少可以少牺牲一些人。不过,我们也不能没有走罗马尼亚模式的准备和决心,也就是内战。”“虽然走‘和平演变’的模式最有利,也不能没有结合武力进行民主运动的准备。”并声称他们要“在下一次的民主风潮中掌握军队这个有绝对影响的重要因素”。读了这些杀气腾腾的文字,确实让人触目惊心,这些叛逃“精英”们,为了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已经不惜制造内战,让人民流血了。事实再一次让人们看清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再想想他们反复鼓吹的“远离政治”、“淡化政治”、“不为政治服务”等等口号,该有多么虚伪。他们不但当起了国际反动势力“和平演变”战略的“突击队”,而且疯狂地鼓吹“呼唤”武装暴乱和“军事政变”了。

逃亡海外的动乱“精英”们为了颠覆社会主义中国,采用了种种卑劣手法,其中之一,就是游说、乞求国际社会对自己的祖国进行经济制裁。

据《百姓》杂志报道,万润南在一次谈话中说:“当大陆发生经济困难,无法解决的时候,不得不在政治上有所让步。在海外使得各国对中国施加有限度有区别的经济制裁,加速它的经济困难,施加压力。”万润南讲的“有限度”和“有区别”的含义是什么?刘宾雁的话是最好的补充和解释。他无耻地希望美国和西方世界“在不损害美国利益的前提下,加紧对中国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中国人民愿意付出这种代价”。

非法组织“北自联”和“高自联”在一份“致各国首脑书”中,公然呼吁“采取各种方式继续对中国现政府进行谴责和必要的经济制裁,取消与北京当局的首脑级、高级官方交流访问活动”。

陈一谘的话最为典型。他说,“我个人认为对中国政权实行经济制裁是必要的”。1989年9月7日在巴黎的一次谈话中,他乞求“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不断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和实行经济制裁”;

抱怨美国政府对他们的支持和对中国的制裁不够有力,并以一种十足的奴才腔调挑拨说,“中国现政权是反对美国的长期和根本利益的”。至于制裁的目的,陈一谘说,“我们最希望的是出现一个群龙无首的软弱中央,和强大的地方势力的对峙”。“中国基本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群众此起彼伏的不满,造成政治瘫痪……这样,我们就可以早一天回到中国”。“海外抗议势力要能够促进中共的内部分化才能有效”。至于什么是海外的势力?陈一谘说得更明白:“包括台湾的,香港的,达赖那儿的。”

不久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海内外炎黄子孙无不为之欢欣鼓舞,就连台湾的几家报刊也全文转载了《基本法》,认为“这是为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屈辱划了个句号”。但是据《香港时报》1990年4月6日报道:4月5日下午,“民阵”头头严家其、万润南、吾尔开希在巴黎拉德方斯五楼的欧洲俱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表“民阵”声明,呼吁港人抵制《基本法》。声明说,“只要中共政权继续存在,香港的前途就没有保障”;主张“由港人自主起草新的基本法”,取代人大通过的《基本法》,并“以联邦制或邦联制解决香港、西藏、台湾问题”。结果引起了海外华人的强烈愤慨,进一步暴露了动乱“精英”们背叛祖国,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立场。

把外国利益和具有政治野心的“精英”的利益,置于祖国和民族利益之上,乞求外部力量给自己的祖国、人民制造经济困难和灾难,这不是一种典型的卖国贼、民族败类的行径吗?

## 背宗忘祖引起公愤

叛逃“精英”们在海外的丑恶表演,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和主持公正的各国人士的普遍反感。早在去年8月5日,由



一些旅居菲律宾的华侨组成的“旅菲华侨游子会”就写了一封致严家其、吾尔开希等人的公开信。信中明确指出：“你们为自己争一席之地，罔顾国家尊严、民族利益，只靠污辱自己的国家、糟蹋自己的民族、咒骂自己的同胞，向主子献媚、邀功请赏，是十足的政治乞丐的表现！你们的行径是背祖忘宗的。你们是民族的败类。”并郑重声明：“我们反对你们不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死搬硬套地仿效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本会同仁最痛恨某些强国专门收容、收买、支持、煽动各国不得志政客或持有不同政见的政治分子，然后去搞乱自己的国家，使世界永无宁日。”

即使在“民阵”所在的法国巴黎，叛逃“精英”们的活动也并非一帆风顺。据路透社报道，去年9月的一天，法国巴黎地方官员不让数十名流亡者进入漂亮的巴黎十六区会议大厅，进行百日大祭活动，理由是“会议大厅是公共场所，它不应在一个涉及法国对外政策的问题上支持哪一方”。因而活动只好在街上举行。去年9月12日晚，严家其一伙在巴黎人权广场集会，原计划拉拢两千人参加，实际来的只有二百人。

“民阵”为寻求支持，扩大影响，由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刘宾雁和苏绍智等人四处活动，策划到各地建立“民阵”支部，先后到过联邦德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地游说募捐，但收效甚微。澳大利亚政府取消了原定由部长级官员会见万润南和吾尔开希的安排，对他们在澳的活动采取了冷淡的态度。澳新闻媒介也采取了低调报道。就连叛逃“精英”们寄希望甚高的美国，议员们也只是表示了有限的热情。对此，严家其一伙很不满意。对未能见到美国高级领导人，吾尔开希说：“我们的确感到有些遗憾。”殊不知，就连美国一些支持过他们的人，也表示对他们不满，原因是“吾尔开希在美国五次谈到‘天安门事件真相’，五次的口径都不一致”。日本《产经新闻》的一篇报道也指出：吾尔开希的“讲演同事实不

符,就连听众也常常指出其错误”。至于这伙人勾结海外敌对势力伪造《人民日报》海外版,进行下流的欺骗宣传,更为国际公正舆论所不齿。《欧洲日报》曾刊载一个台湾读者的来信,一针见血地指出:“陈一谔者流,自诩理论家,但只有卖身理论,……丧失国格人格的‘理论’……九流都配不上,人渣而已。”

美国华盛顿霍华德大学宪法教授陈嘉祐曾写下专门文章,揭露严家其、吾尔开希一伙制造谣言的无耻嘴脸。文章说:“这次学潮对中国的经济损失,真是不能以金钱来计算。但是这些学潮的领导人居然要挟政府承认这次学潮是爱国运动,真是丧心病狂,不知他们对祖国所造成的无可挽救的严重破坏。”“美国社会对天安门广场的真相已日渐明朗。这完全是由于几位有理智和公允的美国电视特别节目主持人和专栏作家,将他们在6月3日夜间和6月4日早晨亲眼目睹的实况作了详尽的报道,否定了谣言。”

不久前,“民阵”在海外反动势力的协助下,搞了一条旨在造谣惑众,宣传反动主张的广播船“民主女神”号,定于六月开始向中国大陆播音。据外电报道,“民阵”头头万润南已准备了长达几小时的节目,专门攻击邓小平同志。围绕“民主女神”号上的“民主之声广播电台”,海外舆论也表示了不同看法,《欧洲时报》总编辑梁源法指出:“这条船的背景、整个行动经费从哪里来,大家都很清楚。单靠船上的设备,根本发射不到大陆去。广播必须经由台湾基隆的发射站转播才能到达大陆。但通过台湾的做法,其客观性就有疑问,新闻从业人员应有的道德操守是实事求是,我希望到时广播的内容不要造谣,不要攻击中国。”据香港《亚洲周刊》报道:“这条广播船的全部经费预算为800万法郎,其中一半由台湾的《联合报》系统及《中国时报》负担。”对于搞这种“广播船”的行动会有什么结果,连“民阵”的一些骨干都是没有信心。据有的通讯社报道,“民阵”有的头头,就借口“太累”而没有参加“命名”活动。有的骨

干说：“没办法，总要做点什么才过得去。”另一位骨干说：“我们的活动多少也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确，拿了人家的钱，不做点什么，能交代过去吗？

## “失根”的“浮萍”

叛逃“精英”们在国际上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和赞助，继而一齐转向台湾，演出了一场反共闹剧。

早在去年7月25日，台湾国民党海外工会主任郑心雄就同吾尔开希在美国会见并合影留念。由于“民阵”头头对台湾的大力吹捧，台湾“内政部境管局”于去年12月通过三个团体邀请了包括苏晓康、万润南在内的二十余名“民运人士”赴台。据台报透露，由于“民运团体”与台“接触愈趋积极”，台“政府”决策单位已决定，“行政院”设置大陆事务负责机构，负责处理与海外大陆“民运人士、团体联系等事宜”，以“强化海内外反共力量建立共识，统一步调，共同达到大陆民主化、自由化、平等化”。

最先到台湾的是刘宾雁夫妇。去年12月15日，刘宾雁就开始了对台湾的“访问”，并且怀着“第二种忠诚”表示他“要像小学生那样来学习观察”台湾的“成就”，所到之处，赞不绝口。他一会儿说，“台湾比大陆民主”，“这里的政府也比大陆开明”；一会儿讲，“希望台湾能完成四十年新闻发展史，台湾四十年经济发展史等书，给大陆民众一个学习的例子”；还说“将来台湾和香港将扮演重要角色。……未来中共垮台，还需要台湾的人力帮助大陆恢复和运用”。

万润南是以“民阵”秘书长的身份赴台的。他一到台湾，就到处散发附有接受捐款地址的贺卡。在台湾当局的鼓励下，几位“立法委员”“捐出”100万台币。万润南马上对记者说，“支持民运的

就是朋友”。“我们一直把台湾当作争取民主的一个主要部分。……我认为台湾当然可以支持整个中国的民主运动”。

去年年底,台湾《中央日报》报道:一支由作家组成的民运团队抵台访问,他们是诗人老木(刘卫国)、徐刚、远志明(《河殇》撰稿人之一)和祖慰。在机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老木声称:“台湾是复兴基地,所以短期上要对民运做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而长期要规划如何在大动乱后协助大陆重建,台湾的经验和人才很重要。”祖慰也称:“除了经验外,台湾实践民主的过程也将有启示作用,因为两岸同一文化、同一民族,比西方民主的影响更深刻。”远志明则抱怨:“目前台湾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在大陆民运发展中其重要地位和责任,多少把大陆民主当成大陆人的事,光是支持、声援、捐款是不够的!无论是李登辉、李焕、严家其或方励之,对大陆前途的关注都应该是相同的。”“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未来大陆民主政体的建立与经济制度将走向哪一条路,这些都应该是执政的中国国民党迫在眉睫的准备工作。”他还热心地向台湾献策:“建议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口号改为‘自由民主均富统一中国’,以利争取大陆人民的认同。”这些当年赵紫阳的“智囊”,不是又充当了台湾“反攻大陆”的“智囊”了吗?

台湾对苏晓康格外关照,人一到,就被授予“中央日报文学奖”。拿了10万台币奖金的苏晓康自有回报。据台湾报刊报道,苏晓康说,“此行我尤感兴趣的是台湾和东方的民主经验。”“台湾可以提供道义上、经济实力的支持。”“台湾已实现或基本实现了民主政制,而代价震动比较小,但台湾实现了民主政制并非全中国实现了民主政制,台湾的知识分子是否有理由卸下肩上的重担?”“若大陆出现乱局,中共垮掉,社会崩溃……台湾这些政党能带些什么到大陆去取得合法地位。”殷殷热望之情,溢于言表。至于刘宾雁在台湾领赏的丑恶表演,《中流》第三期曾有所披露,在此就不详述

了。

陈一谘和苏绍智虽然没到台湾,却是有话在先。还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演时,这个自吹为“中共改革派”的陈一谘就说过,“在中国共产党的四十年统治下,大陆已形成一种共产党文化,如果仅仅依赖三民主义,所产生的效果可能不如台湾今天所有的建设成果”。苏绍智则在去年10月5日在美国俄亥俄州大学讲演时就说过,“类似台湾的民主化未来在大陆可行”。

对于叛逃“精英”们在台湾的言行,台湾当局立即给予回应。据台湾报刊报道,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了题为《面对大陆民主运动我们不能置身事外》的文章。文章说,“就短期目标而言,可在宣传上着力,借着他们(民运分子)的言词和行动,让全世界更清楚认识中国的本质,凭着他们本身的心路历程,让仍对中共有幻想者幡然省悟,这种彻底而完整揭露中共面目的工作,可继续进行”。就前期而言,对“大陆民主自由的战斗,我们不能只做一个置身事外的观战者,这场战争是影响整个中国前途,没有人可以隔岸观火”。

叛逃“精英”们在台湾的表演,引起了台湾知识界的批评和反感。台湾学者李敖在《世界论坛》1990年1月4日发表的《“民阵”的归宿》一文,就颇有代表性。文中谈到,“刘宾雁这次来台,我不肯见他。他赠书写信来,我题诗回去。……期勉刘宾雁立场要站稳,不要把自己跟国民党扯在一起”。“天安门事件以后,有大量‘民阵’之类的人士,或大陆留学不归人士出现,他们的处境与困境,是可以概见的”。“他们离开大陆做浮萍,基本上是失根的。他们想在大陆以外成些势力或气候,或对大陆发生什么大作用,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文化水平’上——真正符合自由民主开明进步的思想‘文化水平’上却不无差距而不自知。他们一方面高唱自由民主开明进步,却同时又要‘公审’别人。……如今又群集台湾,向国民党讨资助。虽然他们的处境与困境,令人同情,但是

失格与混乱一至如此,却更令我们叹息”。

## 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平息反革命暴乱至今已近一年,“民阵”成立至今也半载有余。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发生的这场动乱的真相已昭然于世,叛逃“精英”们制造的谣言越来越没有市场。他们目前的处境也更加困难和孤立,何况这些人本来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民阵”活动了不过短短几个月,却在内部出现了种种矛盾,几乎难以为继了。今年3月12日,美国《纽约新闻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苏晓康坦承民阵内部矛盾》。文章说,“在几个月的轰轰烈烈之后,总部设在法国的‘民主中国阵线’目前正处于低潮”。“民阵目前内部矛盾严重,主要派别分为万润南的四通派,陈一谔的体改所派,严家其的学者派和吾尔开希的广场派。以上四派,目前严、吾两人较为靠拢,万、陈二者几成水火不容的状态”。“民阵主要成员中,其中有一些本来就与学运民运有距离,只是‘票友’,而今却因不得已而‘下海’,思想准备不足”。“该批成员,由于过去在中共改革派内红极一时,去国后又数次对形势估计错误过于乐观,初期无法摆脱中共‘幕僚’的心态,总把其他民运人士看成‘痞子’,因而高高在上,格格不入,神神秘秘。近阶段,又走向另一极端,致使巴黎民运人士笼罩着一派悲观绝望的气氛,有的仅以无出路的流亡客看待自己,成日价悲悲切切凄凄惨惨,甚至有长吁短叹以泪洗面度日者”。国外观察家评论,这些人很可能“堕为半个世纪前的白俄的流亡心态”而“一事无成”。

苏晓康在列举“民阵”面临的“难题”时说到,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成员没有足够的民主知识”。他们的“民主意识”处于“幼稚园的水平”。在内部更是“内讧不已”,“一味排除异己”,“在选举等问题

上违背民主原则”并成为一种“通病”。这也足以说明,这些以“民主”、“民运”、“民主女神”、“民主阵线”相标榜的“民主派”,不过是一批与民主无缘,甚至是反民主的历史小丑。这真是一个历史的讽刺。“目前有个别参与民主的风头人物已从‘职业革命家’变成保饭票争饭票的健将,……至于‘极少数极少数’贪污街头‘六四’捐款当个人玩乐开销者,更不值一提了。还有的暗拿某方面津贴不惜充当线人,完全丧失了民运人士的人格及政治独立性,甚至有签字画押答应政治条件者”。

据合众国际社驻北京分社的戴维说,吾尔开希可阔气了,身着300美元一套的西服,还从外地请朋友专程到波士顿吃海鲜。他在波士顿有自己的办公室和女秘书。在他们那伙人中已经有人提出他贪污的问题。日本《产经新闻》也指出,“吾尔开希在金钱、异性方面存在着问题,而且学识浅薄”。

多行不义必自毙。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人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历史已无数次地证明了这个道理。动乱“精英”们的最终结果还将会继续证明这一点。

好戏还在后头,这一帮小丑怎么混下去?我们将拭目以待。

(《中流》1990年第5期)

# 叛逃“精英”劣迹钞

(六则)

章 姗

## (一)

1990年第8期香港《争鸣》杂志发表祖慰文章——《依然仰天长笑》，文中引方励之的话说：“前几天，剑桥的中国留学生同我聊，他们讲了许多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好点子，但我说，现在的麻烦是，我们和对手交不上手了。过去我们在国内，发一通议论，写一封公开信，中共政治局就要开会讨论怎样对付，交得上手。你功夫再好，交不上手是白搭。现在交不上手了。交上手，即使被对方摔了个四脚朝天，我还可以爬起来练个新把式再去干。在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最难的课题是怎么再同邓小平交上手。”

## (二)

1990年8月14日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该报特派记者江素惠在剑桥大学采访方励之夫妇的记录。严家其夫妇专程由巴黎抵伦敦参加谈话。其中有以下问答：

江：海外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共仍能有效将大陆的民众与



海外的民主思潮隔离的情况下，海外民主运动实际上很难对大陆的民主起关键作用；大陆的转变主要还是靠大陆内部的转变，在此情况下，海外民运人士能够应该做出哪些努力？

方：这当然是个难题，我感到出来以后与国内的联系大大减少，影响力自然也减少，要成为反对势力确实很困难，如何解决这问题就是重要课题。更大的来讲，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一定会很难有边界的，就像我桌上这部电脑，它是可以随时和欧洲任何国家联系上的。

江：中共的民主化，你们是期待党内健康力量的崛起，还是期待另外有反对党的出现？

方：这个就是所谓的体制内、体制外。我的看法是不要把它对立起来，我认为这个发展是以多种形式来进行的。实际上，我们看东欧形式有的是党内，有的是党外，戈尔巴乔夫也是党内。所以，不应当排斥任何的方法，至于是哪种方法，也是历史的机会。

严：最后具体的，就是反对党成立，我们愿意对共产党里的改革派，能合作之处合作。这一点，我们和台湾的想法有点区别。

鼓吹西方不要孤立中国，而是应该加强同中国的经济、文化和科学上的联系，说“只有保持联系才能施加压力。这犹如摔跤，只有接触对手，才能把对手摔在地上”，“如果西方中止贷款，冻结联系，那么这是个错误”。

方：仍然要发表自己的政见，让这些信息传到大陆，引起他们内部分化，内部“斗蛐蛐”。

### (三)

1990年10月27日出版的香港《当代时事周刊》发表《远志明书生报国苦坚持》，引用这个《河殇》撰稿人之一、现在在美国普林

斯顿大学的远志明的话说：“普林斯顿搞了一个十几个人的研究小组，我们这些流亡人士，包括陈一谔、苏晓康、阮铭等都在这里，这笔钱大概是美国一个商人捐助的，支持大陆民运，一百万美金，资助我们一年。当然，这笔钱用完后，明年到哪儿去，现在还很难说，明年再联系别的学校吧。”“中国如果有像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就可以有控制地走向民主。”“靠农民、靠工人、靠士兵恐怕都靠不住。”“我们回去的前提，是共产党大幅度调整了它的政策，变得更加开明、更加民主。起码恢复到‘六四’前，赵紫阳在台上时的情况，甚至比那个状态更好，我们才能回去。”

#### (四)

1990年第10期香港《动向》杂志发表《刘宾雁畅谈世界观》。文中在《对未来存有希望》的小标题下，刊出刘宾雁的“希望”：“对中国政局未来的变化，刘宾雁有自己的见解，他把中国未来政局的发展分成几个方面来看。在上层是政权不断地改组，共产党依然一党执政，但经过一次次的改组，到一定的时候会修改宪法，会实行多党制。这个和平演变的过程将会继续。在中下层分权独立的现象会越来越强，各个省对中央、各个县市对省的独立自主权力越来越大，在底层的乡村恐怕会实行地方自治，从现在或者说从中共发生变化到在中国实现基本的民主制度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甚至会是很痛苦的、流血的过程。对未来的估计只能说中国是有希望的，不是像以前那样失望。”

#### (五)

1990年10月1日出版的香港《百姓》半月刊第225期发表阮

铭《21世纪中国的命运》。文中说：“正当新权威主义思潮在中国知识分子与共产党内改革派中方兴未艾之时，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主运动。这就使知识分子与党内精英一时陷于进退失据的境地，他们无法拒绝表示同情或支持民主运动，但却不敢像1978年的知识分子与党内改革派那样公开与西单民主墙运动联盟，击破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力量（至于党内改革派后来软弱退让甚至背弃民主目标，那是另一个问题）。理论上的新权威主义和行动上的犹豫愠惑使他们不能获得学生与民众的普遍信任。”

“社会民主力量未能同知识分子和党内改革力量结成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联盟，是1989年规模巨大的民主运动失去取胜机会的根本原因，夸大军队的反动作用是缺乏根据的。”

## (六)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六四”后逃到西方的苏晓康等中国作家在海外处境艰难，情绪低落，已萌生回国念头。

报道说，这些出逃者发现他们在西方的生活远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惬意。他们漂泊不定，北岛在过去一年中仅睡觉的地方就挪了100多个窝，也不敢给留在国内的妻子和小女儿打电话、写信。他们在西方办了两个中文刊物即《今天》和《广场》，但出刊经费困难，靠人施舍，印刷只有3000份，仅在学者层中散发，影响有限。他们不懂英文，无法向西方人作讲演。北岛说，他们语言不通，存在文化障碍，感情上无法交流，他们都患了“流亡综合症”。北岛透露他内心的苦闷：“我经常问自己：‘我是否想当一个政治难民？我该学英文吗？我是否愿意返回中国？我什么时候能返回中国？’”北岛还担心他在外漂泊久了，自己的中文将慢慢蜕化。他说：“在中国，语言无时不在发生变化。可一旦流亡海外，你的语言

就变得固定起来了,脱离了母体。”

报道说,苏晓康也流露了类似的苦闷情绪。日前他寄居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他说:“来到海外,写作是没有任何限制,可以自由地写作,但我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可写。”他还说:“多数流亡者在西方都不愉快。”报道说,苏晓康在《河殇》中批评了中国传统文化,敦促中国去拥抱西方的价值观念,但他的亲西方的理想与他在西方生活的现实发生了冲突,使他的幻想破灭。他已宣布放弃他以前对中国文化所持的许多批评观点,并对另外一些流亡者盲目崇拜西方不予苟同。

报道说,这些流亡作家对“西方的自由生活已经感到失望”。他们原来希望他们的作品和他们追求的目标能得到西方社会的承认,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基本上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对失去社会地位感到很不自在。在中国当个专业作家,有政府发给的固定工资,还有稿费,生活相当舒适,而在海外,他们脱离中文读者,写作出版都很困难。另外,在美国的其他中国学者也瞧不起他们,认为老一辈作家如30年代作家无论西学还是中学都根底深厚,而现在的年轻作家赶时髦,时髦一过,他们的作品也完蛋了。他们写得太多,写得太快。

(《中流》1991年第6期)

## 国格人格的廉价大拍卖

——评祖慰、刘宾雁台湾行

赵 初

以“怪味文学”、“骡子文学”、“审丑文学”曾经喧闹一时的张祖慰，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大动乱中，做了淋漓尽致的表演，最后叛逃出国，好久没有消息了。前几天偶然翻阅一份文学杂志，题为《文人的文和行》，才知道这位“作家”，今年3月曾到台湾观光，在台湾逗留了16天，发表了不少高论，为我们介绍了“最民主最自由最幸福”的新样版。

据台湾3月7日《联合报》报道，张祖慰在赴台途中，和飞机机长谈话，那位机长讲，他的月收入近3000元，他就非常激动，认定台湾人是“富裕的自得”。过了几天，看了一些事情，又感到那里言论的自由，然后就得出总印象“那里是言论自由的轻松和富裕的自得”。张的观感，全文如下：

“我感知到了‘机长所感’的台湾社会背景。翻开报纸，各种言论都有，从批评李登辉总统到揭露蒋介石父子隐私；从‘统派’到‘独派’，无所不有，打开电视或广播，政治人物的互相攻击是那么尖锐和激烈，甚至还有君子动口也动手的武打场面；走到大城小镇，笼罩着国民热烈参政及说道的热烈气氛。”

末了,不言自明,台湾是最富裕自得最民主的样板。

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在祖慰先生的笔下,台湾简直变得比西施还美,比王蔷还美,“连臭虫也是双眼皮”的了。

我没有到过台湾,对于台湾的“富裕自得”缺乏了解。从总体来说,台湾比较富裕,大概是确实的。“四条小龙”之一,如果不富裕,怎能得到这个美称?但是不是每个台湾公民都富得流油,像祖慰碰到的那个飞机驾驶长一样,便值得怀疑了。前不久从台湾报纸上看到,不少老兵穷得连住处也没有,只好住在大树上,过巢居生活,忍无可忍,聚众闹事,可见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富裕”的。

至于“富裕”的人是不是那么“自得”,怕也未必。据前不久台湾报纸登载,台湾最走红的是“勒索公司”,即以恐怖手段,向富而多金的人进行敲诈勒索,或采用绑架形式,或采取电话威胁的形式,和中国旧社会的“绑肉票”差不多。由于这些“勒索公司”大量出现,许多大资本家搞得心惊肉跳,日夜不安,上班要穿防弹衣,行路要几人保镖。稍一疏忽,便有丢掉性命或倾家荡产的危险。由此可见,“富裕”和“自得”仍然是两码子事。

至于言论自由,在报纸上可以你骂我我骂你,这本来是资本主义的家常便饭。这种“民主”、“自由”,即使在旧社会的中国,我们也领教过。过去我在国统区办过报纸,便看到过 CC 系和黄埔系两派报纸互揭丑闻的事情。但有一条,对待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则一点“自由”也不给,不仅不给,而且轻则坐牢,重则杀头。柔石、胡也频等烈士的鲜血,李公朴、闻一多的鲜血,我们都记忆犹新,祖慰先生当也不会遗忘。今天的台湾,是不是“民主”有了质的变化,可以公开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到退一步公开宣传“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唯一合法政府”呢?恐怕还是不行吧?张学良何罪?被囚禁了半个世纪;胡秋原回大陆一趟,没有说一句损害国民党的话,也没有说一句赞扬中共的话,回台湾却受到“追查”

“严办”的威胁。哪里有那么多的“民主”和“自由呢？“想宣传什么就宣传什么”的“无条件的绝对的自由”，不过是祖慰心造的幻影织成的美丽的纱巾而已。

祖慰可能是一时兴起，感情冲动，把“君子动口也动手”，也列入台湾的“民主”范畴，这使我们十分吃惊。诚然，在只应该“动嘴”的地方“动手”，在西方世界是家常便饭，对于国民党的统治的地方，更是祖传衣钵；在“国大代”选举中把棺材抬到会场门外，“立委”争论时大打出手，确实是古已有之，于今尤烈。然而，在西方世界，对于这些“大打出手”的行为，从来认为是“野蛮”“不文明”的“丑闻”，没有人作为美好的东西加以宣扬的。尽管他们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而标榜的也是“尊重对方，承认对方，讲理”，认为大打出手是一种羞耻。祖慰却把台湾政界的大打出手也宣扬为美德，不能说不是他的“审丑学”的又一发展。本文前面所说的使人感到“连臭虫也是双眼皮”的印象，就是从这里得来的。

然而，画龙点睛，最值得玩味的，还是“从‘统派’到‘独派’，无所不有”那一段，对“独派”暗送秋波的态度。“统派”，即主张祖国海峡两岸统一的一派，“独派”即主张从祖国分裂出去，独立成为一个“国家”的一派。“统派”和我们统一的条件不同，但毕竟都是炎黄子孙，骨肉关系，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海峡两岸的人民，终将要骨肉团聚，祖国终于要统一的；而所谓“台独”，则是像西藏的叛乱分子一样，主张把祖国一部分的台湾从祖国躯体上血淋淋地割下来，成立一个“国家”，这是海峡两岸人民共同坚决反对的。中国政府多次严正声明，“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一国两府”和所谓“一中一台”。这一原则，是举世共知的。台湾当局，从来也是反对台独的。祖慰把“统派”和“独派”放在一起，一视同仁，为“独派”有“充分自由”而津津乐道，欢欣鼓舞，这就自己把自己推到了和海峡两岸人民对立的地位，丧失了作为一个

中国人的起码立场。这个付出的代价，不也太大了吗？

列宁曾说过：市场上叫卖声音越高的，推销的往往是最劣质的商品。祖慰推销的“言论自由的轻松和富裕的自得”的“样板”，似乎也如一把碎土掷入大海，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留在海峡两岸上空的，只不过是叫卖者力竭声嘶的声音而已。

这件小事，本来不值一提。但通过这件小事，却使人思索许多问题。祖慰一向是“审丑”的作家，多少年来，两眼盯着的只是中国大陆的“黑暗”，吹捧的多是有反抗精神的“持不同政见者”，自命为凌驾在党和人民头上的“啄木鸟”的。为什么一到台湾，刚刚住了16天，便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变成了“歌德派”了呢？这不是有点令人费解吗？

然而，仔细想想，也不奇怪。刘宾雁在国内的时候，一向认为只有揭露阴暗面的作家才是最伟大的作家，斥责雷锋只是驯服工具，一向以“刘青天”自居的，但到了台湾，便一反常态，卑躬屈膝，自称是“小学生”；严家其在大动乱中如凶神恶煞，不惜赤膊冲锋，但前些时拼凑了一艘名为“民主女神”号的“海盗船”，希望在台湾能够靠岸，作为反共宣传，颠覆祖国的根据地受到青睐，为了讨得台湾当局的欢心，不惜对台作肉麻的吹捧，说“中华民国”搞得很好嘛，不承认“中华民国”是错误的。公然厚颜无耻，不顾国格和人格，宣传起“两个中国”来了。可惜，台湾当局一眼看穿，严家其这个“支持”是水中月，镜中花，数目虽大却一文不值的空头支票，因而对他更加鄙弃，对他们靠岸严加戒备和封锁，结果“民主女神”走投无路，只好卖掉。据说，严家其十分伤心，对着大海流下眼泪。在这一场闹剧里，“精英”们一个个登台表演。为了讨得新主子的“恩宠”，全身的“傲骨”顷刻变成“媚骨”，摇尾巴，在地上打滚，什么丑态都做得出来。他们在这一次人格国格的大拍卖中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堕落的规律则是一致的。他们的表演使我们认识到：所有



的高踞于祖国和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一旦背叛,便无例外的要变成软骨头的叭儿狗,对他们不容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从擦亮人们眼睛这个意义来说,他们倒算作了贡献,值得感谢的。

(《中流》1990年第10期)

## 苏晓康沉浮录

马午阳

建国之初，作为踩着“进军腰鼓”的鼓点进北京的、初出茅庐的记者，我采访过不少进京开会的青年模范人物。那时，我要认真对付的，是北京饭店的那扇玻璃转门。我曾站在门外观察良久，研究怎样才能“转”进去。但我对于自己所要采写的人物却是了然于胸的。其中许多人成了我的朋友。从朝鲜归来的志愿军女卫生员，向我诉追求者太多的苦；一位男卫生员，在桌上摆出一排女学生寄来的相片，要我帮他从中挑选一个最漂亮的，被我好“克”一顿，最后红着脸认错。回到前方后，还给我写信来。我和那个后来牺牲在青海草原上的“红色医生”李涌也有过约定：一定到他生活的地方去看一看。几十年后，我从戈壁深处归来，特意绕道青海，也有践约和纪念他的意思。

60年代下乡知识青年的标兵董加耕，我不用采访，因为我就住在他的家里。早晨，我们顶着星星从舍上（苏北将村外零散的茅舍称为“舍上”）出发，走过一颤一颤的木板桥，到小队的打谷场。晚上，等到董加耕将鞋子脱下，把里面的稻粒全磕打在场地上，再顺着原路走回来。有时，河畔鸭棚里的江开阳老爹被脚步声惊醒，会喊一声：“是加耕呐？”“嗯哪。”我们继续前行，不用讲话，但心是相通的。

就是现在，在边远苦寒的地方，在那些普通劳动者中间，我仍然可以很快地交上许多青年朋友。但是要我写苏晓康，我没有把

握。我能了解红领巾的苏晓康,也许还能了解“文革”中下乡知青的苏晓康。但我不了解所谓“精英”的苏晓康。

我这里要写的,又恰恰是这样的苏晓康……。

我打电话给苏晓康的父亲老苏同志(在这以前,我已经从报章上看到过这种说法:“苏晓康的父亲背叛了自己当资本家的父亲,苏晓康又背叛了他的老革命父亲。”)。

老苏同志首先问我:“你打算怎么写?”

“写他的发展和变化,写他并不是天生地就反党反社会主义……”

这位曾坚持四明山根据地斗争的老同志当即打断我的话:“他现在已不只是背叛自己的家庭,而是堕落成为反对我国现政府的‘民阵’的骨干,加入了国际反华大合唱。你这样写,分寸上恐怕不好掌握。”

我懂得老苏同志的一片好意,但我仍然摆脱不了这个想法。

苏晓康,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独具个性,极富才华,他曾经真诚地信仰过他崇敬的一切。他不是刘宾雁,不是严家其,也不是方励之,但他终于同他们走到一起去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在他身上,我们失败了。谴责、痛恨之余,我深深地感到痛苦和惋惜。并且想,我们应当从中找到经验和教训,以利于今后培养接班人的工作。我向一位我很尊敬的老前辈请教(苏晓康在文学道路上迈出第一步时,也曾得到他的帮助),他很支持我的想法。所以本文的目的不是全面批判苏晓康的文章和观点,而只是想追踪他的思想发展、变化的某些重要轨迹……

## 苏晓康的文学生涯并不长

1983年,《人民文学》第八期上发表了他描写龙门佛雕研究人

员的报告文学《东方佛雕》。一发表就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开始引起了各方的关注。那些帮他迈开第一步的革命老前辈(包括他父亲),热切地希望他循着健康的路子走下去。而另一些人却不然。苏晓康后来还写了几篇报告文学,他们认为这都是“歌颂主题”的一些“应景之作”,不能代表真正的苏晓康。于是,用苏晓康自己的说法,从此以后,他就专拣有轰动效应的写了。苏晓康的作品多数以揭示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为主旨,这自然无可非议,关键是站在什么立场(这个词儿苏晓康等人大概早就不能接受了),用什么观点、态度和方法去采访和写作。在这些大的方面不出格时,苏也能写出好的作品,如《神圣忧思录》。就是在争议颇多、与事实有不少出入的《洪荒启示录》中,我们一方面看出了他日后走入歧途的端倪,同时也感到了他对人民的挚爱之情。

这是一篇描写1989年河南省驻马店地区的灾情和救灾工作的报告文学作品。文章中多次不点名的点了“省委上峰”。按理说,即便这位“上峰”做得全不对,如果是一位严肃的记者,也应当向“上峰”本人及众多的当事人核对一下事实吧?!很遗憾,没有。这不仅仅是采访作风不正,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作者本人认识上的偏颇甚至是错误,反映了作者的不满和对立情绪。

稿件发表后,河南省委、省纪委、省委宣传部以及省里的负责同志,多次向中央有关部门说明情况,说苏这篇文章将驻马店灾情和救灾工作“描写得一团漆黑”,说干部“或说假话,或邀功请赏,或横行霸道,或发灾难财”。并且把1984年的自然灾害同1938年至1942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旱蝗汤”混为一谈,既不恰当,也与驻马店地区的实际情况不相符。报告还指出,这样的作品不但不能起到鼓舞群众抗灾自救的作用,而且恰恰适得其反。

我现在一再阅读河南省委和那位被苏晓康攻击为“昏昏然”的省委负责同志向中央的报告,我发现语气是平和的,他们指出苏文

中一些不实之处,但对他本人仍是爱护的,既没有打击报复,也没有扣帽子。如果这时候,苏晓康能冷静地思考一下这些意见,包括老父亲的忠告,也许他今后的创作路子会是另一种样子。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在文艺界,这时叫好声迭起。其中有些人最欣赏的,恰恰是苏文中骂共产党,丑化党的干部的那些章节。什么“这些官匿灾无计,救灾乏术”啊,什么“上上下下的班子都在新老交接,要下的心里不舒但,要上的情况摸不准,都把遭了水灾手中无粮的百姓给忘了”。等等,等等。某些也许苏晓康在写作时尚属朦胧的东西,一经这些评论家的“点化”,便更清楚了。

请看:不是有人“启发”苏晓康吗?你写的那些东西惹了不少麻烦,怎么才能弄出那种稍微保险一点又不失尖锐、绕开敏感点又能擦个“边球”、谈来叫人吃惊又没“辫子”可抓的佳作呢?于是他想到了联邦德国的报告文学作家瓦尔拉夫和我国的鲁迅。他说,“同瓦尔拉夫选择的题材相比,我们的报告文学的那种‘尖锐性、深刻性、广泛性’,便相形见拙得近乎可怜了”。“我们只有望瓦尔拉夫之项背”。苏晓康又怎么会想起鲁迅呢?他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这一段话:“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去写自己以外的谁,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

原来如此!苏晓康接着又说:“先生此处虽然说的是作小说,但对照瓦尔拉夫的机智和巧妙,便让我觉得同样适用于报告文学某些忌讳的、容易惹麻烦的题材。”“鲁迅和瓦尔拉夫都是这方面的大师。”

这里,苏晓康不仅混淆了资产阶级专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和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质的区别,而且要用鲁迅先生和瓦尔拉夫等对付反动统治者的文字钳制的办法来对待我国有关的领导和部门了。

果然，他在下一篇《自由备忘录》里，虽然主要引用的仍是《洪荒永示录》中的那些材料，却“隐去人名、地名乃至采取种种让人难以对号入座、穿凿附会的办法”。他认为这样“似乎更高明一些”，不但“无损于报告文学的毫毛而只会增强它的效果的”。

这种“苦”心立刻引起有心人的注意。有人评论道：《自由备忘录》是《洪荒启示录》的深化，是它的续篇，是“从更高层反思中国政治体制缺陷的作品”。赞扬这是在1987年的“社会生活频繁波动”（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者注）中仅有的一篇作品。

同年底，苏晓康又写了剖析我国精神病人问题的报告文学《活狱》。对这篇作品的失误，有的评论家认为是苏晓康错误地借用了西方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来作为自己的解剖刀。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名为“活狱”，实际上是“心狱”，它的指向仍然是我国的社会制度和人际关系，请看看那一个个精神病患者的发病起因！请看看“代结语”里的最后这段话：“……我们东方人有西方颇为羡慕的修心养性之道，……有似乎非常合理的人际关系的设计，但实际上我们的心灵几乎都被扭曲过，我们的‘窝里斗’十分盛行，我们社会里的‘疯子’何其多！这究竟是为为什么呢？一个人怎样才能不使他的心灵成为他自己的牢狱？”

其实苏晓康并非不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人性的扭曲更其厉害。他是有意识地采用了这种写法的。为什么？有一位评论家说，他已经注意到，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基本主题，从刘宾雁到苏晓康，“具有某种承传性”，“尽管刘宾雁和苏晓康属于两代知识分子，……但在反封建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因为他们都同时感到了封建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处处飘荡，所以才执著地在自己的报告文学中高扬民主的大旗……”。这位评论家又说，“当刘宾雁被迫放下自己的笔之后，苏晓康受到人们的注意，也就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因为虽然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在内在精神上与刘宾雁相

同,但苏晓康毕竟又避免了一些容易引起麻烦的具体事情。在这一类作品中,刘宾雁和苏晓康的区别是:刘宾雁喜欢将自己的思考与激愤集中溶注于一个具体的典型事件或人物身上,而苏晓康则善于通过对非典型事件的集中处理来达到与刘宾雁同样的目的,这是面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被迫选择”。

我想这位评论家说得够坦白的了!他也承认被苏晓康“集中处理”的并非典型事件,而所谓“被迫选择”则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方式!在《河殇》和《“乌托邦”祭》未发表之前,这位评论家就能够对苏晓康作出这样的评价,也应该承认他观察的敏锐。

也是在那次同老苏同志通电话时,我曾问过他,据苏晓康大学老师介绍,他在校学习期间,不但学习好,而且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老师看过苏晓康的入党申请书,当时觉得还是恳切的。为什么后来苏晓康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老苏同志告诉我,苏晓康经历了两个“十年”,“文革”十年和改革开放后的十年。“文革”十年一度摧垮了他对党对毛主席的信仰,后来经过思考,有所恢复,心情也渐渐平复,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对改革开放寄予热切的希望。但是,他对于随着开放而涌入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潮和形形色色的理论,没有丝毫思想准备,更不具有批判的能力,因此他对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以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腐败、丑恶现象,不仅不能正确地分析和认识,反而在政治上、理论上、创作上走入歧途。

我从老苏同志的语调里,感到了作父亲的深沉的悲哀。据熟悉他们家庭的同志说,他们父子间,曾有过十数次的长谈,每次都不欢而散。到写《河殇》的时候,苏晓康索性连父亲都不告诉了。

当得悉苏晓康叛逃国外以后,他大学的一位老师从教育青年这个角度反思道:“早知如此,就不应该让他留校任教,更不应该同意他参加《河殇》剧组。那时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旅馆有旅馆,

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温床,从《河殇》以后,苏晓康的创作明显地走上了歧途……”

《河殇》的创作,对苏晓康后来进一步的变化,确属关键。

第一,如果说以前苏晓康的作品是就社会问题进行单个“反思”的话,那么,从《河殇》起,他宣称要进行“历史的总体反思”了。实际上是对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中国文明的“总体否定”。

第二,如果说以前苏晓康基本上是从事文学个体劳动,从《河殇》起,他们宣称“要与思想联姻”了。《河殇》的另一位总撰稿人王鲁湘曾列举了为《河殇》提供支持的众多“理论精英”的名字,其中一些人的理论,不仅成了《河殇》的理论支柱,也成了苏晓康以后的作品的理论支柱。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西方现代各种流派的思潮也都可以拿来研究中国的问题了。从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上,我们不再被哪一种既定的模式所约束,而是不断地寻找新的思考角度。”

## 以《河殇》为转折点,苏晓康加入了“精英”的行列

《河殇》引来一片喝彩声:什么“中国近代史上最好的一部教科书”啊,什么“划时代的史诗”啊,什么“现代的、最科学的《天问》和《离骚》”啊,“请一百个外国专家也说不出《河殇》十分之一道理”啊,等等,等等。一副副的“迷魂药”,使得他的头脑膨胀起来。

连外国人也对苏晓康瞩目了,美国的“1989 中国问题研讨会”等组织,接连向苏晓康发出访问邀请。然而你要问苏晓康的老父亲和学校,苏晓康写了《河殇》以后又作了些什么?他们都茫然。苏晓康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因为从这时起,学校、党组织谁也管不了他,自然也就关心不到他了。我们只能从他的作品《“乌托邦”祭》、《龙年的悲枪》、《世纪末回眸》中追寻他的踪迹;知道他在



某些人(包括某些部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这一片喝彩声中,兴致越来越高,胆量越来越大了。一部《河殇》犹未尽兴,还要在1989年再推出一部《五四》,“把百年兴亡说道说道”(见《世纪末回眸》)。

这部《五四》后来虽然没有能够出笼,但那题旨已被苏晓康在《世纪末回眸》和《龙年的悲怆》中点出来了,那就是:

全面否定一百年来中国人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说什么这是“往下出溜”的一百年。

彻底否定“五四”运动,说什么“这犹如‘日出’般的新文化运动,恰在‘五四’这一天走入迷津……”。

特别要指出的是,苏晓康们名为说“五四”,实际上他们真正要“说道说道”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

“无休止的政治折腾、穷过渡的物质生活、清教徒式的道德压制、高强度的思想控制、极度匮乏的精神生活以至最终引起‘古罗马竞技场’式的全民族大厮杀时,黑暗降临了。”——这便是作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描述。

作者还胡说什么“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这一代的血管里,已经不可能有半滴‘五四’新文化的血液,而是按照那种‘读书如吞砒霜’的观念培养起来的”。因此,“70年前的普罗米修斯们从西方盗来的那把圣火终于在中国的漫漫长夜中油尽灯惨,而从古老的荒野中燃起的熊熊野火却把他们烧得灰飞烟灭”。——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民民主专政说成是“漫漫长夜”,这不是对历史的彻底颠倒和诬蔑又是什么?!

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苏晓康则咒之曰“苍龙”,说什么“十二年前……天崩地裂,苍龙死去,中国人仿佛恰在这大灾大难中熬满劫数,获得了解脱”。“自然暴君之外又给中国人加上了一个社会暴君,龙便获得了双重的象征”。因此,他们“下决心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好生说一说这老东西了”!(见苏

晓康：《龙年的悲怆》——关于《河殇》的札记）

岂止是一部《河殇》，《“乌托邦”祭》、《龙年的悲怆》、《世纪末回眸》以及未来得及出笼的《五四》，不都是针对这而来的吗？！

《河殇》出来了！《“乌托邦”祭》居然也出来了！于是就有人模仿着电影《红高粱》里“我爷爷”的腔调朝苏晓康吼叫了：“晓康你大胆地朝前走吧！”

走向哪里呢？

苏晓康们曾经断言：“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依附于政治权力”，“没能形成独立的社会群体，并缺乏独立的人格意识”。他们认为一部《河殇》证明了“一个具有独立学术意识的精英文化群体已经形成”。他们不仅向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而且已成为进行社会改革的独立的领导力量。这就是说他们不但要“参政”，而且要行动了。

1988年的最后一天，苏晓康和中央电视台的《五四》摄制组路过上海，苏的一位朋友去看他并悄声问他，搞五四，有把握吗，苏晓康答：“拍了《河殇》《再拍》《五四》，应该是很忌讳的。但我们仍要干，哪怕拍不出。这是一种……”他暗示说这是一种选择，一种行动。确实是一种选择，一种行动。

1988年9月，党中央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环境，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以后，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整个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势是基本稳定的。但在党内和社会上都有极少数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上的分配不公等问题，内外勾结，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极不光彩的活动。社会上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十分错误乃至反动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他活动。苏晓康此时选择了什么？参与了什么行动呢？请听他自己的叙述：

“一日下午，大名鼎鼎的诗人北岛光临寒舍，极郑重地递给我

一封联名信，文字极短，大意是今年为建国 40 周年和‘五四’运动 70 周年，为创造一个和谐的改革环境，建议全国人大对政治犯实行大赦。文后已有十几个签名，全是首都文化界的名流，真可谓群星荟萃。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当下让我只觉得北岛能来找我，乃是看得起我。于是不假思索地签了字。”

说签名时“不假思索”，也许有几分真实，但要借着“五四”和法国大革命搞行动，苏晓康是早就思索过的了。在 1989 年 2 月，他同他的老师的一次谈话中，也隐隐约约地透露过。

就在这风雨欲来的时候，一位革命前辈特地打电话给苏晓康的父亲，要他劝告苏晓康千万不要站到对立的方面去。但以“精英代表”自诩并早已卷了进去的苏晓康哪能听进这番忠告呢？

5 月 10 日，即动乱进一步加温升级以后，苏晓康、赵瑜等一部分在京作家，骑着自行车上街游行，一路呼喊着“写作自由”、“言论自由”等口号，为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撑腰打气。

5 月 12 日晚上，在北京某工厂的招待所里，苏晓康召集，赵瑜主持，开了一个 50 多人的会。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一）讨论 5 月 15 日知识界大游行的有关事宜，决定赵瑜任总指挥。（二）讨论并通过苏晓康起草的一份声明。会议结束以后，苏晓康、赵瑜和夏峻拿着这份声明到严家其处最后定稿，这便是由刘再复、严家其等牵头号称有上千知识分子签名的“5·16 声明”，连这个题目都是严家其最后敲定的。

5 月 14 日，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于浩成、李泽厚、苏晓康、温元凯、刘再复等 12 人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求宣布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说如果不实现这些要求，他们也将参加绝食。这个呼吁书也是经过苏晓康修改的。当天晚上，他们还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进行煽动。苏晓康在讲话中诬蔑我国政府是“无能的政府”，对

参加动乱的学生又加以美化和挑唆。他说：“……同学们，你们第一次在中国教会、正在教会人民和政府怎样进行现代政治运动、现代民主运动。你们比政府、比官员、比文化精英都要高明得多……”

5月15日，首都知识界大游行，苏晓康走在头排。

5月16日，苏晓康等在北京大学举行了“5·16声明”的记者招待会。这个声明就正式出笼了。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指出，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动乱策划者就是要在我国取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实现资本主义化的绝对自由。同这种要求相配合，一些知识界的所谓“精英”分子，也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极少数人，在此期间大造舆论……

动乱期间，见诸国内报刊的众多“声明”和“呼吁”中，“5·16声明”应当说是相当突出的一份。它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它指斥我国政治腐败，要求在中国“运用现代民主政治的原则”，“使中国出现一个民主的、稳定的局面”，即资产阶级专政，它要求政府承认非法的学生组织，妄图建立政治上的反对派；它还要求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集会、游行、结社自由等等，并针对人民日报“4·26”社论，公然为这场反革命动乱张目。

严家其、苏晓康等错误地以为他们这个声明将知识界都动员起来了，于是迫不及待地成立了非法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妄图和其他非法组织乱中夺权。

5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从20日上午10时起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们结成死党，集体进行地下宣誓。

5月20日,香港《文汇报》上发表了所谓《知识界誓言》,声称“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80年代中国的末代皇帝称臣”。宣誓人中就有包遵信、严家其和苏晓康。

5月22日,严家其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召开了近百人的会议。会上严家其明确宣布,前一段我们是反对人民日报“4·26”社论,现在是反戒严。苏晓康在会上介绍了堵军车的情况(也可称为“经验”吧),他还煽动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必须是让人民起来。因为从李鹏的角度讲,他希望市民能保持平静。如果只有学生留在广场,政府可以不理,这样时间长了,政府就可以抓住把柄,市民也会增加厌烦情绪,最终导致失败。”

这个会上他们还决定了出版地下报纸及其他措施。

到此,苏晓康真正是“大胆地、不回头地”往前走了。一直走到国外,走到与祖国、人民为敌的阵营里去了!他不仅参加了反动组织,据1989年47期《北京广播电视》报道,最近苏晓康在香港一家半月刊上撰文说,今后他思考中国的问题,不能再绕过共产制度而只去清算传统文化了。这也就是说,他今后将不加任何掩饰地反对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制度了。这不是民族的败类是什么?!

苏晓康“大胆地往前走”了,终于走到了与人民与祖国敌对的营垒,而难以自拔了。

我想到了当年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沉痛呼唤,本来该是革命接班人的材料和苗子,竟然充当了社会主义的掘墓人,我们难道不应从中吸取一点什么教训吗?

早在十年前,邓小平同志就提醒全党,有几种人是不能低估的,那就是:搞政治阴谋的人,所谓“民主自由派”,无政府主义分子和极端个人主义分子。邓小平同志说,“尽管这几种人的性质不同,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他们完全可以纠合在一起,成为一股破坏势力,可以造成不小的动乱和损失。”

纵观苏晓康堕落的过程时,重温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是很有益的。

自然,苏晓康之流是我国青年中的极少数,我又一次怀着激动的心情,想起建国以来那一代又一代和祖国共命运的热血青年,包括苏晓康的同辈中的绝大多数,他们是祖国的骄傲,也是青少年们学习的榜样。

(《中流》1990年第1期,标题略有改动)

## 从《河殤》到《五四》

殷其雷

电视片《河殤》出笼后,有的同志曾断定,这是一部“绕过批判现实的险滩去安全地鞭苔祖宗”的作品。可是《河殤》的炮制者和批判者,却都没有理会这个论断。围绕《河殤》的这场论争,更多地是现实的论争,而不是翻一些与现实无关的历史旧帐。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那些“精英”们所炮制的《河殤》,是并没有把他们所想说的东西和盘托出的。严格来说,这仅仅是放出了一个试探性的气球,打了一场“前哨战”。真正的杀手锏,还藏在后头。

果然,《河殤》刚刚播出,在一片大吹大擂的鼓噪声中,他们又紧锣密鼓,开始了其续集《五四》的拍摄了。这个续集,就不再转弯抹角,而是直接“鞭笞”“五四”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段革命的历史,对黄河、长江的诅咒,则已变为肆无忌惮地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直接的凶恶诅咒了。

选择“五四”这个题目,选择“五四”70周年纪念日的前夕,赶拍这部电视片,显然又是与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势力,借“五四”掀起一场政治风暴的预谋,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他们制造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重要步骤之一。

可惜的是,这部电视片还没有摄制完成就流产了。广大观众,对它的真实情况也就知之甚少。

知道《五四》是一部什么内容的电视片,对于我们认识围绕《河

殇》的那场大鼓噪的真正含义,是大有帮助的。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我们所接触的有关材料,把它的炮制过程和内容的设计向读者做一番介绍。

《河殇》的“轰动效应”,使所谓“精英”们欣喜若狂,他们决心变本加厉,沿着《河殇》的思路继续走下去。1989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早就预谋借题发挥,利用这个日子大做文章。于是,“五四”就成了《河殇》炮制者们的下一个题目。据说,这个计划的首倡者是《河殇》的“总顾问”金观涛。苏晓康在他那篇追述这一创作过程的《世纪末回眸》一文中写道:“我们的‘纪念’,由金观涛先生提议,还想借助电视这个‘现代化庞然大物’,把百年兴亡说道说道。”文中还透露,金观涛及“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同有关部门洽谈了这部“政治电视片”的构想,并得到了同意。金观涛本人在《文艺报》召开的那次《河殇》座谈会上表示,“希望《河殇》剧组能以这样的精神(按:指决心下地狱的“彻底的精神”)摄制出更好的片子。”《河殇》首播结束之后不久,它的编导即对记者宣布:“更令人高兴的是国内知名学者已同我商定了新的合作计划。我们将沿着这条道路坚定地走下去。”(发表在1988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同一天,《羊城晚报》也发表了《河殇》另一撰稿人的文章《我与〈河殇〉》,文中一方面吹嘘《河殇》“吸收了当代中国思想的各家精华”,同时写道:“原班人马正在筹备创作一个新的电视节目,以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我相信,它将比《河殇》更加成熟。”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一位副台长,1988年8月12日对记者宣布:“《河殇》能够全播就说明它不是最后一部。我希望我和我的同行们,能搞出更好的电视片。”1988年9月14日纽约《华侨日报》也曾透露了来自国内“官方”渠道的信息:“明年的5月4日,是‘五四’运动五十周年(按:原文如此)纪念,该台还计划拍摄一部历史纪录片,题目是《科学与爱国》,也可以说是《河殇》的继续。”



于是那些“精英”便呼朋引类，忙活起来。金观涛亲自引荐一位拜某大名鼎鼎的学者攻读博士的人参与脚本的起草。此人根据“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理论”，语惊四座：“新文化运动，恰在‘五四’这一天走入迷津，爱国、救亡的迷津。”这就是说，救亡运动断送了中国的启蒙运动。有这样一副头脑，自然是最佳撰稿人选。此时，正是1988年夏天多雨之际。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份提纲，题目是《心中的日出》，而不是《科学与爱国》；此外，1989年5月苏晓康对上海《青年报》记者说，这部片子暂名为《五四》，看来题目尚未最后确定，各个部分的标题也在斟酌之中。《心中的日出》提纲的第一部，题目《寻找现代中国的主题》下分三集，第一集：《寻富求强之路》，内容是追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寻求富强的历程，最后的结论落到了“民主政治必须得到必要的文化前题和国民基础”，为下文“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曲”张本。第二集：《中国的伏尔泰们》，着重宣扬梁启超、严复，特别是陈独秀、胡适等人“功不可没地开风气先”。闭口不提李大钊、鲁迅。第三集：《新文化的圣地》，主要歌颂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称北京大学为“思想的自由王国”。提纲的第二部题目《肩负起中国的命运》，第四集企图借一位“五四”老人之口，强调“政府不善，学生得纠察之”，用心十分险恶。第五集《新文学的奠基者》介绍鲁迅、茅盾等人的创作活动。第六集：《启蒙与救亡》，这是此片的核心主题，自然要请“导师”来主讲，在这一集里将要正面阐述“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曲”。据说，“在强烈的民族情绪中，人们容易忘记中国的主题——忘记只有不断启蒙，才能真正救亡，只有继续取法西方以自强，爱国主义才有切实的内涵。于是，救亡压倒启蒙，个人权利臣服于虚幻的集体意志；拿来主义转变成蒙昧的闭关锁国；新创的文学形式让位给旧有的民族形式……不仅继续建设新文化的任务被弃，而且启蒙运动已经得到的成果也多有丧失。”一句话：中

国共产党领导进行反帝斗争是犯了滔天大罪，她领导的反封建斗争等于白费。提纲的第三部，题曰：《走向中国现代文化》。第七集《在科学的旗帜下》，由节目的策划者金观涛亲自主讲，据说：“五四过去了70年，赛先生（科学）在中国的地位仍然悬而未决”，“作为最终价值尺度之一的知识本位，仍然立足未稳”。第八集《在民主的道路上》。第九集《知识分子的盛大节日》，别有用心地提出，“5月4日这一天，并非笼而统之的所谓‘青年节’——它是‘学界节’，是‘知识分子节’，是中国现代知识精英的盛大节日”。

这份提纲，后来又做了很大的修改，由三部八集变成了五集，每集都有两个字的标题。苏晓康曾向记者讲述了这五集的内容：第一集《天演》，相当于前一份提纲的《寻富求强之路》，“五四”以前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苏晓康说是“表现了经济层面改革的失败，这对现实颇有反思借鉴的意义”。这当然是胡说八道，但也透露出他们的政治野心。第二集《盗火》，歌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同时诅咒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说什么“这些思想的巨子没有子嗣，‘五四’精神没有被继承，而是烧起了另一把野火”。第三集《迷津》“表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夭折。爱国救亡同时也救了一个旧文明”。把攻击的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四集《失魂》进而攻击毛泽东同志是“奇理斯玛型”的领袖。奇理斯玛一语来源于《圣经·新约》，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用以表明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苏晓康胡说奇理斯玛型的毛泽东“与群众非理性的、愚昧的素质结为连体”，结果使中国导向了非现代化。第五集《追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五四’之后整体地失落了。解放以后，他们更是向新权威沉沦。群体性的一边倒造成了群体性的毁灭”，又说，“今天，知识分子的首要问题是必须建立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人格。否则一切无法谈起”。这已经是公然鼓动知识分子脱离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了。从浙江西行，来到毛泽东

的故乡韶山,苏晓康的咒骂更加恶毒了。他认为毛泽东代表着“一种反理智主义的传统”,建立了:“奇理斯玛型的统治”。它“要求每个个体放弃自我而为政党、阶级、国家、民族利益服务,这是奇理斯玛成功的最大诀窍。然而,这又与创造新文明的‘五四’精神——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人格独立、国民素质更新等等,恰成南辕北辙。”苏晓康硬说:“中国人经过30年浴血奋斗又经过40年艰苦努力而未能进入现代化,症结就在于此。”看到上面这些胡言乱语,我们不能不为苏晓康等人的信口雌黄和强词夺理而震惊和愤怒。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与集体,个性的解放与阶级、民族、全人类的解放是一致的,它们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一方面,“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5页),就是说个人离不开集体,个人的发展离不开集体的发展,个人要得到发展就必须为集体利益服务;另一方面,“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1页)。就是说集体也离不开个人,集体的发展取决于个人的发展,只有每一个人都得到自由发展,集体才能够自由发展,全人类的解放,意味着每个人个性的解放。苏晓康之流对于这种辩证的关系显然是一窍不通的,按照他们的荒谬逻辑,似乎每个个体都不去为集体利益奋斗,而专心致志于自己个性的解放,中国就会更早地进入现代化,难道这是可能的吗?

江南之行40天,摄制组于1988年底回到北京,分头撰稿,春节后,五集脚本均已写出草稿,交由苏晓康修改润色。这时广播电视部决定停止这个节目的创作活动,创作组被解散了,因此,无论是草稿,还是苏晓康笔下的完本,我们至今都无法看到。苏晓康在他的文章里透露,我们花费了“半载心血”,已经写下了“满纸宏论”,拍出“无数画面”。这些资料现在何处?其中有些什么货色?我们同样不得而知。但是,虽然笼罩在《心中的日出》上面的

重重迷雾尚待驱散,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也完全能够确定这部作品的性质。如果说《河殇》用了较多的篇幅去“鞭笞祖宗”的话,《心中的日出》即《五四》则是妄谈“百年兴亡”,而两部作品的矛头所指都是当前的现实,其要害是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苏晓康们反对一切革命,尤其反对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认为在中国只能由“中产阶级来推动科学和民主”。革命,就是“不遵守规则”,正是革命和社会主义使中国陷于贫困落后,进不了现代化的大门,结论是: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心中的日出》是直接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摇旗呐喊,为1989年那场政治动乱作舆论准备的。西方新闻界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合众国际社记者马珍在1988年12月6日从北京发出的一份英文电稿中说,“这部电视系列片已成为较大规模的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又说:“准许拍《河殇》续集可能是说明赵紫阳站稳脚跟的一个信号。这个计划最终能否在电视上播映将决定下一个回合的胜负”。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不过,她主要着眼于高层的政治斗争,并不把这件事看成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次较量。1989年春夏间,这场关系到共和国生死存亡的较量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结果是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遭到了失败,他们苦心炮制的所谓“心中的日出”还没有露头就归于殒灭了。但是,我们同国内外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之间的对抗是长期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中流》1990年第4期)

## 西方无岸

——孔捷生其人其事

于 逢

10年前,28岁的孔捷生出版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追求》,步入文坛,成为众所瞩目的青年作家;以后成为“名作家”以至“大陆名作家”,而终于他走到“蔚蓝色的海洋”去了:这正是他追求的目的,也是他追求的终结。

出版这本集子之前他进了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文学院,从锁厂青工成为专业作者,受到专业作家的厚遇。文学院筹办于1978年底,1979年7月正式成立,是为了解决十年浩劫后广东文学创作专业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从工农和干部的业余新秀中吸收成员,加以培养。主席兼党组书记欧阳山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宣布办院宗旨,并现身说法,强调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以促使作者健康迅速成长的重要性。孔捷生进了文学院,有了充分的时间读书、写作,并进行社会活动。他连续写出了好些小说,发表于各个报刊上以至《人民文学》上;后来编成集子出版,这就是《追求》。他在集子的《后记》上表示:“我衷心感谢广东文艺界的老前辈,当我摇摇晃晃地在文学道路上学步时,是他们牵着我的手教我如何开步的。”我写了评介文章《孔捷生和他的追求》,登在《作品》月刊1981年1月号上,但已暗示他要警惕自己不要误入歧途。这个集子所收的短篇小说,是有好些地方值得研究的;特别凡写到领导,

不是“昏官”，就是“秃顶”，大半成了反面人物。他的处女作《姻缘》的原稿，其实也不例外，厂领导“包青天”也是“昏官”；后来给他提了意见，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在小河那边》有编造痕迹，调子低沉；受到一些批评，领导上认为此作尚属瑕不掩瑜，向他做了思想工作，以免挫伤一个年轻作者的积极性。

作协分会创办文学院，是为了建立一支有组织、有战斗力的社会主义文学专业创作队伍。院里曾三番五次地申明，创作员们都耳熟能详。孔捷生是文学院的一员，理应把自己放在集体之中，而不是放在集体之外或之上。但他在文学院里却好像作客或来宾，开会的时候摆弄桌椅打开水等很少见他动手帮忙；开起会来他远远坐到一边去只管埋头看报纸；会未开完他往往已不知去向，对集体和领导表示出轻蔑的态度。这真是要“民主”有民主，要“自由”有自由。有一次在白云山开会结束，大家合影留念，全体约30人在炎夏烈日下站队，他却一个人躲在旁边大树的阴影里窥测；待大家满头大汗地站好了，即要拍摄，他就一个箭步窜出来，站到看中了的位置上。对种种极端个人自私行为，别人也曾给他略予指出，耐心等待他能自觉改正。

文学院一直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思想，要求创作员自觉地深入生活，同人民群众相结合，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汲取创作养料。创作员可以根据自己和兴趣，选生活基地；但一定要实行下去，挂职工作。孔捷生选的是自己的故乡“南海洙泗村”。他在祖居住了几个月，就回来了，且带着“作品”。但这作品却不是反映当地人民生活和现实斗争，而描写一个住在广州小巷深处被埋没了的曲艺作者的凄凉遭遇，一个音乐学院女学生从他那里发掘出了优秀民间音乐传统加以发扬光大的故事，篇名《绝响》。当然，写小说是可以而且应该虚构的，但必须以现实生活为依据。这故事却完全是捏造的。据各方面调查，解放后华

南文艺领导是大力抓了剧改工作的,对民间曲艺传统也抓紧发掘,从未埋没过一个稍有成就的老艺人。《绝响》不过是把旧社会里可能发生的事,搬到解放后进行随意编造,意在诋毁新社会。但就是这么一篇东西,硬是得到国内某些评奖主持人的欣赏,加上某些报刊吹嘘,于是拍成电影,送到国外去,得了个什么洋奖。当时孔捷生声言自己正在“探索”各种写法,他运用现实主义方法写了些较好的作品,如《普通女工》、《南方的岸》等,也运用某些手法,写了些晦涩难懂的作品,如《海与灯塔》、《挽歌与和弦》等。后者常在晦涩难懂的烟幕后埋藏着一些恶意隐喻。最后他的倾向性就逐渐清楚了:朝着西方现代主义前进。此时他已并不讳言崇拜萨特、弗洛伊德、乔伊斯等了,并且在文学院里传播,引诱个别创作员跟着走,成为领导上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种阻力。他原来是最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但他却最起劲地宣传自己的艺术观和政治观。最后他写出了中篇小说《大林莽》,全篇使用半现实半象征的手法,作着存在主义的说教,把“文革”当为一个普遍的现象,诽谤我们整个现实社会充满种种暴力,扼杀所有的生机。而从此他的创作生命力也就逐渐衰竭了。

1984年前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泛滥成灾,文艺界是重灾区。有人宣布文艺的“黄金时代”到来了。孔捷生一帆风顺,先是当上了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跟着当上了中国作协理事。他于是自称是“新文学运动的弄潮儿”,所写作品频频在全国得奖、广东得奖,受到当时文艺界某些高层领导的赏识和宠爱,于是南来北往,结交了一批“哥们儿”、“姐儿们”,旅游各地,到处讲演。不久就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欧洲;途径法国时还特地到萨特墓前献上花圈,表示自己忠于存在主义,恪守“他人是我的地狱”的格言。回国后发表了多篇赞美西方的文章。这些文章名为散文,实是政论,直接为其政治服务。其中《在足球皇帝的故乡》,多处针对《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某些提法,加以反对和嘲弄;却竟然获得报刊评奖。终于1986年元月写了杂感式的长篇政论《俄狄浦斯与薛仁贵》,以论述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为开端,及于中国薛仁贵的误杀其子,东拉西扯,牵强附会,归结为西方的文化是杀父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是杀子的文化。西方代代杀父,因而能代代前进;中国代代杀子,因而只好代代停滞。可惜孔捷生这样“独立思考”时,他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能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弄潮儿”,正是中国当时的某些文艺高层领导所赐予。显然于此已无所谓“杀父”“杀子”之分,倒有近乎“物以类聚”之嫌了。同时他完全忘记了他八年前在《追求·后记》自己所表白的一切,换了另一副脸孔说:父辈“稍圆通者竟创立‘扶上马,送一程’之说。于是真有扶人与被扶者。却不想,连踏蹬上马都战战兢兢要人拉拉扯扯地扶持,其本事可以想见。何况,那匹马早就应该属后辈所骑,何扶之有?”“可是老年人慢腾腾地‘跑’在前面,既碍了道,又挡住视野,于是年轻人想到还是干脆去抡棒子。”孔捷生的这篇杰作,既是他肆意讨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檄文,也是他自己要皈依西方彼岸的政治宣言书。

一个人的发展和变化,总是有内因和外因的;内因为主,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孔捷生其实在《追求》中早就宣称自己要“离经叛道”了。领导上多次提醒他要注意,他却报以漠然的脸色;也只好让他去自行“探索”,自行得出结论。

1989年春夏之交,他认定“抡棒子”的时机已到,文化上“杀父”已嫌不足,实行政治上“杀父”。他南来北往串连,在大街、广场周围风风火火地奔忙了好一阵子,就忽然失了踪。不久即安然出现于大洋彼岸,却一直沉默着。孔捷生其实也很懂点儒术,他是个三“窥”而后行的“谦谦君子”,沉默了八个多月之后,今年2月终于接受香港某报记者的采访,打破了沉默。宣称“我感到彻底的幻



灭，……这个(中国)政府肯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政府”。那末，怎么办呢？他既“不愿认同‘吾尔开希式’”，又断定“民阵”“还不是一个很成熟的政治组织”。他声言“君子不党”，表示自己“今后也不会参加任何政治团体”。但他跟着就参加反华的“海外中国作家会议”，这不是带政治性的活动吗？他要复刊在本国被禁的《今天》，还接受“大姐”的邀请主编什么《广场》还不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可以“自由”地咒骂养育自己成人的祖国吗？他还声明要写一本叫做《血路 1989》的书，“作一些深层检讨”，这不是要总结经验教训，幻想卷土重来吗？真个是进退有据，可进可退，退而又进，正如“条条大路通罗马”。事情看来好像十分热闹的样子，但其实“这样去国无家的流亡者”不多几个人聚在一起是够寂寞的，只能“举樽豪饮，狂歌当哭，排遣乡愁”。凄然自叹“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孔捷生自称“身为作家，这只不过是我人生追求的一个延续”。那么，这个“延续”之后的“延续”呢？又是什么？人们当拭目以待。

1990.11.24. 于广州

(《中流》1991年第4期)

## 1988：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在巴黎

牛 羊

**编者按：**1988年5月间，在法国巴黎的一次聚会上，一批中国访法作家学者，围绕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同到会的人们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和辩论。这个事实，已为巴黎的舆论界所广泛报道，特别引起了那里的华人、华裔和中国驻法机构等的密切关注和议论纷纷。台湾的某报刊，也就此作出了反应。

本刊认为，一些中国人，不远万里，拿了国家宝贵的外汇，跑到巴黎去争论中国的事，闹得满城风雨，而国内大多数人却对此一无所知，这是很不正常的。国内广大人民、读者，有权利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也有责任向国人提供这方面的情况和材料。

为此，本刊特发表本刊记者根据当时巴黎华文报刊和有关人士提供的情况而写成的综合材料。我们相信，这些材料一定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和深思。

这些材料不一定完整和全面，如果当事人和有关主管部门有新的材料或不同的解释和意见，我们欢迎他们也向我们提供，我们将酌情予以刊登，以期读者对此有进一步了解。

应法国文化部邀请，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12人于1988年5月25日至6月11日访问法国。为了配合这次文化交流活动，法方同时邀请了正在国外的刘宾雁等几位中国作家。这是近年来访

法的阵容最大的中国作家代表团,法国文化界十分重视这次中法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先后多次举行报告会、座谈会以及与读者和观众见面等活动。法国的新闻媒介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可以说,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到来,在法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在法国文化界特别是华人华裔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来讲,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在访法期间,几位中国作家却连续发表了一些有损于中国形象、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歪曲事实的言论,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了不负责任的批评。他们的言行,在法国友好人士及华人中间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引起普遍的反感和抵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但它所造成的影响至今并未消除,国内读者甚至还不了解事情的真相。看来旧事重提,让这些与中国作家身份不相符的言论曝一曝光,并非没有必要。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文引用的材料,均有据可查。

**“听了你们的发言,让我们流泪,因为从你们的叙述里,人们发现中国这么渺小,这么卑鄙。”**

5月27日晚,法国文化部所属的文化交流协会主办题为“中国文学的觉醒”讨论会。这是中国作家代表团25日抵达巴黎后首次公开活动。6月1日的《欧洲时报》为此专发的“特稿”《一场关于中国文学创作倾向的辩论——记访法中国作家代表团首次讨论会》这样报道:“热情的观众把整座大厅挤得满满的,连通道地上也坐满了人。”“中国作家代表团9名成员,27日晚在巴黎著名的蓬皮杜文化中心地下大厅同300多名法国文化界人士、汉学家以及部分中国留学生,就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现状、如何对待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如何评价中国作家当前的创作倾向等问题进行了激烈

的辩论。”

一位作家说：“我在写小说过程中碰到一个很沉重的心理问题。我是排除不掉两个阴影，一个是我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非常惊人的贫穷，一个是我们民族的总体文化水平非常低下。”“据说一个作家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不能进行写作，但我没有办法……，它成为我创作小说的一种心理因素。”

一位作家谈到他想讲真话时的心理冲动。他说：也许法国朋友不理解为什么讲真话还需冲动。“如果有一个人30年没有说真话，光说假话，到了让他说真话的时候，他就会像我这样冲动。”他接着说：“最近我听到在中国提出一个口号‘允许人们说真话’。全国人民对此都欢欣鼓舞。这一方面说明这许多年来没有允许人们说真话，同时埋伏着也许有一天又不允许人们说真话。所以现在我趁允许人们说真话的时刻来写小说。”

另一位作家说：他想回答许多记者经常向他提出而他一直没有回答的两个问题。其中之一是“为什么中国作家有那么多挫折”？他形象地比喻说：“中国许多作家就像是不合时宜的雄鸡。一般情况下，正常的雄鸡都是早晨叫。不正常的雄鸡们总是半夜叫，这样就引起主人們的生气，包括善良的主人們也很生气，于是就把它杀掉了。可事实是，不管正常的鸡或不合时宜的鸡怎么叫，早晨都会来到的。”

6月1日《欧洲时报》的“特稿”写道：

这场辩论是由出席讨论会的中国作家们各自介绍自己对中国近30年社会发展情况的一些看法及自己的创作观之后，由华人学者徐广存（引者注：徐原籍山东临沂，1949年12岁时随学校去台湾，在台读完大学后于1968年到巴黎，一直在巴黎第三大学任教。自1975年以来多次回国探亲）即席发表感想引起的。他说，听了

你们的发言,让我们流泪,因为从你们的叙述里,人们发现中国这么渺小,这么卑鄙。你们没有一个人谈到中国文化、中国的历史对你们的影响。在你们的作品中就是揭发、揭发,已经揭发十几年了,还在揭发。中国是贫穷,但中国的文化并不贫穷,应该歌颂你们的民族。不要忘记你们作为作家,应该领导中国人民前进。

报道说,“出席讨论会的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们几乎一致强烈地表示不同意徐广存先生的批评。”

据当时在场某位人士说,徐广存先生发言后,几个作家一个紧接一个对徐进行批驳,而且有些人嗓门很大,有的代表甚至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手指着徐进行诘责,含有颇浓的“集体反击”的味道。

一位作家说:“坦率承认中国贫穷,承认中国很多人文化还很低,就是中国的光明。”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些东西是很坏的,“再也不能抱着我们有优秀的传统、了不起的文化在这个世界里混下去了。”

刘再复认为,最近十年中国知识分子“敢于对过去走过的路进行反省”恰恰是继‘五四’运动之后“又经历了本世纪的另一个文化心态史诗性的转变”。

辩论进行当中,主持讨论会的法国著名剧作家卡里埃提问说,要是不允许讲假话的话,那文学怎么存在下去?听众席中也有人说:文学中的虚构情节,事实上也属于讲假话。

当晚,讨论会结束后,辩论继续进行。

徐广存,这位在巴黎任教近二十年的华人学者说:对中国应当有个基本估计。

同西方比中国是穷,共产党这些年没有治理好有责任,但从根本上说,中国穷不是共产党造成的。

退一万步说,你们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不行,这如同倒下的一

堵墙，我们不能老是站着数落这堵倒下的墙，大家应该同心协力想办法把墙扶起来。

在会场采访的法国电视一台记者雅克琳娜·迪勃瓦当场公开表示：她对这批作家的水平感到失望，她将放弃对他们的采访报道。

### “亲身体验到文化大革命大批判的味道”

日后，曾当场采访过5月27日座谈会的一位大陆新闻机构驻法记者曾应邀去访问徐广存先生。

徐广存认为，这批来访作家多数人感兴趣的是政治，不是文学。而他们所谓的政治，就是来告诉法国人，中国共产党专制、独裁，中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徐广存对记者说，“这些做法很不正常”，而他同代表团一些成员的分歧点就是如何从历史的角度正确分析中国的现状，如何寻找正确方法去振兴中华。

后来，几位与徐广存有接触的华人朋友告诉这位大陆记者，5月27日“讨论会”后，徐的心情一直很沉重。有人曾问徐广存，对这些目前在中国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文化人最深的感触是什么？徐答道，他“亲身体验到文化大革命大批判的味道”，而更主要的他“深深感到振兴中华民族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说到政治，还可以顺便提及一件事情。6月1日，在蓬皮杜中心举行的作品朗诵会即将结束时，一个华人谭雪梅（引者注：此人曾在国内政治运动中挨过整，二十多年前去法国定居）提议为魏京生默哀一分钟。在场的某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起立说：“我不仅要为魏京生默哀，而且还要为我的朋友中坐过牢或死在牢里的人默哀。”当时有些华人表示抗议，喊道：“不要搞政治！”会场一时陷入混乱。

## “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现状”

据6月4日《欧洲时报》报道,5月29日下午《欧洲时报》编辑部邀请了中国作家代表团部分成员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此报道刊登了如下对话,并注明未经本人审阅。

**《欧洲时报》编辑部人员**(引者注:以下简称编):那么您(引者注:指到场的中国作家,以下简称作家)认为去年这么搞法(指开除几个作家的党籍),本身就是错误的。

**作家甲:**我认为是错误的。

**作家乙:**在一种没有广泛民主的国家里面,少数人控制意见,或作出决定,并不是件困难的事。

**作家甲:**香港也有记者问我,以后能不能避免这样的现象?我说,如果我们解决了民主体制这个问题,这种现象就可以解决。

**编:**这么说现在中国大陆还不能马上解脱?

**作家乙:**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说。我想补充一点。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反映意见是非常中国式的。在这种文化传统下,基本上处于沉默状态。他不会屈服,也不会直接反抗,……中国式的抗议最多是沉默。

**编:**你们作家现在常到外国,接受记者访问,发表观点,心里怕不怕一些话返回到国内,上司听了不高兴?有没有思想负担?

**作家甲:**在言论自由的国家,作家所起的作用可能少一点,在言论不自由的国家,作家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大一点。就我来说,我并不是很害怕这件事的。……

**编:**听说你们在蓬皮杜文化中心报告会上,发表讲话后,有人说听了你们的言论,感到中国这么渺小,这么卑鄙,对此你们有何

评论？

**刘再复：**听了他的发言，我是很气愤。他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呢？现在，我们的作家写作，不是单纯的歌颂，也不是单纯的揭露，我们是深刻的反思。

**作家乙：**如果他从我们的谈话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的话，只能说明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现状，或者没有看当前的文艺作品。

以上两位作家所说的“他”，系指徐广存。

6月2日，在蓬皮杜文化中心举行“中国作家的创作使命感”座谈会。5月30日清晨由美国甫抵巴黎的刘宾雁首先申明“不属于这个代表团，也未参加27日讨论会”，然后宣称：中国作家对中国存在的问题连千分之一还没有写由来，中国近40年的历史也连千分之一没有写出来，很多重大事件现在中国人还蒙在鼓里。接着话锋一转，在徐广存先生并不在场的情况下，当着300多法中人士的面，刘宾雁对徐进行了再一次的批驳：

（徐广存）似乎是很爱国、似乎是很革命……但他的这种爱国、这种革命，我们太熟悉了！我们中国人受它的苦受够了！我们的揭露太过分了吗？从来没有，老实说，是太少了！

同时，针对6月1日《欧洲时报》为5月27日讨论会而发的专稿，刘宾雁喝斥道，那个记者不该报道徐的发言。

事后，这位记者曾找刘宾雁谈话。刘承认，报道属实，但对其倾向性不满。



## “把那个记者调回国内”

6月1日《欧洲时报》刊登“特稿”《一场关于中国文学创作倾向的辩论》，记述了5月27日讨论会上几位中国作家与徐广存的辩论。刘再复和一位作家找到了该报社长和总编辑，严厉质问：

为什么要刊登徐广存的“反动言论”？

那个记者的身份？

当他们得知这个记者是国内某新闻机构驻法记者时，立即扬言：

回京后找胡启立，将这位记者调回国内！

## 1989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6月15日下午，刘宾雁离法赴美前，在巴黎第七大学，作题为《明年是一个重要年份》的演讲，历时120分钟。6月19日至21日的《欧洲时报》刊载了这次演讲的消息和主要内容。尤其引起读者密切关注和深思的，是演讲特别突出了“明年”即1989年的三个纪念日：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

关于刘宾雁在巴黎第七大学的这次演讲，《台湾时报》1988年6月17日发表该报驻巴黎特派员的报道。报道称刘宾雁为“以揭发中共在大陆各项罪恶与阴暗面而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报道引述刘宾雁的话：“毛泽东害苦了中国人。”报道又写道，“他对中共当前紧抱着的‘四个坚持’，表示了嗤之以鼻的态度。同时他也回答在座听众，没有‘政治制度’的改革，就不会有‘经济改革’成功的可能。他认为在共产主义的架构之下，不会有政治民主和自由

的可行性。”

人们今天才知道,1989年5、6月间,一伙什么“精英”、“智囊”之类与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早有在今年即1989年趁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这三个纪念日制造事端,挑起动乱的计划。刘宾雁在这一计划实施中间的表现已经举世皆知。值得思考的是,刘宾雁在巴黎的一番表演中,点出这三个纪念日并特别说1989年“是一个重要年份”。不知道他是有意泄露天机呢,还是无意中为未来虚幻的胜利得意忘形而走嘴?

## 题外话

下面有几则中国作家代表团1988年访法后的随感。随感者是一些耳闻目睹者。

对于5月27日蓬皮杜中心的“中国文学之觉醒”讨论会上的辩论一事,一些法国人士说:这些“中国作家气量小,气质也差,听不进不同意见,自己口口声声要民主、要自由,却不懂得如何民主地讨论问题”。

旅法华侨俱乐部副主任严伟达说,他对国内出来的某些人以揭露中国社会的疮疤为时髦十分反感。他尤其对刘宾雁在法国电视六台说的“中国40年来的历史是一片迷雾”,“我们的民族的生活太沉重、太痛苦”等言论感到不理解。

6月2日晚刘宾雁再次对徐广存公开批评后,有八位曾听过徐讲课的法国人次日集体到徐的寓所拜访徐,说他们不能理解这些要求别人给予自己讲话自由的人为什么不能容忍别人有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他们不是说来法国体会民主气氛吗?法国是允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

香港一家报纸驻巴黎的记者说,他们不是一再说中国没有新闻自由,他们在这里讲的是真话吗?为什么客观如实地报道一下有人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就受到攻击呢?

中国留学人员联合会一位委员说,“从这件事中使人对他们追求的新闻自由发生怀疑”。

有人得知代表团个别成员扬言要把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撤回国去后说,幸亏这些人还没有掌大权,否则中国人更得遭罪。

(《中流》1990年第1期)



## 第二章

不废江河万古流



## 爱我中华的心声 壮我中华的呼唤

——向读者推荐颜元叔诸位先生的三篇文章

**编者的话:**台湾大学颜元叔教授《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原载台湾《海峡评论》1991年第2期)的摘要在有的报纸披露后,引起人们极大兴趣和强烈反响。许多同志投书本刊,希望我们全文转载。有人还向我们推荐港、台舆论界与此有关的言论,要求我们一并转载,以飨读者。

我们感谢大家对本刊的热情关心,认真地考虑了这些建议,决定拿出足够篇幅将该文按原貌转载。同时转载香港《文汇报》发表的暨南大学潘亚暾教授致颜元叔的信:《中华民族揭开了腾飞的历史》。

为免断章取义之嫌,我们刊登上述文章时,均一字不易,未加删节。这样做,既是出于对作者的尊重,也是对读者的信任。既然这里涉及的是牵动11亿人灵魂、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已在港、台被人广泛议论,为什么不可以让我们大陆同胞窥其全豹,表示自己的态度和看法呢?归根结底,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建设中国的亿万人民”自己。例如,漓江是否变成“泥水沟”?远在普林斯顿的苏晓康,是并无发言权的。他埋怨颜教授没在江边站“几分钟”。而潘教授却告知我们,颜教授恰恰在苏晓康之流起劲大搞动乱时,带着全家游览了桂林山水,他们在漓江呆了总不止几分钟吧?他的判断比起苏晓康蛊惑人心的渲染总要可靠点吧?连这个起码的事实都不准备尊重,又对中国的历史缺乏

常识、没有体验，还居然自诩为中国一代“精英”，在正常人看来，这实在是一种无情的自我嘲讽。苏晓康所提供的其他所谓“数据”、“细节”有多少可信性是可想而知的！

颜文也罢，潘文也罢，陈文也罢，他们所说的也并非句句是真理。在看待中国历史和现状上，有着不同视角，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这并不难理解。这个问题实在太太、太复杂、太难解了。向读者推荐这些文章，也并不表明我们就同意他们的每一个论断。但是，读到这些文章，我们不能不深深地感到，他们有着极其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胸中都跳动着一颗炽热的中国心。你可以赞成或不赞成其中的这样或那样的判断和结论，却不能不被他们字里行间、溢于言表的爱我中华、壮我中华的浓烈情感所感染、所激动。

他们真的像苏晓康指责的那样，“漠视”中国人民的“苦难”吗？不，恰恰相反，正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遭受的难以言状的巨大苦难，激发了他们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正是在这种感情支配下，他们珍视我们这个民族为摆脱苦难而取得的每一点哪怕是微小的进展，尊重为摆脱苦难而献身的人们的伟大业绩，也能够正确评价、理解在摆脱苦难斗争的历程中所遇到的曲折、磨难和失误。难道这是“残忍”，而不是一种高贵的民族感情吗？可是，指责别人“残忍”地“漠视”苦难的苏晓康之流，却把近代史上给中国造成最大苦难的新老殖民主义当成了中国人民摆脱苦难的靠山、救星和楷模，而把中国人为摆脱苦难而遇到的阻碍，统统归罪于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归罪于脚踏实地前赴后继地不懈奋斗的革命者，甚至责难于祖国的历史，羞愧于皮肤的颜色。这难道不是为制造苦难的真正罪魁祸首开脱吗？另一方面，他们又以中国人民的苦难为口实，蓄意在神州大陆制造动乱，不惜把亿万同胞推入“流血”和“内战”（见苏晓康在台湾的言论）的更大的灾难之中。



这种人的鳄鱼式的眼泪,受到一切爱国人士的怒斥和蔑视,也就理所当然了。说这种连国格都不顾的人是利用中华民族的苦难,火中取栗,进行政治投机,达到不可告人的卑劣目的,不是更恰当一些吗?我们认为,这才是对中国人民的苦难的最大残忍呐!

事实胜于雄辩,真理越辩越明。其实,这不过是几年前围绕《河殇》那场大辩论的继续和深入。看了这些文章并将其与苏晓康之流过去和现在的言论加以对照,是大有裨益的。它将使我们更加认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实质及其危害,激发我们的爱国热忱,使更多的人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不分海内外,不分男女老少,振作起来,团结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阵线,促进中华民族的真正振兴和腾飞。

亲爱的读者,你愿意在读了这组文章之后,和你的朋友交换一下看法,并把你们的感受和想法告诉我们吗?

# 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

——读何新先生文章有感

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 颜元叔

## 不容洋奴座上宾

两年前读到王晓波兄痛斥索拉兹与台湾“索奴”的文章，读得我老泪纵横；今天读何新先生的大文，痛陈我中国之立场，也读得我泫然泪下。我是不会为“凄凄惨惨”流泪的，更不会为“星星心”流泪——父母 86 高龄寿终正寝，我亦流泪不多——唯独为中国的命运，为中国的近代史，为中国当前的挣扎、奋斗与成就，我有流不完的悲痛泪，流不完的兴奋泪！信不信，我为亚运 183 块金牌，也情不自己地流泪——无他，别无他因，只因为我们中国太需要成就，太需要出人头地的成就！“驱除鞑虏”已往矣——大家都是中国人了——惟独“振兴中华”，则“同志仍须努力”！而 40 年来的中国，虽说走了一些弯路，但是除非是汉奸、除非是洋奴、除非是鲜廉寡耻的“烂香蕉”（这包括那众多的心灵被西方殖民的华人知识分子在内），才会说 40 年大陆还在原地踏步，甚至倒退，说长江变成黄河（这是我的一位已入美籍的高中老同学亲口对我说的，而他既未去过黄河，也未去过长江），说黄河变成“黄黄河”（而事实上“黄河的水变色了”——见年前台湾某报“大陆新闻”），说漓江变成一条泥水沟（去过漓江的千万台胞，是吗？）！老兄，你依在美人篱

下睁开瞎眼说瞎话,你完全背离事实,完全盲目于真相(他哪里都没去过,只去过昆明)!地球只有一个,中国只有一个,你这么糟塌你自己的祖国,你究竟是“人”还是“狗华人”? (我当即把这个来访的老同学——老汉奸!——赶出我家!真的赶出去。我家不容洋奴为座上宾!)

打开天窗说亮话,中国的前途不在台湾(什么叫做“台湾经验”?可笑!),中国的前途不在港澳(殖民地岂是民族复兴基地!但大陆一民运人士竟然认为“中国被殖民才能现代化”,疯子!不过他已自称“疯狗”!)不在海外华人,不在舔洋人后跟的学运民运小丑,中国的前途在中国大陆,在那 11 亿心含“鸦片战争”之耻,心含“八年抗战”之恨的中国人身上!他们衣衫褴褛地制造出原子弹、氢弹、中子弹,他们蹲茅坑却射出长征火箭,他们以捏泥巴的双手举破世界纪录,他们磨破屁股包办 12 面亚运划船金牌,他们重建唐山而成联合国颁奖为世界模范市……同胞们,他们为的是什么?没有别的:他们爱此“中华”,他们不能让“中华”再陨落!

为什么美国人那么爱美国,为什么日本人那么爱日本,为什么有些中国人就不爱中国?走向“世界公民”(可笑的痴梦!)的美籍华裔“烂香蕉”,你们说说看,为什么中国人不能爱中国而被视为“沙猪”!要爱中国,不再只是口号,不再只是情绪,而是要像大陆 40 年,苦心孤诣胼手胝足,不仅流汗甚至流血地干,干,干!把大庆油田打出来,把北大荒垦出来,把葛洲坝拦江筑起来……难以屈指的各种建设,无数的建设,把中国建设起来——这才是爱中国!而中国已经被热爱了 40 年;她将继续被热爱,被那群建国者,真正的建国者,所热爱!(我手边这部大陆编《新英汉辞典》,这部大陆版《辞源》,编得如此周全,印制如此精致,细小的铅字用放大镜看都划划清晰,而且从来没有看到一个错字:我为他们的心血表现而发抖!我们可以把这两部辞书掷在以精致称著的日本人的辞书之

侧,而开始不觉愧色——而我们台湾,40年来,哪部英汉辞典不是翻译剪贴自日作!惭愧哪,台湾经验!)

## 一辈子吃两辈子苦的拼搏

大陆上的人说,他们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痛心的话,悲痛的话,却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话。试问:不是一辈子吃两辈子的苦,一辈子怎得两辈子甚至三辈子四辈子的成就?何新先生说,40年前中国落后西方百年,40年后还落后10年20年(基础科学若干部门已与西方比肩,甚至超前!),这不是一辈子吃两辈子苦的成就么?40年前中国参加奥运亦总是扛着零蛋回,40年后中国的奥运成绩虽未称霸世界,却已称霸亚洲。谁敢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1991澳洲世界游泳锦赛,中国得金牌八面,突破中国人,乃至亚洲人,从未得游泳世界金牌的纪录!且一举夺得四面。另四面为跳水金牌,六得其四,跳水金牌早已为中国包办。壮哉!中国人!)这就是“吃两辈子苦”的成就!我的老同学傅孝先留在大陆的姐姐,搞化学研究的高级科学家,52岁就死了,是活活地给研究工作累死的!累死,多值得的死!她不累死,千千万万的她与他不累死,中国科学怎么迎头赶上西方!怎么出人头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建设文明文化也是要死人的——尤其是要“超英赶美”搞建设;而不“超英赶美”,永远跟在英美之后吃英美屁,中华怎么振兴,中国怎么出头!

所以,40年来,中国大陆是“炼狱”。什么是“炼狱”?就是经过火的洗礼,能够升入天堂。中国过去40年的苦难,是“炼狱”的苦难,是有提升功能的苦难,是有建设性的苦难,是追求成就的苦难——就像你要考上台大而一年不看电影的苦难程度不同,性质则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苦出头来的中国人,如今在人类

中已经崭露头角了。所以,40年的苦难不是负面的、消极的、毁灭性的;它是中国的大蜕变——政治蜕变、社会蜕变到精神蜕变(现在的中国人不再是“差不多先生”,而是竞泳则争半掌之长,射卫星则出从不出毛病的“精准先生”)。而我们在台湾,侥幸而不侥幸地躲过了这场“炼狱”的煎熬,40年隔岸观火躲过了这场火之洗礼。就个人的福利言,我们是幸运者;就重建民族国家的责任言,我们是十足的逃兵!我们就像肢体残障者站在路边,看着一队队的男女好汉走上战场,看着他们她们的尸体被抬回来,或者看着她们他们流血呻吟地爬回来,裹好创伤又冲上去——而我们呢,隔岸观火;而他们呢?他们拼搏,他们打仗,他们打的是我们的仗,打的是150年来的民族复兴之仗,打的是为全体中国人争一口气的仗!而我们呢,我们还在讪笑他们的厕所没有门,讪笑他们的所得低,甚至视他们为仇敌!我们究竟是什么一群没有良心的市侩,一群没有人性的畜牲?

## “中国之光”中国人共享

然而,一个民族国家的羞辱,像雾一般落下来,无可取舍,你非承受不可。(就算你入了美国籍,认同美国,为美国去中东对海湾作美帝侵略之战;你若战死,你的讣告中仍然是“美籍华人”,而不会像别人一样,“美籍美人”!何必骗自己啊,昨日今日以及今后的三、五万日,民族主义还是当令的食品,不认同自己的民族只有做异族之奴!)同理,一个民族国家的荣誉,也无可取舍,它会像太阳一样,你非被照射到不可。中国今后的光荣——苦尽甘来的光荣——你是无法拒绝而非接受一份不可,连反中国的中国人也将同浴于中国的光辉中!这就是说,我们在台湾的中国人——管你是台独、独台、或统派、或无党无派——一旦生为中国人,今后你将分

得一份“中国之光”——虽然我们没有为这“中国之光”之诞生做出什么贡献；无功受禄，我们实在太侥幸！侥幸之余，我们至少要“吃果子拜树头”吧——总不能吃了果子，又对那棵树冷嘲热讽或视之为敌吧。这是怎么样的一种肥心症，象皮病！

中国的问题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简单得只一个字：干，干，干！多加三个字：苦干，实干，硬干。因为中国缺乏的就是成就，要成就只有干。干，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个人想干，个人有惰性；团体想干，团体会涣散。这时候，你自己摆脱不了惰性，就得有人鞭策你；团体反侧于涣散，就得有人严加管束。其实，就像你考大学，你自己督促不了自己，就得有师长有父母在后面鞭策——甚至补习班鞭策也是应该，假使你想考上大学——而考上大学就是一切！就中国言，建设国家就是一切！于是，在中国的问题上，你就知道为什么有集体主义之必要，社会主义之必要，权威专制之必要！

当然，假使中国有二万年的悠闲时间来完成她的现代化，那么一切慢慢来，随各人今天做一点明天做一点，一万年做不成，十万年总可以做成吧。可是，中国原已落后，而这是一个竞争白热化的世界，我们哪能悠闲，哪能慢慢地 *slow boat to China!* 我们不仅要快，而且比别人快；不快不足以竞争，不比人快不足以超前——至少迎头赶上。这就更显出专制、集体、极权之必要！因为，只有这种精神，这种体制，才能团结一切的人，团结一切的意志，一切的力量，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处处攻关，力成大业。就算是西方人笑讽中国人是“蓝蚂蚁”：我们为建国却必须做“蓝蚂蚁”，必须是千千万万的蓝蚂蚁，像蚂蚁一般单纯一致，才能造就出比我们个人大千千万万倍的大堤坝。再造中华，必须是每个人捐弃一己之见，乃至捐弃一己之身，为的是中国这大堤坝之建成。要讲求个人意志，要讲求个人欲望，个人利害，必然是蚁群四下溃散，永远建不成任何东西！而中国就是要建设，要成就——中国要改写《大英百科全

书》——君不见现在“大英”的文明文化榜上中国有几人！

## 自中国近代史中解放

就是为什么，为历史上此刻的中国，我胆敢高呼：反民主！反自由！反西方民主！反西方自由！抽象地说，自由民主绝非绝对之善；而落实在历史的流程中，对此时此地的中国，它们是相对之“恶”！因为，自由只会使中国涣散，民主只会使中国崩溃。有人也许会讥诮：中国人为何如此可怜，竟然承受不了自由民主之“福”！我要反问以这种西方价值为人生价值的人：自由有什么了不起！民主又好在哪里！日本、德国如今又称雄，是它们的民主自由超过英、美？英国如今衰微了，是它的自由衰微？民主衰微？美国今日超强，是它的自由超强？民主超强？而美国的自由民主扩散开来，正好变成美帝国主义的原动力！不是菸草资本家有剥削的自由，台湾怎么变成美菸的垃圾场！“鸦片战争”还不是一个君主立宪笃信基督的英国做出来的“撒旦之战”！而最重要的关键是：这些东西对中国有什么好处？这些东西能帮助中国达成中国的历史目标？曾经有学生问我：老师，中国民主重要还是强大重要？我说：废话，当然强大重要。中国若不强大，而中国自由民主了，中国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保证中国不还是清末民初的中国，不是次殖民地的中国，不是“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中国！所以，中国人必须以一条裤带束紧千万亿腰干，中国人才得解放——自中国近代史中解放！自列强的囹圄桎梏中解放！

西方人是充分了解这 11 亿“蓝蚂蚁”的可怕，这 11 亿众志成城的“蓝蚂蚁”的可怕，于是他们用“自由民主”的口号，企图分化我们，打散我们，划割我们，制造我们的内在矛盾，让我们自己互相抵

消——因为，拿破仑早已叮咛他们，“让这条龙睡吧，他一醒来，西方世界就麻烦了。”可怜可鄙亦可悲那些学运民运小蠢才，连这点简单道理都猪油蒙心看不透，一味地接受西方价值，试图分裂中国，为西方的终极利益服务……让西方继续为世界之主，中国为奴——而尚自以为是“爱中国”。我告诉你们：当西方人对你翘起姆指叫“好”时，你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卖国贼！除了你们这一小撮牛油蒙心小丑之外，天下任何聪明人都深知“人不自私，天诛地灭”；而为国自私，更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当行本色——美国人更是如此。（某教授说：“美国大众传播是美国利益之文化手肩。”——信哉斯言！而美国大传诸君子女士时时自诩为超然的自由派！欺己欺世！）世界已被西方帝国主义 dominate 二百年，洋奴们，心头被殖民的洋奴们，香港的“英奴”们，难道你们的“婢妾情性”如此深重，如此安于为奴现况(whatever is right?)，不也想换换主子，让中国人骑在世界之屋脊上!?

## 为中国伸冤，为中国宣告

何新先生拿那个日本教授作谈话的靶子(东洋亦是中国之敌)，长江大河似地滔滔不绝，他所谈的细目有些专门得超过我的门外汉了解，但是他的大意，是为中国辩护，是为中国伸冤，是为中国宣告，总的而言，正如他自己所说：一切就是为了“爱中国”。他的这个基本立场，赢得我最深的敬佩，最大的认同。从纵的历史上看，从横的国与国的相对关系上看，中国的未来必能使“爱中国”的中国人，不再是孤臣孽子式的悲剧人物；“爱中国”的人，中国的命运必会使他们变成崇高的喜剧人物。说真的，经过 150 年的衰微，中国还会继续衰微？经过 40 年火浴的中国，已经走上复兴之路，除非是山崩地裂，这条路中国一定会继续走下去！中国已经强大，



明日的中国若不更强大,那么天就不成其为天理了。反省我的爱国情操,似乎浓得近乎疯狂;其实,我只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是一个识时务的人而已。历史大趋势这么明明白白地摆在面前,我跟着它走,实在只是大潮流的跟屁虫。但是,我乐于做这么个小虫子,因为今后中国的这个历史命运之完成将正是我一生梦想之实现。我如今是每天喜悠悠看着中国把世界金牌一块块摘下!

# 中华民族揭开了腾飞的历史

——遥致颜元叔书

暨南大学教授 潘亚曦

颜兄：

去夏羊城阔别后，我一直担心你那慷慨激昂的言论会不会惹来麻烦？今天读到你在《海峡评论》第二期发表的大作《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读何新先生文章有感》，一方面感到无比振奋，另一方面又为兄捏一把汗。对比之下，映真老弟的《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读何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较理论化，冷静得多，也平和得多，而兄文却很个性化，情绪化，读来怦然心动，激情澎湃。

这使我联想近年来我俩三度聚首畅谈的老话题——中国。1988年夏，你来暨南大学讲学、座谈，而后是咱们南游从化温泉，在那朝夕相处的三天里，你我的话题总离不开中国。1989年6月底，正是海外谣言满天飞的非常时期，你偏偏选在这时携妻儿回大陆旅游，从昆明、成都、桂林到广州，我与东儿同你畅谈了一夜，你说这次是你怀着“报效祖国”之心而来，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也非常赞赏你的举动，更欣赏你的高论，东儿说他在香港绝对听不到这种声音，深受启迪鼓舞。去年8月，你再度来穗，给我送来二十多本著作，我邀你为本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你和映真兄一样欣然接受聘书，这使我很感动——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三次聚首,我俩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而“中国”始终是我们谈话的主题,道理很简单:我们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你我都非英雄,而在许多问题上“所见略同”。你在“六四”前后的一些预言,都已为事实所印证(了不起的判断),使我很是佩服。你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旗帜鲜明,提出“九七”乃“大庆”而非“大限”的看法,并痛斥“九七大限”论者,使我很受启发。常言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有比较才有鉴别”。你对资本主义是有发言权的,你在美、加等国留学、执教、讲学、与会;对中国你当然更熟,你对中国历史有研究,对中国的现状又作过实地考察,你的观点有说服力,原因就在于此。说句老实话,在认识你和映真之前,我没想到留过洋的台湾知识分子会有这么强的民族意识,总以为牛奶、面包吃多了,思想上难免会崇洋。没想到你比大陆人更“传统”,当然也更富现代意识和环球意识。

文如其人,读你的这篇文章,你那慷慨激昂的神情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整篇文章具有诗的奔放气势,看得出来,那些高亢的语调、炽热的感情,都是发自你心底的;有好些段落,如把句子拆行排列,就像激情澎湃的散文诗。我认同你文章中的主要立场和观点。你的大作,我分析一下,是围绕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来抒怀的,这也正是我最感兴趣的命题。我读着、读着,感情上激起阵阵的共鸣。文中提到你那位已入美籍的老同学“依在美人篱下睁开瞎眼说瞎话”,胡说什么“长江变成黄河”、“黄河变成黄黄河”、“漓江变成一条泥水沟”,惹得你勃然大怒,当即把他逐出家门,说是“我家不容洋奴为座上宾”,真令人痛快淋漓。黄河不曾变成黄黄河,长江不曾变成黄河,漓江依旧风光旖旎,此三川我皆亲眼目睹,可以为你的观点作证。对这类民族虚无主义者我也深恶痛绝。祖国,这是一个庄严、神圣的字眼,祖国以她广阔的胸怀和古老而常新的思想文化,养育了自己的儿女。每一个中国人在祖国母亲面前,只有尽

力报答这如山似海的恩情的义务，绝没有背弃甚至肆意亵渎她的权利。谁要是公然去干不顾人格、国格的卑劣勾当，甘愿做中华民族的叛逆，就不齿于国人，必为国人所唾骂。不过，如果有这样的老同学（你称其“老汉奸”我也不反对）来拜访我，我决不会像你那样把他轰走了之，并非我的涵养功夫好，我相信真理是驳不倒的，我倒要问问他：“你如此胡说八道，究竟居心何在？”他不说个明白，我就不放他走，我要用事实驳得他心服口服，给他一个深刻难忘的教训。

我常想，中国经历几千年的大风大浪、兴衰变迁而一直稳固地凝聚成一体，并且一直保持着伟大民族的生机和活力，炎黄子孙一如既往的爱国精神起着重要作用。热爱和献身于自己的祖国，这是古往今来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所具备的起码的道德品质。我长期在广州工作，1841年，广州三元里人民“少壮争御侮，老弱同赍粮”的同仇敌忾的斗争精神，一直令我感奋不已；台湾人民在反对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喊出的“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的口号，至今令人热血沸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你在文中说：中国人在美国社会至死都是个“美籍华人”，“不认同自己的民族只有做异族之奴”！这话说得太好了！在祖国命运之外去寻找个人的出路，无疑是行不通的。

谈到民族自信心，我不由地想到了鲁迅。鲁迅的民族自信心向来为我所敬仰。“九一八”事变后，有人发出“民族之自尊心和自信心，既已荡然无存”悲叹，鲁迅写了一篇题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杂文，回击了那种悲观失望的慨叹，他说：“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自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说得何等好啊，今天，中国的脊梁更坚强地挺立着，就因为拥有亿万并未失掉自信的儿女。前进的道路是曲折

的,大陆 40 年来出现过不少失误(我这个“右派”便是直接受害者),由于这些失误,国家没有能取得本来应当取得的更大的成就,人民承担了本来不应遭受的痛苦和代价。现在的问题是,在发生了这样的历史曲折之后(凭心而论,要想历史按直接前进那是不切实际的奢望),究竟应当怎样正确地认识和看待这些曲折。“中国还搞得好吗?”有人心存疑虑,由于失误所带来的困难和问题相当多,因而时有这类怀疑,我觉得不足为奇。有一些人眼里:中国那么落后,有什么可爱?对这种人我就不能原谅了。难道爱国能以祖国必须繁荣富裕为前提条件吗?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中有一名句:“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祖国落后,更需我们努力奋斗,这正是对每一个中华儿女的严肃考验。颜兄,你写的那一段令我读了为之动容:“40 年来,中国大陆是‘炼狱’。什么是‘炼狱’?就是经过火的洗礼,能够升入天堂。中国过去 40 年的苦难,是‘炼狱’的苦难,是有提升功能的苦难,是有建设性的苦难,是追求成就的苦难……40 年的苦难不是负面的,消极的,毁灭性的;它是中国的蜕变。”是呵,中国这只凤凰已经从火中再生了。

可惜不少中国人看不到或者熟视无睹。只要是不存偏见的人,都能看到不论曾经遭到多少严重的挫折,祖国毕竟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在全国范围有计划地进行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可以毫无夸张地说,中华民族已揭开了腾飞的一页崭新的历史。记得当年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归来,看到祖国的新貌,就深有感慨地说:这“不仅为百年来所未有,且为中国史无前例的新气象”。颜兄,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共识:坚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近年来,我对此每每撰文加以表述,并获海内外广大读者的赞同和好评,堪以告慰。

“中国的前途在中国大陆,在那 11 亿心含‘鸦片战争’之耻,心含‘八年抗战’之恨的中国人身上!”陈若曦也曾对我说过类似的

话,但看来还欠深刻。羊城深夜我们促膝交谈时,你就是这么说的。文章中的这段写得很精采也很动情,我反复读了好几遍:“他们衣衫褴褛地制造出原子弹、氢弹、中子弹,他们蹲茅坑却射出长征火箭,他们以捏泥巴的双手举破世界纪录,他们磨破屁股包办12面亚运划船金牌,他们重建唐山而成联合国颁奖为世界模范市……同胞们,他们为的是什么?没有别的:他们爱此‘中华’,他们不能让‘中华’再度陨落!……苦心孤诣胼手胝足,不仅流汗甚至流血地干,干,干!”读你这篇政论,我觉得像是在读一首热情洋溢的散文诗。虽有偏激之处,却是才华横溢之突出表现。跟你一样,我对这些脚踏实地、流血挥汗,用勤劳的双手,改变着祖国落后面貌的人,怀着最深的敬意。为了中华崛起,他们在无私地奉献着,在他们心目中,祖国的利益和荣誉高于一切!在他们身上充分表现出中国人民崇高的爱国精神、伟大智慧和创造力。“被耽误了的中国,只能由被耽误了的中国人来拯救”。颜兄,你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这句话吗?这是许多大陆人爱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每一个中国人都应正确估价和充分肯定自己民族所蕴含的伟大力量,看到这一点,能使我们在国家发展顺利,取得伟大成就时产生自豪感,又能使我们在国家遭到困难、遭受挫折时,仍然坚信自己具有克服困难,复兴发展的潜力,充满理想,并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努力奋斗。从中华体育健儿身上,世人清楚地看到了中国人身上的这种伟力(例如白先勇在北京观看亚运会时就被这一伟力感动到热泪盈眶)。23届奥运会上体育健儿取得了32枚奖牌的好成绩,中国在奥运会金榜无名的记录已成了历史,确实令炎黄子孙扬眉吐气啊!兄为亚运183人金牌而流泪,在那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我坐在电视荧屏前不禁诗兴大发写下好几首诗(下次见面请你指教)。

从体育事业的崛起,我看到中国的前程未可限量!成绩来之

不易啊,正如你所说,是“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换来的。你发的关于“蓝蚂蚁”的宏论,深得我心:“为建国却必须做‘蓝蚂蚁’,必须是千千万万的蓝蚂蚁,像蚂蚁一般单纯一致,……要讲求个人意志,要讲求个人欲望,个人利害,必然是蚁群四下溃散……”兄不但比喻用得生动,还含有哲理呢。说得是啊,众志成城,道理就在于此。文章尾声那段话尤其精彩,我读之不禁拍案叫绝:“中国的未来必能使‘爱中国’的中国人,不再是孤臣孽子式的悲剧人物;‘爱中国’的人,中国的命运,必会使他们变成崇高的喜剧人物。”对这一点,我也坚信不移。在读这篇文章时,我还为你严于律己的精神所感动,凭你这颗坦荡的赤子之心,凭你这奋臂一呼震聋发聩的举动,就算不得“逃兵”,“隔岸观火”了。我倒觉得你是个很有水平的预言家和鼓动家,真希望你这样的预言家和鼓动家多一些才好。文中说此时此地的中国,“民主”、“自由”是相对之“恶”,“自由”只会使中国涣散,“民主”只会使中国崩溃。对这一观点,我却不敢苟同。你我生活阅历、实践经验不同,看问题的角度时有异同,这是很正常的,希望我们有交流。而对祖国,我们都有着刻骨铭心的爱和共同的愿望与理想,这就是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思想基础,也是我读赏大作的原因所在。

我周围的年轻的学者都认为你火气大些,担心“江南案”重演;我则认为像我俩已到花甲之年已荣辱不惊,能为祖国捐躯,死得其所,有何畏哉!你送我的书,因忙于编写《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辞典》(100万字)及几本专著,致至今尚未读完。本来还想就读过的几本谈谈感想,看看这封信拉拉杂杂已嫌冗长了,留待下封信再谈吧。不过,我可肯定地说,台湾文坛称誉你是“十大散文家之一”,你是受之无愧的,我衷心祝愿你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敬祝

全家羊年喜洋洋

弟 亚曦手上

1991年3月3日于暨南园

(原载香港《文汇报》1991年3月24日-26日,《中流》1990年第6期)



## 真正的爱国者

——读颜元叔诸先生文章感

魏巍

最近《中流》杂志6月号上,以显著地位转载了三篇好文章。一篇是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颜元叔先生的《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一篇是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先生的《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还有一篇是暨南大学教授潘亚暾先生的《中华民族揭开了腾飞的历史》。《中流》编者说,这三位作者“胸中都跳动着一颗炽热的中国心”。确乎如此,只要你血管里还奔腾着中国人的血,你读了这样的文章就不能不怦然心动。

自从毛泽东同志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那一天起,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真正开端。四十几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没有不承认的。即是敌人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颜元叔先生说得好:“……40年来的中国,虽说走了一些弯路,但是除非是汉奸、除非是洋奴、除非是鲜廉寡耻的‘烂香蕉’(这包括那众多的心灵被西方殖民的华人知识分子在内),才会说40年大陆还在原地踏步,甚至倒退……”他还一针见血地说:“打开天窗说亮话,中国的前途不在台湾(什么叫做‘台湾经验’?可笑!),中国的前途不在港澳(殖民地岂是民族复兴基地!但大陆一民运人士竟然认为‘中国被殖民才能现代化’,疯子!不过他已自

称‘疯狗’!),不在海外华人,不在舔洋人后跟的学运民运小丑,中国的前途在中国大陆,在那 11 亿心含‘鸦片战争’之耻,心含‘八年抗战’之恨的中国人身上!他们衣衫褴褛地制造出原子弹、氢弹、中子弹,他们蹲茅坑却射出了长征火箭,他们以捏泥巴的双手举破世界纪录,他们磨破屁股包办 12 面亚运划船金牌,他们重建唐山而成联合国颁奖为世界模范市……同胞们,他们为的是什么?没有别的:他们爱此‘中华’,他们不能让‘中华’再陨落!”这话说得何等好、何等令人动情呵!在祖国的大地上,那些英勇献身的洒下成吨成吨汗水的创业者可以得到些许安慰了!

和颜元叔那种火辣辣的诗人性格不同,陈映真更近于理论家的冷静思维。他在举出极有说服力的论证后说:“即使是对中共最苛评的经济学家,都不能不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发挥了无法否认的成绩。”他对 40 年来的评价是:“而即使有过 1958 年‘三面红旗’、‘大跃进’,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那样重大的起落的转折,到 70 年代末,中共还是取得了这些不平凡的成绩(M. Selden 1990):消灭了以财产为基础的不平等,在城乡内部缩小了不平等;快速而巨额地增加了累积和投资,使工业显著发展,打下了重工业发展的技术和总体经济的基础;消灭了外国资本对中国现代贸易、工业、金融和财政支配;农业生产率初步超过了人口增长率;工人阶级获至实质和精神上的解放,收入、社会地位及福利有巨大增长。”这些对中国社会进步所作的具体分析和公允的评价,比起那些只懂得从人均收入上看问题的浅薄之见,是多么地高明呵!

对中国人民建国以来所取得的这些伟大成就,在基本态度上,是承认它还是贬低它、否定它,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这个问题最后势必归结到,中国共产党还能不能领导中国的问题。回顾过去,在这个问题上不是没有教训。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大家对“左”害都有切肤之痛,集中一段时间批“左”,以便认真汲取教

训,不再犯同类错误,是完全应该的,必要的。但是没有注意到,在长时期漫无节制的发展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乘隙而入,以批“左”的面貌出现,实际上攻击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大肆兜售资本主义的货色,其势力越来越大,否定的东西愈来愈多,否定的时期愈来愈长,最后发展到公然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本人进行诋毁和诬蔑;对建国以来的光辉历史大部否定或全面否定;给人的印象仿佛是共产党几乎没有做什么好事。其间虽然出现了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对错误思潮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从实际情况看,那些党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对这个庄严的决议根本不放在眼里,在他们掌握的报刊上,依然继续兴风作浪。一些理论刊物是这样,一些文艺刊物也是这样。那些泛滥成灾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集中营文学”,都渐渐发展成了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控诉。作品中出现的小小的支部书记,你都很难找到正面人物,把人民大众特别是知识分子都写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受害者。试想,在这种作品包围下的青年人,怎么会不受到消极的影响,走向歧路呢?所谓的“三信危机”,和这种宣传不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的宣传工作应当实事求是。尤其是涉及到党的历史,更应该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有多大成绩就讲多大成绩,有几分错误就讲几分错误。而我们往往为了突出现在的成绩,就把过去拼命贬低,甚至说得一无是处。其结果不仅否定了过去,也否定了现在,使整个党的形象受到损害。这是很失算的。

夸大错误,否定成绩,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破坏社会主义声誉的主要手段。他们多年来就想从这里打开缺口,以便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达到全盘西化的目的。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他们的同类也莫不如此。(你千万不要以为这种手段不屑一顾,长时间的混淆黑白,就会搅乱人们的思想,最后导致悲惨的结局。这种活生

生的例子,不是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吗!?)而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的人,或站在民族利益立场上的人,对于党和人民取得的成绩,总是抱热情肯定的态度,对其决策中的或工作中的失误,也是比较容易理解和谅解的。因为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需要从没有路的地方踏出路来,其间就不可能不出现曲折和失误。我多次举过长江、黄河的例子。我说,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长江也是千回百折,为什么它不一从巴颜喀拉山和各拉丹冬出来就笔直地流到大海里去呢?社会现象也是如此。天底下几乎没有一帆风顺的事情,事物的发展过程无不充满着迂回和曲折。例如人们经常指责和嘲笑的“大跃进”的确是一次大的失误,也确实造成了很大损失。但是你如果冷静、仔细地分析,也不是没有深层的原因。一个站了起来的人民,手中既掌握了政权,就急欲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这几乎是当时所有中国人的普遍心理。对于毛泽东这个一向壮心不已的革命家,自然更是这种意志的代表者。再加上 50 年代初期和中期,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三大改造几乎没有什么震动和损失就顺利成功,其他各项事业也都获得了巨大成就。往往过分的顺利就是挫折的先导,在这种情况下,难免就不那么谨慎了。这样就产生了主观愿望和客观规律的矛盾。加上对经济建设毕竟缺乏经验,后来就出现了这样的失误。这里我谈的都是主观因素,还没有谈国外的因素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当然,一个郑重的党必须从失误中接受沉痛的教训。但是站在历史的高处看,从历史发展的总过程看,这些失误毕竟不过是前进中的一个曲折。退一步说,即使像大跃进这样的失误,也不是从头到脚都是错误,没有成绩。且不说工农业的进展,我们的核工业不就是在最困难的年代加紧攻关,打下了巩固的基础吗?几年之后不就响起了震动世界的原子弹的爆炸声吗?如果要叙说全国万千座水库(它已经构成了我国农业生产的稳定因素)的历史,就

不能不从 1958 年说起。大家都知道的十三陵水库,现在已是京郊风景优美的旅游区,那不就是大跃进的产物吧?人们不会忘记,那里还洒下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众多领导人的汗水。可是对人民的事业一向冷眼相看的人,不管你用血汗换来多少成绩,他一丁点儿热情都没有,而对错误则千方百计地夸大,无非是要把共产党打倒在地,让她再也爬不起来。这里我想问一声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精英”好汉:凭你们那点本事,让你把中国革命重新领导一遍,你胆敢说就不犯一点错误吗?叫我看,这种人别说领导中国革命,要在战争时期,你叫他跟着部队行一天军,怕也咧着大嘴哭啦!时间是无情的,它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清了各种人的面目。我们既看到了像颜、陈、潘这些真正爱国者的可敬,也看到了那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可鄙!

一个人胸中燃烧着爱国的火焰,自然会觉得那些舐洋人脚后跟的叛逃“精英”可鄙可憎。颜先生骂他们是“猪油蒙心”的“可怜可鄙亦可悲的学运民运小蠢才”,真是骂得痛快,一点都不过分。可这一来倒真地把他们刺痛了。于是苏晓康就来了一个反击。只要你看看那个反击,你就会看出它是多么色厉内荏,苍白无力。我真没有料想,这个“小蠢才”竟堕落到这种程度,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他竟说大陆上“谁藏粮食就吊起拷打,甚至点‘天灯’”。这不是多年前出现在反共传单上的下流语言吗?过去我们在战场上不是经常缴获到这样诬蔑解放区的传单吗?现在也被他抄在这里了。苏晓康还说大跃进时期的几个月内就死了 2000 万人,等于抗战八年的死亡总数。这不是说共产党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可恨吗?而且他说这是“官方承认的数字”。我们在大陆多年谁也没听说过这样的数字,经向有关方面询问,也说并无此事。苏晓康的这个数字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他所说的“官方”究竟是哪个官方?因为现在的官方,既有他仇视的官方,也有他卖身投靠视若父母的官

方,这样的官方也许还不止一处。但是凡是有脑子的人都会想一想:当时中国才6亿人口,几个月就死去2000万,那就是说二三十个人中要死一个。苏晓康说那时是“易子而食”,他本人那时还是个娃娃,大概是出于某种侥幸才没有被吃掉。不仅没有被吃掉,而且还健壮地成长起来了,上了大学,成为能够写点儿像《河殇》那种电视片的作家。颜元叔先生说,看了《河殇》,无论剧中人摆出什么学者口吻、理性姿态,在“虚假的理论之后看到的只是‘不更世事’的知识孩童”!这点我有同感。我当时就感到好像一个幼儿园的孩子拼命拉开架势发表纵论天下大势的演说。既可恨可气又滑稽可笑。不过他现在确实进步多了,从《河殇》到这次对颜先生的“反击”,可以看出这个“知识孩童”已经颇像说谎话大话脸不红心不跳的反共老手了!这个进步的秘密,后来我看了台湾的报纸才明白:原来洋主人100万美元的施舍真叫没有白花呵!

苏晓康在他的这篇《对苦难漠视的残忍》中,一口一声大陆的“苦难”,斥骂颜元叔先生没有在大陆呆过,所以才这样残忍,说如果颜先生到长江或黄河边上住一阵子,哪怕是一天都会受不了的。但是,我倒想问问这个“小蠢才”:你真的懂得什么叫苦难吗?你见过旧中国卖儿卖女的惨象吗?你见过1942年河南饿死300万人的惨象吗?你见过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广大乡村是怎样搞“三光”政策的吗?你见过美国人在朝鲜丢下了多少炸弹,造成了多少孤儿吗?你见过日本人制造的“无人区”和美国人在南越制造的“战略村”吗?是的,这些不久以前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你全没见过,全不知道,也不愿知道,你但凡多少知道一点儿,也就不会被“猪油蒙心”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苦战所得到的独立和解放,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和解放,其革命的深度和广度,是没有多少国家可以与之相比的。人们常常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民主革命的光辉代表,其实长达28

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比法国大革命要深入得多和彻底得多。中国人民得到实际利益是有目共睹的。纵然目前人民的生活还不能说十分富裕,但比起旧中国,那简直是天壤之别了。旧中国人民的平均寿命是35岁,现在平均寿命是70岁,这不是活生生的事实吗?现在我们的青年身强体壮,身高普遍超过他们的父辈,这不也是事实吗?更重要的是过去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已经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正是由于这种根本变革,才使得人民从来没有这样心情舒畅,意气风发。那种长期被压制的生产力,像地下的岩浆冲天爆发出来。中国的各项事业在短期内所以能出现奇迹般的成就,其奥秘正在这里。在这些问题上,苏晓康们是既不懂历史,也不懂现实。如果人民像苏晓康说的那样每天都觉得自己在受苦受难,能释放出这样的能量吗?那些奇迹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在旧中国为什么就出现不了这样的奇迹呢?抗美援朝的胜利,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苏晓康辈须知,手执劣势武器的战士,并不是谁用鞭子赶着前仆后继,压倒现代化的敌人的。这些本来都是一般中国人最基本的感情,然而苏晓康辈身上没有,而且感觉相反。也许他们喝“蓝色海洋”的水喝得太多了,已经失去了一般中国人的人性。

读过颜元叔三位先生的文章,再次使我深切感到,爱国同反帝是两个多么密切的命题。其实,一部中国现代史已充分说明,凡是真正的爱国者没有不反帝的。反过来说,凡是在反帝立场上模糊和动摇的人,也很难做到真正的爱国。可以说,中国近代的爱国思想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而强烈地激发起来的。帝国主义和我国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不反帝何以救国呢?又何能称之为爱国呢?从三位先生身上可以看出,他们爱国的思想如此浓烈,正是因为他们反帝的立场十分鲜明。反过来说,正因为他们看穿了帝国主义的狼

子野心,他们的爱国热情才如此炽热。而且应当指出,帝国主义同中国的矛盾,并不因中国的解放,并不因大陆上驱逐出帝国主义的势力就结束了。这一点,颜、陈两位先生都有洞察。颜先生在《盘古龙之再临》中说:“时至今日,东方还是东方,西方还是西方;中国还是中国,非中国还是想吃掉中国!外籍的个人可敌可友;但是作为国,作为族,中国与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则永远是死对头!”陈映真先生的文章则通篇都是从世界帝国主义同第三世界的矛盾来阐明问题,中国自然是第三世界中的一个主要棋子。他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第三世界的穷人,在建设自己国家的同时,不要失却了“与世界穷人同舟一命的认识”。他还说:“西方正以低廉的费用,吸引大量的大陆知识分子进行高效率的、精密的洗脑,和60年代、70年代以来的台湾一样,大陆知识分子到西方加工,塑造成一批又一批买办精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举出的这些事实,看来是很值得已出国、想出国的青年学子们警惕的吧!此外,他提出的不要忽视阶级分析的意见,也是值得我们十分重视的。

民主、自由,是近几年被搅得最为混乱的题目。反共分子,叛逃分子,以及大小汉奸卖国贼、烂香蕉,莫不以民主、自由相标榜。颜先生斩钉截铁地提出:“为历史上此刻的中国,我胆敢高呼:反民主!反自由!反西方民主!反西方自由!”话说得如此激烈,无非是想让一些糊涂人清醒清醒。这里说得很明白,反的是西方民主,西方自由。也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自由。他之所以说得如此痛切,是因为他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体会得太深了,彻底地看穿了。当然,他不是指社会主义民主,而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必须日臻完善和充分发扬的。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本性所决定的,而且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而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是我们一向鄙视的。我们认为,民主、自由,决不是一个空



家伙，它首先要有经济内容，也就是要建立在人与人经济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要消灭剥削、压迫、奴役，要人人都有饭吃。单是这一条资本主义就做不到。有人把美国看作民主、自由的天堂，它的数百万无家可归者也只有挨饿的自由。经济上如此，政治上他们有实质上的自由吧？也没有。朝鲜战争时，我曾到俘虏营中调查访问。我同众多的美俘谈过话。可以说几乎 100% 的美军士兵是不愿到朝鲜来打仗的。尤其是那些刚刚参加过二次大战的老兵，怀有强烈的不满。但他们的自由最多也只是骂骂杜鲁门，此外，别无他法，最后还是得乖乖地到异国他乡来当炮灰。一些糊涂人只看到美国议会上可以互相对骂，可以掷墨水瓶，就以为这是令人陶醉的民主了，其实，这样的“民主”、“自由”对人民毫无用处。现在美国正是用这样的“民主”、“自由”，作为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武器。颜先生看得很透，美国用“自由”、“民主”的口号，是要“企图分化我们，打散我们，划割我们，制造我们的内部矛盾，让我们互相抵消”。现在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就是这样吗？人民面对着政治分裂、经济崩溃、思想混乱的困境，往往苦笑着说：“我们这里除了自由，什么也没有了！”这是多么痛苦的教训！经验已经证明：在当前这个历史阶段，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才是唯一可以选择的最理想的政治制度。它既包含着对广大人民群众充分民主，又包含着对一切反动力量的专政。两者构成了完整的统一。我们应该使这个制度愈来愈完善，愈来愈成熟。民主与专政两者不可偏废。但是现在两个方面我们都还做得不够，不仅民主不够，专政也不够，现在种种社会丑恶现象的出现和得不到有效的防止，就是证明。因此，我们在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都要做出足够的努力。不管帝国主义分子和反社会主义的小丑如何叫嚣，我们只能沿着人民民主专政的路线前进，决不能听信他们的胡说。

最后，我还想顺便谈一下近年来出现的“振兴中华”的口号。

提出这口号的用意无疑是好的。但是如果以为中国革命取得的震撼世界的伟大胜利和几十年的创业都不算“振兴”，那就不能令人同意了。陈映真先生就说：“1949年中国的革命，对于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不发展国家，是一个仍然必须付出艰难而巨大的努力犹难予取得的成绩。帝国主义的支配被彻底驱逐。和帝国主义内外勾结荼毒民族发展的国内反动势力被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过了根本性构造改革。中国成了她自己的主人。”难道这些都不叫振兴？这样就把中国革命胜利的意义和含辛茹苦得来的建国成绩全看得太低太低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上的发展还远远不够，还要做很大努力。这只不过是一个继续发展的问题。如果把1949年建国作为中华民族已经复兴的起点，把此后的发展看作是持续振兴的过程，那就比较适宜了。颜先生高声赞美盘古龙之再临，我看这是除一小撮卖国贼之外全体炎黄儿女的心愿。而且我将预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已经重新腾飞的盘古龙，定将为全人类带来更为辉煌的贡献，也将为我们的民族带来远远超过往昔的光荣！

1991年七一前夕

（《中流》1991年第8期）

# 盘古龙之再临

——答苏晓康先生

威斯康星 Wisconsin - Madison 英美文学博士 颜元叔

“11亿中国人像长江像黄河，日夜奔流，不会为难止步，不会为谁停留。它会灌溉你，也会淹死你——看你置身什么方位。中国之存在，岂不是为了取悦世人的！只会冬眠不会死的盘古龙，这是你第几度觉醒？第几度降临？”（拙作《忆长江》）

苏先生，昨日才读到你在香港《信报》骂我的文章，从一方面说，你骂得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大陆同胞过去三四十年既然如此受苦受难，甚至牺牲性命，而我却在一旁鼓掌叫好，看似我是太残忍了。苏先生，容我先告诉你一个私人故事：我是独生子，自幼跟表兄刘超一同长大，虽是表亲，实同兄弟；加之超兄生性鲠介，判事有独到之明，数学生来天才，令我自小就对他十分崇拜。40年前，我们来台湾，他留在大陆，文革的时候，在沈阳东北工学院做教授时被红卫兵整死（关牛棚二十余天，放回家就死了）。他的死对我打击甚大，一时冷冻了我对大陆百分之七十的热情。我日夜苦思苦想，我的童年的哥哥，就这么去了吗？就这么平白无故的死了吗？就这么白白的完了吗？在这种绝望的低回中，我想，人死不能复生，但是，他的死总该有点什么价值，有点什么意义才是吧——就我个人言，才能给我一点点安慰。我试图为死者扳回一点什么，

想给他的死赋给某种意义、某种价值，于是，我这才可以说“发明”了这个“炼狱”的说法：刘超之死应该视为一种牺牲，一种祭献，是在中华民族大祭台上的一头羔羊之死。

上面这段话，让普通人看了，也许会说我莫名其妙，荒诞不稽；你是有学问的人，你当然知道我的立论是凭藉什么“原始类型”。耶稣死在两个盗贼之间，死得如同任何血肉凡人；但是圣保罗说他复活了，他的死乃被说成一种牺牲，他死了乃成了“舍身赎人”的奉献？！死亡的意义或由自己肯定，或由后人确立——死亡的意义是可以被发明或发现的。苏先生，我是不忍让在这个大激变中死去的千千万万中国人，不忍让他们死得无价值，死得无意义，我才把他们从地狱打救出来，提升他们到炼狱！

我不忍只说“死者已矣”，死了就算了；我们总该替那些亡魂孤鬼，在中国历史上找个位置，让他们在中国历史转变中找一个栖息之地。我们不能老是无益而无用地诅咒，诅咒，诅咒，诅咒，因为，你在诅咒杀人者的同时，非常反讽的，你也诅咒了被杀的人。就像我的表兄刘超之死，你假使只抓表层，认定是一群无知的红卫兵的谋杀、滥杀，或误杀的结果，那么刘超之死就像在路上被车子撞死一样——一个偶发的死，在人类的价值格局中就找不到坐标！

然而，给刘超与像他的千万人之死赋予价值，也不是纯主观的假设，纯自慰的虚拟。我的价值之赋予是以历史为根据的。40年过去了。如今是可以从历史的远近景中，去解说过去，诠释过去，赋给历史以意义的时候了。看历史，只能宏观；看历史，只能抓住两头，抓住“始”，抓住“终”。那么，当我们要赋与这两千万死者——还有亿万未死者的苦难——以意义的时候，我们只有从今天的中国看，从明日的中国看。对于今日明日中国的看法，你我会有许多争议。然而，也许一位原属“左派”现转右派已入美藉的某华裔科学教授的话，有基础性的公允，他说：“当然喽，中共统治大陆

至少做到了两点：把帝国主义赶出去了，把中国真正统一起来了。”我想这该是最低的评分吧，我想再加两项：“把中国的国力提升到国际水平，把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我想这两项，你也不太能一言否定吧，那么，假使有这四项成就——甚至只算前面两项——你说，这是不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梦想的初步实现？数不清的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的不就是这些？！

既然今日中国有这四大成就，那我们在赋给三四十年来这两千万死者与亿万苦难者以意义时，我们还不必像圣保罗那样凭空立论地肯定耶稣之死的价值。我们可以像今天的基督徒，以基督教文化席卷半个世界的成就，来坚持耶稣之死的价值。是的，两千万中国人没有白死，千千万万的未死者的大苦大难，没有白受：他们的死亡与苦难是因，今日中国之成就是果。他们的牺牲（管你自愿不自愿），才创造了今日之中国，乃至明日之中国！这不是历史事实吗？今日中国是怎么来的？难道不是这样来的？既然有这样的果，在土壤中的一切该都是它的因。苏先生，我是这样地从历史的流变上，打救我们的死难同胞与苦难同胞，让他们的死与苦在中国历史上 mean something！你说，我这样做是残酷的吗？你说我这样做是幸灾乐祸的吗？至今我收到二十余封大陆同胞的反应信，多数来自五六十岁的人，他们经过这 40 年，而他们都肯定我的说法，没有一个例外——唯一的例外就是你！而你呢？你假使把他们的死与苦，定位为暴政下的无谓牺牲，像希特勒杀犹太人，你是残酷地不肯赋给他们的“死”以任何意义，不肯赋给他们的“苦”以任何价值，不肯在历史的神庙替他们立一方无名英雄碑！你在你自己发泄了一番情绪之后——是大公的人道情绪还是自私的政争情绪——你给我们这些死难者留下了什么？！他们死了，你将他们再打入 limbo（一个无意义与无价值的死域）。

不谈玄理，且落实在现实中。什么成就不需要牺牲？！小成就

小牺牲,大成就大牺牲。要把中国从那种落后的境界推向现代世界,这牺牲必须惊天动地,才能有惊天动地的成就。理论上说,这一切的牺牲既属必要,因此该牺牲也就牺牲!但是,实际上,我们必须承认,有些死亡与苦难显然是不必要的,应可避免的。可是,一部开山机推过来,该推翻的被推翻了,不该推翻的也一齐给推翻了。时代的巨变是全面的,无选择的。欧立德(T. S. Eliot)的“三王朝圣”说耶稣之降临,毁掉了坏的,也毁掉了三王手持 S. herbert 的优美生活。叶慈(W. B. yeafs)的“二度来临”中的宇宙魂巨兽带来巨变,是善恶不加抉择的。我是以这种模式看中国之巨变。固然,这巨变引发多少血泪,然而巨变是历史之必须,不变则中国不会变。而且,在人的良知指引下——若非全部指引,至少是部分的指引——这巨变乃是从坏变好,从旧中国变到新中国。

你身临其境,你对中国的了解应该比我多,比我更全面。以我三四十年来对大陆的遥观,从前只知道大陆爆了原子弹,后来又听说射了东方红卫星,近五六年来,两岸信息较灵,我乃发现大陆的成就不仅止于“穷兵黩武”的那些硬东西,她的成就还是多方面的,甚至可说是全面的。我看到那些软性的成就如动画“牧笛”,我看到制作“牧笛”的几位形容枯槁的制作者(而电视上的你之白晰丰润,简直好像跟他们不同类族!),我大叫:“竟是如许的丑陋涌出如许之美丽!”我几乎扑倒在那几位比屈原还要憔悴的中国艺术家之前!他们的枯槁血肉与精美成就,最足以象征现代中国之苦难与荣耀。

几个月前,我在录影带出租店无意碰到一卷《丝路花雨》的歌舞剧,居然是甘肃歌舞团演出的。从前的甘肃能有什么文化?除了玉门关,左公柳?然而这卷录影带一看之下,我不得不折服,今日之甘肃竟有这等艺术。再说,70年代北京有沙漠化之虞,80年代北京春季沙暴从三十天降至十余天,而今年好像只有一天的大

风沙(吹掉了咱们陈长文先生的眼镜)。这种绿化环保的成就,你不在乎?“三北防护林”多雄伟的大工程,你不在乎?1990年起,“长江上中游防护计划”开始了,四川的一位先生来信说,数年内必见成效。这些远景,你不在乎?中国产煤已世界第一(一百年来一直是美国第一),钢铁产量世界第四,棉毛麻丝产量全部世界第一,你不在乎?11亿人口基本上获得温饱,这种空前的成就,你不在乎?你不在乎这一切,你跟你那一小撮民运学运分子,似乎全不在乎,你们只在乎“民主”——而且是“美式民主”。其实,民主易求,你去40年前,抗日以前的上海租界去寻求就好了;再不然,今日香港也听说有民主,而且非常英式,你去香港享受民主好了;再不然,欢迎你再来台湾,来享受一下台湾的打架民主。好美丽的香格里拉!多可爱的香格里拉!打住情绪语,重归理性话;历史因缘的凑泊,使“民主”与“殖民”在中国变成了一条铁道的双轨。在民主霸权的环伺下,打开民主之闸门,流入的必定是西方民主;而西方民主之流入,不可避免地,必然带来西方的殖民,西方的帝国势力——正如同鸦片战争为基督教打开中国之门(见P. W. Fay的《鸦片战争》)。所以我们必须先甩脱殖民,自立自强,而后方能有真民主——不听命于民主霸权的“民主”。于是,你该知道民主化在中国建国的程序上该占有的先后位置。

苏老弟(你既然称呼我为“老先生”——诠释为“老糊涂”?“老朽”?“老贼”?实则我只应算是快毕业的少壮派,虚度春秋五十有八),不等你骂我,真的,我早就想骂你了——自从看了你的《河殇》。你说何新被李鹏御用,我觉得你跟你的《河殇》明显地被赵紫阳御用。我看完《河殇》,第一个感想,就是你在替赵紫阳的经济政策做宣传——是一部公关影片。赵紫阳的经济政策应该还不错。宣传推展他,应该就事论事,直话直说,犯不着来一套什么“蓝色海洋”的理论作为说词;在别的事物上理论理论也许不打紧,在这里,

你跟你那一群,不知轻重地为了一个经济政策,赔上了整个的中国传统!你们把盘古龙给屠了,再把黄河给填了,又把几位代表民族气节的漂流死士给鞭了尸,然后把郑和的舰队给一艘一艘戳沉了!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搞沿海经济特区,搞外贸!经特外贸毕竟是有时而尽的政策,而你却不惜把永恒的中国去作支付!你太不平衡了,你太不知道传统之可贵。你只看见一个一个铜板的价值,就把一荷包珍珠丢掉,去换一只猪耳朵!

30年来的锁国政策,好好坏坏的效应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令像你这种高级知识分子变成了大观园中的刘姥姥。一旦目击外面的世界,无论西洋或东洋,你们就崩溃了,脱尽撕尽自以为的“满身褴褛”,一呼一跃,跳入了向往不已的“蓝色海洋”——其实那里面载浮载沉的全是资本主义消费文化抛下的塑胶罐!塑胶袋!

我看完你的《河殇》,无论剧中人摆出什么学者口吻、理性姿态,我在你们的虚假理论之后看到的只是“不更世事”的知识孩童!(于是,我当时在中央日报副刊就以“《河殇》之伤”痛斥了一番。)好像时轮未转,你们的头脑尚处于清末民初——甚至更早期的——襁褓中!到今日还来暗搞全盘西化,还来搞民族虚无主义,未免是还在崇拜维多利亚女王的发式吧。如今你,苏老弟,你在西方世界也待久了,你可知道人家是如何的敝帚自珍!只要是自己的,只要是自己祖宗传下来的,死的能说成活的,坏的说成好的,假的说成真的,好的说成最好的,真的那当然就是放诸万世而皆准的真理喽!人家是怎么“敝帚自珍”,你们却是怎么“珍帚自敝”啊——这话好像说不通,你但知其意就好。“敝帚自珍”的人创造了帝国,“珍帚自敝”还要留恋上海租界之民主,殖民香港之民主——伟大的名言是 *Medemization through colonization!* 我把这个词儿解释给一位美国教授听,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因为更令人惊讶的还在后头!



我的朋友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六四”之前数日人在北京，也凑热闹去宣慰天安门广场扎营的学生。他跟他们演讲，谈民主，谈自由，谈到最后，他说：各位同学应该适可而止，不要把事闹得不可收拾。聆听的同学们——中国未来希望之所寄——立即反驳：“我们就是要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好让美国出兵！”突然间，成教授跟我说，他好像跌回百年，跌回八国联军进北京！中国的知识分子，你们的脑细胞究竟是什么“异型”构成的哟！这等卖国言论、卖国思想连正常的三岁孩童都不会有，而北京的大学生有，这是不是你们教唆的？（此事你若要求证，拨个电话给成教授好了。）

你们似乎昧于一个事实：时至今日，东方还是东方，西方还是西方；中国还是中国，非中国还是想吃掉中国！外籍的个人，可敌可友；但是，作为国，作为族，中国与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则永远是死对头！从古到今——我敢说，在未来的千年，国与国，族与族的利害总是磨擦，总是矛盾，总是冲突——尤其是当美国这个傲慢的恶霸企图主霸全球的时候！天下有什么国家，真是友邦？！为什么美国派布什去作北京办事处主任，派李洁明作大使？而他俩都是中情局的大头目。中情局是干什么的？拉小夜曲娱你之耳的？卖炸鸡娱你之口的？你们的代表人物方励之，怎么可以跑到李洁明的鸡翅下躲起来！这不太 obvious 了吗？

近来台湾报纸恭贺地报导你们这些民运学运人士（而且还附照片）终于在普林斯顿大学落脚下来，通过一位华裔美籍鸿儒，接受着华尔街一位股票商一百万美元的供养（其实，何不学穷留学生以洗碗盘刷厕所维持生计——当然，这不是你们各位民主斗士憧憬的 Lifestyle——你们是要吃甘乃迪龙虾，喝密特朗香槟，在纽约长舞达旦的）。把你们看成政治难民，只是政治斗争中挤出来的“粉刺”，吃谁的饭原也不必挑剔——面包实在是活着的惟一条件——别听耶稣打高空。问题是各位女士先生，自命为中国之救世

主！如果果然而又万一，各位有朝一日真把中国给“救”了，你想那位华尔街的股票商能让你们忘掉旧恩？你们各位这么善良，又怎会对恩主负义？！当你们各位以“美式民主”（要不要加几枚美国飞弹？）“救”了中国的光，你们所痛恨的毛泽东的尸体当然是要烧掉，留下那个空位，放谁的尸体呢？华尔街的那位恩公？林肯？甘乃迪？布什？索拉兹？莫洛西？还是“民主女神”？告诉你，当你们推出“民主女神像”之当时，台大外文系美藉客座 Professor Maglila 对我说——诚恳地，略带嫌恶地说：“他们大概想拿美国绿卡。”此事亦可直接求证。苏老弟，我看你们是被世人“误解”得太深了。何不做个单单纯纯的“中国人”？阿门！

（原载台湾《海峡评论》1991年6月号，《中流》1991年第8期转载）

# 一片冰心在沸腾

——驳“牧惠”

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教授 颜元叔

早在年初,北京的《中流》已把牧惠的文章《为什么〈中流〉引进个颜元叔?》(这个“个”字好厉害,把我物化了)寄给了我。我觉得它的份量尔尔,在忙碌中没有抽时间答复。今年八月台北的《联合文学》居然重刊了这篇文章;两位朋友转知此事——因为我自己从来不看《联合文学》——好像牧惠在大陆骂我之不足,还要追到台湾来骂!现在,为了满足牧惠先生老缠不放的拗劲,我就来答它一篇,免得落个“沉默的傲岸”或“傲岸的沉默”之讥消。

既然提笔上阵,我想把火线拉大接宽一点,不完全囿于牧惠那篇文章已经划定的范围,不跟牧惠作私斗——这只会是浪费时间的事。所以,我想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谈谈牧惠那篇文章所引发的一些省思:一、从历史与国际看现代中国;二、牺牲与成就的逻辑;三、鲁迅在当年之作为破坏力;四、美国民主自由与美国企业组织。

## 从历史与国际看现代中国

牧惠的文章给人一个感觉,就是他的思考范围完全封锁在中共建国后这四十余年之内,甚至集中在“大跃进”与“文革”那较短的时期之内。他的目光集中在主观选择的事物上,以主观的情思

来观照这些事物,其结论虽则可像胡桃般坚实,却会像胡桃仁一般扭曲。国家之事,中国之事,必须如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所说,“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甚至从更早的“自利玛窦到中国以来……”。假使我们拉开时间的长卷,看历史的大轨迹,大流变,我们便可以看出:中共加诸于中国的大革命,是一百五十年来,甚至宛近数百年来,中国人所渴求的、中国之所必需的大革命。没有这次大革命,中国会一直处在利玛窦吹拂起的西风下;没有这次大革命,中国会一直处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中,香港会永远是英国王冠上的一颗明珠,中国颜面上的一个烙印;“振兴中华”永远只会是仁人志士的口号。中共所加诸于中国之大革命,是百余年来中国大大小小革命、各式各样改革的总结;是中国全体人民在颓于羞耻、陷入迷惘、继以悲愤、终致于洒尽热血抛尽头颅的总结。没有这场大革命,没有这40年来的大变革,不会有今天的美国已视中国为其最大假想敌;不会有世界货币银行的预测,中国在20年内将成世界第一经济超强;不会有1993年6月15日《洛杉矶时报》的专刊:China: The Giant Awakens(中国:巨人醒了)。

牧惠与中国的“牧惠族”,由于客观环境使然,被封锁在较短的时流内,较狭的空间里,他们的所见所闻,乃至亲身的体验,可能是某个共干的横蛮,某个领导的跋扈,某次斗争中自己或他人的伤害,甚至大局面的破坏,如大炼钢时大伐森林,文化大革命时的大砸烂。这些都是事实,甚至是血淋淋的事实,无人可以否认或文饰。但是,当这些“坏片段”与那些牧惠族所不愿提起的“好片段”——而“好片段”远大远多于“坏片段”——结合在一起时,它们便形成了四十多年中国这条苏醒的巨龙的鳞片!而若干在一时一地若若干人眼中被视为的“坏片段”,当它们被纳入历史拼图的整体,被流变的时空所转化,它的“邪恶”表层褪尽,而成为闪耀的巨鳞(我不是在这里说神话,且看那大运河,究竟隋炀帝是中国的罪

人？还是功臣？也许是一时的罪人？也许是千古的功臣？历史经常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变化——也许唯一的历史邪恶就是“什么都不做”(inaction)。

我们身处海外的华人，在一定的距离之外，看自己的祖国，是看她的整体，看她的大形势，看她的全面流变，看她的历史之昨天、今天与明天，看她处在世界大格局中与其他国家的相对比例，相对大小，相对强弱。这种远距离的全景视野，不是相对于近距离局部视野的另一种视野而已，它实在是历史与国际(纵深向度与横断向度)所能接受为可作推算与可资评估的唯一视野。这个视野可以比较准确地估量中国，估量历史中与国际间的中国。其实，就是身在其中，身囿国内的人，也必须提拔自己，凌空观照，取得这种全景视野。因为，这个视野才能看出中国之整体，中国之大方向——特别是在国际格局中之中国。因此，我不否认或低估牧惠与牧惠族的亲身经验与因之而发的反应；但是，显然他们的视野是局部的，短暂的；在历史观与国际观下，这个视野变得无价值，无效应；时空一变即遭遗忘或成泡影。

自利玛窦以来或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一直追求奋斗、奋斗追求，始终只有一句话：“振兴中华。”试问这句口号，在 50 年前的漫长岁月中，实现了多少？在这 40 余年来又实现了多少？50 年前，有哪个外国看得起中国？今天有哪个外国敢于轻视中国？再过十年二十年谁能不仰视中国！这是海外华人的看法，这也是国际友人敌人的看法。为什么当整个中国在如此大跨步走上“振兴中华”之路，当长征三号火箭为澳洲送上卫星，当王军霞、曲云霞打破世界纪录时，当数不清的大小成就出现在奋起的神州之际，为什么还有像牧惠与牧惠族这样的人，总是为中国吹奏着挽歌？总是抱着自己不知哪年招致的旧伤与积怨，责怪全中国未曾为他一洒同情泪？总是看着小处忘了大处？看着个人忘了全体？看着过去

忘了今天与未来？

## 对牺牲与成就的认知

牧惠与牧惠族似乎最不能原谅我的地方，就是我说我的老友傅孝先的姐姐，一位科学家，以 52 岁的壮年，死于过度工作，我说“死得好”！扩大起来说，一切为建设中国而牺牲的人，都“死得好”。他们认为我是幸灾乐祸，麻木不仁，残酷冷血。从单纯的人情看，也许的确如此。就像牧惠所言，在那些艰难的岁月中，许多科学家都是待遇太低，营养不良，工作负荷太重，以致夭折——这种情况如今还时而有之，我也在“长征号今夜起飞”中看到，当年研发火箭的科学家最好的营养品是发了霉的窝窝头！令人惘然凄然！中国的科技人员，乃至一切建设中国的有名无名的英雄们，在那种艰难岁月所受的大辛苦大创伤，这是任何人不能不承认的悲剧。那么，回顾这个悲剧，我们这些后来人应该怎么去面对呢？是不是我们只该执著于这个问题的“苦”与“死”，然后在敢言与不敢言之间悄悄暗示这是政府的恶政败德的结果，这是毛泽东凶狠跋扈的结果，这是中国共产党罔顾人道草菅人命的结果？假使我们为这些问题都作了肯定的答案，我们的政治性图谋是成功了：中共该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失败了：我们把这些我们所敬爱悲悼的死者归类为“暴政下的牺牲者”。他们死得没有价值，死得没有意义。这种思考是政治性的，它的目的在于攻击“暴政”，不在于尊敬死者与肯定死者的价值及贡献。——而事实上，他或她们是做了大贡献，留下大成就，死得有意义、有价值。若是把他或她们视为“暴政下的牺牲者”，这毋宁是对死者的亵渎与侮辱！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没有政治图谋，我不想借别人之死一遂自己的政治意志，简言之，反中共。我只是一以贯之地从“振兴中

华”这个大前提下看问题,佐之以一个小前提:“有成就必得有牺牲。”我肯定这些人的生死正是向这个大前提所作的付出。条件许可,他们能在高待遇高享受下为国奉献固然是国人之所愿;条件不许可,缩衣节食,甚至餐风饮露,照样要为国奉献,为一百五十年的苦难中国作奉献,这就更显出他们的爱国热情,这就更需要我们顶礼膜拜了!也许,你会反驳:噢,你中共政府要搞原子弹、氢弹与火箭,就叫他们来牺牲!你无人性,不人道!可是,你怎么知道这搞两弹一箭的人的希望不是他们自己的希望?不也是中国人一百五十年来希望?你怎么知道为两弹一箭奉献牺牲的人不是这一百五十年来渴求“中国强”的中国人的标兵代表?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正为着能实现这一百五十年自远祖传至自身的热望,能在自己手中完成而倍感自己这一辈子活得太值得!死得太“好”了!能不死,活下来与国人共享两弹一箭的荣耀,固然是当事人与同胞们之所深愿;但是,若果累死、辐射死、炸死,总之死而留下这一百五十年来举国同胞大愿望的结晶,亦死可瞑目,因为这辈子科学研究得使民族大希望得以大实现,所以死得值得!

中国的文人被中国文学的生死悲欢离合的题材蒙误了,总觉得死是绝对的,若铁板,若岩石,到此为止,没有背后意义。死就死了,死是大绝灭,大溃崩,大大的“零”。其实,我们也有“死有重如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说法,暗指死的价值,死后的意义。那么有人为什么把死总是看得那么缺乏价值?应当肯定的是:当生命是为成就付出去的时候,这死就是比生更高贵更有价值。不如此看,我们何以面对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千千万万的文明烈士?千千万万为建设国家而付出生命的建设烈士?他们的死有价值,因为他们的死换来了成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成就”照汗青。牧惠与牧惠族把他们的死看成“歹死”,显然是想通过“歹死”将死换来的成就视为“无成就”,“非成就”。不过,这么否定下来,他们就否

定了一百五十年来中国人的意志,否定了中国人的渴望之合法性,否定了“振兴中华”的中华大愿!那么,牧惠与牧惠族是站在中国人这一边还是反中国人的一边?(其实,两弹一箭最先是美国人搞出来以称霸世界的;假使若干中国人出于任何情操或立场反对搞,那么这些中国人为什么不以同样的崇高情操求之于美国,求他们不要总是两肋夹弹以骑跨别人为乐呢?!)

其实,最简单普通的中国格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就够说明一切了。最大的苦莫过于死,其次是流血流汗,日以继夜不断地干,这才能期望“振兴中华”。只有不回家过年的人,才能破世界纪录!中国人从前追求安逸,如今追求成就;中国人从前追求平山远水,如今追求波澜壮阔——因为中国人醒了。小成就,小牺牲;大成就,大牺牲。原意把性命抛舍,才能做开天辟地的人。这是铁的逻辑!于是,在这么一个大考虑下,说营养不良就显得偏离主题——衣食住行只是技术性的问题,不该因之质疑大原则。今日不是大家都吃穿无虞了吗,那又何必老抱住过去一时的技术困难,企图以之否定永恒性的原则呢?

### 鲁迅在当年之作为破坏力

牧惠在文章里大引鲁迅(好像要用鲁迅的威望把我压死),说鲁迅当年一再抨击中国,批评中国,对中国是好事,是真正爱护中国。又说鲁迅见到骂中国的外国人,视之为友;见到赞美中国的人,反而怀疑他的居心,视之为敌。因此,牧惠引伸,我既然一味的赞美中国,是害中国,居心叵测。

我们大家都知道,当年鲁迅用杂文加小说,吹打弹唱,冷嘲热讽,是把当年的传统中国骂惨了,他和他的“鲁迅族”终于把传统中国给骂垮了。可以这么说,毛泽东在延安推旧中国的屋墙,鲁迅在



上海挖旧中国的屋脚，一上一下，联手合力，把国民政府赖以存活的旧中国推翻了。鲁迅配合毛泽东，完成了他的时代使命。

牧惠先生似乎跟传统中国的文人一样，或抱着孔夫子千年不变，或抱着鲁夫子百年不变。实际上，时代变了，中国变了，鲁迅的文化战略与战术也该改了。今日的中国难道还跟清末民初的中国一样，今日中国难道还要鲁迅死而复活，以杂文骂吃人的礼教，写小说讽刺土豪劣绅？牧惠捧出鲁迅的神主牌，未免是有点“泥鲁”了吧。考究鲁迅的心态，他是恨那个旧中国，他是想推翻那个旧中国，所以他拿起笔杆，就像毛泽东拿起枪杆，要把那个中国干掉！牧惠先生，在“泥鲁”之余，大概没有意识到鲁迅的终极意图？还是你意识到了而有意仿效？只是，中国已经被鲁毛联手打倒一次了，死而复活，爬起来，脚跟刚站稳，你又想来击倒她？！中国是一个“人”，不是练习拳击的沙包，不要一天到晚一年到头打她揍她掴她，打多了她是会死的。人不打固然不成器，打得太多太久也就打成死尸了。部分中国人到今天还是难以摆脱自我作贱、自惭形秽、自卑自辱的心态，部分原因不能不归于近百年以至于今天某些中国文人、知识分子、自以为先知先觉的读书人，残酷而无情地给予自己的祖国之毒恶搏击！是他们把中国骂得一无是处，骂得连一堆狗屎不如，以致骂得中国人、特别是年轻的中国人掩面自惭，自信丧尽，乃唾弃中国，跪舔西方！我在西方文化文学里打滚打了三十多年，在美国拿到英美文学博士，在美国读书教书九年，我从来没有遇到读到西方人像中国人作贱中国那样作贱西方！连莎士比亚这位很能超越的大文豪，对英国历史与利益却曲尽维护，时而变成一头“沙猪”（chauvinist pig）！至于现代美国知识分子，面对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之嚣张霸道，至多耸耸肩膀，表示无奈。（有没有英国知识分子为鸦片战争惭愧过？向中国人道歉？自知羞愧过？）——其实他们心中乐不可支，因为他们正分享帝国主义之利

益呢！天下人好像只有中国人是最会自省自贬自损自残的！其实，损人者也不是在自损。当鲁迅族在损中国的时候，理所当然地他们视自己已跃登高阜，超脱旧中国，居高临下地咒责旧中国。所以，他们损的不是他们自己，他们损的是他们的同胞；而辱骂同胞，是最方便，最安全，最惬意，最能满足优越感之举。“我超脱了，你们还在泥淖粪坑中，哈哈！”

中国人骂中国，外国人骂中国，中国人挨骂被骂也一百多年了。不说别的，就为了换个新调子，也该停止这种知识分子的耙粪游戏，开始找点好话说说。学学外国人，他们整天自吹自擂，敝帚自珍；他们谈自己，就算坏透，也坏得很男性、刚强、英勇；谈外国人，尤其是黄黑种人，就算有好处，也好得阴柔、可怜、无知！且看好莱坞的电影，上帝与撒旦全是白人，黄黑人总是被虐待、被迫害、被拯救的弱者！咱们中国人是个生来谦逊怕羞的民族，不作兴自吹自擂，那就有一句说一句，有好的就说几句好话吧。我那几篇牧惠看不入眼的文章，也不过是觉得中国有些好处，就为她说几句好话，如此而已。时代不同了，我不步鲁迅骂中国的后尘；中国曾被骂垮过，我不做损垮中国之事。何况鲁迅骂中国，我颜某赞中国，对象各有不同。鲁迅骂的是传统中国留下的各种消极与负面，我赞的是新中国的积极面与成就面。我赞赏的事情，其实我想也该是鲁迅会赞赏的。难道你牧惠叫我讽骂千千万万建设新中国的人，那是我疯了还是牧惠疯了？

实则，牧惠的终极心态可能同于鲁迅的终极心态。鲁迅已骂垮旧中国，牧惠则似在责我何不与他联手骂垮当今的北京政府？这种事我不能做。我虽与北京政府非亲非故（家父一直供职国民政府，我自己未曾见过一个北京七品芝麻官），可是我知道北京政府若是垮了，环顾中国内外，没有一个差一千步的取代者，其结果必定是五胡再度乱华，中华再坠！牧惠与牧惠族，要权衡，要珍惜

呀！今天的北京政府，你若不是从美国华府的观点来瞧她，她好像还蛮不错的。干嘛要骂垮它？为了出你自己的一口鸟气，你不惜毁掉全中国的命脉？

## 美国的民主自由与美国企业组织

由于我曾经喊出“反民主反自由”的口号，可说是犯了大禁忌；朋友们惋惜默尔，敌人咬住我的后跟不放。其实，我这么“反”，我有我的道理。就我看来，民主的对立点是协调，自由的对立点是纪律。民主政治是派别争利的政治，而自由经常只是人之兽性的放纵而已。民主政治据说涵盖两支：制衡政治与民意政治。现在就随便谈谈吧。

我在美国读书教书呆了那么多年，虽说专业在文学，对美国政治文化，耳染目濡，也嗅出一些味道。一般的美国老百姓，应该说是美国民主政治之所本，其实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他们的兴趣在于赚钱花钱与用钱买刺激。美国的运动事业，尤其是各种球类，非常发达，各种赛事一年到头层出不穷，吸引着举国的注意力，尤其是中下层阶级。美国人自己也说，美国的运动狂实则是美国人的政治意识之麻醉剂。大家醉心于打不完的球赛，打不完的拳击，哪有心情关心什么政治或社会问题！演艺传播是另外一个美国人醉心的焦点。这些刺激还不足，他们便吸毒。为什么全世界的产毒贩毒事业这么潮水般前赴后继，全是因为美国有最广大的吸毒人口！在这么多的“兴趣”让美国人醉心分心之余，何况还有谋生的工作占据了上班时间，试问美国人如何还能去关心政治？政治他们就让给政客们去专管，只到了四年一次要投票的时候，听政客们透过传播媒体的诱导，“很独立自主地”投下他或她的“神圣”的一票（请读美国名作家包可华对美国选举文化的杂文），投给没有选

择的选择：二（永远是一个民主党一个共和党）选其一（这算选择？）；而这两个候选人，真是天高皇帝远，素昧生平，唯一的印象全来自大财团控制的各式传播媒体。

1958年我去美国密瓦基的马克特大学读英文硕士学位，次年在该校亚洲研究所做助理。当时正逢肯尼迪竞选美国总统，打出the man for the sixties（60年代看我）的口号。肯尼迪来自一个大世家，是巨富，包了专机，免费招待记者，全国飞来飞去，到处活动。跟他打对台的是汉弗莱（好像是党内竞选），原是明大的历史教授，弃学从政，在国会中有藉藉名。可是他没有钱，来回竞选，只能买票搭客机；记者要跟踪，得自掏腰包，人数大减。结果，报纸电视几乎全为肯尼迪盘踞，汉弗莱聊备一格而已。

肯尼迪还有个大大优势，就是他有个漂亮而年轻的太太杰奎琳·肯尼迪。每次肯尼迪演讲或赴宴，她都出现在他身边，一语不发，只是眯眯笑，颇似一尊活观音。当肯氏这一对来到密瓦基作总统竞选时，我们所里那位平日从来不谈政治的美国秘书小姐梅里蕾，大学三年级生，突然向所主任请假，要求去参加肯尼迪的政见发表会。所主任吴博士说：“梅里蕾，你向来不谈政治，你去听什么政见？”梅里蕾说：“我不是要去听政见，我是要去看肯尼迪太太的发式！”第二天，她来上班，满口肯太太的发式，说周末她也要去发廊弄一个同样的。当年，肯尼迪夫人梳成一个德军钢盔式的发式，加上她那张俊俏的脸蛋，风靡了美国。据说，她就这样无言地坐在一旁，替肯尼迪拉到不少票。肯尼迪是胜了，成了美国第一家庭（据后来的传闻，肯尼迪与杰奎琳结婚之时即已约定，互不干涉对方的婚外情，因两人婚前早已各有所恋。但是，当时的竞选宣传一再把他们描绘成一对如胶似漆的甜蜜夫妻！）。

肯尼迪算是一位有点见识的总统，大概是自罗斯福以至今日美国最好的总统；当然还是一个美国至上的“沙猪”，不过尚有些开

明的国际观。可惜他被刺杀了。谁刺杀了肯尼迪到如今还是个大谜。最近,美国政府公布了五千多页的秘密文件,仍旧让专家解不开这个谜。年前美国独立制片家拍成了电影“谁杀了肯尼迪?”,直指是美国大财团与中情局联手搞好的阴谋,原因是肯尼迪想结束越战,而这将使美国大财团(那 Industrial Military Complex)损失百十亿美金(战争是美国经济最大的推动力),所以只有干掉他,换个约翰逊上台,让他言听计从,把越战一直打下去——直到把自己给打出越南为止!

现任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为了挽救美国的经济,向国会提出新税制方案。白宫与国会为了这个案子争来辩去,耗时达数月之久。后来,付诸表决,居然反对赞成各半,形成僵局,还是副总统一票,替克林顿赢了这一局。我在想,克林顿是赢了,赢在一票之差上,这能够证明他的提案本身是好或坏吗?是对或非吗?假使光凭人头计数,50人说非,51人说是,这不能证明这课题本身的是或非,而只是在为辩论而辩论,为斗争而斗争上,打了一场技术性的胜仗而已。是非真理之争结果以投票定胜负,以一票(或数票)定真理?!所谓美式民主,据说其核心即在府会互相制衡。结果,制衡变成了一切,议题本身的是非被抹煞了!(本年6月14日的《时代》周刊居然来了一篇文章谈儒家的民主观,说儒家强调的是“和谐”,而西方民主强调的是“制衡”——是“斗争”。醉心西方民主的人能不能回头研究研究儒家之民主,发扬发扬中国的传统——据洋大人说,那里面也有民主,只是不同于专搞制衡搞对立的西方民主!)

我想美国的政客们何必为这个问题或任何问题,斗来斗去,为什么不大家坐下来静静想想,大家聚首在一起心平气和地商量商量,究竟是非如何,真理何在,达成一个共识,总结出一个最终的方案。就像一对夫妻决定要不要投资一项房地产,两人平心静气商

量商量,作成最佳决定;何苦各自联络儿女,先来一场辩论比赛,然后以投票决定是夫胜或妻胜。这样做,是投资房地产最明智的决定?真理愈辩愈明?这只是善辩者的口号吧。

我近来悟出一个大矛盾:作为美国立国之核心与基础,美国的企业组织,却从来没有听说使用民主制度。有没有工人投票选举厂长?有没有职员投票选举总裁?就是股东投票选厂长?有没有职员投票选举总裁?就是股东投票选董事,董事互选董事长,那也是依股权多少决定投票权,你若占 51% 的股权,你永远都是董事长,大老板。这算民主?实际上,美国企业无论多大,员工千千万万,领导权完全操之在十来人组织起来的董事会之手,甚至操纵在董事长一人之手。这次与布什克林顿试图鼎足而三的企业巨子佩罗,他在他的企业里便是一个十足的独裁者,而且是个英明的独裁者,乃变成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为什么美国的企业要采取这种体制,无他,一切为效率,一切为成就,一切为繁荣昌盛。实际上,美国政府在紧急危难之秋,为了效率,为了有效施政,也采取独裁制,最有名的是 1929 年大不景气之后出现的罗斯福总统;那时,为了挽救美国之狂澜于既倒,他提任何方案,国会立即照案通过,不敢有半句异议,这样才把美国从覆灭的边缘拯救过来(而其中许多方案是很社会主义的)!

这样对比起来,我们可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在和平时期,不必讲求施政效率,不必强调立竿见影的成果时的一种政治游戏。时间拖沓无所谓,方案妥否无所谓,实施起来的成或败亦无所谓,反正没有危机压力造成国家存或亡的分别(我要插一句,这种所谓民主政治的运作,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又造成多大的浪费!——牧惠似乎颇欣赏台湾的“民主”,请来参加席开千桌的造势大吃会吧!)。因此,这些众议员参议员们,一个个一手插在裤口袋,一手挥裁着空气,继承自古罗马元老们以来的滔滔雄辩(而在古罗马

谁是真正的政治家？谁对罗马乃至世界的贡献大？是凯撒？还是西塞罗？），而雄辩争的是民主党之利或共和党之利，争的是幕后财团大老板辗转交代的立场，争的是各个利益集团游说的好处！而沉默的大多数，那些美国百姓，忙着工作，忙着渡假，忙着看打球，忙着找刺激，谁管国会山庄在争什么！而你一个小老百姓又管得到吗？平时，一个法案实施下来，个人之利分摊不到多少，个人之害也分摊不到多少，就利害由之。战时，要一旦决议征兵上前线，Uncle Sam want you(山姆大叔要你)！你还能不去韩战越战卖命送死——就算知道那是帝国主义不义之战。（其实，每个美国人也一直分享着帝国主义之利，那自己战死也是活该！只有克林顿这种聪明孩子，既享受帝国之利，又逃避了上前线面对死亡之险，难怪他的才智足以入主白宫！）

看多了美国的民主政治，你就觉太虚伪，太无效，太消耗，太是一场假严肃的真游戏，太与是非真理无关系！而这么一套商业化的平庸的（美国政客全是三流人才）无效率的政治体制，为什么还那样堂而皇之不可一世呢？没有别的，全是依托于它那经济体制与经济实力！而经济体制则又与政治体制背道而驰，实行反民主制，你说滑稽不滑稽？！

又说，美国国内民主，是否可以保证它在国际间也民主呢？比如说，大家辩论辩论，大家投投票，这至少是一场和平的游戏嘛！而众所周知，众所共睹，历史及新闻为证：民主美国的国际行为，完全继承了已垮民主帝国英吉利（英国的民主制度未垮，垮的是经济，所以帝国垮了，这可见民主制度与国之强弱无关）的“炮舰外交”，动不动就是航空母舰开来了，巡弋飞弹飞来了，氢弹核弹蓄势待发！民主政治，除了解释为府会制衡的政治，也可解释为民意政治。美国对内不一定依民意行事，对外可是完全以民意为依据；因为你翻开美国两百年的建国史，有没有任何美国民意（成气候有份

量的民意)反对过美国任何一场侵略战争?从早期的杀尽红人(奴役黑人也应该算是种族侵略)到中东之残杀伊拉克人(利用高科技武器杀害了20万伊拉克人),哪个美国百姓不是欢欣鼓舞的!韩战打了个平手,越战吃了败仗,美国百姓才会反省反思——我们怎么打输了?“人性本善”,孟老夫子的神话!人性以兽性为主,它好血好杀好利。帝国主义正好满足了这些嗜好,也可说是这些嗜好的集体意志之表现。(中东海湾战争协议停火之次日,美国眼镜蛇直升机队发现了一个伊拉克装甲师正向巴格达撤退,美机调集火力立即将始终未曾反击的伊拉克部队全部以火箭摧毁。美国大兵,据报导说,一边发射火箭一边大喊欢呼:“送你们去见阿拉!”此一消息曝光之当日,美国统帅施瓦茨科夫将军上美国国会发表胜利演说,国会全体起立鼓掌达13次!)人性兽性难改,所以我们需要不世出的圣贤,英明善良的政治领导人,真正关怀人类的国际政治家,他们才能克制自己国内人心中的兽性倾向,克制这种兽性结合而成的帝国主义,去殖民,去剥削,去强占油田,去垄断国际经济,把他国他民族逼上绝路——而后再拉他一把,让他活过来,以俾继续为帝国殖民主义做奴隶!美国的国际策略不就是这么一径地迫害人作弄人吗?这种民主,无论对内对外,牧惠先生(我几乎忘了你的存在——借用台湾一句电视广告词,那广告品则不宜曝露),你说我们中国人该塑起女神像去学习模仿吗?只怕你想模仿,美国人还不让你“全模仿”:你若搞起帝国主义来,它是自己培养了一个竞争对手?它只是叫你模仿“制衡”民主,搞得你的政府无效无能,自己对抗分裂,自己僵持,僵持得奄奄一息,好让他们来凌空驾驭你。我想这是美国人要你模仿它的民主制度的真目的——“和平演变”的真目的,而今之俄罗斯就是现身说法,现世报应!我的终极意见是这样,西方民主不可取,不可仿,不仅它的品质不良,而且有分解中国之图谋。中国应从自己的传统出发,从中



国的现实出发,搞中国自己的民主。让儒家民主与民主集中制结合如何?

讲到自由,“不自由毋宁死”,这真是吓坏人的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大人权。我儿子爱睡懒觉,假期睡到中午12点不肯起床,说他有睡觉的自由。美国中学生不修数理化,说不感兴趣,或坦白说太难,他们有不修不感兴趣的课目的自由,有自由不让自己的脑袋负荷太重,有自由轻松愉快闲散放荡。美国的年轻黑人看见这个同族打拳年入三千万,那个同族打球年入五百万,另一个同族唱歌,派头排场赛过总统国王,于是大家舍学校教育而不由,群起直攻拳击玩球唱歌,直攻不下,万无一成,纷纷落下马来,一无所长,一无所学,加减乘除都不会,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不过,还好,打抢是会的,贩毒吸毒是会的,包娼卖淫是会的。我的老二在美国留学,他的室友一月之内被黑人连抢三次,吓得我儿只得转学。我的一位朋友,两年前,就在纽约大学的后门早晨上学时被抢,进得教室惊告同学,同学们哈哈大笑说:“你到今天才被抢呀?”

自由诚然可以鼓舞想象,激发创造,启动活力,促进追求,没有人说自由没有积极的一面。但是,自由之积极应用或积极性之自由,也许只出现在万中一人之身,正如在学却不上课,全凭自己跑图书馆修成正果,万人之一而已。(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就是一个名例。)但是,那万中剔一剩下的九千九百九十九,那怎么办?你说你有自由不上课,他便也有自由不上图书馆,他的人性兽性教唆他,自由的最美的运用,就是留在床上睡懒觉!就是这样放任,就是这样让他们自由选择,于是美国有这么多黑人,这么多波多黎各人,还有白人及其他种族的年轻人,选择了“少壮不努力”之路,选择了“自由落体”之路,沿着物之惯性,自由坠落到底!说实话,美国的大人们,特别是白种人们——因为他们是大家长——没有尽到教育后代之责,没有教诫年轻人做人做事讲求“纪律”之根本

必要性。美国的白大人们，有意无意，拿“自由”这一听来神圣的口号，荼毒了美国年轻的一代，毁掉了美国明天。一般而言，赴美第一代华人移民，事业学问做得有声有色，第二代勉强守成，第三代被美国文化所同化，就全垮了（这是一位移民美国的亲戚亲口对我说的）。自由是个潜能库，它可以让你飞上青天，不过百分之九十九点几的人，还是变成“自由落体”，坠入地狱。（罗马帝国是怎么垮的？美国帝国也将这样垮。别向它“输梦”吧，太迟了。）所以，还是少讲自由吧，多鞭策自己，多压制自己，一定要把自己像懒驴一样，前拉后推，牵上征途；人不琢不成器，个人有太多的自由，个人垮了——国家也随之垮。实际上，那些善用自由，自动自发，自我实现的人，他们是用了更高度的纪律来约束自己，鞭策自己，悬梁锥股，才把自己打造成器。意志力不够强的大多数，就要靠别人的督促鞭策；当别人打断你的懒筋——那人性中的兽性——时，你要感激他才对！

至于谈到制度性的自由，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等等，使用得好，有益国计民生，造福文化文明；但是滥用之祸亦可倾国！就举赵紫阳时代出现的《河殇》为例吧，西方人誉之为中国自由主义之一现的昙花。可是，就中国人的观点言，这样糟塌中国传统，这样践踏龙的文化，这样否定黄河母亲，这不是反省，这是背叛；这不是批判，这是连根拔起的扬弃；问题是传统文化一旦被连根拔起，留在地上的大窟窿，大空虚，一千年也难得填平！这民族虚无主义把民族传统虚无掉了，剩下的就是一片空白，但等外国主论人侵——但也无法完全浸透填满，所以一直只会留下一个大空虚！（文化传统的形成是要千百年的累积，不是说换就换得成的。）像这样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简直是向中国投原子弹，你说这是造福国家社会的自由吗？任何人没有自由毁掉他自己的民族与文化。

新闻自由是美国人自诩最了不起的自由。可是,非常怪异,美国的自由的新闻界,从来不违背美国利益,从来是鼓吹美国价值,从来是膺服“美国至上”。他们就像一群同类鱼,看来条条独立,但大家总是不约而同心照不宣地沿着美国主义这条路线游下去,甚至沿着美国总统个人的好恶游下去:卡特私恨伊朗的霍梅尼,美国大众传播把霍梅尼描绘成撒旦;里根私恨利比亚的卡扎菲,美国大众传播抹黑卡扎菲;布什私恨伊拉克的萨达姆,美国大传亦视之为眼中钉。(所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西方教育出来反西方的有人格的东方知识分子——倡议建立亚洲的大传体系,摆脱西方大传之钳制;而新加坡到如今尚不准《时代》周刊在该国发行,每期刊仅购五百本供政府人员参考。)中国的言论家,文化领袖,牧惠族知识分子,应该向美国人学学,他们是怎么爱美国,爱美国主义,爱美国的帝国主义。说到底,美国帝国主义也不是一两人或一两党搞得起来,他们是全国人一起联手干。不过,让我们只学他们的爱国主义,不要学他们的帝国主义;学他们的国家利益至上,不要学他们的霸权主义,睥睨万邦。

牧惠先生——我又几乎忘了你的存在——至于漓江长江黄河的黄度问题,就留给时间去回答。假使那些江河昨日是黄的,不一定今天还黄;假使今天还黄,不能说明天也黄。你总要给植树造林水土保持的千千万万同胞,给他们一两句鼓励话,一点点同情心。中国人口多,中国要发展经济,水土流失污染是个大问题。不过,觉醒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这方面也一直在作相应的大努力,联合国也鼓掌过多次。所以,只要多努力,不要束手扼腕悲泣吧。您与其交臂忧天,不如攘臂照国家要求一年一人植五颗树吧(你植了吗?)。最后,你影射我写那些文章可能出于策划阴谋,又指出我曾任正中书局总编辑。正中是国民党的书局;作为该局的总编辑,我应是反共都来不及,怎么会替《中流》写文章支持中共(我的文章都

是发表于台北的《海峡评论》，《中流》转载我事先不知情），特别是你所谓的“左派”（让爱国鸟飞在一起！）——我要串连也该串连右派如吾兄者，一起来反共反华嘛。实际上，这只是一个从五岁开始就恨“日寇占我山海关”的人，如今天从人愿（应说人定胜天），眼见“中华振兴”可期，却又见一簇簇汉奸甘愿受国际反华势力的驱策，企图挫折这“振兴中华”之大努力，我乃不得不为此平生大愿大声疾呼了！

后记：近来你又在《岭南文艺》上发表一个短文，攻击我对外国人冷嘲热讽，不友善。你所说的那故事是以讹传讹，全属虚构。不过，我在做台大外文系主任时，倒的确“整肃”过两个外国人。一个是西德歌德学院派来教德文的，他老兄一连五信臭骂学校与政府；我给他回了一封六页的长信，痛驳他，限他一周之内向我道歉；附本告到歌德学院。结果，他如期来道歉；歌德学院亦来信道歉。另一个是 Fulbright Foundation 派来的美国教授；他每到系办公室总是大呼小叫，颐指气使，我火了，把他轰出去，命令他以后只准站在柜台外面，不准进办公室，要跟哪位助教讲话，必须先“May I……”开始。从此他乖得像只猫。不过，次年他要求延期，我还是拒绝他。这就是我“刻薄”老外不顾“国际友谊”的两个劣迹。你觉得我太不“崇洋”了吗？

（原载台湾《海峡评论》1993年10期，《中流》1993年第12期转载）

## 牧惠为什么大骂颜元叔？

武汉中南民族学院 刘志洪

牧惠先生所作《为什么〈中流〉引进个颜元叔》，洋洋洒洒七八千言，说起来不过是这么几个意思：

一、指控台湾大学颜元叔教授在台湾发表的《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是“极左”的“上纲上线”的“大批判”；

二、指控“颜元叔隔岸观火”为大陆知识分子“英年早逝”“拍手叫好”，这是“极左”之极，并且“确实是活学活用的标兵”；

三、指控颜元叔鼓吹中国人民个个“不准有思想”，那就是“呼唤”“教唆”“文革”“再干一次”，“再来一次”。

于是颜先生就成了“打着爱国旗号因此更能骗人的‘衍太太’”。他的文章，就成了“心怀叵测的教唆和诬蔑”与“欺人之谈”。

由于《中流》杂志转载了颜文，于是牧惠先生又向《中流》杂志发出了如下指控：

一、《中流》把颜元叔的“大批判”奉为样板，“编《中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二、《中流》转载颜文，他“不能不拆穿《中流》上演的把戏！”

三、《中流》杂志的“‘左’是多么孤立无援，使得颜元叔也成了他们的‘中流砥柱’”。

于是，“引进个颜元叔”就成了《中流》的一大罪状！成了《中流》杂志“左”的突出例证！

现在,我要直截了当地回答牧惠先生:你对颜元叔的“指控”和对《中流》的“指控”,都是可笑的。

“为什么《中流》引进个颜元叔”?说来也很简单,其实牧惠先生自己心里也十分清楚,那就是颜先生以炽烈的爱国激情,用《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盘古龙之再临——答苏晓康先生》、《中国的希望在你们身上》、《邪恶帝国》这样一些无可指责的命题,不仅表达了他爱我中华的热忱,而且由于客观的观察,得出了中国有坚持社会主义之必要,有提倡集体主义之必要的公正论断。其中,虽然可能有个别激烈偏颇之词,但是纵观全文,它们和当前我们所强调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这个社会的“主旋律”并没有相悖之处吧!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好文章。把它说成是负有“来意不善的”“特殊使命”的“欺人之谈”和“心怀叵测的教唆和诬蔑”,难道是符合实际的吗?为了暗示其言外之意,牧惠先生竟然把“有人说他(颜元叔)是正中书局总编辑”这种“查出身”、“查三代”的老手段都搬了出来。《中流》转载了台湾同胞颜元叔教授的这些文章,你为何兴师问罪,气急败坏地责问“编《中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倒要反过来问一下:牧惠先生,你把一连串“左”的“别有用心”的可怕的政治大帽子和政治“大棒”追赠到一个远在台湾宝岛的爱国学者的头上,那恶毒、吓人的罪名竟无以复加,这又是上演的什么“把戏”?这倒使人联想到“政治帽子满天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无限上纲上线”的年代那种似曾相识的典型做法。如果说牧惠先生的文章才真正像是一篇“无限上纲上线”的“大批判”文章,具有当年的“大字报”的特征,恐怕是更符合实际些吧!不同的也许仅仅在于其“棍子”挥舞得更远、更凶,帽子扣得更大、更多,罪名定得更可怕、更邪乎,打击面更宽更广,立论更不讲道理、更武断而已。是不是这样?我想只要读读

《中流》所转载的颜先生的文章,读一读大陆的作者和读者对颜文所作出的反应,对照一下牧惠先生名副其实“大批判”文章,就不难得到客观公正的判断的。

这种“左”得出奇的“大批判”式文章,竟然在反“左”的名义下写成并发表出来,倒是很令人深长思之的。在这样的意义上,把它载入《防“左”备忘录》倒是颇为“得体”的。它用活生生的事实提醒我们,这种可怕的妄加人以罪名的“左”的流毒,是怎样在新的堂皇的名义下,继续大行其道,恶性发作。防“左”的斗争,确实任重而道远啊!

《中流》编者在1991年第6期该刊转载颜文时,其“编者的话”——《爱我中华的心声,壮我中华的呼唤》中表述是十分明确的:“读到这些文章,我们不能不深深感到,他们(即颜元叔、陈映真、潘亚瞰三位作家、教授——刘志洪注)有着极其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胸中都跳动着一颗炽热的中国心。你可以赞成或不赞成其中的这样或那样的判断和结论,却不能不被他们字里行间、溢于言表的爱我中华、壮我中华的浓烈情感所感染、所激动。从《中流》“引进”个台湾同胞颜元叔教授充满爱国主义主旋律的好文章之后在广大读者中引起的巨大“轰动效应”来看,这个“引进”是非常及时而成功的,社会效果相当之好。

不错,《中流》应许多读者的要求不加任何删改地转载颜文,如同“一字不易,未加删节”地于同期转载苏晓康攻击颜文的奇文《对苦难漠视的残忍》一样。对此,《中流》编者在“编者的话”中写道:“这样做,既是出于对作者的尊重,也是对读者的信任。”若按牧惠先生的逻辑,凡是“全文转载”的文章,就“意味”着编辑者均“认可”其转载的“全文”的每一句话,那么文章作者的“文责自负”之说岂不是不复存在?并且,如果《中流》编者要对颜文中的个别词语“负责”,那么,按此“逻辑”,《中流》编者岂不是还要对该刊全文转

载的苏晓康“精英”在《对苦难漠视的残忍》中所狂叫的诸如“不要疯狂得像毛泽东、邓小平那般”一语“负责”？由此，牧惠先生的“逻辑”之荒唐可见一斑！

颜文中个别词语与论断，当然也可能有值得推敲以求更加准确之处。看来，《中流》编者在转载颜文之际，对此也是充分注意到了的。《中流》编者既要满足读者们的要求而全文转载颜文，又要尊重作者颜元叔教授而对颜文不加删节与改动，在这种情况下，《中流》编者在那篇“编者的话”中原则性地又十分得体地声明：“颜文也罢，潘文也罢，陈文也罢，他们所说的也并非句句是真理（刘志洪按：即可读为“并非句句是对的”）。在看待中国历史和现状上，有着不同的视角，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这并不难理解，这个问题实在太太大、太复杂、太难解。”《中流》编者甚至还接着再一次强调：“向读者推荐这些文章，也并不表明我们就同意他们的每一个论断。”这一切都是白纸黑字，这一切都是光明磊落，这一切都是那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哪里是什么牧惠先生所强加于人的似乎《中流》编者成了颜文“每一个论断”的“支持者”和“赞扬者”呢？牧惠置颜文全篇于不顾，抓住颜文中那么个别一、两句话“上纲上线”为“左”，继而又把《中流》打成“左”的“鼓吹者”与“宣传者”，如果不说这是恶意栽赃，也至少是太不近情理，太不讲作文的道德了！

牧惠先生强加于《中流》头上的“左”，也许会一时蒙骗住那些看不到颜先生原文和《中流》1991年第6期“编者的话”的人们；然而，一旦读了牧惠先生之大作的人们都看到了颜文，得到《中流》“编者的话”中还有认为颜文“并非句句是真理”、向读者推荐颜文“也并不表明我们就同意他们的每一个论断”的话，那么牧惠先生不就立刻显露出一派不顾客观事实、乱打棍子的凶狠相，真的留下了一份对历史很不老实的铁的“备忘录”了吗！

牧惠先生写道，他发现《中流》“每期必有的大部分都是夸《中



流》如何如何好的《编者与读者》栏，则更是少不了说颜元叔如何感人的读者来信了”，他也看到了“《中流》曾在一个小范围内掀起‘颜元叔热’”。从这些情况中，我们可以得知：牧惠是深知颜文如何痛斥“学运民运小丑”，也是深知“叛逃精英”苏晓康如何污蔑颜元叔的，而《中流》编者及其广大读者又是站在颜元叔这个真正的爱国者这一边，一起向背叛祖国的反共小丑苏晓康辈作严肃斗争的。在这里，牧惠不仅打了颜元叔和《中流》，而且也攻击了《中流》的普遍读者。他们看了颜文后发表自己的看法，何罪之有？你不是“株连”得过宽了吗？

那么，在颜元叔教授这位爱国的台湾同胞与卖国小丑苏晓康之间，牧惠先生站在了哪一边呢？

事实告诉人们：牧惠先生之大作，不仅一词一字不指责苏晓康，反而是“老牧”先生“鸚鵡学舌”“小苏”先生，实在是可悲可笑。

请看——

“小苏”在《对苦难漠视的残忍》中大骂颜元叔“只配去做中国共产党‘老人帮’的弄臣和策士”，而“老牧”则冲上前去，指鼻大骂颜元叔一句“媚共”！

“小苏”大骂颜文“通篇是不堪入目的脏话诟语”，而“老牧”则再次冲上前去，吐着口水大骂颜元叔“脏话满嘴”！

“小苏”大骂“你颜元叔没掉过一根毫毛，过了20年来幸灾乐祸地高唱什么‘累死，多值得的死，千千万万的她他不累死，中国科学怎么迎头赶上西方’一类的昏语”。“老牧”则跺着脚跟叫骂“最好让颜元叔有当上一次‘右派分子’的光荣，到北大荒伐树，去新疆哪一个农场或诸如此类‘炼狱’体验一下这种‘累死，多值得的死’的美妙境界”！

“小苏”大骂颜元叔“走火入魔……当面骂人家是‘老汉奸’”、“黄河长江生态破坏之严重，难道颜老先生这样的教授会有发言权

吗”？“你有什么权利漠视 40 年来生活在那两岸的中国人的苦难”？而“老牧”则翻遍香港报刊为“小苏”找“证据”，终于在香港某报上“喜出望外”地找到了“漓江每年有五个月的枯水期”以及“黄河今年几度断流”这样的字句，继而大骂颜元叔“动辄”给人以“种种恶溢”！

“小苏”大骂颜元叔“欣赏”“大跃进”，而“老牧”也大骂颜元叔是一个“盼望”“劳民伤财的‘大跃进’和灾难般的‘文革’”“再干一次”的人：“我们都为自己曾经干过这种蠢事而羞愧，而‘衍太太’颜元叔却说：‘好，再干一次，我记着，看谁干得最卖力。’”……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语言”与“腔调”，又何其相似乃尔！说“老牧”之文不过是“小苏”1991 年《对苦难漠视的残忍》的 1992 年大陆版，岂不是很恰当么？

牧惠先生之文，还有比《对苦难漠视的残忍》“棋高一着”的地方，那就是——

牧惠先生来了个“黑虎掏心”，抛出去一个“杀手锏”，公然在文中将台湾大学外文系颜元叔教授诬陷为负有“台湾”的“特别的使命”的人！（注意，这可是顶右得不能再右的帽子！“反‘左’”的牧惠先生及其同仁组建的“帽子进出口总公司”制造的“吓人的政治帽子”，就这样，左右开弓，从大陆扣到台湾大学颜元叔教授头上去。然后又扣回到大陆《中流》编者头上！）为防“杜撰”之嫌，特别录牧惠原文如下：

“当然，在这段话里，他（指颜元叔——刘志洪注）没有忘记插进‘反西方民主！反西方自由’的话，因此有文章说他反的仅仅是西方的民主自由。但是，请问颜元叔们：你能在台湾发表这种‘媚共’文章，如果不是出于特别的使命，那么，你享受的是西方的民主自由还是人民民主专政下的民主自由？”

——牧惠先生上述的话，阴险而且恶毒。照牧惠先生的惊人“逻辑”，你颜元叔在“台湾”能发表颂扬大陆 40 年建设成就的文章，要么得承认你在台湾“享受的是西方的民主自由”，要么你就是“出于特别的使命”，“二者必居其一”！然而，牧惠先生恰恰忘记了不仅在台湾，而且在西方世界，称赞大陆 4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这 14 年伟大成就的言论不计其数，而这与所谓的“西方的民主自由”风马牛不相及，这只是一种客观的评价。当然，照牧惠先生本意，那是说你颜元叔“不可能”如此大胆地发表颂扬大陆 40 年经济成就和“反西方民主自由”的文章，既然你颜元叔“发表”了，那就是“出于”“台湾”的“特别的使命”！

名曰最“反‘左’”的牧惠先生上述此语的全部阴险与恶毒就在于：你颜元叔在《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文中讲了“那么多”大陆的“好话”，那你颜元叔就是“媚共”（媚者，谄媚、拍马屁之谓也。把说了几句肯定社会主义中国和建设者的话，斥之为“媚共”，你把自己又摆在什么位置上了呢？）；你颜元叔的文章有个别激愤之词，那就是“极左”，那就是“心怀叵测的教唆和诬蔑”。总之，“由于”你颜元叔教授人在台湾，就断定你不是一个“好东西”；“由于”你颜元叔颂扬大陆 40 年巨大成就的文章发表在台湾，“必定”是“大阴谋”无疑，“绝对”是“出于特别的使命”！——牧惠先生的眼光如此惊人之“左”，谁敢与之争论？！

但是，我愿意为台湾同胞颜元叔进行辩护，并坚决驳斥牧惠先生没有一点根据、没有任何道理的指控：

第一，广大读者都心悦诚服地看到了颜文的中心之主题是：“中国的前途不在台湾（什么叫做‘台湾经验’？可笑！），中国的前途不在港澳（殖民地岂是民族复兴基地！但大陆一民运人士竟然认为‘中国被殖民化才能现代化’，疯子，不过他已自称‘疯狗’！），

不在海外华人，不在舔洋人后跟的学运民运小丑，中国的前途在中国大陆……不能让‘中华’再陨落！”——我们为颜教授这些掷地有声之言，深感敬佩！“指婊子为婊子”那不是脏话，而是道出了事实，鼓吹“中国被殖民化才能现代化”的“民运人士”只配被骂为“疯子”！“学运民运小丑”确是小丑！

第二，颜文公开承认大陆有过“大跃进”与“文革”这样的“弯路”，而不是像牧惠辈所诬蔑的那样——所谓颜元叔希望将“大跃进”和“文革”“再干一次”！颜文感人地写道：“而40年来的中国，虽说走了一些弯路，但是除非是汉奸、除非是洋奴、除非是鲜廉寡耻的‘烂香蕉’（这包括那众多的心灵被西方殖民的华人知识分子在内），才会说40年大陆还在原地踏步，甚至倒退！”诚哉斯言！

第三，颜文是骂与他友善、“来访的老同学”，为“狗华人”、“老汉奸”、“洋奴”，言词显然过激，但还终究是两个尚有友好往来的老同学之间的事儿，咱们局外人最好不要“横加干涉”；同时，绝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绝不能置颜文全篇“向建设中国亿万同胞致敬”的大量感人例证与肺腑之言于不顾，绝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第四，颜文明确指出，“大陆上的人说，他们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这是“痛心的话，悲痛的话，却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话”。这说明颜元叔对大陆“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的中国苦干者，是“肃然起敬”的，绝不可能是“幸灾乐祸”地巴不得让大陆人民都去“累死”，而是认为有人虽然以身殉职，虽是莫大的不幸，却绝不是完全不“值得”。而且，从颜文中“我的老同学傅孝先留在大陆的姐姐，搞化学研究的高级科学家，52岁就死了，是活活地给研究工作累死了”！其深深惋惜与痛惜之情，已是溢于言表，这哪里是牧惠们所说的是对大陆知识分子“英年早逝”“拍手叫好”，这哪里是肯定、呼唤再来一次“大跃进”和“文革”？这哪里是“希望我们沿着‘左’

的轨迹一直滑到底”呢?!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最后,我们不能不深含些许忧虑地指出:在台湾《海峡评论》杂志上发表的台湾大学外文系颜元叔教授《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的大作,数千言虽无一句直接明指“中共”(尽管此词近年已获准在台湾报刊上使用)或“共产党”,但此文对大陆40年来巨大建设成就的热情赞美,已无不令人动容;可是当暨南大学潘亚暾教授“周围的年轻的学者”都认为颜文“火气大些,担心‘江南案’重演”(见《中流》1991年第6期潘亚暾文)的时候,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上万册的《防“左”备忘录》中的牧惠之文却心怀叵测地向海内外频频发出并无明指“共产党”的颜文“媚共”!“媚共”!这就使好心的人们“担心‘江南案’重演”的忧虑,更加深了。至于颜文这种“媚共”之浓烈情感,被同一个心怀叵测的牧惠有意“指斥”简直是负有“台湾”方面“特别的使命”所为,那么这种向“海外”的险恶“暗示”,又意味着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在台湾若能“除掉”这个并非负有“台湾”方面“特别的使命”的“极端”的“危险”的热烈“媚共”者,岂不更可让苏晓康和他的“政治密友”们大“开”其“心”吗?!

1993年1月3日于留轩斋

(《中流》1993年第3期)

## 不忘民族恨，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劣根性

中国旅美学者 雁 湫

编者按：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悲惨一页，刚刚翻过去还不到半个世纪，有些人就已经在那里大作其翻案文章了。不久前，日本一位法务大臣，上任伊始，就公然大放厥辞，为日本侵华暴行大翻其案，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此事在国内外触犯了众怒，这位大臣不得不被迫撤回错误言论，最后连个官位都丢掉了。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某些中国人自己竟也自觉不自觉地起劲地参加到这种翻案的鼓噪中去了。最新的例证，就是有人竟公然宣布，“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故事“缺乏根据或者说根本没有根据”、“纯系子虚乌有”，而是“人为编造”出来的。这条消息不仅在国内外报刊上郑重披露，而且还由一家通讯社作为专电传到了大洋的彼岸，在海外的一家华文报纸上刊登出来，并立即引起了海外爱国学人的义愤。这里发表的中国旅美学者雁湫先生的文章，就对这件事提出了自己的强烈看法。据我们所知，上海的《报刊文摘》摘登了这条翻案消息之后不久，就收到了一位读者的来信，说明早在30年代，方志敏同志就看到“华人与狗不准入园”的那块“刺目的牌子”，并进行揭露和控诉了。难道他也是“在1949年后的博物馆里”看到的吗？难道他的那一番感受是“配合形势”凭空“编造”出来的吗？

问题在于，一块展出的牌子是原来的实物，还是其复制品，难道能够从根本上否定帝国主义者横行霸道，欺压中国人民的历史事实吗？这不是小事一桩。我们希望有关的历史学家和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能够出来澄清这个历史事实的真相。一个日本人，不得不为违背了历史事实而请罪、认错，那么，那些得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纯系人为编造”的“专家”们，是否要为自己的论断所带来的后果承担历史责任，并作出负责的交代呢？

据香港中国通讯社上海4月11日电，《世纪》杂志刊登了篇文章，上海外滩公园门前曾树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一事，“纯系误传”，据称，该牌子是1949年以后，上海历史与建设博物馆“为配合当时形势而制作的。”1983年，上海成立历史文物陈列馆时，“许多专家认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故事缺乏根据，或者说根本没有根据，何况人为地编造一个被人侮辱的故事只能说明中国人的劣根性，于是这块牌子便被弃”。鄙人对历史虽有一定兴趣，但无研究，对上海地方史，更知之甚少，比起“专家们”来，自然是自愧弗如的。本来么，一块牌子的真伪与否，实在不必大惊小怪，更无需劳动众专家的大骂。但这块牌子的留存，竟牵涉到能够说明中国人的“劣根性”。看来确实不是一件小事。鄙人向来对“劣根性”这样的字眼感到毛骨悚然，试想，中国人之劣，又劣在根上，进而成为一种本性，我等不都有被划入“劣等民族”之可能吗？慎之慎之。

“专家们”从一块牌子的真伪判定“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故事“缺乏根据或者根本没有根据”，这话听起来颇具权威口气，可惜的是专家们恐怕是太专注了一点，眼睛里看到的大抵只是“天有一口井大”。鄙人绝不敢夸口见多识广，但对外面的世界之精彩略知一二。前几天在美国广播公司的一个专题节目上，就有一个镜头显

示在南非的一个公共场所门口高悬一块“有色人种与狗不得入内”的大牌子,想必不是为了“配合形势”而制作的吧。这种故事在殖民地是司空见惯的,怎么就变得“根本没有根据”了呢?“专家们”另外一个高论是“人为地编造一个被人侮辱的故事只能说明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被人侮辱的故事怕是“专家们”数都数不过来的,岂止是侮辱,任人宰杀,命运不如一条狗。远的不说,光南京大屠杀(距专家们的府第仅几百里之遥)几天就杀了30万人,这故事想必是具有“劣根性”的中国人们想造也造不出来的。美国大兵在北京强奸了女大学生,一走了之,屁事没有,这又是一个造不出来的故事。至于海外华人受歧视、侮辱之事,现在还无时不在发生,“专家们”当然是不知道也未必想知道的。三年前,在康乃尔大学的一位中国学生被白人无缘无故地打至昏迷过去,就是一例。

就算这块牌子以至具体的故事是人们杜撰的,又有什么可以小题大作的呢。历史上,每个民族、教派为了教育后代,无不是大书特书其先人们经历的苦难,其中不完全和事实一致之处,在所难免。在西方基督教、天主教国家,人人都知道耶稣为救众生受难的故事,可以说是大多数人笃信不疑。君不知,梵帝冈珍藏的那块被称作是耶稣裹尸布的东西,早在60年代就由康乃尔大学的一位显微学教授鉴定为假货,但至今仍被视如真迹,这又是谁的劣根性在作怪呢?日本人也是很绝的,记得去联合国参观,讲到二战之恐怖,仅仅显示了原子弹给日本人带来了巨大灾难,儿童们会认为日本民族才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而中国人死了几千万,连提都没提起,这公道吗?和大和民族相比,中国人在自己的博物馆里竖一块小小的木牌(顶多那算是实物的复制品),以示后人,永远不忘受人侮辱、宰割之惨痛历史,实在只能是小巫见大巫,这为何使得“专家们”如此愤愤然起来?真是令人费解。



以鄙人之愚见,专家们大抵也有难言之隐,如果说当时“制作牌子”是“为了配合形势”的话,如今废弃牌子怕也是为了“配合形势”,不然的话,一不小心让“友邦人士”瞧见,“莫名惊诧”起来可如何是好。至于《世纪》杂志的那位可敬的撰稿人拿这事来借题发挥,是为了“配合”什么,恐怕只有他自己心中有数。鄙人只是希望专家先生们和撰稿的先生脚下留神,不至滑落到那群具劣根性的中国人之中。

1994年5月3日于波士顿

(《中流》1994年第6期)

## 牌子与骨子

柳下舟

编者按：本刊六月号发表了留美学者雁湫寄自波士顿的文章，就《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一文，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这一期临近截稿之际，我们又收到了柳下舟同志推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一文的文章。正当西方某些强权国家借所谓人权问题，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华风波之际，重温一下列强们践踏中国人权的罪恶纪录，实在是大有必要的。尽管这仅仅是罄竹难书的践踏中国人权的历史中的一例。耐人寻味的是，恰恰是在列强针对中国的人权鼓噪达到无以复加程度的当口，在首当其冲，蒙受过这一奇耻大辱的上海滩上，经历了四十多年之后，竟然有人出来以“揭秘”的名义，摆出“专家”的架式，极力要把这一铁的事实彻底推翻，从中国的历史上彻底抹掉。《揭秘》一文，不仅无视起码的历史事实，开了无知加武断学风的恶劣先例，还并非善意地加罪于深受其害的中国及其人民。这真正是太岂有此理了！说这样做的人，是当年那些蒙受其辱的先辈们的不屑子孙，大概不算过分吧！这足以说明，“勿忘国耻”，仍然是中华民族面临的重大主题，这是万万忘不得的。

经过这场“揭秘”的周折，又有了对这一历史事实的进一步澄清，根据周恩来同志的遗愿，在上海外滩的相应地点（而不仅仅是在影片中、舞台上），真正立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如找

不到原件,做一个复制品并加以说明也是可以的),使我们子孙万代不忘这耻辱的一页,其意义不是更大了吗?

《党史信息报》在1994年6月1日发表的,由马福龙、徐国梁、虞骁三位同志合写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一文,是一篇好文章,很值得一读。它以数十件无可辩驳的客观历史材料,雄辩地证明了,在半殖民地时代,帝国主义在上海外滩公园竖立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是一种无可辩驳的客观历史存在,因而从根本上澄清了上海《世纪》杂志今年第二期发表的《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这篇文章(以下简称《揭秘》)散播的所谓这块牌子不曾有过的无稽之谈。马、徐、虞三位同志是历史的真实反映者,而不是历史的歪曲者,更不是历史的伪造者。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牌子不是一块简单的木板,也不是一般的行政性、事务性的告示牌,而是一种严酷历史的象征——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的象征,压迫中华民族的象征,凌辱中华民族的象征;它是“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的象征。它记录着中华民族永远不应忘记的奇耻大辱和悲惨的命运。

我们还记得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吧,那里面有一个场面就是“百年魔怪舞翩跹”时代的上海外滩。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和美学史上的这部杰作是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关怀下出世的。他审看了排练。在排练的时候,在那个场面上,江面停着帝国主义的兵舰,江岸公园旁边我们的搬运工人艰难地背扛着。周恩来同志指出,公园这里应该竖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文艺工作者果然这样做了,以后就照这样演出。这块牌子一竖,这个反映帝国主义罪恶、中华民族灾难的场面不是因此而提高到了与历史真实性完全相符的高度吗?这件事是参与过《东方红》排练演出和报道的人都当面听到可以做证的。据舞台演出而拍摄的电影中,这

块牌子至今仍赫然在目。周恩来同志曾经长期生活在旧上海,并且曾是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反帝斗争的领导人。难道他也是在“编造”这个“故事”吗?

然而时至今日,《揭秘》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不过是“人为地编造”的“故事”,上海外滩并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牌子。

就在发生这一历史事实的地方所出版的刊物竟率先做出这样的论断实在令人惊异和难解。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是中国与各国通商的最大口岸,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并不是无足轻重、不引人注目的中小城市。外滩是上海最显眼的地方,外滩的景物简直成了上海的象征,并不是僻街小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就竖在这个城市的这个地方!它竖在这个地方不是一天两天、一月两月、一年两年,中国人、外国人到过这个地方、见过这块牌子的无法计算有多少万,真可谓举世周知;有的目睹者至今健在,记忆犹新,怎么敢断定这个地方根本没有出现过这块牌子!怎么敢断定这是人为编造的!怎么敢断定有些“老人确实看到过这牌子,但不是在解放前的外滩公园,而是(在)解放后的博物馆里”!解放后的博物馆从来没有展出过这样的牌子,那么多的人又怎么看到了博物馆的牌子?这真是惊人的武断。

《揭秘》又一个大胆的说法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人为地编造”的“故事”是由于《上海通志馆期刊》上的一篇译文中写上了这句话,“被部分报刊转载”,这才流传开来的。这种说法使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人为地编造”“故事”的究竟是谁?请注意年代:这一期《上海通志馆期刊》出刊是时间是1932年,而马、徐、虞三位同志列举的客观历史材料起于1878年,止于1930年,究竟哪在前?哪在后?在那一期《上海通志馆期刊》出刊以前64年,即1878年,《晋源报》和《申报》就发表文章,对于帝国主义的执行机关工部局派巡捕监守外滩公园、不准华人入内提出不满了。从这一年开

始,中国同胞的不满、谴责和抗议,外国友人的批评,已经进行了60余年,这与1932年出刊的那一期刊物有什么关系?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1925年就逝世了,他怎么可能知道在他逝世七年以后上海要出那么一期刊物?他怎么可能在他生前就按照他逝世后出刊的那期刊物中的一句话来谴责“狗同中国人不准入”这块牌子?

那么,为什么要“人为地编造”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故事”呢?为什么要制作这块牌子呢?这些做法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呢?《揭秘》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是“50年代为配合形势教育”而制作的!

这句话里面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牌子究竟是50年代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制作的,还是几十年以前帝国主义的工部局制作的?这种历史真相,马、徐、虞三位同志的文章已经摆得再清楚不过了,不必讨论了。需要讨论的是另一层意思:50年代是什么形势?

50年代的形势是,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这一伟大成果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了109年得来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20年革命武装斗争打出来的,特别是其中的最后三年打败了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那场反革命内战打出来的。这是盛极一时、凶极一时的美帝国主义从来没有遭受过的大失败,他们的白皮书就作出了最好的招供。但他们不可能甘心失败,并且推行采用军事手段“遏制共产主义”的全球战略。这一战略的东方部分便是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武装占领中国神圣领土台湾省、又发动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用这三把钢刀直刺社会主义中国。面对着这种穷凶极恶的新的侵略,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要不要站住?我们的民族要不要生存?你认为要,你就昂首挺胸进行斗争,包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

江”；你认为不要，你就俯首贴耳，任凭宰割，让舞了一百年的魔怪继续舞下去。共产党、毛主席教育的全中国人民一齐说，要！因此坚决斗争，而且又是胜利的斗争。这便是 50 年代的形势。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向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必不可少的重要教材之一便是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华民族的反抗斗争，包括“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牌子在内。《东方红》中的一个场面就使用过它。我们与《世纪》《揭秘》一文的分歧在于，这块牌子究竟是半殖民地时代的客观存在，还是社会主义的 50 年代“为配合形势教育”而凭空编织造来的？否认了半殖民地时代的这块牌子，这就否认了什么？为什么要否认真实的历史？

《揭秘》进一步的说法为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故事”，是“人为地编造出来的被人侮辱的故事”，是“哗众取宠”，是“中国人的劣根性”！

这就再明白不过了——并没有帝国主义侮辱中国人，中国人“被”人侮辱的故事是共产党领导的 50 年代的形势教育“人为地编造出来的”，这种“人为地编造”正是“中国人的劣根性”！

裹纸千层无用处，开言三句现灵魂。文章标的题目是“揭”别人的“谜”，实际作出来的文章是“揭”自己的“谜”。一切精神生产者须知：任何形式的精神产品中都是包含着精神生产者的灵魂的。精神生产者不把自己的灵魂倾注到自己生产的产品中去是不可能的，否则你就不可能成为某种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了。

概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面对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凌辱，中国人的态度一直都是一分为二的。绝大部分是坚决抵抗，决不妥协投降，直至慷慨悲歌，赴荡蹈火，视死如归；少数是苟且偷生，卖国求荣。前者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伎俩口诛笔伐，痛予揭露；后者并没有结束，不同的只是表现形式。

一种是政治精英的观点和手法。苏晓康的《河殇》就是鼓吹“蔚蓝色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的，即拥护帝国主义侵略的，因此辱骂祖宗，辱骂同胞。王若望逃到海外后，在澳大利亚发表演说，宣扬“英国早就不是帝国主义了”，它“主动”“情愿”地使殖民地独立，它占领香港有“贡献良多”，中国人反帝是“错觉”、“思想僵化”，等等，简直与汪精卫拥护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一模一样了。

另有一种作法是，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用文化解释历史，而不是用历史解释文化，因此英国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就成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指导思想。剑桥的那部《史》完全否认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华民族反抗的矛盾实质，否认侵略者的大炮屠刀与被侵略者的鲜血白骨，而以悠然、漠然的神情将一场接一场的火与剑的斗争说成只是“文化冲突”。北京的一家刊物于是发表题为《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的长文予以阐发，并且说，要将“那些喧嚣一时的政治风云”“从记忆中漾去”。按照这个说法，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首都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就应该毁掉。因为这座巍峨的纪念碑正是为了纪念鸦片战争以来的几代人民英雄而树立的，正是为了使我们的子孙万代永远记住这段历史、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而树立的。纪念碑底座上精美的十块浮雕反映出来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八大历史事件全都是轰轰烈烈的“政治风云”，人民群众到这里来瞻仰了它们，肃然起敬，牢记于心，不把它们毁掉，怎么可能“从记忆中漾去”呢？

《揭秘》的错误比这篇文章严重，但不管怎样严重，依然是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当然不是“小事小非”。提高一点说，这两篇文章都有一个世界观问题，但世界观问题仅仅是人民内部的认识问题，而不都是政治问题，我们决无意于把它与前面讲的政治精英的

政治问题相提并论、混为一谈。

然而有一种事实我们也不要回避：在对待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某些同志的认识与政治精英的观点还是有相同点的，至少是将帝国主义的侵略给淡化了。这对于我们同那些人严格地划清政治界限是不利的。我们愈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愈是努力摆脱西方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影响，对于我们同那些人严格地划清政治界限愈是有利。这一点希望我们自己的同志三思。

毛泽东同志在批判美国白皮书的系列文章中将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应该重温。那里面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这种精神上的主动应该保持并且发扬；如果有些被动，就应该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上来，再转为主动。

我们还应该向鲁迅学习。因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半殖民地状态虽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结束了，将中国造成半殖民地状态的那种帝国主义势力依然存在，他们并不因为奴才王若望说了那么一句谰词就从世界上消失。我们不能掉以轻心，鲁迅的骨头性格也是应该保持并且发扬的。

精神上的主动，鲁迅的硬骨头性格，实质是一致的，都是丢不得的。

1994年6月11日



##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

马福龙 徐国梁 虞骁

《世纪》杂志今年第2期发表了《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一文(以下简称《揭》文)。《揭》文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所以被弄得像真的一样,是1932年蒯世勋在翻译一本《中国的发展》中一段话时,“将 Chinese and dogs not admitted 译成了中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蒯世勋是30年代柳亚子先生主持的上海通志馆成员,是一位对上海史造诣很深的学者……。《上海通志馆期刊》是上海史研究的权威性刊物,于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事被部分报刊转载”,随之流传开来。《揭》文接着又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是“50年代为配合形势教育”而制作的,有些“老人确实看见过这牌子,但不是在解放前的外滩公园,而是解放后的博物馆里”(事实上,解放后博物馆从未展出过这块牌子——笔者)。因此《揭》文作者认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故事缺乏根据,或者讲根本没有根据,是“人为地编造一个被人侮辱的故事”,是“哗众取宠”,是“中国人的劣根性”,等等。有关报刊摘登了该文,由此引来了众多读者包括海外侨胞的议论,许多了解上海历史的读者致函报刊,对《揭》文作者轻率抹煞和曲解历史事实的作法提出了批评。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真的是“没有根据”的故事吗?现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择要罗列于下,以就教于读者。

## 一、由来已久的不满和抗议

外滩公园是上海第一个正式公园,建成于1868年。租界当局一开始就在公园门口派驻巡捕看守,不准中国人入内,曾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抗议。1878年6月的《晋源报》和《申报》均就此发表文章,对华人不得入园一事鸣不平:“华人独禁,不许一游……殊属不公。”

1881年4月6日,虹口医院凯军(译音)等8人想进公园,被门警阻挡,为此向工部局(上海公共租界的统治机关,受外国驻沪领事团和驻华公使的监督)提出抗议。工部局秘书索尔本(R·T·Tharburn)复信说,“我要解释一下,工部局并不认为中国人有进入(公共)花园的权利。”(见工部局1881年年报)

1885年11月25日,陈泳南、吴虹玉(译音)等8人入园受阻,这些人对此联名写信给工部局,指出:“一切剥夺我们权利事件之发生,我们都表示反对。”工部局12月2日复信,“不准备给予这项权利。”(见工部局1885年年报)

1886年7月下旬,又发生宋耀如(宋庆龄的父亲)、颜永京等6位牧师,手捧《圣经》来到外滩公园进行和平抗议的事情。(见《宋氏家族第一人》,北方文艺出版社)

在此期间,《申报》曾于1881年4月28日、29日、1885年12月8日、1888年9月21日、1889年8月11日先后发表文章,论述华人被禁入园的不满。“名之曰公家花园……而其实乃系私家”,“工部局所捐之款计之华人之捐多于西人者几何……”,“西人得以入园中游,……而独于华人则严且厉禁不得拦入”。1909年1月27日,《申报》更于第四版的上方正中地位,刊载了一张大幅照片,并加大字标题:“不准华人入内之上海公园”,以示抗议。

在清末民初的地方志书中，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强烈的不满情绪。1907年，清朝有位文人李维清在编《上海乡土志》中写道：“黄浦江滨，西人有公园，芳草如茵，鲜花似锦。东西各国之人皆可游玩，即印度亡国之民、洋人豢养之犬，尚得出入自如，独禁华人人内，是彼之蔑视华人，且奴隶犬马之不若矣。喧宾夺主，实堪浩叹！可知当今之世，惟有强权足恃而已。我侪宜若何努力，以洗刷奇耻耶！”

1917年，民初有位姚公鹤，写了一本影响较大的《上海闲话》史料笔记，提出“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牌子问题，文中写道：“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筑之所，每不准华人之拦入，喧宾夺主，无过于此。今之跑马场及白大桥下之公园，其最著矣。……跑马场首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之涉足。今门首高标英文于木牌，所云‘狗与华人不准入内’是也……。”

清末民初的《上海指南》中，在介绍西人公园（即外滩公园）时，几种版本在介绍公园概况后，都注明“华人不得入内”。

当时工部局公开的条文，如1913年7月，工部局公布的花园（即外滩公园）与预备花园的规则中，其中第1条“这些花园只准外国人（社团）进出”，第2条“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1914年公共租界巡捕房公布的《公家花园章程》中，其中第1条“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第4条“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1916年5月工部局公布的《公园规则》6条，其中第2条“狗与自行车不入内”，第3条“华人不准入内，但外籍居留者的仆佣外”。1917年9月在外滩公园修订的《公园规则》10条，其中第1条“公园只准外国人入内”，第4条“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

## 二、中外人士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揭露与谴责

郭沫若在1923年8月28日夜所写的《月蚀》一文(见1923年9月2日《创造周报》第17号)中愤然写道:“上海几处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便可以进去了。”

蔡和森在1923年11月16日第46期《向导周报》上发表《被外国帝国主义宰割八十年的上海》一文指出:“上海未开埠以前,一草一石,哪一点不是华人的?但是既开埠以后,租界以内,最初是不准华人居住的,而‘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标揭,至今还悬挂在外国公园的门上!”

孙中山1924年11月25日在题为《中国内乱之原因》(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的演讲中指出:“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还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

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有几个穷朋友,邀我去游法国公园。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射入我眼中,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受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了。”

1925年7月2日《不列颠周报》(British Weekly)第299页上发表一名通讯员的私人信件,写道:“在上海的公园里有这样的通告‘华人与狗不准入’,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利于安宁。”当詹姆斯·A·希尔给《不列颠周报》去信否认这一告示时,有位中国读者K·K·W马上去信说:“我确证上面的那句话是百分之百存在的,”还说:“希尔先生明知句子中‘华人’两字只是在最近欧战或战争刚结束时,由于本埠华人社会的经久而强烈的反对,方才抹去的。”

1925年9月12日,美国迪尔伯恩出版公司编辑部 W·K·卡梅伦给上海的美国总领事写信,说在美国报界和其他人士中,都讲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上有过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而这种说法还“受到责难”。他要求总领事告诉事实真相。(摘译自工部局档案)

1929年7月15日,有位读者根据当时香港报纸上议论上海公园门口的告示牌问题,在《香港电讯报》上发表文章,说:“笔者在1916年亲眼目睹的措词是‘华人与狗不准入内’,“长期以来,凡知道有这块告示牌的中国人都对之表示愤慨,这是合乎情理的。”《香港电讯报》编者 A·希志斯将这份报纸转给了上海工部局。

1929年11月9日,《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中国人,请走后门》的文章,说:“根据工部局命令竖立在上海各公园门外的,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告示牌,尽管已在一些时候以前拆除,但在上海外侨社会的某些中间,由这块傲慢无礼、侮辱他人告示牌所表示出来的那种典型精神,却至今尚未死去。”

1930年美国埃德温·罗哲斯·恩布里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说:“……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到那里去散散步,除非这个中国人背着一个白人的皮包,或者用摇篮车推着一个白人的婴儿。你们都能记得这个极端的例子,上海动人的花园里一直竖立着一块告示牌,用显眼的文字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他后来给美国宗教刊物《洗礼者》杂志编者的信中,又讲道:“我写的是若干人的说法(其中亦有传教士),他们证明他们亲眼目睹这块告示牌。”美国浸礼会 A·泰勒为此写信给上海工部局要求了解此事。

### 三、目睹者的陈述

目前尚健在的一位 86 岁的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姜豪,在最近

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说,我在 1921 年从宝山乡间到市区来读书,在外滩公园亲眼看到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他还补充道,这块牌子是长方形的,挂在公园门口的南侧。

1989 年 10 月 6 日,苏步青教授同复旦大学学生进行过一次谈话,苏教授在谈话中讲道:“我是 1919 年到日本去留学的,至今已有 70 年了。我第一次路过上海时,外滩公园前面挂着一块牌子,我亲眼看到,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后来他于 1991 年又对《上海园林》编辑部补充说,那年他是从温州经上海赴日本时,在外滩买船票,看到外滩公园门口有这块牌子。

陈岱孙教授 1982 年所写《往事偶记》(《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一辑,收入 1989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陈岱孙文集》),讲到 1918 年他在上海外滩公园见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1990 年 7 月 12 日他又去信上海黄浦区园林管理所强调:一、这块牌子“不是游园规则中的某一条,……而是一块木牌子”;二、1920 年,“即我初次见到这牌子后两年,我知道这牌子仍然‘健在’……。”

陈毅的兄长陈孟熙在回忆 1919 年 6 月他与陈毅的上海之行时谈道:“……一到外滩,公园门口木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字体赫然在目,真使我们感到莫大的侮辱。有一位同学主张砸掉木牌,仲弘(即陈毅)说:‘这不是砸掉木牌就能解决的问题。’”(见《人民的忠诚战士——缅怀陈毅同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生于 1903 年的桂祖良,1926 年曾在法租界工董局园林种植处工作,任一等秘书。他说,以前读书时,有次去虹口经过外滩公园门口,想进去看看,门卫不准进,指着一块木牌让他看,牌子上写着黑色的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上海市园林局 1991 年 5 月 15 日访问记录)

1960 年,有位姓陆的(曾在外滩公园担任三等英文秘书)老员工回忆:在他一二十年代在外滩公园工作时,外滩公园的门口竖有

一块大牌子,上面有公园规则(即1917年9月工部局用英文公布的10条规则)。另外还专门做了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木牌为长方形白底黑字,插在草地上,由于日晒雨淋,木牌损坏,以后又改用三角铁底架,上有网形块状铁牌。后来,这块牌子被取下,放在公园音乐厅的地下室。最后被当废铜烂铁处理掉。(1960年为筹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调查记录)

最近,日本《朝日新闻》也发表有关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的文章。1994年5月4日“天声人语”专栏中介绍:“不少人来信说真的看到过,并记载有逗留及访问时间。他们这些人是军人、军队护士、学生、公司职员……说是在黄浦公园和法租界公园内看到,并一致描述为是在涂成白色的板上写的黑字。年长的女性在信中说,在日本人和欧美人家中帮助料理家务的中国女性可以带领主人的孩子自由出入公园,并在公园中游玩。这位写信人的双亲都曾在上海居住过,此人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回想起来,当时的日本似乎并没有感到有一种特别罪恶感,但有时小姑娘却感到伤心,她们感到把人与狗等等同起来,实是可怜。’”

最后,这里我们再摘引两则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报章志书中的记载:

30年代初中期一个探索上海历史的学艺团体“上海通社”,考证、分析上海的发展历史,在上海的一份夜报《大晚报》上辟了个“上海通”专版,专门刊载论述上海历史的文章。在1935年6月10日第71期“黄浦滩专号”(一)上发表《外滩公园话旧》,在介绍外滩公园是上海第一个公园的历史后,写道:“虽然地皮是中国官地,填土和造园的经费也出自中外居民所纳税捐,然而外滩公园跟以后所建的几个公园都不许华人入内,甚至园门口还挂着极侮辱华人的牌子,这些事,虽是健忘的人,也不至于已经忘掉了吧?”文章说:

“直到 1928 年起,华人才可以到公共租界各公园去玩。”

抗战时期上海的《新中国报》,也辟了一个“老上海”专版,在 1942 年 1 月 29 日第 62 期上,发表《不准入内》一文道:“20 年前,租界中外人建筑所不准华人入内的,有静安寺路跑马厅,及白大桥南堍的外滩公园,最先跑马厅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涉足,而于门首高标英文木牌: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继之公园也藉着‘华人入公共场所,即折花驱鸟糟蹋地方’的原因,和跑马厅同样,挂出了侮辱国人的木牌。这当然引起了国人很大的反感,但因国事纷乱的关系,终于忍受了数十年。后来,民国十四、五年时,民众对这情形激烈反对,租界外人只得除下这侮辱的牌子,而开放他们专用的禁地了。”

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我们相信,通过本文引述的材料已经回答了《揭》文提出的问题。

(原载 1994 年 6 月 1 日第 203 期《党史信息报》,《中流》1994 年第 7 期转载)



## 谁对历史开了个大“玩笑”？

蔺美璧

编者按：本刊六、七月号曾就“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牌子的“公案”，连续披露了一些有关文章和资料。本来，我们曾认为，既然基本的历史真相和是非已得到澄清，也就可以就此打住，告一段落了。孰料，在此以后，我们又陆续收到了不少作者和读者的来稿和来信。他们不仅从新的角度，提供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史料和论据，而且强烈地提出了如何从这次不寻常的争论中，吸取真正教训的命题。现仅从中选取其要者，继续加以披露，供读者进一步深入思考。

另1994年4月29日，《南方周末》有《史学家的骨头》一文发表。连基本的历史事实，都没有也不准备弄清楚，连基本的事实和谎言都不加以分辨，就见风就是雨，大兴问罪之师。这是怎样一种学风，又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他的“史学家的骨头”又体现在哪里呢？

今天第6期《中流》杂志以“爱我中华的心声，壮我中华的呼唤”的通栏标题，披露了有的报刊做出“流传数十年在国人脑子里种下深刻印象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说，原来纯系误传”的报道。这使我十分惊诧。

老实讲，我没有亲眼看见过当年上海外滩公园（或法国公园）门前树起的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辱我中华的牌子。可在我

40年代上中学的时候,它就深深地伤害过我的民族感情。所以,我也是属于数十年来被“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说“在脑子里种下深刻印象”的“国人”之一。

我是内蒙人,抗战胜利后,进归绥(今呼市)上中学。1947年7月7日,归绥的各个中学,联合召开纪念“七·七”事变全民抗战十周年讲演会。会上有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的讲话。记忆犹新的是他在讲话中就谴责过上海外滩公园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的侵略行径。乃至讲得情不自禁,泣不成声。从此,我才知道洋人居然敢在中国的土地上树那样的牌子。会后,音乐老师特地教我们学《黄河大合唱》。我在中学里学了许多歌,然记得最牢,唱得最准确的是《黄河大合唱》。与此同时,国语老师还特地组织我们出墙报,主题是“洋人与狗不准进入中国公园”。青年学生,血气方刚,群情愤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猛烈抨击帝国主义列强的横行霸道,欺人太甚。新中国成立后,我上了大学,又有幸从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里,深入体察了他亲眼目睹上海法国公园树的那块侮辱中国人的“华人与狗不准进园”的牌子的感受。我还特地把其中的一段话,抄写在我的日记里。“在中国的上海地方让他们造公园来,反而禁止华人入园。这样无理的侮辱华人,岂是所谓‘文明’国的人们所应做出来的吗?华人在世界上还有立足的余地吗?还能生存下去吗?”这段话,至今仍在我保存的大学时代的日记本里闪闪发光。……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说,就是这样在我这个“国人”的脑子里种下了深刻印象的。

方志敏是共产党。董其武是国民党。他们其时分别属于两个敌对的政治营垒。但他们却都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历史存在,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义愤,晓喻国人。方志敏叙述的是他在上海的亲眼所见。董其武在40年代以国民党省主席的身份向青年学生做那样的讲话,即使未曾亲眼见,也恐非道听途说;当然也难

以设想是受了方志敏的“误传”，人云亦云。如果说，这些都是“误传”，恐也只能“误”一时。现在的情况是，不但“误”了数十年，而且“在国人的脑子里”还“种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这“误传”说，岂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真是无独有偶，这条颠倒黑白的论断，居然产生于历史上确曾挂过那样一块牌子的上海滩。做出这种论断的人，对得起自己蒙受其辱、其害的先辈吗？这就不禁使我联想到八九“6·4”风波中，有的“精英”叫嚷要请外国人来中国当总理；有的“精英”还大放“如让日本人统治中国，中国早就富了”，“如果早当三百年殖民地，中国早就实现现代化”的厥词。

时间已过了数十年，竟然还有“国人”，挖空心思，呕心沥血，为那块“在国人的脑子里种下深刻印象”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翻案，替帝国主义列强开脱罪责，往“国人”的脸上抹黑。

做出这种武断结论的那篇文章居然还以教训的口吻说：“牌子一事与国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但在玩笑之后，人们不应该吸取点教训吗？”

到底谁对历史开了玩笑？现在已经愈来愈清楚了。那么，做出这种武断结论的人，该不该从中“吸取点教训”呢？

## 意大利人奥雷利奥·佩西如是说……

林一株

旧中国上海滩的历史上，是不是曾挂出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践踏中国人权给中国人民带来奇耻大辱和悲惨命运的牌子？看过马福龙等同志撰写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一文，已经足够做出明确的答案了。

然而，最近在闲中翻书时，却偶而发现了一条闻所未闻的新的有力例证。我想，把它作为一个新的角度的新材料，介绍给广大读者和治史的同志，仍然是有意义的而不会是多余的“蛇足”吧！

意大利著名的工业家、反法西斯战士、罗马俱乐部的创建人和主持者之一，奥雷利奥·佩西，1977年出版了一部自传性的著作：《人类的素质》（1988年，由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翻译出版。译者：薛荣元）。文中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30—1938年，他作为意大利菲亚特公司的代表，在中国“常驻”的一段经历，特别是他曾经在中国的上海作“暂时逗留”的经历，以及这段历史在他一生发展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下面这段话，就是他对这次上海的“暂时逗留”所做的简略描述：

“我在上海作了暂时逗留。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城市。上海的人口膨胀本身就是一个不祥之兆。另一方面，在国际侨民公园绿地上的牌子却出现了不应有的标记，上面写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尽管上海具有强大的魅力和诱惑力，但它毕竟是个可怕的

城市。也许是在上海,我才成熟起来”。

这位意大利人是根据什么需要,为了“配合”什么“形势”,在回顾自己一生的专著中,明确无误地证实这块“不应有”的牌子的存在呢?这个影响他的一生,促使他“成熟起来”的“可怕”事实,难道也是他“人为编造”出来的吗?

这位在世界范围具有很高知名度的意大利思想家,已经在1984年逝世。如果他至今仍健在,听到某些中国“专家”就此大做翻案文章,加人以莫须有罪名的事实,又将做何种感想和反应呢?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这位佩西先生,这位西方的工业家和思想家,尽管一再强调他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却在自己的这部著作中一往情深地表露了他对于中国人民、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友好、同情和敬佩:

“在南昌,我们接到警告说:江西南部(即苏区)‘土匪’活动猖獗。要是我早知道所谓的‘土匪’就是长征以前那些团结在毛泽东及其追随着周围的农民的话,毫无疑问,我一定会设法去拜访他们的。不幸的是,那时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我失去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尽管如此,他还是通过和善良的中国人民的长期接触,认识并且表达了他的敬佩之情:

“然而,中国人民却表现出最文明、最慷慨的行为,始终帮助我们……我被中国人深深地感动了。我发现他们有许多品质是值得敬佩的。”

这足以证明,做为一个西方人,佩西并没有像当今以权威、专家自居的中国人那样,十分蛮横无理和武断地为外国列强践踏中国人权的历史事实辩护和开脱,也没有一味地向这些深受其害的普通人民大泼其脏水。相反,他当时就对这一侵犯中国人权的露骨表现,表示了应有的愤慨,并且明确无误地站在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为打掉有形的也包括无形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而从事着正义斗争的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一边。这与某些人借此向中国人民大泼“劣根性”的脏水,对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进行无理指责,不是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吗?

在颠扑不破的、大量的事实面前,我们完全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

围绕“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牌子,大开(而不是“不大不小”)历史“玩笑”的,到底是谁?

有资格被认为反映了中国人真正的“劣根性”的,到底应该是谁?

在开了这样荒唐的历史大“玩笑”之后,需要真正从中“吸取点教训”的,又应当是谁?

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屈辱历史一页,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能够真正体现“史学家的骨气”?

一切爱我中华,一切具有真正民族良心和骨气,而不存历史偏见的人们,是不难得出自己的答案来的!

## 也谈“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

陈漱渝

周氏兄弟，鲁迅与其二弟周作人的合称。两人的文学成就举世瞩目，但政治上却分道扬镳：鲁迅一身正气，被中国人民誉为“民族魂”，而周作人却在北平沦陷期间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务，堕落为民族罪人。但周作人并非一生下来就是汉奸胚子。他的蜕化变质有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在青少年时期，周作人身上也沸腾过爱国的热血。请看他1903年9月11日（旧历七月二十日）的一则命题日记：

### 公园之感情（二十日）

上午乘车至高昌庙，晤封燮臣，同至十六浦。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围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甚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见影印原件。该件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周作人当时是跟鲁迅从绍兴经杭州赴上海：鲁迅乘海轮东渡日本，他则回南京读书，可见这块牌子是周氏兄弟共同所见。在年方十九岁的周作人看来，那些目睹公园辱华牌示而神情麻木的国人与冷血动物无异。然而，他书写此则日记时何曾料到，九十年

后,某些同胞不仅会对近百年帝国主义侵华史熟视无睹,而且还会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考证家”撰文证明周作人当年目睹的那块牌示为子虚乌有,还会有无脊梁的“杂文家”辱骂利用这块牌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单位为“作伪”、“卑劣”、“太下三流”,还会有一些颇有销路的副刊不恤血本付高稿酬刊登这种“太下三流”的文章。将周作人本世纪初的日记跟本世纪末个别国人的高论相对照,真是令人不禁感慨系之!真正可以问一声“奈何竟血冷至此”了。

毋庸讳言,由于“左”或右的错误影响,对历史滥施刀斧的现象确曾有发生。但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不能对传统说法一律采取“翻烧饼”的态度,更不能把殖民主义者侵华、辱华的行径也都说成是“人为编造的故事”。近些年来,报刊上新论迭出,奇文屡见,诸如周作人当汉奸系共产党派遣……有人相信,有人不信;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这种情况的出现,除开因为不同人知识水平不同之外,更重要的似乎还是不同人观念、心态各个不同。比如辱骂别人“卑劣”、“哗众取宠”,是“下三流”的这位“杂文家”,知识面不可谓不广博,文笔不可谓不犀利,但他对殖民主义者辱华这事,宁可信其无,不愿信其有,在一份不大知名的杂志上看到一篇真正“不顾史实”,真正“自己作贱自己”的文章,就笃信不疑,愤怒得完全失去理智,哪里有一点“史学家的骨头”!窃以为这种心态和情绪,倒真正反映了一种至今未泯的“劣根性”。早在1901年,梁启超就发表过一篇《中国积弱溯源论》,他在斥责“伪事”、“伪文”、“伪语”的同时,更鞭挞了那种“性奴隶之性,行奴隶之行”的国人,深刻指出“不甘为奴隶,则必无能奴隶我者”。先驱者九十年前的论述,难道不值得现实生活中的某一类人警醒吗!

看到那篇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博物馆大肆辱骂的杂文,我不禁又想起六十九年前的一件往事:在北平前门附近,有两个美国



兵殴打了中国的车夫和巡警,被激怒的群众跟在暴徒身后高喊“打!打!”于是有位吃过洋饭的“正人君子”就借题发挥,在文中斥之曰:“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鲁迅阅后挥笔写成了杂文《并非闲语(二)》。他回敬那种希望中国人挨打而不作声的“正人君子”说:

“这样的中国人,呸!呸!!!”

## 毛泽东同志怎样评论 “狗和华人不准入内”这块牌子？

柳岸牛

编者按：继本年6、7、9期之后，本刊这一期又发表柳岸牛同志的文章：《毛泽东同志怎样评论“狗和华人不准入内”这块牌子？》和正言同志的文章：《请读陈天华的〈警世钟〉》。我们决定就这个问题继续发表文章，当然首先是为了“华人和狗不准入内”这块牌子是否确实存在的问题提供新的例证，同时也是为了对“华人和狗不准入内”这块牌子应该怎么看待的问题提供更多的资料。我们坚信：只要摆事实，讲道理，是黑是白，谁是谁非，人民自有公论，历史自有公论。

令人高兴的是，由于柳岸牛同志的来稿，让我们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有关此事的讲稿。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就曾经多次到过上海，他的话又是在全国解放之前讲的，证据确凿，条理分明，高瞻远瞩，语重心长，当时说得就理直气壮，如今读来仍鞭辟入里，的确是不可多得的感人肺腑、发人深醒的高论良言，不可不读！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1945年4月在延安举行）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当时以书面印发，同时作了一个口头报告。报告是这样开头的——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同志们作报告。政治报告的书面稿已经印发，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我就不照这个书面稿来讲，只讲一下这个报告里头提出的一些问题。我讲三个问题：路线问题，几个政策问题，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

这个口头报告的全文，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主办的《党的文献》杂志编辑部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第二次誊抄稿整理，发表于该刊1993年第六期。

报告的第三部分讲了个性与党性、党内几部分干部、讲真话这三个问题。

讲到个性与党性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这样一种不正确的意见，接下去说——

我在报告里讲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是摧残个性的，使中国人民不能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身体也不能发展，精神也不能发展，都受到了摧残。我曾经讲过，鲁迅的骨头很硬，半殖民地的国家有像鲁迅这样硬的骨头是很可贵的。半殖民地的国家是穷得很的，人民生活痛苦，饱受压迫，于是有那么一些人就变成了洋人的奴隶，即买办。上海有所谓“外国火腿”，就是外国人踢了一脚，算作给一个“火腿”。到过上海的人，还看见过有的公园有“狗和华人不准入内”的牌子。民族斗争就反对这些东西，外国民族压迫中国民族是不行的，我们要独立。外国野蛮的法西斯压迫中国人民，不讲道理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独立！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作，经济上要这样作，文化上也要这样作。广大群众没有清楚的、觉醒的、民主的、独立的意识，是不会被尊敬的。

关于帝国主义在上海外滩公园竖的那块凌辱中国人民的牌子,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讲得明明白白:这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到过上海的人”,这里面恐怕就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吗!1919年3月17日,他在黄浦江码头为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送行。1920年5月5日至7月上旬,为湖南省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事宜在上海盘桓两个月。1921年7月,在上海参加共产党成立。1923年至1924年,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同志自己就是这块牌子的见证人。

这块牌子究竟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还是子虚乌有?究竟是在“人民五亿不团圆”的黑暗岁月里,魔怪们竖在那里的,还是1949年全国人民获得了解放、发展了个性以后共产党为了欺骗人民而制造了一个“谜”?这本来不是问题。现在之所以成了问题,是上海《世纪》杂志的文章制造出来的。《中流》杂志接连发表文章以一系列的证据批驳这种半殖民地时代的买办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的新表现,是完全必要的。读了这些文章之后再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是尤其必要的。

因为,毛泽东同志的论述具有一种特殊重要的意义:他是以什么地位、什么身份讲的?是在什么场合讲的?是以什么形式讲的?他是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地位和身份,代表中央委员会,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在这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上,向代表们作的正式报告中讲的!在如此庄严的代表大会上肯定“到过上海的人,还看见过有的公园有‘狗和中国人不准入内’的牌子”这个客观历史事实,它的庄严性是它所独具的,是我们必须首先看到的。

再者,毛泽东同志不是就牌子论牌子,而是将这块牌子问题放在帝国主义摧残中国人民的个性、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全局中来处理;非如此处理不能显示这块牌子所

象征着的欺凌与屈辱,也不能说明欺凌与屈辱的矛盾应该如何解决。这里有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资产阶级喋喋不休的个性(以及自由)问题应该如何认识,如何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与雇佣劳动是一种对立的运动,资本是雇佣劳动创造的,资本家是一种“社会的地位”(后来马克思又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家不过是“人格化的资本”),所以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要想在资产阶级社会获得个性和自由,就得消灭资产者的个性和自由,就得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人是以生产关系为根本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把人的个性问题放在一定历史阶段内的生产关系的全局中处理,是说不清楚,也解决不了的。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统治着整个中国的时候,人民大众就只能得到受欺受辱、受饥受饿、受屈受杀的“自由”,还有什么个性可言呢?现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我们国家建立起来了,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们又向这种生产要什么“个性解放”,除了浅薄,不过是为“蔚蓝色道路”鼓吹帮腔而已。

毛泽东同志的论述还有一个重要之点:将没有骨头的买办思想同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相对照而提出。这种提法,这种告诫,不但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当年具有现实意义,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也没有使它的现实意义降低。“华人和狗不准入内”的牌子在上海外滩竖了几十年,举世周知。现在,不是在别的地方,恰恰是在竖过这块牌子的上海的刊物公然发表文章说这块牌子根本没有竖过,公然为帝国主义凌辱中国人民的恶行翻案。帝国主义本来夹着尾巴逃跑了,他们的思想现在又招摇过市地回来了。中国人民本来站起来了,某些人现在又跪下去了。买办思想如果只有九足而不是十足,中国人的身份如果只抛弃九分而不是抛弃十分,这样的文章写不出来,发不出来。这样的文章

是个别的,却是较为普遍地存在着的崇洋媚外思想的尖端。这是对自己的个性的消灭,是不会被人看得起的。毛泽东同志在七大报告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一再强调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又在批判美国《白皮书》的时候指出中国人民自从学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精神上就从被动变成主动。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这些论述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1993年11月4日

## 请读陈天华的《警世钟》

正 言

编者按：正言同志文章中提及的《警世钟》，是1903年陈天华去日本留学期间所著，与周作人在日记中的记载在同一时间。毫无疑问，它为周作人的记载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佐证。

这个新的例证还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思索的更深一层的问题。大家都知道，陈天华并不是一个无名之辈，他是一个已经载入中国近代历史的著名爱国者和民主革命家，他的《警世钟》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中，曾经鼓舞过千千万万的爱国者。可是，我们今天的某些以“史学家”自居的人，却连他70多年前所提供的历史资料，都毫不顾及，便武断作出了“狗和华人不准入内”这块牌子从未出现过的论断，并且还大讲什么“史学家的骨头”，这不是太具有讽刺意味了吗？问题还在于，这并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最近几年，公然为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劳动者的行为翻案，为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的行为翻案，甚至为人民公敌蒋介石背叛民主革命的倒行逆施翻案，就连续不断的出现，而且无一不打着“历史权威”的招牌，这不是很能发人深思吗？

上海有一个外国公园，门首贴一张字道：“狗和华人不准入内。”中国人比狗还要次一等哩！中国如今尚有一个国号，他们待中国已是这样；等到他瓜分中国之后，还可想得吗？各国的人也是一个人，中国的人也是一个人，为何中国人要受各国人这样欺侮

呢？

以上这段文字，见之于陈天华的《警世钟》。

陈天华为何许人也？

陈天华(1875-1905)，近代民主革命家。字星台，号思黄。湖南新化人。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留学日本，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并与黄兴等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著《猛回头》、《警世钟》等书，影响甚大。次年回国参与组织华兴会，准备在长沙起义未成，逃亡日本。1905年参加发起同盟会，担任书记部工作和《民报》编辑，12月在东京参加抗议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的斗争，愤而投海自杀，留下绝命书，鼓励同志誓死救国。

由此可见，“狗和华人不准入内”的张贴，早在1905年之前就已存在，决非50年代共产党人的宣传。《史学家的骨头》之类作者，读史似甚多，可巧偏偏漏了陈天华的《警世钟》？！

若君尚存中国心，请君长听《警世钟》：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

万丈风潮大逼人，腥膻满地血如糜；一腔无限同舟痛，献与同胞侧耳听。

噯呀！噯呀！来了，来了！甚么来了？洋人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贵的、贱的、富的、贫的、做官的、读书的、做买卖的、做手艺的各项人等，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唉！这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

苦呀！苦呀！苦呀！我们同胞辛苦所积的银钱产业，一齐要被洋人夺去；我们同胞恩爱的妻儿老小，活活要被洋人拆散；男男



女女们，父子兄弟们，夫妻儿女们，都要受那洋人的斩杀奸淫。我们同胞的生路，将从此停止；我们同胞的后代，将永远断绝。枪林炮雨，是我们同胞的送终场；黑牢暗狱，是我们同胞的安身所。大好江山，变成了犬羊的世界；神明贵种，沦落为最下的奴才。唉！好不伤心呀！

……

真呀！真呀！真呀！中国要瓜分了！瓜分的话，不从今日才有的。康熙年间，俄罗斯已侵入黑龙江的边界；道光十八年（1838年），英吉利领兵三千六百人侵犯沿海七省，破了许多城池，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才讲和，准他在沿海五口通商，割去香港岛（属广东省），又前后赔他银子二千一百万两。从此那传教的禁条也解了，鸦片烟也任他卖了。

……

到了庚子年义和团起事，八国联军打破北京，这时大家以为各国必要实行瓜分中国了。不料各国按兵不动，仍许中国讲和，但要中国出赔款四百五十兆（每兆一百万）两，把沿海沿江的炮台拆毁，京师驻扎洋兵，各国得了以上各项利益，遂把兵退了。于是人人都说瓜分是一句假话，乃是维新党捏造出来的，大家不要信他的胡说。不知各国不是不瓜分中国，因为国数多了，一时难得均分，并且中国地方宽得很，各国势力也有不及的地方，不如留住这满洲政府代他管领，他再管领满洲政府，岂不比瓜分便宜得多么？瓜分慢一年，各国的势力越稳一年，等到要实行瓜分的时候，只要把满洲政府去了，全不要费丝毫之力。中国有些人，瓜分的利害全然不知，一些儿不怕；有些人知道瓜分的利害，天天怕各国瓜分中国。我只怕各国不实行瓜分，倘若实行瓜分了，中国或者倒能有望。这暗行瓜分的利害，真真了不得。

……

耻！耻！耻！你看堂堂中国，岂不是自古到今，四夷小国所称为天朝大国吗？为什么到于今，由头等国降为第四等国呀？外洋人不骂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中国人到了外洋，连牛马也比不上。

……

奋呀！奋呀！奋呀！于今的中国人怕洋人怕到了极步，其实洋人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怎么要怕他？有人说洋人在中国的势力大得很，无处不有洋兵，我一起事，他便制住我了。不知我是主，他是客，他虽然来得多，终难得及我。在他以为深入我的腹地，我说他深入死地亦可以的。只要我全国皆兵，他就四面受敌，即有枪炮，也是寡不敌众。

……

快呀！快呀！快呀！我这人人笑骂个个欺凌将亡的中国，一朝把国势弄得蒸蒸日上起来，使他一班势利鬼，不敢轻视，倒要恭维起来。见了中国的国旗，莫不肃然起敬，……

读史需明志，毋“自己作贱自己”。否则就“太下三流，卑劣得令人愤怒”了！

##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续考

绿 原

前几个月,为了一桩令人不愉快的掌故是真是假,热闹了一阵子,现在算是消停下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似乎还没有搞清楚。照说真的假不了,可有人为什么硬说是假的呢?颇值得继续考一考,想不到却一直没有后文。今年天气特别热,该不是这个缘故,使得人们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吧?

按管见所及,先是某大报发表了一篇《史学家的骨头》,根据某刊所揭露的“解放后流传甚广的所谓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外滩公园悬挂中英文对照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内幕”(据说,“原来,这是50年代上海一家博物馆为了配合形势教育,不顾史实人为编造了一个受人侮辱的故事,所谓的牌子解放前并未在上海出现过!”),于是便判定这是“哗众取宠,自己作贱(贱?)自己,就太下三流(滥?),卑劣得令人愤怒”!

当时读了,真叫做如堕云里雾中。虽还没读到那篇文章所依据的某刊,但它们(包括同时照本宣科摘录一通的某文摘报)众口同声地断定洋人当年悬牌昭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人为编造”的,我也一点不敢表示异议,因为当年我毕竟没有到上海,自然也没有亲眼见过那块牌子。没有见过的东西,未必是真的,虽然同时也未必是假的,表态还是审慎一点好。但是,将这件讹传(姑且假定那块牌子是假的)委之于“50年代上海一家博物馆”,便不得不

大声疾呼：那可真是冤哉枉也！本人年逾七旬，明明记得远在 30 年代上半叶，斗大字自己还认不到几个的时候，就亲耳听见老师给我们讲过那块牌子，而且是连同汉口租界一个日本孩子打了中国孩子扬长而去的新闻一并给我们讲的。难道我们的老师会向他的小学生们“哗众取宠”么？太不可思议了。

好在不久，各种“反馈”纷至沓来；先是有人从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周作人的日记，接着有人从郭沫若、蔡和森、孙中山等名人的文章和讲演词，最后还有人从上海工部局（旧上海公共租界的统治机构）的档案，以及英国的《不列颠周刊》和日本的《朝日新闻》上陆续发现了证据；原来不是中国人喜欢“自己作贱自己”，而是“所谓的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确喜欢“作贱”中国人，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的确“在上海出现过”！后文呢，没有了。也许果真天气太热，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吧。但问题却原封不动地摆在那儿。老实说，岂止这块牌子是真的，不知还有多少血泪斑斑的往事说出来更令人难以置信，说不定也就更令一些人“愤怒”，这里不说也罢。至于那位提倡“史学家的骨头”的作者，他会不会后悔把话说得太满了，从而吸取教训呢？那是他个人的事，用不着别人操心；何况他不过是轻信道听途说，今后慎重一点也就是了。令人寒心的倒是从他身上反映出来的某种流行的“思维定势”。

没有读到那个始作俑的某刊，只好仍从这位作者说起。从他引经据典、纵横捭阖的架势来看，他的年龄不会太小；但就其中的火气而论，又未必会大到哪里去，很可能（也许猜错了）不过是解放后生人，想不到在新的形势下一变而否认“所谓的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存在，硬说是中国人“自己作贱自己”，以致引起了他的“愤怒”……如此这般，似乎不可理解。其实并非不可理解，那块不合时宜的牌子被人说成“是假的”之后，他之所以“愤怒”起来，是觉得外国人本来一贯对我们好，我们不应当栽诬他们？是怕自己在相

熟的老外面前丢脸？还是从根本上认为提到“国耻”就是“卑劣”？都不是不可能的。然而，不幸那块牌子竟是真的，而不是假的。虽然他的“愤怒”也并非多余。不过，现在值得那位作者以及我们读者每个人“愤怒”的不是别的，倒是害得他或他们“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客观原因吧。

那是什么呢？与其说是始作俑的某刊，不如说是被他们作践的博物馆事业做得太不到家了。据那张文摘报转录，曾经展示过那块牌子的那个“上海市历史与建设博物馆”“尚未正式对外开放就在60年代解散了”，那块牌子由于“大多数同志认为……，只能说明中国人的劣根性”，而被“扔在废物堆内准备最后处理”。足见，在一股莫名其妙的舆论压力下，该馆才把它这样处理掉，致使解放后出生的观众对解放前这段痛史终于一无所知，而没有花点功夫，把它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拿出上述种种铁的证据来说服观众，批驳别有用心者：这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吗？

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另一段经历。几年前在德国波茨坦参观洛可可风格的无忧宫，正在那儿漫步欣赏好一片“凝固的音乐”时，忽然远远望见绿色草坪上立着黑黝黝一尊庞然大物，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座比人还高一两倍的大鼎，鼎侧赫然铸有“雍正三年造”等字样。它怎么搬到这里来了呢？我立即想起了圆明园，随之心便如阴霾的天空，再也露不出愉悦的光采。圆明园始建于1709年（康熙48年），无忧宫建于1745—1747年；前者毁于1860年（咸丰10年），后者至今安然无恙。德国人的博物馆事业可真发达，一点小掌故或传说之类都可以弄成一个纪念碑或塑像什么的，让后人永志弗忘；特别是那轻言细语在你耳边细说的意译风，更令人倾慕不已。可这个大鼎又是怎么来的呢？我在附近转悠了半天，也找不到一个字的答案。未见得是火烧圆明园当儿弄来的，因为后来统率八国联军侵华（1900）的德国当时并未参加那次殖民主义的劫

掠罪行；但也肯定不是花钱从中国买来的，其“内幕”肯定不比“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更光采。当地博物馆为什么单单对这座中国大鼎不置一词，我不了解；他们本国人不识汉字，看见这件怪物肯定会莫名其妙。但是，站起来了的中国人到这里来参观，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原来是从什么姿势站起来了；这一点倒真值得感谢。

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好的！让外国人来华赚钱，也中！对国际友人要有礼貌，更是绝对正确！然而，因此而把过去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的屈辱、压迫、痛苦、愤怒一笔勾销，恐怕任何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不会同意吧。时至今日，诚然我们站起来了，那些屈辱和压迫已是昨日黄花，“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对许多青年都会是陌生的名词。偏偏有些人却致力于磨灭一切新旧伤痕，根本不愿让青年一代认识过去，真不知是何居心。如果近在眼前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都是假的，一百多年前的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岂不更可能是假的？搞不好（例如再不把博物馆业搞好），连“南京大屠杀”在若干年之后也可以引证日本阁僚的胡说八道，被我们自己某些人斥之为“下三流”的造谣，那时再喊呜呼哀哉怕也嫌晚了。

今年天气特别热，说这番话也许更令人烦躁，好在孟夫子帮忙为我道了歉：“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1994.8.8 汗雨后

（原载《大地》1994年12期）

## 都怪中国人犯了贱

老 编

自从北极熊负伤踏地后，恰似共工氏头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倾，东西均势登时失衡，国际政治舞台也随之停锣息鼓。虽然中东、北非、加勒比海不时有小型戏剧上演，但有生没旦，有旦没生，一台戏也唱得不成样子，好比《牡丹亭》，老在“游园”，没有“惊梦”，任她杜丽娘使尽浑身解数，究嫌没趣。

新戏没得唱了，大伙儿不免翻翻旧戏码，来个旧戏新唱，此之谓“翻案”。君不见前些时日本法相永野茂门力辟“南京大屠杀”为捏造乎？又不见西方各地旧纳粹党改装门面成了光头党，厉行祖宗遗教，大排异族，行动日见鸱张乎？李义山句云“留得残荷听雨声”，没有几茎残荷，连雨声都听不到，岂非没趣？因此，翻翻旧案，制造新闻，算是在百无聊赖中聊以赖之。

中国人说“闭门思过”，永野茂门及其同志与光头党中大小各当家有没有“闭门”？不得而知，“思过”肯定是有的，不过不是思自己的“过”，而是思人家的“过”，一本老账翻起来，只翻出自己的理长，人家的理短，老在自己的脸上抹粉，往人家的脸上抹灰，究竟是蛮夷之邦，气窄量狭，上不了台盘。你看咱们龙子龙孙，百数十年来不但思自己的“过”，而且孝思不匮，连老祖宗的“过”也一并代劳了。那“思过之学”，真是举世无匹。

为表言而有征，且引录一段报道：

香港中国通讯社上海 4 月 11 日电：

《世纪》杂志刊登一篇文章，上海外滩公园门前曾树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一事，“纯系误传”，据称：该牌子是 1949 年以后，上海历史与建设博物馆为“配合当时形势而制作的”。……许多专家认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故事缺乏根据，或者说根本没有根据，人为地编造一个被人侮辱的故事只能说明中国人的劣根性……

这里不是搞考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究竟是实在抑或虚构，不拟多议。老编只是奇怪，如果该牌子是中国人有心栽赃，这许多年来何以洋老爷噤口不言？人家人材济济，不要说如此彰彰在目的大事，即连中国大地上的穷乡僻壤、名不见经传的历史人物都摸得一清二楚，此事果系捕风捉影，自有洋专家引经据典去辨证正误的，岂会背了几十年的黑锅？这下倒好，人家肯含糊，咱们不马虎，人家的专家不辨不正，咱们的专家却又辨又正起来了。

之所以要弄这么一块牌子来，咱们的专家认为乃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劣根性”是啥？老编身上没半个文艺细胞，弄不明白，请教文艺界的朋友，好不容易才算有点眉目。“劣根性”也者，“犯贱”是也！

说起中国人犯贱，倒是碍难反对的。就说文章罢，肯定传统价值的文字如果有人拿来覆瓿投溷，算是作者的祖上积德，盖虽不是用来看而是用来揩屁股，究竟还有些许价值。至于那些专鞭老祖宗尸体的文字，大家可就来劲了，你看一个个龙颜大霁、龙心大悦，鞭尸鞭得愈厉害，悦的劲头就愈大。因此，《霸王别姬》与《蝴蝶君》这类电影一推出来，真是众情咸悦，雅俗共赏。洋老爷那边更加乐不可支。嘿！原来赛泥屎不但搞同性恋，而且源远流长，可见吾道



不孤了！感动之余，说不得抛几个啥啥奖意思意思，特兹鼓励，以策来者。有人不识好歹，偏要指手划脚，如名角张君秋看《霸王别姬》，就曾拍案而起，怒斥该片“程蝶衣”一角，演来“舞台上不像女人，舞台下不像男人”，不三不四、不四不三云云。真是缺了把子的便壶，从何提起！盖大伙儿欣赏艺术尚在其次，最要紧是凑鞭尸的热闹。咱说张大爷，您便省把劲罢！也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果真是一团糟？没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何以不见有人拍几部电影介绍一下？你说啥？这样的电影有人看么？就算有人看，人家洋老爷会颁个啥啥奖给你呀！至于拿人家皇室的菊花表征设计“国旗”，以当日本人为荣，当中国人为耻的，大有人在焉！究竟是否中国人的“劣根性”？得请教心理学家。虽然，此乃只许做、不许说的事，老编不识相再罗嗦下去，得罪的人可就多了，还是就此打住可也。

且说咱们的专家何以会有这份雅兴替洋老爷翻其旧案？此乃想当然耳！你看洋老爷开口“民主”，闭口“人权”，大至鲸鱼，小至蜥蜴，蛇虫鼠蚁，一律保护如仪，何况彼此同属圆颅方趾？若非如此，博学如方励之教授如何会说出“洋人没有种族歧视”的话来？以今概昔，人家仁慈厚道，怎会干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荒唐行径来？寄语各位专家，如大驾惠然奔向蔚蓝色的海洋，洋老爷定会倒履相迎，待之如丹顶鹤、护之如大熊猫，这一身的福推都推不掉的也！

也有人说：南非联邦黑人在获取政治权利之前，“有色人种不得入内”的牌子随处可见呢！你说啥？瞎扯！没有的事！南非的白人不是英裔就是荷裔，系出白人中最尊贵的诺狄克(NORDIC)种，人家大公至正，民胞物与，岂会这般野蛮？“有色人种不得入内”当然是为了配合形势而造出来的谣！谣言止于智者，专家自然都是智者，是不是？

咱们的专家愈来愈睿智英明，看来终会有有一天考证出“南京大

屠杀”是为了配合形势而捏造的,什么“胶东事件”,什么“七七事变”,都是无稽之谈!最近不是有一位超级专家说过,“中国要富足康乐,先得被殖民一百五十年不为功”的话么?以此推论,大日本帝国哪里是侵略中国?那是中国人恭请“太君”们来殖民的哩,只可惜雄图中沮,否则中国人早已人人洋房、个个汽车了,何需费偌大的劲改革来、改革去?

那么,“八年抗战”如何定位?呸!抗什么战!活折腾!当初大家安安份份做“顺民”不就结了?有福不会享,都怪中国人犯了贱!

(原载澳洲《汉声》杂志 1995 年 2 月号)

## 洋奴的嘴脸

郑永慧

天地有正气,世间不乏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顶天立地的铮铮汉子。他们虽不像颜常山那样在对敌斗争中战败被俘,不屈而死;他们却在异国纸醉金迷的环境中经受多年的考验,没有丧失人格、国格,最后摆脱了高位厚禄的诱惑,回到自己的祖国,报效于父老乡亲。他们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不愧为我们时代的英雄。然而正如最上等的酒在酿酒桶里也不免有酒糟一样,在英雄的下面,还有渣滓。这些渣滓是一群目光短浅、只顾一己私利的无耻之徒,他们对西方的汽车洋房崇拜得五体投地,因而在洋人面前自觉低人一等,腰板直不起来,膝盖只想下跪。他们千方百计要到外国去,到了外国,似乎就同自己的祖宗十八代断绝了关系,第一件事就是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自己的祖国和同胞,向洋主人摇尾乞怜,讨洋主人的欢心,让洋主人收容他们。洋主人从狗嘴里取回一根骨头,扔给他们,就买下了他们。他们一生的憧憬,就是躲在异国领土的一只角落里,拥有自己的一个窝儿,安安稳稳地当个下等公民,享受别人祖先开拓的成果,承认拿破仑或者华盛顿是自己的祖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青春和贞操,不惜献出自己的妻女。一旦有所成就,他们马上向家人报喜,吹嘘自己已经登上了天堂。他们忘记了哺育他们的祖国大地,忘记了父老乡亲们正在夜以继日地辛勤劳动,去迎接富强中国的

诞生；临产的阵痛触动了他们的小利益，他们就一走了之，把白粉朝自己黄皮肤的鼻子上一抹，混进白人堆里，寄人篱下，吃些残羹剩饭。他们成了洋奴，永远跪在尘埃里仰视主人，总觉得主人高不可攀。主人心里对他们充满了歧视和轻蔑，他们和主人之间没有什么平等可言，但是主人只要在某些社交场合，对他们微微颌首，有时甚至能叫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就惊喜欲狂，高呼“民主万岁”！恨不得去舐主人的脚后跟。这种人为了自己的小小私利，卑躬屈膝，卖身投靠，无以名之，只能称之为衣冠禽兽，将他们归入跪在岳飞墓前的秦桧一伙。

前些日子，收到美国来信一封，谈的就是这一类人。现将信公布于后，让大家看一看洋奴的嘴脸。

……您的信很让我鼓舞。从照片上看，您老仍像先前一样，很健康。我为老师的健康感到由衷的高兴。

您老对W的评语，我完全赞成。（郑按：W原是某学院教授，流窜美国后，常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向祖国射出恶毒的诽谤之箭。）来美国这些年，我一直在为我们的一些国人在美国的丑行感到苦恼，常常为一些知识分子堕落之快、之深感到惊讶。台湾来的中国人常常因此看不起大陆来的中国人。每当我的美国朋友谈起一些中国人的行为时，我只好对他们说，到美国来的一些中国人，已经被异化，已经不是典型的中国人了。我这也许是自欺欺人，但这样说后，心里感到好受些。读了您老的信，我又觉得我没有说错，事实正是这样的。

我在佛蒙特念书时，同学中有一位北京来的女同学，其父母均为大学中文系教授。她来美国后一直跟学校里一位退休教授同居。我们中国同学不知就里。一天，该教授托这位女生请我们去他家吃晚饭。席间该教授（已经七十多岁）用手托起该女生的下

巴,用教训的口气对她说(当然也是对我们说):“You’re mine!”(郑按:you既可作你亦可作你们解,mine既可作我的亦可作我的东西解。)该女生出乎意料,我们更是出乎意料。但女生毫无抗议举措,我们也无可奈何。还有北京来的另一位女生,在国内是攻美国史的,英语的听、说、写全不过关。上课根本听不懂,我为她在课堂闹出的笑话感到难堪。她为了能够过关,只好在老师中找“保护人”,保护她过关,当然她为此也要付出代价了。

许多在国内时看上去道貌岸然的“学人”,来美都变成了人家的“走狗”。刘宾雁、王若望等人来美后全靠骂中国共产党来领取美方的津贴。刘宾雁自己接受台湾报纸的采访时自供,来美后与其他许多“精英”,无所事事,每星期到校方领取生活津贴而已。而津贴来源据刘讲,是一位匿名的“好心人”捐了一百万美元来“供养”他们这些“精英”。刘宾雁与王若望等人,在国内时,我对他们尚有一丝敬意,看了他们来美后的作为,原有的敬意全没有了。

中共在当政的过程中,犯了不少错误,伤了不少人。要讲吃苦,您老并不比刘、王以至W等人少。但您老对祖国的赤诚不变,更增了我对老师的敬意。看中共的功过,要历史地看,评价中共,不仅仅关系到中共,还关系到祖国。古人有投鼠忌器之虑。我们要评议现代中国,也不能不三思。我来美后看一些国人与美国学者异口同声大骂中共及其政策,把中国说得一无是处,一片漆黑。我深不以为然。写了个百多页的论文驳斥。既说了某些过失更进一步谈了某些进步。特别是在农村。Monthly Review出版社一直在催我增加一下篇幅,作为一本书出版,我因学业忙,无暇顾及。台湾一帮学者想在台湾以中文发表,我已表同意。我写该文,一是出于尊重事实,同样也是对那些卖国求荣之徒表示驳斥。

在美国一切都是有钱的,人格、尊严都可以出售。一位自称毛泽东同志私人医生的人前不久写了一部关于毛泽东同志的秘

闻,售价 50 万美元。我读了该书的片断,觉得完全是一派胡言、100%的恶意诽谤。但英国 BBC 公司不管真实与否,拍成纪录片在全球发行。中国有位张姓的名作家逃亡美国,下机伊始,第一句话便是他有证据证明中共在文革当中有吃人肉之暴行。其所谓证据是他偷着复印的云南某一少数民族地区公安局的档案材料,记载该少数民族的中学生在文革中武斗杀人食肉。美国各大报纸、电台争相报道。这位作家为何要在下机伊始,对这件发生在十几年前中国边远地区农村怪事大作文章呢?无非是向美国人讨好而已。殊不知美国这里杀人吃人的事也时有发生。两年前有一叫达玛的人连续杀死十几名少年男女并蒸食受害者的心脏。这位作家后来到哈佛讲学,又大谈中共杀人食肉之事,被一位台湾来的社会学博士生提问,当众出丑。该台湾人问他知不知道该少数民族本来就有杀吃仇人之习俗?他说不知。该台湾人又进一步阐述该少数民族在中共掌权后,放弃了食人肉的原始习俗,文革时中共领导权削弱,该原始习俗复萌。该生质问他把这种少数民族原始习俗归罪到中共的领导是否合理,是否正当?该作家无言可答。从此不敢再招摇。

您老要我们海外学子以 W 氏为戒,我认为很重要,写这封信让老师放心,也让老师知道我的立场,我决不会做任何有损祖国的事。……

中国每年出国深造的知识分子,数以万计,像来信所说的那些洋奴,只占极少数,出国人员中绝大多数人都抱着学习人家的长处,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回国后可以更好地为祖国服务的崇高目的。他们没有忘记父老乡亲们掏出血汗钱,把他们从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培养到出洋留学,在中国的繁荣富强指日可待的今天,他们愿意回来一齐作最后的冲刺,使祖国摘除贫困落后的帽子,达

到人人富裕,个个文明。只有自己亲手缔造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贪图享受别人的成就,吃嗟来之食,只能把自己的身价降为奴仆。我们谴责这些洋奴,不仅仅是还爱国者们一个公道,还将这些洋奴嘴脸曝光示众,让善良的人们共同唾弃之。

(《中流》1995年第2期)





## 第三章

# 一个留学生的思考



# 一个留学生的思考

——《友人书简》之一

丹 阳

**编者按:**这篇《友人书简》是一位对祖国一往情深的中国学人,从大洋彼岸投寄本刊的。信中涉及到了作者在异域生活中,对许多根本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我们很愿意把它推荐给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

文琪:

那天接到你的电话,真是高兴,谢谢你对我生日的祝贺。那一番长谈很是解渴,我们触及到的问题是有深度的。放下电话后,却又一直想给你再写封信,有许多想法,电话上似乎总是说不清楚。今天是周六,刚好有点空,给你写上几笔。

我们这一辈留学生何去何从,在北美七八年前就是一个公开的问题。记得当时在 M 州领事馆工作的一位官员,利用自己的身份和便利,替女儿谋到本科生的奖学金,这位千金入学不到半年,便将留美学人划成几种:一心回国报效的,犹豫矛盾观望的,糊里糊涂无所适从的,铁定要做美国人的。当我问她是属于哪一种,答曰:“当然是最后一种。”再问:“为什么呢?”她瞥了我一眼,似乎很奇怪怎么有人会提这种傻问题,再不屑回答什么,转身与别人交谈去了。这是在 H 大学 1985 年的校庆联欢会上。你们旅欧学生,也

许是像你说的,情况很不相同;由于中国人在欧洲就业几乎没有可能,社会上对移民歧视极深,能够辗转来美的毕竟是少数,总之,留学界逐渐变成移民群,你认定旅美学子中的聪明人是始作俑者。

这个说法,如果在留学生圈内看,我想大致上是不错的,但是从更深广的历史范畴看,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值得细致地分析。首先,80年代的留学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是通过考试被选拔派遣出国,以求深入西方,掌握各种有用的知识和技术,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路。是中国现代史的发展巨浪,将我们推上了西方主导了一个半世纪的“世界舞台”。忽然间,我们有了一份从未体验过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独立感,也有了一份作客他乡,不必履行当地居民义务责任的特权;处在中美两不受制的社会真空地带,一方面享受着空前的“自由”,一方面滋长着寻找自己在这个大舞台上合适位置的焦灼。大多数人迈出的第一步自然是做“尖子学生”。在美国学术界怀疑地审视我们课业成绩的眼光下,我们用自己的言行证明,中国留学生是世界上聪敏、坚忍和勤奋的优秀青年人中的一部分;北美各地主要的大学中,中国研究生数量迅速增大,越来越多的美国教授尝到招收中国学生作为自己科研助手的甜头。待到《大西洋》等一类重要的杂志撰文,惊叹中国来的学生“改变了以往的评分标准”,使美国原先的尖子学生不再是尖子,留美学人可以说是初步打开了自己的局面。同时,分化也旋即或明或暗地出现。一部分人在各自的领域中努力深入,竭尽全力探索、搜寻着对中国有用的一切知识和信息,他们的知识天地是世界的,他们的关注中心则是中国。另外一部分人则在长达六七年的研究院生活中,先是以美国电视电影排遣寂寞,逐渐视其中的人物为模仿对象;美国社会心态的三大要素:金钱、权势和肉欲,对这部分人产生了某种下意识的影响,遥远的故国是越来越遥远了。还有一部分人即是我称之为“聪明人”的,他们在赴

美入学后的半年、一年内,便暗自细细地捉摸着美国就业市场的机制和行情,调整自己的学习和生活,集中全部的心思,最早地进入了移民的过程。中国对于他们只是人生路上的一块跳板,一块垫脚的砖石,一块用过之后尽快丢弃的抹布而已。

与此同时,世界史上历时四十多年的“冷战时期”被苏美两国的首领们十分慷慨地宣布结束;正在到来的新世纪则被美国一个国家的总统捏到手掌心里,笑眯眯地转上几圈,再打开,现出以美国利益为轴心的“世界新秩序”,就像法海和尚的宝器,似乎足以使一切不服管教的异族大众运交华盖。生活在这个“新秩序”轴心地带的中国留学生,坐在各自的起居室里,通过美国跨国公司资本控制的电视报刊传播媒介,随着那一幅幅、一篇篇经过精心选材、拍摄、制作、讲解的新闻画面和报道,去“目睹”、“判断”那几万里外,发生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地区的大事变。不知不觉中,所有这些涵义极其复杂的事变,都化成了一个不断重复的强刺激讯号:在这乱七八糟,充满暴力和动乱的地球上,美国政府是世界上独一无二不撒谎,不营私,不捣鬼的政府,美国社会是世界上仅此一家人人平等个个快乐的天使大乐园;想要证明你自己是世界上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么?那就看你是否能够运用一切手段,挣上一张“美国人”的长期饭票了!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留学界,在自身的和外界的各种条件交错作用下,就此卷入了一场核心是“美国至上”的飓风中。

本来,任何一个国家“至上”不“至上”,跟我并没有什么大关系;同辈中有人逐渐融入他们辗转多年的北美,我也十分理解;由于个人的能力、志趣和机遇的不同,落脚谋生之地的选择也不同,这本应是生命的一种常态。只是,不幸得很,就像纳粹日耳曼人的自视优等是建立在践踏其他种族尤其是犹太人的生命尊严之上,这份“美国至上”的激情在极大的程度上是靠“中国低贱”的诅咒支

撑的。正好比是没有低等人,高等人何以显示其高等,没有中国人可怜巴巴的绝望相,也就衬不出拿着美国护照的春风得意了。于是,文琪,像我这样知道并且认定自己是一个中国的小百姓,就不得不对俯视着我的“高等人”去作一番审视了。

“美国人”,这称呼意味着什么呢?有位熟人曾冷笑着说这意味着“有饭吃”,那言下之意是要我别清高臭美,饭是人人要吃的!我当然不例外,我的生命中,吃饭问题向来重要,从未敢有“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美梦。所以,当看到这位衣冠楚楚的老同乡一边引用我们古代圣贤的格言:“民以食为天么!”一边掏出巨额美元去办移民手续,我则一面佩服他的富有,一面便忍不住奇怪这么有钱,何以在中国没饭吃?直到有一天在电视上看见美国一家大食品公司的广告,画面上是一块越来越大的上等牛排,衬着两行字幕:“你是什么人?就看你吃的是什么样的饭!”我才悟出,那位对祖训十分忠孝的同乡,不是吃不起饭,而是看中了另一类饭了。这当然并不是说此位仁兄爱嚼牛排,他通烹调,很知道中国菜的佳美;他更通国际市场,知道用能买牛排的钱去买中国菜,其中的利润如何可观!这使我想起一位意大利女友写给我的名片:“丹,我真的去了中国!我还去了长城!虽然只有半个月,但玩得很痛快!那儿的人没什么钱,东西也真是便宜,我的美元忽然变得那么值钱,我也成了富人了!你知道我最喜欢做的事是什么?——吃中国的美味菜肴!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美国人!”

我是几年前一个夏天去欧洲时,在巴黎一位朋友家作客认识她的;朋友介绍我从美国来,这位罗马一家大商店珠宝柜台的店员小姐心下就决定把我当美国人了。她不相信能在美国就业的人竟会不想做美国人,其不相信的理由,在这张明信片的寥寥数语中显露得很清楚。她没有说错,在今天的世界上,美国是物质上最奢侈

的国家,也是政治上最有势力的国家,能够挤进挥舞星条旗的美国中产阶级,便意味着在世界各地民族中爬上了有钱有势的阶层。这份有钱有势的甜头,在作为美国人跑到二三等国家地区去的时候,感觉最为酣畅。简单地说,这里的一般中层公民,他们的收入允许他们时而光顾在本国的快餐类小饭馆;而同样的一笔钱在中国花,他们能够进去的就是上海和平、锦江、希尔顿,北京长城、建国、香格里拉了。美国中产阶级极热衷旅游,与这份异地所得的特殊心理满足,也许是很有关系的。

能够吃上美味佳肴,本身是件好事;我也非常喜欢精美可口的食品。只是人不仅会吃,人还会思考,毕竟与猪类不同。比如,一个人吃了一顿格外丰盛的酒宴,在剔牙齿的时候,也许会朦朦胧胧地想到:这顿酒宴是怎么来的?那位当店员的意大利小姐如果问一下自己是什么使她觉得自个儿在中国吃喝玩乐得“像一个美国人”,如果想一想,这同样一笔钱,来纽约吃同样的中国餐,几天就会难以为继,她那份暂时跻身“有钱阶层”的快乐,也许就不那么纯粹完美了。她也许会想到,这是由于中美两国在世界现存的经济与政治秩序中的不同地位;而这两国之间的等级差别,就使中国与美国同等的劳动力价值在化为交换价值时变得不同等了。而劳动力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落差越大,从中可谋的剩余价值也就越高。不是么?穷国摆脱其穷困的艰难,富国强权在不发达国家不断获取廉价人力和廉价资源,不断扩展倾销商品的市场而变得益富,根源之一不就在这里么?而当这样的致富手段受到威胁,哪怕这威胁是来自于原本是家奴的一族酋首,强权主子的导弹就直飞到那一族的妇孺百姓头上去。1991年年初的波斯湾战争,无论美国如何披挂堂皇的彩带,阿拉伯的石油,实在是美军大打出手的重要原因之一。记得当时在《华盛顿邮报》上看到一幅漫画,画一个记者向报纸读者提问:“为了我们美国人冬天在房间里也能穿T恤衫,

先生们,你们认为该杀掉多少阿拉伯人?”众先生齐答:“所有的阿拉伯人!”作者的尖锐,真有点让人触目惊心。确实,翻开《纽约时报》商业版,涉猎《华尔街报》的各种讯息,琢磨伦敦《经济学家》的文章与数据,人们可以看到所谓“地球村”里世界经济的大酒宴上,各色人等鏖战正酣,有在这酒宴上颐指气使,肆意饱餐的;有陪着笑脸,递酒上菜的;有仗势欺人,向着邻座盘中巧取豪夺,却满口“人权、自由”的;有不甘饿着肚子任人掠夺,辗转挣扎全力抗衡以求生存的;有铤而走险从挣扎转为公然抢人一系列的;有虽吃不上却盼着有残肴可尝的;有嚼着残肴闭着眼睛等着终局的……发现了剩余价值秘密的马克思,虽然与我们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生在世上的时间、地域也不同,却有一条使我深深尊重的:他对于这酒席上巧取豪夺的一类,绝不苟随,绝不粉饰;他对于辗转其中挣扎求生的人们,是感同身受的。可以这么说,文琪,我是留学美国之后,才开始理解马克思作为一个西方哲人的可贵;他的工作并非十全十美,但却是世界上一切在现实人生中诚实地思考的人,至今无法漠视的。

是人,都在这个世界上吃饭;只是怎么个吃法差别真是太大了!记得80年代中后期有些中国学者论证中国的文化就是“吃”的文化,这弱肉强食的西方大千世界,其文化的主体似乎更是个“吃”字!而主导着这一文化主潮的,自然是廿世纪后半叶起世界第一超经济强国——美国。这几日,我又翻了翻S. Ambrose写的《应接全球性的权力——美国对外政策史评(1938~1976)》,译上其中两段,咱们一起赏析:

“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变化对于美国都是事关重大的看法,与1938年美国的世界观,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这种改变的原因之一,是美国海外军事基地惊人的发展增长。在(二



次)大战结束时,美国的军事机构像潮水般涌入许多权力空间;而一旦美国的军队在异土上驻扎,那片土地就被列入美国的‘必不可少的利益’名单。但是,美国起而应接全球性的权力之举绝非是无意识不自觉的,正如绝非仅仅是对所谓共产主义的挑战的反应。二次大战期间,当《生活》杂志的亨利·路斯说20世纪将是美国的世纪,他为多数的政治领袖,美国商人及军队说出了心里话。政客们寻找着那些美国的影响可以占统治地位的地区;商人们寻找着可以牟利的市场和新的原料来源;军队寻找着海外基地,他们全都发现了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使得一项没有内在限度的扩张计划揭开了帷幕。”(见该书20~21页。)

这一幕对于贫弱民族意味着经济政治与文化全方位掠夺与控制的扩张剧,融合了欧洲19世纪殖民主义者所有的基本特质,和20世纪科技发展所提供的一切日趋复杂、精细的新的方式、手段,进行了半个多世纪,却阻挡不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与抗争。这些国家民众坚忍的自强,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的宣传媒介里自然无迹可循;然而他们的存在与发展是无法回避的。Ambrose似乎非常敏锐地感觉到这些在西方史书里隐没掉的历史意味着什么,并且由此而对“金元帝国”的前途,生出一份“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的忧虑:

“当美国创建着它的帝国,与之同时它的商人、军人和政客源源进入拉丁美洲、欧洲、东南亚以及几乎是所有的其他地区,它的领导群很少考虑美国的权力是否是有限度的。那狂乱的扩张,那以天文速度增长的‘必不可少的利益区域’,在华盛顿、华尔街和五角大楼看来,似乎是完全正常和自然的。……至于第三世界会对此产生愤怒,以及最终反抗美国的控制与统治,是不在考虑之中

的。”(见该书第 21~22 页。)

Ambrose 这最后一句话不是很准确;第三世界的自强不仅一直在“考虑之中”,而且是一直在被时明时暗地遏制和戕伐着。变革中的当代中国人,半个世纪以来何曾有一日摆脱过这遏制和戕伐的阴影。远一些的,我们还记得中国进入联合国的艰难;近一些的,我们都看到,当中国老百姓两年前与大洪水搏斗以求生存之际,全世界最高尚仁慈的“人权”领袖,天底下最富有奢侈的超级大国美国,慷慨地拨出两万五千万美元,像那些穿裘皮大衣的太太打发纽约第五大街上的游魂乞儿一样,“援助”了近两亿的中国灾民。至于前不久发生的“银河号事件”,只是又一次告示了全世界,美国政府是如何任意搜查中国的远航货轮,随意侵犯中国的国际权利!在如此种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心态的遏制与戕伐中求生存,我们不得不全力自强与自新;而要自强与自新,我们又必须面对西方世界,深入西方社会,在一切方面力行鲁迅的拿来主义;在这强权当道的“世界村”中,磨炼自己的眼光、能力与意志,在不断的观察、抉择和探索中,走出自己的生路,而决不被轻易愚弄,任意歧视,肆意剥削。这其中的复杂与艰难,是我们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在这世纪的转换之际,都深深地体验着。从这个角度看,文琪,处在中美交界湍流区的中国留学界,只要放弃中国的利益,便可荣膺 20 世纪中心大酒宴上权贵们的跟班或者门客的各类学人中,分化是必然的。痛苦是必然的。有人用尽心机挤进这酒宴上巧取豪夺、肆意饱餐者之列,也是毫不足怪的。只是,文琪,我自知缺少这份肆意饱餐的心肝;因为我怕自己会在幽深的睡梦中,看见那精美的大牛排血红的肉纹里,沾有故土亲人们艰辛中的血汗和辗转中的生命。我实在没有我们留学界里那些相互选出来的“总裁们”做大生意的伟人胆气;看着他们整日地游于美国政客权棍之间,“大

义灭亲地”乞求美国或者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或者对中国“严加”各种各样的“制裁”,好让中国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难一点,我总想问问他们,晚间美食大宴之后是否闹过胃绞痛;而夜半梦中,又是否有过被说着中国话的群魂索债,逼出遍体冷汗的情形呢?!

就写这点吧,下次再接写。

等你的信。

丹阳

1993年12月4日

(《中流》1994年第1期)

## 令人悲哀的卑谀心态

——《友人书简》之二

丹 阳

文琪兄：

来信收到，读了好几遍，很解渴。我同意你对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国家在控制世界不平等格局中使用的一些手段的分析。我也深感：在这些手段中，文化心态的操纵和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而近年来在这不平等的世界格局下生活的同胞中发展蔓延的某种卑谀之风气也一直使我心难静，意不平。

大约是在 1985 年的深秋，我还在 A 大学念书，一日傍晚，接朋友电话，说是国内新来的一位访问学者 M 教授，想见见我；因为他得知我的导师之一 D 教授是美国近年来学术界重要的知名人物，想向我了解些情况，并希望能去听听课。我放下手中的功课便去了朋友住处。三人聊至半夜，尽兴而归。D 先生确实是我所见到的美国学者中头脑异常敏捷，见解极其尖锐的一流人物。他研究欧洲近代思想史，走的是一条从哲学到历史到文学，然后又回过头将文、史、哲熔于一炉的研究道路。这样一种综合性的思考方法，在中国人看来，很容易理解，虽然很不容易做；但在以精细的理性分析和严格的专业分工为正宗传统的西方学者中，这种方法显得格格不入，人们不知道是应当将他列为文学理论家，抑或思想史家，还是哲学批评家。因此，他的名气是与日俱增；但在同僚

中,他实际上颇感孤独,且常有被人党同伐异之危。从太平洋彼岸来的中国教授不仅知道他的工作,还想去听他的课,则不啻是一份难得的肯定了。

第二日,我早早到了教室,告诉 D 先生,有一位中国来的 M 教授很愿意听听他的课;看着 D 先生脸上几近孩童得到奖励时那样的笑容,我的心情也很愉快。毕竟,中国学者在人类文化的研究建设与交流发展中所担任的角色,还是有一定份量的。

M 教授进了教室,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一瞥见 D 教授,脸上立即现出一种几近谦卑的笑容,急步前趋,弯着腰背,满头的白头一颤一颤,使我的心也随之发起颤来。他双手握住 D 先生伸出的右手,连连感谢 D 先生允许他来听课。然后是一大篇近乎阿谀的赞美之词。一份尴尬掺入 D 先生原先明朗的笑意,他转脸向我看过来。我则转身走到窗前,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听见。我已经记不得 D 先生那天讲的是什么,只记得下课时,当我一边走出教室,回身看 M 教授,忍不住说了一句:“你为什么对他那么……客气?”他看了我一眼,叹了一口气,说:“咱们不懂人家的东西,只好这样呵!”我犹豫了一会,终于还是轻轻地说了:“其实,这也不必要的!”他默然,脸色有几分感慨,几分悻然,还有几分黯淡……

走向图书馆的路上,我想了很多。中国人之于西方,大约常有一份难解的“情结”:不是蔑其为“鬼子”,就是尊其为“大人”。对于“咱们不懂”、“咱们没有”的东西,或者是视为废气毒品,或者是捧为圣丹神药,而不善于在争取平等的奋斗中了解这些东西,在扬弃创造的过程中掌握这些东西,使之能为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所用。博学与资深如 M 教授尚且如此,可见国人要做到既有自尊而又敏于汲取别人的经验长处,既有深刻的危机感而又不失自强不息的主心骨,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这些想法,文琪,我至今仍然自认是对的。只是流淌的岁月使我看到了更多的人和事,使我的思考增加了更多的层次与角度。我慢慢体验到某些国人对西方表现出来的那份或含蓄或直露的卑谀之气,并不仅仅是他们单方面无力自处自持的结果,人间万象,就没有这么简单的。

我永远记得 1988 年的一个冬日。

当时我已经修完全部必修的课程,正集中精力写学位论文。整天关在房间里与电脑为伴。一个月下来,也觉得单调,看到那一年东亚研究中心开设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大课,一周只两次,便心血来潮,决定去旁听;一是调节生活,二也是可以了解美国对中国研究的状况。我主修西欧文学与历史,平时完全没有时间顾及其他。

主持这门课的是历史系一位长着亚麻卷发身材瘦长的男子,面色苍白,举止温文。从他那里要了一张课程安排,逐段看完,便觉得有点不对劲。整个学期 14 个星期的课,其中前 6 个星期讲孔子中国,后 7 个星期讲搞改革的邓小平中国,中间那一个星期两堂课 110 分钟讲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和到 1978 年止的当代史的各方面情况。这是门普及性的大课,听课的有三百多学生,来自全校各系。他们对中国了解极少。这样的课程结构,会在学生脑子里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呢?我带着满脑的疑问和好奇去听课了。

六个星期的孔夫子,详尽琐细,内容听起来是陈腐之极。对孔教规范的描述,使美国的青年人不仅很快觉得疲倦,而且渐渐生出厌烦。尤其是孔夫子对吃相、坐相、走相、说话相、穿衣相等诸多的礼节,更使在上课时都能堂而皇之地将长腿搁到桌面上的学生大为反感。于是,到了第七个星期第一堂课,55 分钟里囊括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课堂里便发生了这样的情形:

教授先用几句话总结了前六星期的孔夫子礼教规范,然后用另外几句话完成了对鸦片战争的描述:“我们讲了孔子的主要思想以及根据孔子的道德伦理人们必须遵守的种种规范。(学生面呈厌烦状)人们看到,做到言行规范化是很麻烦,并且常常是不方便的。历史到了1840年,英帝国出动军舰,为了鸦片贸易进军中国时,中国军队试图抵抗。(学生感兴趣)但是,非常自然地,只在几分钟之内,中国就落花流水了。”他淡淡地一笑,摊开双手,耸了耸肩。从听讲席三百多名学生中便漾出一片哄笑,好像看到一个老弱不堪、烦人烦了六个星期的孱弱老头,虚张声势地跳到美国橄榄球场上,还没有来得及动胳膊动腿,就被人几下踢出了脑浆一般好笑,好玩,解烦,解气。

我坐在三百多哄笑的美国学生中间,浑身一阵发冷,脑子却一阵发热。我心里立刻涌上来的,是林则徐严峻的面容,虎门全体战死者的尸体和血,还有圆明园无声的废墟。我下意识地四下扫了一眼,坐在我旁边的一位新结识的朋友玛丽安注意到我脸色,一双蓝得清澈的眸子关切地望着我:“丹,你没事吧?”她柔声问,记笔记的手早停下了。我努力控制着内心冲动着的怒气,平静地说:“这个教授讲得水平非常低,但玩弄材料倒很会用心思。”玛丽安似懂非懂,但用力地点头,大概是觉得她这样做能使我感觉好一点。

我坚持听完了这门课。后面七个星期的讲课围绕一个主题:中国正在努力摆脱共产党治下的枷锁(虽然学生在前面匆匆两堂课中,跟着教授翻着跟斗跳过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史,混沌中很难说弄得明白什么是共产党),中国11亿人民正“跟着感觉走”,这感觉就是“跟着美国走,跟着华盛顿示意的中国道路”走……

文琪,这是80年代末,在美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人们得到的中国观。当中国留学生不得不与脑子里印着这样一幅中国画像的人们打交道时,付出的心理代价就可想而知了。这门《中国历史

与文化》雇有三名助教,其中两名是主修中国政治的美国学生,另  
一名是中国留学生。他戴一副银边眼镜,英语流利,眉目清秀,只  
是那脸上冻结着的微笑,眼睛里游移的神色,尤其是对主讲教授脸  
色阴雨云晴的敏感与乖觉,使我有种说不清的悲哀之感。他好像  
做学生做得太久,做糊涂了,做成了奴才的模样;又好像是今天被  
人损一句,明天被人踢一脚,身心与肌肤都已麻木,自己的感觉究  
竟是什么早已不重要了。主讲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虽然这一回,课  
堂上讲授的,并不是 M 教授为之俯首的“咱们没有”、“咱们不懂”  
的圣丹神药,而是咱——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这一次经历的意外收获之一,是使我懂得了在美国, D 先生那  
样的人的可贵。师生不是主仆,就好像现代化不是殖民化一样,在  
我原是不言而喻的天经地义; D 先生待我的那一番平等与坦诚,我  
一直是视为理所当然的。但是,时日终于使我渐渐明白。文琪,我  
们从一个曾经倍受欺凌的国家走来,背负着生活与求索的双重压  
力。在美国这个西方第一位超级强权的国度里,在相当数量自觉  
不自觉地充满了种族优越感的人们中,不仅平等待我的朋友寻觅  
不易,而且,倘若不小心,还很可能失去自己对自身生命的认识与  
把握。先是再也无力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进而则将有钱、有权、  
有势者的暗示误作自己的“感觉”和“前途”,追随这样的“前途”而  
去,把自己的金子也当作沙当作土抛弃,至于带点比 M 教授更明  
显,更自觉的卑气与谀气,还是其次的。

写到这里,文琪,我可以回到这封信的本题了。正是这样一种  
带着或隐或现的卑气与谀气的社会心态,在一部分同胞中蔓延,使  
一些国人在不知不觉中戕伐着自己对世事独立的感知和判断力,  
而这种被戕伐的感知和判断力与大洋东岸起因复杂的西潮相互作  
用,便使得一批又一批中国人在带着各种各样“平等竞争”的幻想,  
踏上了白人统治的北美大陆。之后,在争活路、找饭吃的冷酷的社



会现实中,一些人明明是做了牺牲品,却坚持自己是进了伊甸园,明明是经受着身心殖民化的惨痛磨难,却拍额称庆说获得了“现代化”的再生洗礼。这一切,都使我在沉静的书斋中沉静不下去。我做不到!文琪,我做不到轻巧地唱上几句“人生很无情,世界很无奈”,便心平气和地作壁上观;或者连壁上观也不作,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我已经这样装过几回的,一辈子装下去吗?!

等你的信。

丹阳

1993年12月20日

(《中流》1994年第3期)

## “变相难民营”

——《友人书简》之三

丹 阳

文琪：

这么快就收到你的信，很高兴。你对“卑谄心态”的概括是准确的。确实，这种心态让人犯的最大错误，一是以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靠拍“强食者”的马屁就能保住自己的生存；二是以为凭着心理上与巨富权贵的认亲，自己也就挤进、或者有望挤进上等人之列。我也同意你对制造这种“卑谄心态”的弄权者们的概括，你信中对他们的描述和分析，实在是入木三分。

文琪，我有时想，是不是所有有权势欲的人都需要他的弄权对象的感激涕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既保证他的权势的行情上涨，又使得他们在损了人的牙龈之时，还能岸然自称是行善布施。既得了天国里基督般拯救世界的圣名，又得了地面上穷奢极侈的声色享受，这么两全其美的生意是只有“愚不可及”的人才不要，而只有弄权势的人才能得的。由于职业环境的差别，我看到的这类人表现形式与你碰上的那些先生不同，但骨子里的东西是一样的。我在 H 大学做学生时，就领教过这样的人。

与其他一些名牌大学不同，H 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既不是中国当代史的专家，也不是中国政治学的权威，而是一位自称真正对中国文化有感情的 F 教授。据说他娶过两位中国女子作

太太,本人则对现代小说很有研究。

在我到达 H 大学的第六个星期,我的指导教授 D 先生,大概是看我终日坐在一班金发碧眼的学友中间,跟他们一起谈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弄得疲惫不堪,出于一份侧隐之心吧,周末特地陪我去参观了学校博物馆的东亚部,花了两个多小时,恭听我的讲解,并且很有兴味地提出了许多问题。我们正谈得起劲,一位先生走过来,微笑着问:“我能参加你们的这么有意思的谈话么?”我扭头看去,见他头发半白,高额碧眼,风度翩翩,既有西方绅士的潇洒,又有中国老派学人的温文。“爰,华尔特,你来得正好!”我的教授高兴地伸出手去,然后向我介绍:“华尔特·F 教授,我们 H 大学的首席中国文化专家,他对中国年轻人最有兴趣了!”

“F 主任,”我微笑着点头欠身,“久闻您的大名。”

“请不需要客气,你可以称我华尔特!”他用口音怪怪的中文说。

我吓唬一下笑了。就此,我便算是 F 先生众多的“中国朋友”之一,逢年过节,也总是接到 F 先生秘书发出来的茶会请柬;去过几次,倒也愉快。较为熟悉之后,他常请我帮点忙,诸如替他讲解大段中文书籍中的难点,或者替他校看教案中的中文部分;发现他把“扇”写成“扁”,把“住”写成“仕”这类错误时,都一一改正。这些事花了我不少时间,但自以为是在帮助一位热爱中国文学的美国友人进一步了解我们的文化,我不在意这份“义务劳动”。然而,我慢慢地感觉到,F 先生似乎对我在国内具体的人际联系极感兴趣,对于在国内政界和文化界流传的各种隐私性的消息过于敏感,而对于学成归国的中国留学生,总是或明或暗地从品性上进行挑剔,这些都使我觉得不很舒服。同时,我注意到 F 先生开始越来越频繁地邀请中国学者来 H 大学访问,短则三个月,长则半年,而每一位学者的到来,总是和他的一个新的研究项目巧合。日复一日,在

校园里,咖啡厅里,饭店里,客厅里,自然还有办公室、图书馆里,F先生微笑着与这些访问学者交谈,极有效果地表现着他对中国文化深厚的感情和对中国学者做出的工作的兴趣。而我们这些学富五车的学者们把他的或者是毕生研究的心血,或者是长年积累的材料,滔滔不绝地在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里输送给了F先生,然后带着一个冰箱或者一个音响组合之类的东西,“满载而归”了;心下对F先生大概还满怀着感激。我静静地目睹着这一切,对F先生的那一份不舒服里,又添了日渐加深的不安。我开始有意识地拉开自己与F先生的距离,并且尽可能显得自然地、一点一点地停止了 I 充满着“国际主义精神”和“中美友好精神”的那份“义务劳动”。

而F先生对我,却更加热情了。每次有中国学者来访,他总让秘书打电话通知我,或者征求我对于如何接待的意见,或者请我参加欢迎招待会,我自然总是借故谢辞。实在辞不了也只是到招待会上去站一站,F先生却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向人显示他对我的善意和关怀。“这是丹阳小姐,我们H大学中国学生里的高材生!”他微笑着介绍,弄得常有人以为我是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生,而F先生是我的导师。当我每次解释自己主修欧洲现代思想史,导师是历史系的D教授时,F先生总是十分幽默地打趣道:“她正在考虑我的恳求,到我的中心来做教授呢!对不对,丹小姐?”我便只好也开玩笑地说:“不敢,不敢!连做您这样大教授的学生都还不够格哪!”听着他快活的笑声,我总有一种被调理、被使用的感觉,总有一份想扭头就走的冲动。

那天在欢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当时已是全国很有影响的李君的茶会上,F先生又照例玩起这一套。但是,当他笑着提到请我去中心当教授时,我没有按着老习惯,顺着他说笑;我望着李先生,脱口而出:“其实,李先生如果在中心开两门课,对H大学的研究

和教学帮助会非常大的!”李君听了,下意识地用左手整了整打得太紧的领带,很得体地对我说了声谢谢,转身向F先生笑道:“这们的学生对中国看来是很关心,我今天刚到,就听到好几位学生问我开不开课,开几门课了!”我顺着他的视线向F先生望过去,意外地发现,F先生脸上那份永恒的微笑早没了踪影;他清了清喉咙,好像没有听到李先生的话,颇为突兀地说:“李先生关于胡适的几篇文章我都拜读了,很有启发!”李君先是微微楞了楞,但立即十分随和地笑答:“请F教授批评!”F先生谦逊地摇摇头,开玩笑地说:“胡适可算中国现代文学之父,但是他在美国只能在图书馆里做做事;也是有意思,讲解中国文化,做中国文学教授的是我,而不是他。”我站一旁听,心里禁不住悄悄泛起一股寒意;只觉得这种“玩笑”,似乎有一种吃了人肉还说人肉是酸的气息。看着李君有些尴尬的脸色,想到在F先生手下,一个又一个像橘子一样被榨过汁的中国学者,我终于明白,这位对中国“深有感情”的汉学家和他的中国“朋友们”究竟有着一份什么样的关系。这些中国的“朋友们”怕是很有点像冯友兰当年访印度时提到的殖民地国家的“生产原料”,当然是活的文化与心理原料,对F先生用来过滤制作成英文产品,在西方世界的学术市场上赢得暴利,实在是重要得很,也便宜得很。

自然,我正式把F先生从我的友人圈子划了出去,但每次看到他微笑着走过来,非常亲切地打招呼的样子,我倒也不回避;也许是出于某种好奇,我总想看看他在越来越动荡的世态中如何行事。从1987年开始,他明显热衷的话题是中国人如何有求于他;高至全国名流如“青年导师”级人物,低至各高等学府中的教授学生,统统巴不得到他手下来做研究生,做助手,甚至做秘书。他早已不必表现他对中国文化如何有感情,或者是否有感情;贵为美国教授,似乎只要往中国人堆里一站,中国人就会像古罗马的奴隶见到了

凯撒大帝一样纷纷下跪叩头，纷纷抢着献身。他在1988年冬去了一趟中国，说是所到之处，视种种政府法律行政规定为废纸而为他办事购物收集资料的“朋友”比比皆是，所谓要什么都能搞到。那天，当他站在那里谈兴正浓，见我似听非听之态，便忽然发问：“你知道我下学期需要雇佣一个教中文的帮手，你有朋友需要照顾吗？”我一愣神，忙想了想，刚要张口，他笑盈盈地接着用中文说：“我办公室，很多中国人来说话给我，他们都想这个工作；这工作钱不多，我说。比他们在中国钱多，他们说。他们人太多，都想这个工作；我不要失望他们……”F先生顿了顿，忽然仰脸一笑，回到英文：“还有人送礼品给我，我很不习惯这些，但又怕失礼，还怕他们相互闹得不高兴……”

我咽下了已经到嘴边的一位中国学者的名字，静静地听着他那份七颠八倒的中文，想到他新近还收得两位从中国头号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已获硕士学位的女生，拜他为师，在六、七年内可望戴中国文学美国博士帽，我忽然有点想笑。中国人跑到美国来做中国文学的学生，是钱钟书那辈知识分子编出来的讥刺30年代的时事的笑话，居然成为我辈生活现实中的一部分，看来我们正在超越前人的光明大道一溜烟地跑，值得史学家记一笔。然而，转念想到那些“说话给他”的中国学者学生，设身处地估计他们如此竞争这份差使的种种可能的原因，我笑意尽失。

“我知道，我知道，这些人都有苦衷，他们的生活一定很糟糕，”F先生一脸同情地盯着我，仿佛我就是那些中国可怜人，正拎了大包小包向他进贡的礼品，“我帮助……”知道他又要滔滔不绝于如何“照顾”像蚂蚁一样多的走投无路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这些人又如何感激他，我漫然应付了几句，便想抽身而去。见我有要走的意思，F先生敏感地打住了话头，再三叮嘱我将“需要照顾”的朋友名字电话告诉他。“你的朋友，我当然考虑，”他说。大概自认为深谙

中国人重面子的心理,他这是给了我很大的面子,我乖觉一点的话,得领情的。

回到住处,面对着电话机坐着,我犹豫着要不要将自己想到的那位朋友名字告诉他。那位朋友在国内是副教授,要不是新近妻子带着女儿来了,经济一时紧张,他不会托我帮他留意各类杂活。又觉得 F 先生给“面子”已经是笔人情债,欠是欠,不欠也是欠;我便拎起电话,向 F 先生推荐了这位朋友。搁下电话,耳边绕着 F 先生微露得意的声音:“有可能,我一定帮助。”心里十分不适。F“帮助”的中国人真是太多了!多到他连摆摆门面的欢迎会也已经省去。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书,至少有四五个中国学生学者直接为他做了研究工作,而书成名后,从第一页搜到最末一页,不见他们的名字。至于这些廿世纪末的中国智力劳动力所得报酬是正常研究人员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自然是没有人问一下为什么。人们耳边听到嘴上说到的,是中国人正在美国社会各界受到“照顾”受到“帮助”,仿佛是一群既无知识又残废的人,坐在美国这个免费大酒宴上,被贵人们平白赐予了许多海味山珍,真是交上了神仙运了。

是神仙运还是华盖运,我不敢就下结论。具体的事情比命运的概括更切实些。向 F 先生推荐了朋友,当然也向朋友提了提 F 先生;但等了五六个星期,不见任何动静。再隔了几周,朋友已很难安心等下去;经他催促再三,我便给 F 先生又挂了电话。接电话的大概是新近刚来的一个秘书, F 博士出去了,问我有什么事。我便照直问去,她听后,说:“有个教中文助手的位置,据我所知,是为一个新来的研究生设置的,她已经开始工作了。也许还有另外一个位置,我来这儿才两个星期,许多事不了解,我会把你的电话询问告知 F 博士。”

两天后,我收到 F 先生秘书用电脑打印的一封整洁正式的信。信上说,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权衡各方面因素,非常抱歉,非常遗

憾,不得不告知你,你推荐的某先生不在最后候选人之列,实在是因为合格的中国人太多了……

我把信交给了朋友,他已收到了回绝他的信,望着他郁闷的脸色,我明白做了一件再蠢不过的事。我以无端伤害朋友的代价,替F先生若市的门庭前增加了一枚锦上添花的小炮仗……

那天晚上,我向邻住的K君提及此事,心里懊恼不已。K君是研究移民问题的,性格率直,“也不是你独独比别人蠢。”她说,一双墨西哥人的眼睛热辣辣的十分引人,“看看这世界,跟着美国的新闻媒介叫嚷要争得做世界公民权,把自己的国家闹垮了,才发现那不过是替花旗梦放了一束焰火,却把自己送进了美国难民营、变相难民营的人,还少么?进了难民营,就天天感激人施舍吧!”

K君这几句话,脱口而出,说得随意,却使我有一份听到旱天打雷时的心惊。坐在书桌前,整理连日厚厚一迭国内来信,朋友、认识的人、不认识经认识的介绍的人写来的信,让我帮忙联系出国。但字里行间的心态与氛围,文琪,与我的当年准备出国的情形,有着某种本质上的变异。我们的出国,曾经是中国这艘航船在现代世界的海洋上出航的彩旗之一,眼下的出国,都散发着弃船而去的鼓躁和骚乱。当大洋彼岸故土上的人们双眼露出了混沌和自弃,大洋此岸的学子们便全体陷入了第三世界国家移民的地位,比深受种族歧视的美国少数族裔的处境更为困难。尽管中国留学界学人在智力、能力和受教育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一般的美国公民,他们的求业谋生都几十倍、上百倍地难于一般人。少部分的学人经过多年辗转,极辛苦地得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饭碗;但四分之三的中国学人,至今还在各种暂时性、过渡性、非正式性的职业中打转,承受着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双重剥削;美国政府对新移民的百般控制和筛选法案,使得中国学人目前承受的这双重剥削不仅合理合法,而且还戴上了宽容慷慨的慈善光环。



然而,美国是自由天堂的仙乐声似乎依然在继续深入大洋彼岸的故土;望着手中这大捧的信,我想象着,如果有一天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家园真的溃乱,F先生这样的人会不会更加乐意“帮助”那不仅没有巨资,没有高技术高学位,而且还没有了祖国的十一亿普通中国人呢?

“进了难民营,就天天感激人施舍吧!”K君的话扎得我心里痛。难民营,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有社会的,也有心理的。难民营的大主管是谁呢?难民营的大施主是谁呢?以难民营谋利,又以难民营得名,诱人自弃行乞又迫人感激涕零的主管兼施主又是谁呢?

文琪,那些在世界范围内膨胀他们权势欲的人们,有满足的一天么?

丹阳

1994年1月5日

P.S.

F先生据说很快将升任全美亚洲研究学会的副会长,两个大基金会的中国方面的什么长;总之,他的行情极其看好,权势正如日中天,不可限量。想来得到他“帮助”的人,也越来越多吧!

(《中流》1994年第5期)

## 选 择

——《友人书简》之四

丹 阳

文琪：

每次接到你的信，心里总感到一份难以言状的安慰。好像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在沙漠地里走了很久，寂寞至极时的悠然长啸，竟时不时地引来一缕真切的回音。这几年，眼看着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权势已是登峰造极，简直就是君临一切民族、尤其是贫弱民族头上的绝对权威，同辈中不肯对美国山呼万岁，锦上添花的人，似乎并不很多。这跟当年对于在“文革”中“最最最”的“革命”权贵们，不少国人有意无意的追随拍马，骨子里其实是有某种相通之处的。而80年代末对中国社会内部种种不平等现状抨击似乎十分激烈的“精英”们，一旦进入国际环境，有些成为西方头领的短期或者长期的门下徒之时，对于强权统治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不是低眉顺眼，就是笑意可掬，往日那份对“不平等”的激愤，恍若梦中的一番表演；一旦有了美元，什么“国家民族”，什么“社会公正”，都在国际权贵灼手之热中化为乌有了。

说这种对强权的奴性是普遍人性的体现，是人就都有一份，则实在又不尽然。有幸活了这卅来年，我见识过在国内国外、土的洋的仗势欺人者面前，绝不苟随，毫无媚骨的人。敬重他们的同时，

我自然很想学着他们的样子去生活；只是还未学得一分半厘，就深深体会到了此道的艰难。于是，碰上和我有同好的人，我更常常引为知己。你在我的感觉中，文琪，用一句林黛玉的话吧，“素日以为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知己们很知道我的渺小与无用，却又绝不不甘心活得无聊与卑鄙，在这大动荡的时代里，在这美元横行的世界上，便有了一种日渐加深的挣扎感。

有这样挣扎感的，倒不仅仅限于我这样的无用之人，还包括一些想于中国、于社会有用而且原本确实会是很有用的人。记得我跟你提到过的我的中学同学徐明吗？他是清华的出国生，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到了 M 学校做博士后。彼此住得近，他就常来我这儿小坐闲聊。自前年起，他从博士后升为 M 学院最负盛名的一个研究中心的正式科研人员，干得很好，提薪很快，被称为是中国留学生幸运儿中的幸运儿，成功者中的成功者。但也是从那时起，见面谈天时，他常显得走神，问起他的工作进展，往往顾左右而言他。问得多了，才慢慢说出他的实情与苦恼。

他是搞空间技术的，目前做的课题，属于美国国家空间技术计划中研制高超音速飞机的项目。这种飞机制成的话，其速度将是波音的十倍。也就是说要比波音 747 还快十倍。办法是先将飞机打到大气层外，让它像导弹一样飞行一段，然后再回到大气层里来。这是一种专为常常需要飞越太平洋两岸的大贾巨商制造的飞机，从纽约到东京只需要两个小时；节省办理商务的时间可以算是一个好处，但主要的还是为了大大减少飞行的不适，让这些跨国资本的巨头们活得更舒服一些。这个项目在美国的航空航天界，眼下是热门得很，因为国家拨给巨额资金；但身在其中的徐明，却并不感觉到充实和愉快。“我是在为谁干呢？”他苦笑着说，“这种所谓高精尖的项目，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享受……”

作为中学时代的朋友，我是了解他的。从上高中起到在美国

完成博士学位,徐君一直做着的梦,就是为中国民航造出好飞机来。他觉得在中国工业化起飞的过程中,大批民用飞机的研制发展不仅是国内急需的一个方面,而且应当力争在今后的几十年内进入国际竞争市场。中国如果不想把自己变成像许多拉美国家那样的廉价劳力市场和廉价组装车间,进而完全失去在“世界村”的经济、政治生活中保护自己利益的能力,就必须真正发展自己的工业实力。花费巨资进口民航飞机,为北美跨国公司组装飞机都不失为解决眼前需要的办法;但如果成为唯一的办法,成为长远的方向,对中国工业的现代化是不利的。民航如此,其他方面也如此。

这是他的想法,我觉得不无道理。他那做了十几年的为中国造民用飞机的梦,也在我心里唤起一份感情上的共鸣。但是每次他去信国内的师友谈及自己回国工作的希望时,朋友们却都纷纷来信劝他不要匆忙回去,说是国内由于资金短缺,自己造飞机还不能放到议事日程上来,让他好好在国外发展自己,为将来回国打下更扎实的基础。那一阵子,徐明很沉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慰他,只说朋友们讲的都是实情,在国外完成学位后工作一段时间,对自己也确实是十分重要的经验。徐明先是点头称是,说再工作一段时间当然是有实际意义的,攻学位阶段所学所做的毕竟有限;在独立的工作中进一步开拓领域中的课题研究并且获得更多的成果,在某一个特定的阶段中,仍是为“将来”回国打基础。“只是,”他眼里蕴着深深的不安,慢悠悠地说,“这个‘将来’是什么时候,似乎没有人认真去想过;十年,廿年,卅年,似乎都可以。我怎么可能生活在美国,却根据中国的社会需要和工业发展,去打上廿年的‘基础’呢?!”确实,廿年以后的徐,将是一个被美国科研与技术供市场塑造成型的科学家,对中国,实际用处在哪里?

记得还是在1984年初,物理学家杨振宁访问我的母校,母校的老师们当然十分热情,送别时再三说,“欢迎杨先生以后常来常

往!”杨振宁笑着回答:“我最好还是不要常来常往,因为我一来,你们总得表示欢迎,表扬我,使学生们觉得像我这个样子是光荣的。而实际上,我搞的高能理论物理,不是中国目前大量急需的东西,弄得太多的青年人想走我的路,其实会是中国的损失。所以,我不是客气,我不会过多地常来常往。”当时,年轻懵懂的我,也跟着大家笑,以为杨振宁是在做文章;十年后的今天,当自己开始置身于美国社会机制的运作中,我才开始理解杨先生那番话里的感慨与诚实。每次登上讲台,望着下面几十个金发碧眼的少男少女,我无法对自己说,我是在为中国培养人材;当我根据他们的生活环境和需要撰写教材和准备教案时,我甚至无法对自己说,我是在发展自己。我,事实上,是在为美国社会服务。

看看周围从国内来美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就业的几位朋友,按美国的标准,都干得很好,很成功;但每次相聚听他们谈起正在研究的东西,我总忍不住问自己,这些东西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呢?一位搞通讯的朋友目前忙于研制带在小汽车上的一种电话,这种电话的用户不仅在跨州高速公路上能够径直打出国际长途,而且能随时接收别人打来的电话。对于在美国办商务的一部分人说来,这似乎颇为有用;对于占美国人口百分之五、六的富人,这大概是一分必备的奢侈;但大多数美国人,谁会需要天天在高速公路上、在汽车里打国际长途呢?至于当务之急还是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中国民众,这种研究会给他们带来什么益处,就更茫然了。另一位搞食品科学的朋友,现在成天想的是怎样合成一种新的食品,好看,好吃,但却全无卡路里,使人能够尽情满足口腹之欲,却不用担心增加体重,因为那东西是虚有其味其表而无其实的,在拼命减肥几乎成为社会文化心理中的一种病态的美国,这项研究的市场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他所属的那个公司已经成功地生产出一种完全没有热量的蛋糕,销路之好,赚钱之多,很是鼓舞了公司各级的研

究人员。只是要说他的研究是为“将来回国”作准备,那当然是开玩笑。美国 80 年代以来在经济运作上是明显地出现了所谓“制造市场”的现象,一架又一架巨大的广告机器,把人们生活中并不真正需要的商品,在强化宣传某种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同时推销出去,影响、塑造和控制人们的心态,从中硬是“造”出消费市场来,这种现象,从我这些朋友被高价雇去进行研究的项目中,也可见一斑。在这些消费市场上,美国妇女吃的苦头似乎比男性要多一些,她们一方面置身于天罗地网般“美容”消费的广告攻势之下,在高价美容过程中千方百计进行减肥,另一方面迫于为强行减肥所付出的正常饮食甚至健康的代价,又以高价购买那些没有营养的食品以解饥饱之苦。这种折腾,说真的,文琪,很有点像心态上的“裹小脚”,只是盖着一层奢侈富糜的金色霓虹。而对于 11 亿中国的平民百姓,这些“造”出来的美国市场,是跟他们的生活很不相干的。

所以,文琪,我完全理解你信中提到的对自己每天八小时那一份工作的乏味心境。这不仅仅是因为离开学校进入社会之后,总有一个惘然若失的适应过程,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一份工作,与我们内心情感的真正所在,像是两条远远平行的路轨,似乎永无交叉的一天。徐明的那份苦恼实际上是一种高度不安的预感,他预感到,如果这样在美国发展“自我”,很可能会使这个“自我”日益地远离中国的土地河流,远离中国的主权实体,远离中国的历史命运。而那一切,对于他,对于我,对于你来说,又哪里是眼前这美元、房子和汽车所能代替的呢!

而且,事情还不仅仅到此为止。

记得我以前向你提过的宋志芸么?他祖父家与我母亲一脉是通家之好,我从小就叫他宋哥哥。大概是听多了母亲夸奖他如何聪敏,能干,还有孝顺,我二姐悄悄地喜欢上他了,是上山下乡一片

红那会儿,这对恋人一起去了陕北;一场炽烈的爱情,以宋哥 1975 年调回北京告终。1984 年,当我在 H 大学陌生的研究生宿舍里接到他从纽约大学挂来的长途,心里的温暖差点弄出两行眼泪来。这些年,他一直对我很关切,1990 年的夏天还专程来我这里过周末,说是庆祝我论文答辩顺利通过,同时还要替他所在的公司到 H 大学来物色一些搞经济、市场研究的中国留学生。徐明正好在场,便也留下吃饭。

那天宋哥特意下厨做了一桌的好菜,还带了一位姓郭的朋友作陪,郭自我介绍是研究“政治科学”的。大家入座时,徐明有口无心开了个玩笑说,“政治和科学,这在逻辑上通么?”宋哥和我们都笑了起来,郭兄则显得不很自在,连连说:“我们是研究政治,不是搞政治,这两者不一样,不一样。”我见他认真,便忙止住笑,问他具体研究些什么课题,他满有兴致地讲了起来。听着听着,我心里就有些疑惑了。他的导师是美国政治学界一个极有影响的人物,进过白宫,当过两届总统的中国问题咨询顾问。自 1985 年起,这位政治方面的“中国通”提出,中央集权的中国政体将日益向地方分治转换,这种地方分治最终会导致中央集权政体的根本性解体。这对美国是有利的。因此,中国问题的研究和对华政策的制定都应当以促进和加快这种转换为方针;研究重点应当从上层政治领袖群的组合变化移至地方政治权力的消长运作,密切与中国地方实力集团的联系。郭兄在他指导下作的论文,就是一个地方政府权力变化与经济实力集团发展的特例分析,为此他已经数次用导师给的钱回到国内,运用各种关系,收集了许多材料。

见徐明脸上的微笑渐渐褪净,似乎很想说什么,我怕他又会措辞不当,惹得郭君不高兴,忙抢在前头说:“这个课题……听上去很新的……”“是的,”郭点点头,“可以说,做好一个这样的课题,今后五年内在美国找工作都不会有问题,美国很需要这样的人,尤其是

做这种课题的中国人。”

我和徐明相互看了一眼，都沉默了；宋哥则一迭声地招呼着吃菜。郭君一边应声拿起筷子，一边扫了徐明一眼，脸上不知为何有些尴尬：“当然，我不见得就会留在美国，中国人在美国吃中国政治学的饭，不容易，也……不舒服的。”宋哥夹起一块红烧肉，声调松快地说：“搞政治学研究是不容易，得有学术才能，也得有政治才能；不像我们搞数学的，要求单纯得多。”我笑着凑趣：“数学家可是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理论家，得有才气！”宋哥看了我一眼，目光变得温和，低头喝了一大口啤酒。徐明这时眼里也有了笑意，问道：“志芸兄是搞运筹学的哪个方面？”“我的论文是关于统计方法，”宋哥替徐明半空的酒杯斟满，解释说，“现在工作了，搞市场统计，做一些比较应用性的东西。”郭君望着宋哥，眼镜片后一双圆眼睛里，露着由衷的佩服之情：“宋志芸是厉害，一毕业就进了R咨询公司经济部，年薪快九万了吧？我有好一阵子不敢相信那是真的！”我心里也微微一震，R咨询公司虽是私营，但在美国政治经济的决策中影响极大，宋哥在那儿做什么呢？看到我询问的目光，宋哥又开了一瓶啤酒，温文地笑了笑：“我搞第三世界国家市场统计分析，重点自然是中国。我觉得那工作有些意思，数学性很强，将数学工具用到经济运作里，实用性也很强。”我一时听不很懂，便看了徐明一眼，见他原先的笑意踪影全无，又现出一副欲语未语的神色。这一次，是郭君抢在了前头：“我说宋志芸，这下你可成了美国大老板们的兴趣目标了！谁要想在中国那个巨大的市场上，成为举足轻重的赢家龙头，谁就需要你！”他说着，举起酒杯，提议我们一起为宋哥事业的大开端干杯，“祝宋志芸今后在中美之间常来常往！”

常来常往！这十分耳熟的四个字使我又像徐明一样，心神不安起来。怎么个常来常往？为谁常来常往？为了谁的利益常来常往？一连串的问号在我脑子里下意识地掠过。也许是平日不惯酒



精，一大口酒下到胃里，烧得慌。明晃晃的灯光下，凝视着宋哥哥长方的脸，平展开的眉，我想象着他干练地向形形色色美国老板提供对中国市场状况的最新情报和周密分析，以及从中牟利调控的政策选择，有点像古代中国的军师，也有点像现代中国的参谋，只是那主帅，却是高鼻深目的美国人。

一种惨人的陌生之感将我紧紧地抓住了。我又喝了两大口酒，连自己也料不到地忽然说：“宋哥哥，二姐前几日来信，还问你什么时候学成归国呢！”一看到宋哥稍稍变得苍白的脸色，我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但却不知为何，硬是等着听他回答。他站起身，从裤兜里摸出一个打火机，又从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根，点燃，长长地吸了一口，然后声调平静地说：“小丹，对我来说，当年土插队，现在洋插队，就这么回事。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我只能选择城市！”一旁的徐明听着笑了起来：“这洋插队和土插队的差别可是真大啊！你的当年土插队插成了农民，苦得你一门心思要回家。现在你这洋插队插成了跨国大洋行里的中国襄理，虽说在洋人之下，但总是在中国人之上，自然是半点也不想回家了！不过为洋老板赚中国人的钱下手不要太毒太狠了，毕竟你的爹妈还是中国人吧？”

我从没听到徐明说话这样尖刻过；烟缠雾绕中的宋哥，也显得前所未有的沉郁阴冷。

“好了，好了，”郭君手忙脚乱地给大家添酒，笑着说，“不谈那些，不谈那些了，咱们难得相逢，难得相逢，大家都是朋友，吃菜吃菜！喝酒喝酒！”

看着这三个年龄、专业和心性都不相同的中国男子一起闷头喝酒下箸，我的心里生出一份说不清楚的感慨。他们今夜的相聚，似乎非常偶然，又似乎有其必然；他们还会再相逢么？会是怎样的相逢呢？

我们能够拥有的人生选择,实际上是并不多的。  
等你的信。

丹阳

1994年3月30日

(《中流》1994年第7期)

## 不该折断的帆

——《友人书简》之六

丹 阳

文琪：

原谅我迟迟没有给你复信。你寄来的信和 Andrew Li(李)的讣告都收到的；但是震惊和一份剧烈的受伤感使我一直静不下心来写信。我很难接受这样突然的死讯，也很怕去打开、探掘那小心封藏的记忆。在异国整整十年的风沙辗转，使我很怕看见自己溺于痛楚而无法自拔。

是的，你没有记错，Andrew Li 是我大学时代交往甚深的一位朋友，我的同班同学，一位按正常的年轮应该当我的老师，但由于历史，却做了我的同学的人。他的原名叫李帆，帆，蓝色的天和蓝色的海之间一抹白帆的帆；他是从插队的内蒙考来的；全省文科全国考试名列前茅，上过全国性的报纸、电台的人物。

在我的记忆中，帆的外貌是一点也不像他的名字。他粗壮，个子中等，黑黝黝的，永远显得精力过于充沛；肥硕而线条有力的鼻子，很难说使他添了英俊还是更显粗鲁。我见他的第一面，他便彻底地得罪了我。我那时是班里的文娱委员，为大家办事十二分的热心。那天去各个寝室送电影票，送到他面前，他不经意地扫了一眼粉红色的小票，并不就接，问道：“看什么东西？”“《英雄儿女》！”

我有点兴奋地说,努力履行我的职责,“很感人的电影;我最喜欢那个王芳!”不知是由于我声调里过分的热切还是别的什么,帆像是被触动了一下,抬头看了我一眼,微笑了。那居高临下,含着讥讽意味的笑,活活地勾勒出我在他眼里是个幼稚可笑的小傻冒。也许是因为很少有人比廿岁未出头的年青人对生活、对自己更认真、更严肃的,很少有比这个年龄的心灵对别人轻看自己的意见更敏感,更愤怒的了,帆脸上那番在我看来简直是无端的轻视的笑,使我顿时满脸通红,搁下票,扭头就走。就为这,差不多整整一个学期,我不曾跟他说过话。

可他却常跟人提我。“看到丹阳,就想起一个消逝了的幸福的年代!”有一次他当着我的面这么说,听的人全是比我年长十几岁的老三届们,是班上的一群“爸爸学生”,他的话引出了一阵笑。笑声里有几分默契,几分调侃,还有一份我那会儿听得分明但是不愿为之动心的浓重的苦涩。在他,是想以此调节一下我对他的敌意;在我,这却又是一次他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的显示,自我怜悯中裹着一份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凭什么?我变得更加固执,全班人里就是不理他。

是偶然还是必然?打破我和帆之间的僵局的,竟是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来的美国留学生格特林,我好像对你提起过他,文琪,记得吗?

格特林是与我们七七级学生首批同住的留学生之一。借他和他的同类的光,中文系和历史系的中国学生住进了每天都有热水澡洗、冬天有暖气,且又是两人同住一间屋子的留学生楼。不知何故,从第一次在阅览里碰上格特林,这位细高个的金发男孩就对我十分的亲切,他喜欢跟我说话,喜欢谈李白、杜甫。有一次,坐在黄昏的斜阳里,他说起了他的家庭,浅棕色的眸子里蕴着热情,活泼,还有一份淡淡的思乡之意。他的家是在密西西比河沿岸一个小镇

里，秀丽宁静的田野，邻里们都熟识亲近。他很小就跟着父亲去河上驾帆船。“高中时，”他热切地说着，一边在一堆照片中挑选他自觉满意的给我看，“我经常参加比赛，得了许多奖杯！”在帆船上强劲地拉住一条粗绳索的格特林显得健康，明朗，像夏日的阳光一样自信，而捧着奖杯的格特林却傻呵呵地咧着嘴，整个儿一个小迷糊的样子。我轻轻地笑了。不知道他是怎么领会我的笑的。还是由于其他的原因，格特林忽然握住我手臂，那手掌心热得烫人：“丹，愿意和我一起去美国么？美国有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也有不少机会，我们一起可以做许多有意思的事情！”见我愣着一时没有反应，他又急切地重复了一遍。血一下子涌上了我的头，惊惶中仓忙四顾，帆粗壮的身躯，恰在此时，像救星般地晃进了阅览室。

我赶紧起身迎上去，一把抓住他，像对最要好的朋友那样把他推到格特林坐着的沙发上，声音聒噪地嚷：“哈，李帆，我这儿正跟格特林说呢，想去美国读书的学生，现在都可以参加教育部的考试，公费留学了！”帆似乎毫不觉察我这番举动的异乎寻常，更无视格特林满脸的窘状，大咧咧地坐着，接着我的话头说：“听说教育部是正式决定了，要派遣留学生，不仅是去美国，还有欧洲、日本等等。”他转身看着我：“你应该应考，你能考上的。跨过太平洋，你的天地是无限的！”我心里一震，留神看去，他黑黝黝的脸上绝无调侃取笑的意思，眼睛里是百分之二百的认真，甚至还有一份微带兴奋的期待。

那天晚上，我和帆有了同学之后的第一次长谈。更确切地说，是他谈，我听。当夜深时回到自己的房间，我坐在月光里，想了很久。帆有一种震动人、感染人的力量。他经历了那一代人的狂热、幻灭、挣扎与苦难；他曾把毛主席的像章别在胸口的肌肤上，又曾在死于他“大义灭亲”批判揭发之举的父亲得到平反时尝试过自杀。在一颗稚嫩的心被撕破又重新整合之后，他居然并没有变得

满眼灰色,好像是一场大火烧过的残林,灰烬深处,火源犹存,一经某种外部条件的触发,又吐出了血色的火焰。这一次,他为之燃烧的,是他从未体验过的西方世界的“高度文明”。听着他时而沉郁,时而喑哑,时而温和,时而激动的声音,我的情绪也随之起伏,在对他生出一份复杂的尊重的同时,又隐隐地感到一种不安。他似乎对自己的“悲剧命运”以及其中的痛苦说得太多,多到使人觉得他不愿看见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人生并不独独对他特别不公,独独玩弄了他,欺骗了他;生活对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是严酷的,虽然形式各不相同。而他对“文革”十年“中世纪”的指控,又使人感到他几乎成了一个凌驾那一切之上的道德判官,我只是不知道他这光判人而不受审的资格是怎么得来的。他对中国社会现状激烈的抨击,我很多地方都有同感;然而,他对于西方,对于美国的那份没有什么保留的好感,又使我十分疑惑。我当时的想法,文琪,跟你是一样的,很简单:如果我们不曾深入那里的生活,我们怎么能断言太平洋彼岸那一片国土就是人间的乐园,更何况我们连到都没到过那地方?

不管怎么说,帆成了我的特殊的朋友。是他,也是格特林,使我最初萌动了出国留学的意念。三年之后,在送我远行的聚餐会上,二度访华,已是中国文学研究生的格特林,和已经在一家报社工作的帆又碰面了。也许是喝多了酒,这两个送行者谈兴大发,倒成了聚会的中心人物。

帆笑咪咪的,对格特林十分友好。他喝一大口酒,说:“中国体制的病灶太深,封建主义的根子太顽固!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中国是最需要,可又最难得的!中国是什么地方?中国是阿Q之国!”

格特林一抹金发软软地沾在额前,汗津津的,五六瓶啤酒喝得他不时打一个气嗝:“美国的民主,其实是舞台上的演戏!我根本就不相信那些政客们,一个都不相信!自己不是巨富大老板,哪有

钱参政竞选？总统大选，投票人不到百分之五十；而这么些投票人里勉强一半的选票，便在大同小异的候选人里决定谁上台；这民算是什么意思？自由么，啊哈！你得有钱，钱就是自由！没钱的话，狗都不要你！它们会把你当粪屎待！”

帆皱了皱眉，觉得格特林的话很不中听：“不管怎么说，你们美国比我们中国，经济上先进不用说，不能比；政治上也要进步几百年！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就是中国人的将来和真正的出路！”

格特林布着淡淡血丝的棕色眼睛直瞪瞪的：“你真的这么认为？你知道这‘自由竞争’是什么吗？你真的相信私有制会带来‘自由’？你知道在美国害怕失业是什么味道吗？再比如你们的公费医疗！在美国，一个家庭里要有一个人得了重病，那个家庭就真正的完蛋了！——完蛋了！”

我静静地听着这两位异族男性，只顾顺着自己的思路怒气冲冲地使劲恭维对方的国家，不期然地觉得好笑；真笑又笑不出来，心里是一团乱麻，便索性跟着他们喝起酒来，直喝到晕头胀脑，眼前和心中的一切都陷入了混沌。

在美国的留学生活终于开始；也开始了我不努力走出混沌的艰难远征。格特林远在西岸，对研究生院生活似乎越来越不满意；起先还频频通电话，渐渐音讯就很少了。帆则与我保持了约有两年之久的通信；曾告知与在农村结婚的妻子终于离异，又告知再次成家，不久有了第二个儿子。随着星月的旋转，信一次比一次更简短，终于，音讯也断了。

八年过去了；抗日战争也不过八年。国事、人世、天下事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也不复是笑盈盈各处送电影票的女学生了。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往事旧友都恍若隔世，然而帆与格特林的那场争论，却常常在梦中重现。梦醒披衣而坐，总有一份强烈的欲望，想跟帆再认真地深谈一次，想告诉他我的许多想法。我想对他说，

这些年的辗转磨炼使我认清,将中国与美国直线对比,并由此评判两者的高低优劣,是一个奇怪的历史误区,就好像曾为殖民地的英属印度,忽然将英帝国作为自己民族奋斗的标准和楷模一样奇怪。这个历史误区,从梁启超到胡适,从五四运动中的全盘西化派,到80年代的“现代西方迷”,似乎总是使人们幻想,只要在意识形态上认同西方,社会制度上仿造西方,中国就能成为与西方一样的强权国家。这个历史误区似乎总是使人们忘却,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也是世界殖民主义的历史;欧洲第二次产业革命的重要条件,是非洲殖民地的金矿和从全球囊括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中国是作为世界上最后一批可供瓜分、掠夺的原料、市场和人力,被西方用暴力卷入了现代世界史的漩涡。如果不想在这充满血腥气的漩涡中淹死,中国就不得不走出一条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去实现自强自新的民族梦,去赢得属于自身的现代化。历史和现实都在告知我们,用西方世界的准则去衡量中国是行不通的,过去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就是用美国的度量衡去计算中国的民生的谬误。你我都知道,文琪,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月收入兑成美元约为四五十元,在北美,月收入四五十美元的人是根本不要活了。然而在中国,由于整个社会制度与环境机制的不同,一个人四五十美元的月收入,也就是四百来元人民币是够过小康的日子了。而要达到在中国有四百来元人民币,也就是四五十美元收入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在美国月收入没有两千左右美元是完全不可能的。当人们以美国生活费用的概念去度量月计四五十美元收入的中国人的生活,自然会惊骇中国人如何活得下去?而中国人以国内生活费用的尺度去想象美国,更加觉得别人的收入几近天文数字,惶然之间,自己变成了天底下最可怕的赤贫者了。在中国四五十美元与在美国两千左右美元的实际价值是同



等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在用美元去衡量、判断中国民生的单一思路中,变戏法一样地消失了。随着这个事实一起隐匿的,是中美之间在国际局势中不平等的处境;当飞机把一位身价是两千美元一个月的美国人送入中国境内之时,这位美国人在中国的行情便远远超过了其原先的标价。

这只是一个非常基本、非常简单的例子。至于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那些极其复杂的组织体制方面的异国优劣,若也用统一的“美国度量衡”去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判断,其结果大约就不仅仅是认识上的谬误了。让天底下的民族与国家都遵照美利坚这个“样板国”的意向重塑自己,正像要人类按照上帝的眼色来统一面目,恐怕只是一种宗教性的神话再造,而宗教神话是有世俗的功用与涵意的。哈佛大学一位教授就在《纽约时报》上宣布,在今天的人类世界里,万事只要花旗国领头,各国各族便不敢不从。如果真是如此,这以一制万的实质,只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国际强权的无限膨胀;对于人类的未来,这种强权膨胀所带来的当然不会是人人舞蹈其中的玫瑰园。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像的额头,是一片青铜的暗色,无论用什么金箔装饰添彩,也造不出普渡众生的圣灵光环。

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被称作“代沟”,文琪,我总觉得我们与当年狂热过、崇高过、骄横过、也幻灭过的一部分兄长们最大的不同,是在于我们不容易相信任何形式的救世主,相信别人开出的药方。中国是现实的,生活是现实的;真实的人生,从来都有不平、虚伪、剥削和自私。活着而又想使人生变得美好一些的人,需要冷静,需要思索,需要朴实的坚韧,需要历史的眼光和不懈的努力,而不需要乌托邦式的幻想,不需要在摆脱一种偶像崇拜之后,转而以更深的盲目,更狂热地匍匐在另一尊偶像的脚下。记得在一次读完帆写来的对于西方充满激赏的长信之后,我问自己,在这一派漾溢的

热情里,他是不是正下意识地重温着那已逝的青春,寻求唤回那足以支撑生活重压的神的光环?“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人要从自己的过去汲取教训,看来确实是不容易的。

意外又不意外,我在毕业离开 H 大学之际,收到了帆从美国北部一个小镇寄出来的信。信中告知,他来美国已经四年,半年前已拿硕士学位,但是失业至今,生计无着;便考虑继续读博士学位,学成时怕要上五十岁了。“这比范进中举没早多少时候,”他写着,“只是没想到会是在美国这异土他乡,演出自己生命这最后一幕;结局也许还不如范进,因为已经没有发疯的热情……”他没有提妻儿的情况,似乎他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他倒是提到格特林,说格特林在获得博士候选人之后,突然决定退学,只身一人跑到非洲的一个国家去了;临行前,还专门驾车去北部看望帆,“我们喝了半夜的酒,谈的都是当年在国内留学生楼的人和事,还有,就是你了……”

一刹那间,粉红色的电影票,小小的阅览室浅灰色的沙发,黄昏的斜阳,格特林驾船的照片,帆在夜色和月光中的故事……那以为早已消失的一切都在心中涌起,我仿佛还听见帆略带兴奋的声音:“你能考上的!跨过太平洋,你的天地是无限的!”

你呢?帆?你的生活呢?!我透过朦胧的泪水想找纸找笔立即给帆写信,铺开信纸时才想起帆无论在信封上还是在信里面都没有写上他的地址,他是知道我会对他说些什么而不愿听么?还是一切对他说来,都不必再说什么了呢?

然而,我没有想到他会死得如此突然,如此没有结果。我不愿相信那是自杀,我不相信。从你信中的所述的一切看来,他是终于没有能够再去“读博士”以维持生计,他终于是连“范进”也没有当上;他实际上是沦为了纽约街头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没有能够抗住、熬过那一场冰天雪地的暴寒。比他年轻将近二十岁的卢刚,在

生存无计,对美国幻想破灭的绝望之际,动用了美国式的暴力渲泄;李帆则是无声无息地走上了他的不归路,在跨过太平洋的时候,他绝对没有、绝对没有选择这样的死亡!

他才四十七岁。

丹阳

1994 年最寒冷的一天

(《中流》1994 年第 9 期)

## “自我”与“沙粒”

——《友人书简》之七

丹 阳

文琪：

来信和附来的肖平的信都收到了，我当然记得肖平。当年出国培训，他和我是一班的，清瘦高挑、干练精明。没想到他现在跟你在同一个公司工作，更没想到他会对我写给你的那些不成气候的文字感兴趣，居然还如此认真地给我写了这样一封“不同意见”的长信。很感谢他的关注与坦率。但对于他信中的一些基本的思路，我很难“分享”。把读了他的信以后的一些感受写下来，就算是我的回信吧。

他说他对李帆这一类人的遭遇，听到过，看到过，但从未觉得有必要对此感情用事，反应过于强烈。中国留美学生数万人，无论自费还是公派，总会有一些帆这样的倒霉蛋，但也有非常“成功”的大能人。每个人的生命自有每个人自己负责，自己走错了，不怨天尤人，别人倒了霉，也不干自己的事；活在廿世纪末的世界里，大可不必、也根本不可能去“以民族为己任”，那种中国大陆以前的政治教育弄出来的“国家民族”的准宗教心态不仅是幼稚，而且是愚蠢。人生来就有强弱之分，聪敏愚笨之分，优雅上等与粗劣下等之分，成功与失败之分；如此而已，完全不必为此自寻烦恼，“无事生非”。

不知道肖平自己意识到没有，他用的是怎样一副居高临下的

胜利者的口吻呵！数页信纸，满篇笔墨，几乎处处在提醒我，他是生活中的成功者，自然有权充分享受这成功带来的优越感、满足感，而我不停地唠叨那些蠢笨倒霉的人们故事，分明是妨碍了他的满足感的完整性，是“无事生非”了。承他看得起我，还将我也划入了他的“赢家”同类；世界上“像咱们这样的人”，充分实现“自我”，就是“贡献于人类”。

可是在我的眼里，“像咱们这样的人”似乎不像肖平所描绘的那样，可以活得处处“潇洒自在”，终日喜色满面。我完全相信他在公司干得很好，“每年分红总得大份”。可是说真的，一个中国人仅仅因为在美国公司坐稳（应该说暂时坐稳？）了中等职员的位子，就可以对自己的一切满意欣赏到如此程度，并由此将众多在西方统治的等级世界里辗转挣扎的国人视为异类，对那些终至毁灭的生命嗤之以鼻？为什么在他满篇“自我至上”的教诲中，在他对“愚弱国人”的不屑中，我感觉到一种奇怪的兴奋呢？是因为在“混得更惨”的其他同胞的衬映下，一个中等职员终于显示出了其作为芸芸众生中“佼佼者”的身份，并且终于有机会学舌北美“上等人”的哲学了？若是如此，那么他就是这个世界上下等人里的上等人了，我大概应该恭喜他从此证实了自己的价值，就像阿 Q 以小 D 的无知和小尼姑的无助证实了自己的聪明与强大！

我得请肖平原谅我的尖刻，因为我从根本上很难同意他立论的核心。

不要以为我不愿为同辈国人在西方世界创出的成绩感到高兴，感到骄傲。文琪，还记得当你的第一篇论文在生化界一份重要杂志上刊出时，我是怎样为你得意忘形么？我虽然一点儿也不懂，却拿着你寄来的论文复印件到处给中国同学看，不管那人是学文科，学工科，还是学理科，我甚至给了一位学音乐的朋友去看，他接过论文，微笑着问：“你是想让我把这些符号用小提琴给你拉出

来么？”话是这么说，他却“借”走了你的论文，说要带给他学医的妻子看看。

我高兴，固然因为我们是好朋友，但更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中国女子，我还着急，因为我很想做得与你一样出色！那些朋友们，都根本不认识你，他们高兴，因为有一位中国姑娘在国际性的杂志上发表论文；在十来年前，这还是那样地少见，而又是那样地鼓舞士气！不奇怪，他们都是中国人，都面临着一场在西方主导和控制的科学与文化论坛上争得发言权的战斗。如果那时你只是个“自己”，像肖平这样绝对纯粹的“自己”，我和朋友们自然就很难有这份心思也没有任何理由去分享你的成功的喜悦了。而当一个人只能对着镜子，去和自己的影子一起享受“成功”，他不觉得失去了什么么？当他把自己与生养了他的那片土地，以及与他一起经历了苦难也经历了欢乐的人们切断时，他这个“自己”是否变得残缺了呢？在夜深人静之时，他能否真正诚实地问问自己：“我是谁？我活得究竟如何？”

对个人的发现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反封建的成绩，而后进一步发展曾派生出“自我”至上论。“自我力求扩大，一面向着大自然，一面向着全人类，……诉诸于人道主义，诉诸于泛神论，诉诸爱与死，诉诸颓废和敏锐的感觉——只除了国家。”朱自清先生在半个或多个世纪前这样记录着。然而，东三省沦陷了，日本人打进来了，于是大家知道，原来泛神论，人道主义，爱与死与颓废云云，都是浪漫派的美学享受；美固然美，却于中国人摆脱自1840年以来在世界中受人主宰受人鱼肉的现实帮助太小，在被异族用枪炮打得血肉横飞的时候，将“自我”与宇宙等同，在拥抱大自然拥抱全人类中求生存，大约显得太高远太超人；像闻一多这样比较不超人的人便喊出了“咱们的中国”！老先生也许是觉得不这么喊，“自我”很可能将不复存在。当然，今天的中国人大约不会被异族轻易地用枪

炮、飞机、导弹在电脑系统的控制下炸成泥浆，毕竟中国不肯停留在十九世纪末而正走向廿一世纪。但是，当国际上由强权操纵的战争更多地是用美元进行，中国人在世界村中做人并不比在枪林弹雨下容易多少——凡是在经济压迫感和文化阉割中辗转的国人会懂得我这话的意思。闻一多先生的呼喊，也许在实质上并没有过时，中国人的“自我”和“咱们的中国”，恐怕是血肉相连，一伤俱伤，一亡俱亡的。肖平信中说，一个人出生在某一个国家是非常偶然的，为什么要为这偶然所累？看来，生养了他的中国确实是成了他不能安心化成美国人的“偶然”的累赘，那么就丢弃这份累赘吧！让他试试看，他是否能像吃完一只香蕉把皮扔掉那样，将中国从他的生活中一脚踢开；试试看，将说了廿年的语言，那他依傍着进入社会人生与知识天地的方块字，从他记忆的基因中干干净净地除去；试试看，将他自己想象成一个脱胎换骨之后的非中国人，一个面目全非、纯粹透明、无色无嗅的“自我”精灵，在这白人统治的美利坚自由飞翔，请他诚实地告诉我，他做得到吗？在这片“弱肉强食”尊为官方哲学的土地上，在这个英语发音标准程度就是人性“开化文明”程度的国度里，在这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和唯利是图的消费文化的包围中，肖平和他的同类真的找到了那本体的“自我”了么？

好像是前年(或大前年)元旦的那个晚上，一群都已就业的H大学老同学相邀聚餐。我苦于感冒，没能赴约。躺在床上发闷时，便给朋友们的电话，电话通过去，未及张口，对方就大叫我的名字，一边笑着告诉我，大伙刚从一个B城最时髦的酒吧回来，喝了一肚子搀酒和香料的上等果汁，跳了半夜的舞，而现在又借了十几盘电影录像带，准备看个通宵，“过节嘛！”几个声音一起嚷嚷，那酒意几乎隔着电话都能闻到。我问是些什么电影，“恐怖电影啊！美国的，欧洲的，还有日本的，都有！”听着那一口气报出的一串名字，

《恐怖世界》、《杀人宴会》、《地狱宅的传说》、《恶梦》……我好像看到一群极度饥饿的人，满世界只发现专卖动物食品的商场向他们开放，于是他们口袋里丰厚的钱币换来了各类狗食、猫食、猪食，大嚼起来；吃的脑满肠肥，吃得浑身油汗，吃到一切感知都麻木为止——十几盘恐怖电影，通宵的“凶杀暴力”！

我忽然难过起来，非常难过。这些老同学，在国内都是最优秀的青年，出国时，都有着当居里夫人，做海森堡的激情，从什么时候起喝得半醉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补充？暴力凶杀成为了他们“文化生活”的来源？

“为什么不……在一块儿好好谈谈呢？难得相聚的。”我问。“谈什么？”电话那头一下子冷落下来，我的问题显然很不合时宜。

是的，谈什么呢？在美国的公司生活没人想谈，更没人想听，这时候是想也不愿去想。当时美国正值经济衰退，各大公司普遍裁员，电视上连篇累牍报导失业大军找饭吃的实况。芝加哥希尔顿饭店要招十名清洁服务工的消息一宣布，数千名失业者彻夜站在饭店门口，站在漫天的风雪里，排队等候应试。其中黑裔黄裔居多，但也有不少各种各样白裔；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教育程度的人都有，包括受了高等教育、当过公司职员、甚至当过中层管理人员的“二老板”们。看着那一双双眼睛里深藏着的难以言状的恐惧，一闪而过的动物受了致命伤时的那种尖锐的痛苦光亮，相比较之下，感官上喧闹的恐怖电影，实在是麻醉性的解脱了。H大学一位教授曾对我说：“你也许很难想象，在这个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度里，人们的生活是建立在恐惧感之上的。”不，不难想象。但他没有说清楚的是，生计难测、生命无常的恐惧感，是与对控制着亿万人人生杀大权的“资本”力量运作消长与变换的无知联在一起的。那只“隐形的手”，那被神秘化乃至宗教化了的“市场规律”，从来是由有形的资本和资本控制者们调理掌握的。他们需要亿万人的恐惧和



无知,因为只有这样,劳动力市场才能永远显得供过于求,剩余价值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恐怖电影”一类的麻醉“文化”,正是保持亿万人继续无知、继续恐惧的最有效的形式之一。文化愚民,是“资本”绝对统治的需要,尤其是在这种绝对统治出现危机之时。

当然,比起一般的美国“芸芸众生”,80年代落脚北美的国人的大多都更有头脑,更少对文化麻醉品上瘾。尤其是在手中饭碗渐稳的时候,像肖平先生这样的“成功者”就会有这样的欲望,谈谈“优等”的“自我”,谈谈“劣等”的异类。记得早在1987年的圣诞节,已经在一家大公司荣升小班头位置的一位老同学刘君买了一幢四卧室的新房子。当他几次相邀“好好谈谈”之后,我和好朋友S君决定一起去一次,乔迁之喜,总得有朋友相聚祝贺才有点意思吧。车到之时,已是傍晚,他那全时管家政的“太太”(他早已称她为“我太太”,她称他为“我先生”,很台湾,很香港,很“时代”的)做菜的油香在门外就能闻到。见面,寒暄,接着参观著名“故居”式地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从厨房到卧室到厕所间都看了一遍。细听他的讲解,关于房子结构、门窗设施、地毯壁橱、屋顶涂料、抽水马桶盖子式样,一切都很完美,很耀眼,很令人羡慕。主人心情显然是非常之好,双目发亮,双颊发红,而我却渐渐地不安起来。坐下吃饭了,橡木直背椅端庄高贵,光可鉴人,我刚坐上去,主人便告诉我们这椅子的身价之贵:“就这一把椅子,”他指着我屁股下的支撑物,“花的钱换成人民币,让中国人活半年!”看着他抖了抖自己的裤子,小心翼翼地拉开椅子坐下来,我心里便有些惴惴然,觉得自己刚才那一坐,太随便太不识贵贱高低了。饭桌是长圆形的,上等橡木,很雅致,于是主人坐稳之后,又指着桌子说:“这个桌子的价钱,换成人民币,可就让一个中国人吃十几年了!”看着他轻轻抚爱桌面的那份深情,我捧着饭碗,很有点不敢碰那桌子,弄脏了呢?中国人十几年不就别吃饭了?!看着我这位小班头老同学,在专门

侍候他和房子和儿子的妻子的服务下，像新冠冕的国王一样招待我和 S 君，一边听着他猛烈抨击中国人愚昧恶劣低贱粗野没教养，一边提心着我屁股下的椅子和饭碗下的桌子，我终于将那顿饭得体地吃完，窃以为是应该得到一番表扬的。

吃完后，肚子是饱了，听骂人也听够了，被邀坐到崭新的客厅里，又被送上两杯热咖啡，我和 S 君不好就说走，却又不知道做什么才合适。四下看看，一台日本山水音响设备亭亭玉立在左侧，还有一满盒 CD，我暗自高兴；但待留心看去，便知大致上是他儿子的收藏，以那种最刺激的 MTV 节目为主；还有一张麦当娜的名曲《我总是能抢到我要的男人》，正儿八经过圣诞节，总不好放这个。无奈中转过眼来，见式样最时新的玻璃钢菱形沙发几上一堆杂志，便挑了一本，是市场指南，再拿一本，是卖车行情，我有点发急，乱翻一阵之后，再挑出一本，结果是专讲女人内衣内裤与整形美容的。我渐渐地有点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烦躁，那边主人与 S 君又谈得热闹了些，静听去，他还是在说中国大陆如何贫穷，中国大陆如何无望，总之这个民族是不行了，早已是死马，当活马医是医不回来的，死了倒好，早死早心静。

我转过身，在乳白色皮面的新沙发上坐稳了，定定地望着这位对中国的死亡如此热心的美国小班头，心中的烦躁渐渐淡去，而一份怜悯隐隐上升。他需要调节调节情绪，在房子车子美元和老婆之外，他显然还有别的需要。然而，终日在公司紧张忙碌，回家后已是疲惫不堪；刀叉都用不惯的刘君，对英语报章杂志一向是无法读下去，与白人家庭社会更无社会往来；于是他谈中国政治，于是他骂中国大陆。看来中国至少是为他做了一件好事，能使他变得有点激情，从而甚至有了点诗意，能使他视而不见这琳琅满目的物质财产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有点残酷的现实：他是一个文化的贫困者，他是一个正在失去“自我”的中国人；他苦于内心的虚空。今

天晚上,我和S君一走,他的兴奋也就失去观众。但愿他能立即平稳神经,睡一个好觉,因为明天一早“good morning”之后,与一声不吭的电脑共同渡过另一天。他与同事不多说话,与白人同事讲话,他除了专业和业务,不习惯说别的,英语词汇不够是一个原因,带着口音是另一个原因,当然还有其他说不清的原因,使他一张口,总觉得像穿了一套别人的衣服那么不自在。与公司内几位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来的中国人,他也不多说话;因为中国人相互讲英文有点不舒服,而要讲中国话,不仅使其他雇员(大多数是白人)觉得异样,而且对自己的发展有害。像刘君这样在公司作为少数民族雇员的地位,大多夹在黑人与白人之间,有点像在夹板中间那一层,上不去,也下不来,当不成大老板,也做不成革命派,只能占个小班头一类的位置。小班头的生存全在于大老板的欢心和赏识,大老板不懂中国话,自然也不喜欢见到一小群人挤在一起说中文,那会给他造成一种局部地区失控的感觉,像布什一类的美国总统看到中东阿拉伯人凑到一起说阿拉伯话会不高兴一样;聪明人何必自讨这个苦吃。我的那位老同学,当然是个聪明人。

聪明人也有真切的苦衷,我是理解他们的,我绝对不想对刘君失于刻薄,好歹他总请我吃饭了。我是知抬举,懂感激的。只是内心里总觉得他为了减轻在变成黄皮白心“香蕉客”的过程中的种种不适,便不惜判定中国人全体得瘟病,过于蛮横了一些,过于冷酷了一些,过于无知了一些。

1992年冬,美国经济衰退到达谷底;他所在的公司裁员八千,其中百分之七十是“有色人种”与妇女,刘君也在其内。两年后,他“东山再起”,在另一个公司找到了职位,相继卖了原先的四卧室,买了一幢六卧室的房子,并且已经不再邀请中国人去作客当他的物质富有的仰慕者,将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詹姆士”。只是依然读不下英语报章杂志,依然无法与白人“主流家庭”社交往来。他

大概是达到了肖平所说的最高的“自我”境界。

如果再来一次经济衰退呢？再来一次裁员呢？当然，这问题似乎有点“无事生非”，至少对于在一幢房子与美元中完成了“自我”，并且目前还能保住这幢房子与这点美元的肖平和刘君们来说是如此。

实际上，有着暂时的富裕的物质生活而坠入永久的文化赤贫与虚空的现象并不是今天才有，也不是只有中国人里才有。冯友兰早在40年前访问印度时就得出一个观感，他说英国在印度的物质建设方面是作了些事，看来是由于它要以此赢利；至于在文化方面，英国好像没有作什么事，因为在这方面，它无利可图。大概殖民主义国家，对殖民地都是这个样子，殖民主义国家以它的殖民地为它的生产资料的来源和销售产品的市场，这就是说，它从殖民地掠夺原料，运回本国，作了加工，再将成品运回殖民地，卖给殖民地人民，一买一卖，从中取利，这就是剥削。在文化方面，没有买卖可做，既无买卖可做，任凭殖民地人民愚昧也罢，无知也罢，与它无关，或者对它还大有好处。有一次与香港来的朋友谈起来，他觉得冯友兰说的好像是香港的情形。香港在廿世纪终于背上了“文化的沙漠”这个“美谥”，也是大英帝国的成就之一。

冯友兰先生没有说明的是，殖民地国家的那种“文化沙漠”，并非是一片空白；那里充满了使殖民地的臣民的心灵世界卑琐枯萎，民族自觉丧失殆尽的心理“消费品”。在这方面，无论是过去的欧洲殖民帝国，还是今天的西方跨国资本，都是做得非常积极，非常自觉，非常有效，其成绩比之宗主国内部的麻醉消费文化，大致是有过之无不及的。但愿我的有幸在北美谋生“成功”的国人们，其成功的代价，不是日复一日地、被迫地或自觉地去忘却、抹杀、戕伐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自己的语言和情感，变成一种专门制造商业利润的现代冷血的机器人——因为那将是一种心灵上的沙漠化，一

种不流血的慢性死亡。死亡的形式有多种；对一个人，一个群体，甚至一个民族，可以从肉体上消灭，也可以从精神上摧毁，很难说哪一种死亡更彻底，更残酷。而一切制造文化沙漠和文化愚民的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人类生命的杀戮者。

所以请转告肖平，“像咱们这样的人”，在我的私心里，实际上与沙漠中一颗沙粒的命运相隔不很远；一不小心，“自我”的伤残、干枯与消灭大约不是意想不到的结局。也许我说得重了些，也许我说得压根就不对；只是对别人写来的长信总要有个回应，有个交待，这些片断的想法，就算是我的回应、交待吧。

再谈

丹阳

1994年6月16日

(《中流》1994年第11期)

## 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友人书简》之十五

丹 阳

文琪：

在 P 城召开的“廿世纪——回顾与展望”专题会议前天结束了。参加者是从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与地区来的学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会议组织的活动之多，日程安排之紧，是我以往没有过的体验。回到住处，倒头就睡，醒来已是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坐在书桌前，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你写信。

这是我在北美土地上参加的国际会议中收获最大的一次，许许多多的想法，一时真不知从哪里下笔。近十年来经历中记忆最深的几次国际会议的情形，开始在脑海里一一重现，其中那些使我一直难以忘却但始终未能清理的感受，在与这次会议的对比中，渐渐地变得明晰清澈起来。心里，有一份快走到长长隧道尽头的专注与期待，也有一种踏入万重关山之前的决然与安然。

记得第一次正式参加的国际性学术活动，是 H 大学历史系组织的“19 世纪欧洲文化史”专题讨论会。与会发言的廿多位学者教授，清一色来自欧洲与北美。我的一篇分析英国 19 世纪中叶文化思潮几个代表人物的论文被会议选中了。现代欧洲思想文化史中，英国 19 世纪工业高度发展后引起的“文化”重新定义，曾是我最感兴趣的课题之一。当时留学已经两年半，我全部的焦思竭虑，

是化在了对欧洲自 18 世纪以来思想主潮发展变化过程的学习与把握上。某种虽然并不清晰但是非常强烈的下意识不时地催促我,“西学”对于现代中国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必须真正钻进去,弄懂弄通;不了解西方,不掌握西学,中国人在世界上的路就很难走得通。我日以继夜地读书,我向一切碰到的人们求教。我的指导教授,欧洲来的各级访问、讲学的学者,来自各国的研究生同辈,甚至美国的大学生们,我几乎是见缝插针,无所不问。学校校报上曾刊出一篇关于国际留学生的通讯,其中对我的描绘是,那个“始终夹着一本词典,用无穷尽的难题使所有学生、教授们大伤脑筋的中国女子”。我入研究生院的第一年夏天就开始进修法文,希望在英文之外,还能在今后的独立工作中使用法文甚至德文。

如此努力的第一个结果,便是这两年半后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机会。当时,内心是兴奋与紧张的交织,感觉上简直是“大战临头”,我不断地对自己说,这就是走向世界了!这就是走向世界了!我是大会发言的唯一中国人,可不能搞砸了!想想也实在是幼稚得可爱,我几乎是把自己当成“中国发言人”那样地充满了责任感,甚至使命感;我要向“全世界的学者”证明,中国的青年人是具有水平、有能力的,对“西学”的了解与认知并不逊于他们西方人本身。我一遍又一遍在寝室里练习宣读论文,搞得我的同屋安妮“忍无可忍”,只好决定参加这场“奋斗”,每天帮助我纠正语音,搞准语调,包括琢磨调整应有的身姿手势;最后连她都能把论文中的一些段、句背下来了。而其中必须用到的几个法文词与德文词,我则专找两位搞法国文学与德国历史的研究生,让他们念上数遍,录音下来,回来自己再听着练习。

发言自然是说得过去的。一切都做得合适妥当。下来以后,好几个与会者或是问我是否来自香港,或者问我是否家在欧洲,言下之意,我的知识素养、职业风格、语音语调都合乎欧美标准,而研

究的领域专题当然是“正宗西方”的。当听我回答说是来自中国，则都露出几许惊讶，意在表扬地摇摇头，说是“没有想到”！我不自在地感受到周围一双双含义多样地注视着自己的眼睛，会议室里簇拥的人群渐渐变成一片白色的湖水，而我是这荡漾回旋的湖水中，一枚沉浮漂转的树叶。一份涵义复杂的扰动不安在我心里开始涌动，我转出了会议室，走到空幽的休息厅里，在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想独自静一静。

不知过了多久，面前的玻璃桌上放下了一杯热咖啡，抬头看见一位中年男子，他手里握着另一杯咖啡，问：“我可以在这儿坐一下么？”我忙点头致谢并说当然可以，并且意识到会议到了休息的时间。远远看见系主任 S 先生匆匆走来；到了跟前，他先是祝贺我的发言成功，又嘱我午饭时记住与他坐在一桌，他要把我介绍给几位“重要的欧洲学者”；说完，向我对面坐着的中年人点头招呼，又匆匆走开忙去了。

我转过脸来看着面前这位陌生人，觉得他似乎有点与众不同，但又说不上不同在哪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我接过看去，知道这是美国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中心之一 Howard 大学来的教授；同时，心里才渐渐意识到，他之所以给我“与众不同”的感觉，是因为他黑中透棕的肤色和一头卷曲的黑发，他是我留学以来见到的第一位黑人教授，自然也是这次会议参加者中唯一的黑人学者。他的名字叫 W. Herton。

谈话是以中国开始的。他告诉我，他很高兴见到从中国来的青年人。他在 60 年代初去过中国，那是一次不寻常的体验，人民的乐观与国家的向上精神给他印象极深。听着他那宽厚、从容的嗓音与异常清晰的谈吐，我的心情渐渐平稳下来，白色的湖水与漂转的树叶悄悄地隐去，一双脚又开始感到了地面的坚实。

我已经记不清我们还说了些什么，似乎大致是我的来龙去脉，



国内的出身地,从事的学业与兴趣等等。然而接下来的谈话,则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他先是问我这样地深入研究欧美文化历史,今后想做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想从中发现掌握对中国的发展有用的东西,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他点头沉吟着,神色严肃起来,问我是否知道我在论文中用肯定的口吻提到的 M. Arnold,当时所倡导的“现代文化精神”是以英国文化为中心,欧洲文化为范畴,而将其他非欧美的民族完全排除在外的?见我睁大眼睛,一时没有反应,他换了角度再问:“你觉得 Arnold‘各民族互补交融’的理论对中国现代化有用。当 Arnold 积极主张把‘英国文明’介绍给世界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什么?”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八四〇年”,而这年份一经放到中国的历史内容中,立刻变得那样的血火浓漓,刻骨铭心:“中国发生了鸦片战争,”我的声音变得沉重了。他点了点头,凝视着我:“在非洲,发生了柏林会议之后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帝国的瓜分狂潮。非洲的整个版图,从此面目全非。Arnold 的英国,正是鸦片战争的英国,也是瓜分非洲的英国……”

我的心里,开始出现某种类似于地震前的动荡。他还想再说什么,午餐已经开始,系秘书跑来让我快去就席,谈话就这样中断了。会议结束后,我到处找这位 Herton 教授,想再约他谈谈,但是会议服务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已在午餐时分离去,乘坐下午一点的飞机回 Howard,临行给我留了一张纸条。我匆匆打开纸条,上面写着:“愿你像大树一样有深根,也像鸟儿一样有翅膀;根深才能生机蓬勃,有翅膀才能远远地飞翔。”落款日期是 1986 年的 5 月。

文琪,你可以想见这张纸条和这次半途中断的交谈对我产生的影响。虽然当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他那些话的全部内涵,完全把握历史的“深根”与知识的“翅膀”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我给自己总结了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一切认真研究西方的人,必须始终记住

中国,必须在深入西方的同时,透彻地理解中国,因为漠视或者不懂近代中国的人,不可能真正认识西方。从此,在琢磨欧洲近代社会发展的时候,我会不断参照与此同时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在追索西方各类思潮的时候,我会不断比较在中西两方面的实际生活中,这些思潮不同的内涵外延与变异归宿。在摸索西方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整体构造及具体运作的同时,我随时审视着这构造对西方意味着什么,辨认着这运作给中国带来的后果。当在逻辑的层面上,西方的强大并非一定与中国的受损相辅相成,而在历史的现实中,西方的扩展与中国的贫弱往往互为因果时,掌握“西学”便成为一种双重的努力:是探索,也是抵御,是汲取,也是扬弃,是学习,也是斗争;既是把握认知他人的过程,也是变革创造自己的机会。当同辈学人问我为何不在美国利用“背景优势”,以中国问题作为自己的论文题目,却在啃欧洲思想史的“酸果”,我说自己其实就在努力理解中国,我说的是实情。我是努力在中西双方一百五十年多来的多重联系中,认识西方,理解中国。

那是一个收获丰美的思想的季节,我醉心于知识与信息的迅速增长,视野与思路的日益拓宽,完全没有预见到自己这一份发展中的理解,将会如何地与美国主流派的“中国问题专家”发生根本性的冲突。而这冲突,并不管我是否愿意或者有无准备,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范畴的巨变动荡中,遽然到来了。

我会永远记得那一次在芝加哥举行的北美亚洲研究学术会议。其时,我的论文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见此次会议规模宏大,讲坛林立;其中一组有关中国“现代化”的讨论尤其引人注目,我未加多想便欣然前往,相信不会虚行。

然而,我是大大地惊讶了。

首先,我没有想到那位名声显赫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会如此或明或暗地把当代中国与满清时代完全等同,而两者等同的特征

竟都是对西方“无知”与“无理”。在他的描述中,鸦片战争,源于林则徐的“粗暴禁烟”,正像现在西方国家的种种“制裁”,源于中国人“违反现代文明社会标准”。1840年以来整整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史几乎等于空白,中国人的全体,仍然处于“非现代化”的史前时代。“迄今为止”,这位白肤蓝血的“中国问题专家”总结道,“我们仍然不能称中国为‘现代民族’,因为它并未能够像英、美、德、日诸国那样,对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清楚自信,与他国在政治开放中,平等地进行经济文化的竞争与交融。”

我也没有想到那位1949年从中国大陆到了台湾,又从台湾来了美国的首席华人血统“汉学家”,会将中国现代文化奠基人鲁迅先生径直斥为“好勇斗狠”、“偏知陋学”的“学匪”人物;说是尤其是鲁迅后期的杂文,全无“面向世界”的若谷虚怀与恭良修养;太平天下,偏去心造乱世之象,专好指人为权门“二丑”或者租界“西崽”。“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自然进程,”这位黄皮肤黑眼睛的“著名学者”收尾道,“由于出现鲁迅这样的文人而发生病变,至今未能产生欧美那样真正的文学巨著,纯净的文化巨人,而总是政治,政治,还是政治!”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接着发言的那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同辈学人、已在P大学谋到教职的“汉学”新星,开口便宣称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周恩来是天下第一个伪君子,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由于他们和他们同党的出现而推迟了几十年。事到如今,只能是从头再来,老老实实地向西方学习,“向世界靠拢”,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在“国际社会”中重塑形象,寻求接受。他用自己从一个中国留学生成为美国汉学家的“成功”经历为例,说明中华民族这样的“从头再来”不仅必须而且可行,但是“要有勇气,要有决心”。比起第一位白人“专家”,他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空白”显得更为痛切;比起第二位黄肤“学者”,他对中国“从头再来,走向世界”的未

来前景,显得更为乐观。

白皮肤和黄皮肤、老牌的和新产的美国专家的滔滔不绝地“研究”“解剖”着中国和她的人民。我坐在听众席里,作为被“研究解剖”对象的一分子,只觉得呼吸压迫,头胀心躁;这是一种类似缺氧的感觉,一种在窒息中的挣扎。我问自己,火烧圆明园,血洗南京城的英、法、德、日,怎么成了被烧被杀的中国人缺乏自信,抗拒开放,不肯与他人“平等交融”的见证人?租界华界赫然分明的半殖民地中国,怎么成了鲁迅先生心造的幻景?而一身入时洋装,一口美国英语的“时代英雄”,连国籍都已归属了美利坚,怎么成了中国未来的出路与象征?在他们盛气凌人的陈述判断中,近代中国似乎是一个巨大的蚕茧,与世相隔,混浊无知,其中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味自戕的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以英、美为核心的西方强权自1840年在中国的土地上所做的一切,那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开端、裹胁着中国近代史进程的“西方问题”,在他们对中国的“研究”中,由淡化到消失,直至踪影全无。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他们研究的专题只是“中国方面”的中国?然而,在他们对“丑陋中国”的解剖中,西方的“瑰美”分明无处不在;在他们对“愚昧中国”指教中,西方的“文明”几乎呼之欲出。在他们手中,具体的历史的西方强权悄然隐去,抽象的诗化的“西方世界”则成为永恒。这份西方世界“永恒”的“瑰美”,当然并不是通过直接的表达与论证得以呈现,而是层层包裹在他们对近代中国的解释阐述里,深深蕴含在他们对“西方问题”的刻意回避中。当他们以种种“学术”手段与语言,描绘出一个西方眼中的“异己”,一个必须全力重塑的中国,他们显然一刻也不曾忘记这“重塑异己”与强权西方一统天下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确实是训练有素、忠于职守的美利坚合众国“中国问题专家”。

会议例行的问答部分开始了。一片举起的手中,不知为何,第

一个点到的是我。我一站起来，双颊便开始发红，一开口，就有点收不住的意思。我已经记不清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只记得身居讲坛的同辈学人，未等我把话说完，便高声打断，全力反驳。我心中涌动的愤懑至此达到饱和，提起书包，抬腿就向门口走去。我走得是那样急，以至没有看见门边放的一把椅子，绊了一下，手中的纸笔文件洒了一地，众目睽睽之下，我的脸色大约已是赤红。

立刻，就有两三位与会者跑上来帮我收起地上的东西，随后跟我一起走出门去，把那场并未开展的“争论”留在了身后。在楼道转弯分手处，他们向不肯再发一言的我伸出手来，握别时，各自说了几句话。第一位说：“请相信，并非所有的美国学者都与他们看法相同。”第二位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不解答‘西方问题’，就无法解答中国的根本问题；近代以来的中国问题，早已不仅仅是中国单方面的问题！”第三位说：“我只想补充一点：中国现实中的‘西方问题’，与近代西方自身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复杂尖锐的矛盾与危机，有着深刻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你指出的问题，也是西方在反思认识自身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抬起眼睛望着面前三位辞情恳切的美国学者，激动与激愤的情绪渐渐平缓；心里是一份安然降临的清朗，一份孕育已久的黎明……

在美国执教已经整整两年。五个辗转、抗争，和开拓的春夏秋冬，芝加哥的会议风波已经在这长长的跋涉中成为过去的记忆。但那是一份绝不会淡忘的记忆，像铁一样，凛冽而严峻。如果说1986年第一次参加的国际会议使我悟出研究西学必然始终记住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体验，芝加哥的风波则使我认清把握中国必须直接面对“西方问题”这个历史现实。在这涵盖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全方位的“问题”中，承担着解释人类世界“公理与规律”之重任的“西学”，自然是极为关键的方面。而构成西学核心的，不仅

是中国自严复以来涉足西方的探索者所注目的那一切——即西方用以组织与定义自身的政治、学术及其相应的社会机制,更包括西方用以重塑与统治他人的强权文化及其相应的理论与实践。近代以来西方对自己的组建与定义,离不开其对全球的扩张与统治;这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的两大方面,构成了西学的基本认知框架与价值主流。那位我曾经很感兴趣的英国 19 世纪的 M·Arnold 先生,他对英国高度工业化后文化的重新定义,正是与英帝国的殖民“事业”一脉相通的。而比起他们十九世纪的祖先,20 世纪末美利坚的主流文化权威并没有提供本质意义上的创新,只是他们变得更为“专业化”、“专家化”,他们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更为深入、精致,更为系统、全面了。

时间与历史以无情的速度流逝着;90 年代也已经进入了中叶。我是带着对“西方问题”的种种思索,参加了这一次在 P 城举行的“廿世纪——回顾与展望”专题会议。我的发言排在会议的第三天上午,这使我在发表自己的看法之前,有了倾听他人与充分交流的机会。意外而又不意外,我对“西方问题”,西学问题,文化强权问题的审视与感觉,几乎可以在所有来自第三世界的学者们的论述中找到共鸣与认同。我们来自这个地球上不同的地方,我们的语言、肤色、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然而我们都在世界近代史的进程中,经历了惊人相似的苦痛,灾难,挣扎与奋斗。近十年前与 W·Herton 教授的那一次交谈不断地在心里重现,我的眼前渐渐展开了一个以往不曾自觉地注意到的世界;以这个世界为背景、为参照,中国的一切变得更为清晰起来。这个世界,包括中国,但不囿于中国,包括西方,但不等于西方;这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这是真正无限多面的人世间。在这个人世间,有着众多不同肤色的民族与文化,有着无数不同的生命和历史;纷繁多彩的古文化,曾经在这个地球上各自生存,各自发展。是欧洲近代工业的兴起,给地球

上这多元的生命景观带来了深刻的变异。船坚炮利,摧毁重塑着地球上的每一方水土,铁路航道又把每一方水土产生的富饶输回了欧洲。由此崛起的欧美列强,在为自己建立金元帝国的同时,将连成一片的世界,又划分成种族、阶级和性别的森严等级。无限多样的人生,被统治着这等级秩序的人们,按照他们的意愿,或者控制盘剥,或者遏制灭除;而求生存的抗争,求发展的创造,也从此在被统治的人们中间发生延续。五百年的人类近代史,便由此构成。

是的,五百年,星轮流转,山川依旧的五百年。尽管当今列强的中心已从欧洲移到了美国,尽管武力的入侵更多地演化为经济与文化的占领与控制,这原本是变化无穷的生命世界,还是被源于欧洲岛国的那种叫作“英语”的语言所统治。全世界 40% 的能源,为占人口 5% 的美国使用消耗;全世界绝大多数的资金和 70% 的能源,为占人口 15% 的西方所控制拥有。与此同时,每年有高达数百万的生命,在非洲的土地上由于饥馑而彻底消失,有高达数百万的人们,在亚洲次大陆的印度行乞街头。然而,占世界人口 20% 以上的中国大众,以世界 5% - 6% 的能源与极其有限的资金,不仅顽强地生活着,而且确确实实地发展着,尽管生活中有重重挫折,尽管发展中步履艰难。“现代中国的故事是 20 世纪人类历史上近乎奇迹的巨大成功”,一位来自非洲加纳的朋友这样对我说。“这成功,给世界上一切必须准确地解答‘西方问题’,必须在变革中发展自己的人们,带来了选择的希望;因为迄今为止,所有追随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经历和得到的,不是政治上的依附,就是文化上的危机和经济上的灾难!”

这位用英语、法语、加纳的 Fanti 语,和肯尼亚的 Swahili 语四种语言写作,作品遍布世界的非洲女作家,也是这次“20 世纪——回顾与展望”专题会议上的主要发言人之一;她平静而又坚实的声音,引来了四方的呼应与巨大的回声,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拥有无数

的朋友与同志,中国在这个人世间拥有西方无法企及的意义与象征,因为中国属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在抗争中生存,在创造中发展的人们。当强权西方不再成为想象中的“地平线”的时候,面前展开的,将是无限广阔的世界人生。

我坐在讲坛上,坐在我的加纳朋友的身边,等待着轮到自己发言的一刻。蓦然,在听众席里,我看到了一张似曾相识、亲切熟悉的脸庞,那一双严峻而坦诚的眼睛似乎在向我微笑着。记忆的光亮像闪电一样掠过心头,我几乎叫出声来:W·Herton 教授!那是他,我9年前相遇、9年来从未忘却的友人!抑制着内心的激动,我从笔记本里取出一张对叠的纸条,打开,悄悄地向他举了举,他远远地向我点了点头。

那是他9年前留给我的祝愿:“愿你像大树一样有深根,也像鸟儿一样有翅膀;根深才能生机蓬勃,有翅膀才能远远地飞翔。”Herton 教授,谢谢你!我在心里说,我的根会深深地扎在中国的土壤之中,我的翅膀会在风雨里磨炼得坚强。中国与整个的世界,都将是我的生活与奋争的战场。

文琪,亲爱的好朋友,你看见了吗?前面那一片辽阔的天地,那一个永无穷尽的世界……

深深想念你的 丹 阳

1995年10月1日

(《中流》1995年第12期)